

新 中 學 文 庫

美 國 史 略

納 康 王  
文 麥 育  
斯 格 伊  
著 譯

2  
752  
1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美國文化叢書

美 國 史 略

Allan Nevins

Henry Steele Commager

原 著

王 育 伊 譯 述

國立北平圖書館主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海初版

（88.52 滬報紙）

美國文  
化叢書  
美 國 史 略 一 冊

The Pocke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定價 國幣 柒 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 版 權 翻  
\*\*\* 印 必 有  
\*\*\* 究 所 必 有  
\*\*\*

原 著 者

Allan Nevins  
Henry Steele Commager

譯 述 者

王 育 伊  
國立北平圖書館

主 編 者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發 行 人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書 館

## 原序

美國從暗昧出現於歷史，只是約四世紀前的事。它是最最新的大國，但它在多方面上是最有趣味的。它的有趣味，因為它的歷史扼要重述種族歷史，插入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發展。它的有趣味，因為那些形成現代世界的歷史大力量大因素——帝國主義、國家主義、外來移民、工業制度、科學、宗教、民主、自由——多數在美國表現過；因為這些力量在社會上的衝擊力，顯示在美國歷史上的，比較在其它國家歷史上的更清楚。它的有趣味，因為它雖然是少年，它今天是最老的共和國，最老的民主政體，並且生存於世界上最老的成文憲法之下。它的有趣味，因為它的人民自始就已自覺有一個特殊的命運，因為人類的希望和抱負已堅附在它身上，因為它能完成那命運，能證實那些希望為正當。

美國故事是個舊文明在一個荒野環境上衝擊的故事。美國已經跳過初期六千年歷史，雄壯且成熟的出現於歷史舞臺上，因為最初的殖民不是原始的而是文明的人，他們移植已有若干世紀的一個文明到這裏。可是新世界並不只是舊世界的一個擴充。它的最早殖民所預期與它的創建先進所計劃的歷史上的新東西。因為未開闢的荒野，面對大西洋到露有曙光的太平洋的開拓者，深深的改變了遺傳的制度，民族種族的混合改變了遺傳的文明。美國成為從來着手民族混合、宗教自由、社會平等、經濟機會、和政治民主的最有希望的實驗。

歐洲史家和旅行家，很容易的承認美國人民的實質上美德，久已堅持說美國歷史平凡無色，無變化，不豐富，不優美。但是，反過來說，它是大可驚人的，奇觀的，鑄成英雄模樣的。現代歷史上，沒有相類似於一羣弱小民到一個大陸上迅速擴展的故事，也沒有相類似於一些零散殖民地長成最強國家的故事。我們的山隘和封建堡壘同樣的壯觀，我們的市鎮集會和宮廷同樣的莊嚴，人民的雲集內地和古代諾曼人 (Normans) 或阿剌伯薩刺森人 (Saracens) 同樣的可驚，我們的國家英雄——華盛頓、哲斐孩、林肯——能夠和任何其它民族的

英雄站着相比。對從事爲自由與民主作有力奮鬥的一世代，美國歷史中自由強韌進展和民主不斷增長的故事中，有些令人興奮的事。

這本歷史是爲平常人而不是爲學者寫的。它不想例示原本的研究，也不想下手新見解。它是被設計以應副美國人民對一個簡短敘述歷史的需要。著者想包括進去的許多事，因爲篇幅的缺乏，他們不得不刪節；他們堅決抵抗魔道，以免迷入政治、軍事、和文化史的許多有趣味的小路，重新創造被遺忘的人物，從事迷惑的爭論。著者沒有把美國歷史首先當作政治的或經濟的，或當作一套問題，而是把它當作一個自由社會演進的事。本書假使有個主題的話，它已包含在書名裏——就是一個才智足以要求自由、並願爲自由努力、爲自由奮鬥的民族的發展。

愛蘭·訥文斯 (Allan Nevins)

亨利·斯提爾·康麥格 (Henry Steele Commager)

# 目次

序	一
第一章 殖民地的樹立	一
第二章 殖民地遺產	一八
第三章 新法蘭西的征服及獨立運動	三七
第四章 革命與聯邦	五四
第五章 制定憲法	七二
第六章 共和國的地位	八六
第七章 舉國一致的興起	九六
第八章 賈克孫派民主主義的得勢	一〇七
第九章 西部與民主	一一九
第十章 區域鬭爭	一三三
第十一章 兄弟戰爭	一四八
第十二章 現代美國的出現	一六一
第十三章 大實業的興起	一七五
第十四章 勞動與外來移民	一九三
第十五章 西部的成年	二一一
第十六章 農民與他的問題	二二五

第十七章	改革時代	二四四
第十八章	興起到世界強國	二六一
第十九章	威爾遜與世界大戰	二七四
第二十章	從大戰到大戰	二八八

# 美國史略

## 第一章 殖民地的樹立

### 北美地勢

一六〇七年四月某日早晨，船主紐博德 (Christopher Newport) 所率領三隻船，遇風損壞，停泊在折沙比克灣口 (Chesapeake Bay) 附近，船員上岸，看見一片芳草，修木清泉，十分悅目。英國在美洲殖民地的歷史，開始在這時候。同船者有若森伯爾伯爵 (Baron of Northumberland) 的兒子柏賽 (George Percy)，少年個儻，又有船主約翰·斯密 (John Smith)。柏賽敘述如何發見華貴的森林，地上鋪滿了花；草莓生得有英倫的四類大，又比英倫的好；牡蠣極肥，味道又鮮美；小獵獸很多；有整堆火雞窠和雞蛋；又有一處印第安人市鎮，野人給他們送來穀類麵包和煙草，煙草用帶銅碗的泥管吸食。這些在維基尼亞 (Virginia) 的初次經驗似乎盛傳一時。柏賽的觀察記 (Observations) 描寫新來者對美麗的鳥類、水果、鱧魚和風景的喜悅。但他的敘述雖優美且充滿詩意，而結局却是可怕。因他敘說印第安人如何攻襲殖民者，「四肢着地，像熊一樣，從山坡爬來，口裏啣着弓；」人們如何死於惡疾，如腫病、痢疾、和高熱症；很多只是死於饑饉，「屍體從木頭房子裏被拖出，像狗一樣的埋了」。

在美洲樹立一新國家，不是件遊戲，乃是一件可驚、賤苦、費力、危險的工作。美洲是一未曾開闢的大陸，東部為森林所蔽無路可通者居三分之一；它的山脈、河流、湖泊、平原都是面積廣大；北部一帶冬天嚴冷，南方區域夏天酷熱；野獸充斥，人民兇詐好戰，我們的文化還在石器時代。在許多觀點上看，美洲是個禁



地。美洲只有航海可到，航程如此危險，沈埋到海底去的船和到岸的一般多。雖然失事層出不窮，美洲做有毅力有進取心者的家，倒極合宜。

北美大略是個三角形的大陸，它的最廣部份——一個富庶、錯綜、水道縱橫的區域——位置在北緯二十六和五十五度平行線之間。這裏氣候適於衛生，溫暖的夏天使農作物能長得好，寒冷的冬天刺戟人們去活動。歐洲人能在此立足，不須費適應環境之力。他們能種他們的主要食物：小麥、黑麥、燕麥、豆類、蘿蔔和葱。他們在新大陸上找到了兩種極有價值的新食糧——玉蜀黍和馬鈴薯。「印第安穀」（玉蜀黍）如播種於五月，盛長於七月，收成極豐富，可供人畜之用。獵獸遍地皆是，鹿和野牛成千成萬，鴿子遮黑了天空。探查的結果不久揭露了北美蘊藏煤、鐵、銅、石油，比其它任何洲都富。它有幾乎無邊的森林。海灣港口給沿東部海岸許多隱蔽。沿岸大體是低地，聖勞仁斯 (St. Lawrence)、康納格第 (Connecticut)、赫德孫 (Hudson)、德拉瓦 (Delaware)、薩斯克罕那 (Susquehanna)、波陀麥克 (Potomac)、詹姆斯 (James)、皮第 (Peece)、薩凡那 (Savannah) 諸大河，使人們容易深入內地。一個立足地，不須很大艱難便可獲得和擴展開來。

大陸上某數種自然形勢，注定影響於美洲國家的將來。沿大西洋岸上的許多灣港利於很多小殖民地。不久，有十五處建立了，新蘇格蘭 (Nova Scotia) 與魁北克 (Quebec) 計算在內。它們給美洲初期歷史以多種制度，各種堅持了它自己的特點。當獨立來到，從這些單位中之十三個新造成的國家，不過成爲一個聯邦。沿海平原的背後，聳起一條寬大荒蕪的山脈——阿帕拉幾 (Appalachian) 山脈。在殖民者費大氣力於橫渡阿帕拉幾之擴展以前，這山很難越過，使得沿海殖民地成長得相當稠密堅強，根深蒂固。當殖民地向西推進，攀過山嶺，一片中央大平原，密西西必 (Mississippi) 盆地，呈現在他們眼前。這大平原，幾乎包含合衆國面積之一半與其已耕地地之一半以上，地勢平坦，所以交通便利；特別有威斯康新 (Wisconsin)、愛奧華 (Iowa)、伊利諾 (Illinois)、俄亥俄 (Ohio)、昆布蘭 (Cumberland)、田納西 (Tennessee)、阿干薩斯 (Arkansas)、利諾 (Illinois)、和紅河 (Red) 諸河流交互東西，密西西必密蘇里 (Mississippi-Missouri) 大河貫穿南北，可以航行。殖民很快

很易布滿了這肥沃的盆地。從沿海各地與西歐各國來的人，在平等關係之下融合在這裏。它成了新民主主義與新美洲情感藉以發達的大池。

更西是氣候乾燥的高原，洛磯 (Rocky) 高山正當背後，長久阻礙了殖民的湧潮。遙遠的太平洋岸的金礦和其它礦藏，在這平原從印第安人手裏奪過來之前幾十年，已經招徠了一大羣冒險先鋒。當一大段未經殖民之地帶把加利福尼亞和俄勒岡 (Oregon) 隔開合衆國舊部分以前，加利福尼亞已是人口稠密勢力強大的一州。這一帶未經殖民之地，並不長此荒蕪。隨着水牛獵戶，牧人很迅速的遍布平原，鐵路帶來了征服無樹地方所需要的物品：鐵絲網、風車、木材、和農具，人口也漸漸稠密起來。灌溉的田畝，數量也有增加。一八九〇年左右，邊地實際上已絕迹，荒野的西部已不復存在。

美洲殖民活動，初期大致取自東而西的路線，是件不可避免之事實。最便於通入內地的聖勞仁斯及諸大湖水道，從大西洋上溯水源，大略成個東西方向。在北阿帕拉幾山之摩和克 (Molok) 流域罅口，後來用作意大利 (Erie) 運河基址者，又是東西流的一個例子。殖民地的第三條大動脈俄亥俄流域也大略隨東西路線。很明顯的，遠從大西洋到洛磯山的移民，有追隨緯度平行線的傾向。據有路易斯安那 (Louisiana) 的法國主權與墨西哥在加州及西南的主權，於操英語的美人推進到時，勢將消蝕，也是無可避免之事。甚至在殖民地時代，有遠見的觀察家已經指出：掌握俄亥俄流域者將來必定掌握密西西必。同等正確的是，掌握密西西必者最後必定掌握它以西的全境。具有絕大的人數與勢力，美洲人儘量利用了他們的地理優勢。

白種殖民所傲幸的是北美印第安人口太少，文化太落伍，鉤不上為殖民事業的障礙。土人攪擾了並且有時就攔了殖民事業，但終究沒有阻止了它。歐洲人初到時，密西西必以東的印第安人大約不過二十萬；墨西哥以北，全大陸上，不過五十萬。武裝僅有弓、箭、戰斧、戰棒，除却埋伏，不懂別的戰術，他們所以常非武裝完備防範週密之白人的敵手。因此，土人在克服自然的能力上，無所表現；他們的生活，以漁獵為主，所以資源不安全。在墨西哥以北之五十九族，其中數百部落，大多數弱小，不能召集堅強的戰隊。最強大的印第安組

織是意羅魁意 (Iroquois) 族的五(後來六)國，它的根據地是西紐約，它有一個大會議，它又抱侵略政策，為鄰近的阿爾貢金 (Algonquian) 諸部落所畏懼。在東南，有克里克人 (Creeks) 所組織強大的馬斯可金 (Muskogean) 族同盟。遠在西北高原上，蘇克斯人 (Sioux) 建立了比較鬆弛的組織。

在殖民地時代，殖民與印第安人的鬭爭，經過有幾個明顯的階段。殖民地樹立之初，各地大多數與隣近小部落發生嚴重的地方爭執。一六三七年新英格蘭的白可特戰事 (Pequot War)，時間短，情況劇烈，居住康納第格流域的白可特族，終於完全滅亡，是個好例證；維基尼亞殖民與包哈坦 (Powhatan) 部落的戰事，開始於一六二二，結果又是印第安人慘敗，也是一個例證。但當白種人進而略地時，土人便結合部族同盟，從事抵抗。例如新英格蘭土人會長菲力 (King Philip)，集合當地幾個部落，血戰兩年才被打敗；北卡羅來納 (N. Carolina) 殖民在塔斯卡羅拉 (Tuscarora) 戰事中，南卡羅來納 (S. Carolina) 殖民在牙馬西 (Yamassee) 戰事中，都遇到類似的結合。這些鬭爭，劇烈廣泛，使白種人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未後形成印第安人和歐洲人聯盟的戰局。有些北方部落和法國人相結合；有些南方部落受西班牙人的接濟與鼓勵。英語殖民幸虧得到強大的意羅魁意同盟以友誼態度相對待，並且得到他們的實際幫助以反抗法國人。敵對的印第安人，在這戰事的第三階段中，同前兩階段一樣，終於慘敗。

### 初期殖民

初期的英國殖民，成羣結隊前來新大陸。紐博德所率領的幾隻船，於一六〇七年五月十三號駛入漢布頓 碇泊所 (Hampton Roads)，只載有男人。他們建立詹姆斯城 (Jamestown)，有礮台一座，禮拜堂一所，倉房一所，小草房子一排。斯密船長在困難中表現出膽量、機智、精力；第二年，他做了殖民地總統和實際獨裁者。農業漸漸發達起來；羅爾夫 (John Rolfe) 於一六一二年開始栽種煙草，當煙葉在倫敦市場上賣高價時，人人都從事栽種，甚至市集上也種起它來；豬和牛也有增加。

成長可是緩慢。一六一九年左右，維基尼亞人口不過二千。那年有三件事值得稱道。一是：有一隻船從英倫載到少女九十位，婚配給繳納煙葉一百二十磅作運輸品的殖民。這批運品備受歡迎，不久又有同類的送到。同等重要者是代表政府在美洲的創始。七月三十號，大陸上的首次立法議會開會於詹姆斯城禮拜堂，出席的有十個殖民地，各有長官一人，參事官六人，市民二人。幾年前，羅爾夫娶了樸卡亨大斯 (Peachonts)，因此和印第安人在這禮拜堂中訂立暫時的和平。等三件大事是：那年八月間有一隻荷蘭船來到，載有黑奴，售賣二十名給殖民。

當維基尼亞在這樣盛長中，一羣遷居荷蘭的英國凱爾文派教徒 (Calvinists)，正謀前來新大陸。這派教徒，原住諾丁漢郡 (Nottinghamshire) 的斯克魯貝 (Scrooby) 村，因為抗議國王的最高教權，并想建立一個自己的教會，致被虐待放逐。從各方面看，這派是個可注意的團體。他們有三位才能傑出的領袖：教師魯賓孫 (John Robinson)，學問淵博，胸襟寬廣，心地和藹，出身劍橋；布留斯脫 (William Brewster)，一位聰明的長者，也出身劍橋；布瑞德福 (William Bradford)，機警、有威、富於理想。這派羣衆有忠實、勤勞、嚴肅、勇敢、和堅忍諸種美德。他們曾在英國忍耐過世俗的嫉視，曾在荷蘭感受過寂寞和痛苦。現在，獲得移殖美洲的特許，一隻船名叫「五月花」 (Mayflower)，和一批糧食，他們準備投身荒野。一百零二位教徒，從里穆斯 (Plymouth) 啓航，於一六二〇年舊曆十二月十一日在馬薩邱塞 (Massachusetts) 海岸登陸。那天，半數以上死於嚴冷和惡病。第二年夏天豐收，秋天有一隻船載到新殖民。他們的決心從不動搖。當那拉干塞 (Narraganset) 酋長卡農尼古斯 (Canonius) 送與他們一張蛇皮裹着一束箭表示挑戰，布瑞德福把槍彈塞在蛇皮裏，帶了應戰的答覆還他。

其它英國殖民地陸續成立得很快。好像幼蜂孵化成熟，闕闕出了母窠。一六二九年五月某日，倫敦碼頭上起了一片喧嘩喝采之聲，五隻船載有殖民四百人，牲口近二百頭，爲一次中橫渡大西洋的空前最大團體，向馬薩邱塞灣駛去。六月底，到達撒冷 (Salem)，那年秋天，恩狄科特 (John Endecott) 和一小羣同伴在那

裏樹立了一個市鎮。這些人是清教徒——英格蘭教會分子，起初想改善或肅清它的主義，後來退出該會——並且開始了一個清教的大遷移。一六三〇年春天，溫斯洛普 (John Winthrop) 率領了十一隻船到達撒冷，帶來殖民九百人，足夠建立九個新市鎮，包括波士頓在內。馬薩邱塞灣殖民地發展極快，不久便向西南兩方散布出分支。熱烈主張政教分立和其它激烈見解的撒冷宣教師威廉斯 (Roger Williams) 被放逐到羅德島 (Rhode Is.) 的荒野上。一六三六年，他建立了普洛斐登斯 (Providence)，作爲一個宗教信仰完全自由的地方。那年，有決心的呼克爾 (Thomas Hooker) 牧師率領他的會衆的大部分，從劍橋向西遷移，初次向康納第格 (Connecticut) 的移民就此開始。當胸襟自由的第二世巴爾的摩勳爵 (Cecilus Calvert, Second Lord Baltimore) 領導首次殖民於馬里蘭 (Maryland)，另一個著名的殖民地實現於一六三四年。初到那裏的貴族大多數是英國天主教徒，像建立者一樣，大多數平民却是新教徒。信仰自由因此成爲要素，馬里蘭並且成爲宗教自由的家鄉，招徠了不同信仰的人民。維基尼亞殖民早已冒險進入現在的北卡羅來納，約在一六五〇年，一部分人佔據阿爾伯麥爾海峽 (Albemarle Sound) 的陸地。

有一個富庶的殖民地的地址，是從征服得來。荷蘭人派遣英國航海家赫德孫 (Henry Hudson) 探查那條由探險者得名的河，這工作實行於一六〇九年，荷蘭皮貨商人追躒而來，一六二四年，一個小殖民地興起於曼哈坦島 (Manhattan Is.)。新荷蘭省 (New Netherland) 雖然成長，可是緩慢，也未能發展自治制度。這時英國人從未放棄整個海岸的要求，康納第格殖民地急於吞併其多事的隣人。在英屬美洲的正中心，豈容他人鼾睡？查理二世把這塊地賜與他的兄弟約克公爵，公爵決定用武。一六六四年夏天，軍艦三艘開到新阿姆斯特丹 (New Amsterdam)。兵臨城下，康納第格部隊勸來助戰，馬薩邱塞和長島 (Long Is.) 也應許出兵。大多數荷蘭殖民民，苦於苛政，對易主這事不置可否。老斯泰未散特 (Peter Stuyvesant) 雖然聲言寧死不屈，但已無能爲力。英國旗子飄上這城，改名紐約 (新約克)。但後來英荷戰爭 (一六七二——一七四一) 一短時期外，從此爲英國所據有。實在，從肯內北克 (Kennebec) 到佛羅里達 (Florida)，都飄揚了英國旗。

但有一個最可注意的殖民地，到十七世紀之末，還沒有固定輪廓。一些英國、荷蘭、和瑞典殖民民找着他們的路，進了後來爲彭西凡尼亞 (Pennsylvania) 和德拉瓦 (Delaware) 的地帶。一六八一年，慈善且有眼光的威廉·彭 (William Penn) 掌握這區域，備準依照教友派的宗旨建立一個模範共和國。這派信徒是後來維爾德 (Voltaire) 所稱爲人類中最真實的基督教徒。彭氏本着他的仁慈風度，以友好的購買條約使印第安土地寧靜下來。他以自由的條件招徠殖民，允許他們可以有土地，成立美滿家庭，和他們的隣人以公正平等相處。基督教徒不因宗教派別的關係而遭到虐待。內政決於法治，人民得與開法律。他指揮費勒德爾非亞 (Philadelphia) 的建立，取「友愛之城」的意義，每所房子都有花園圍繞着，成爲一座綠色並且適合衛生城鎮。一六八二年，他親自從遠道帶來一百位殖民。彭西凡尼亞驚人的繁榮了，吸引來不少英國和大陸上的殖民，但保存着教友派的外形。

大約說來，移民英國和它國人出洋建立新國家，主要的媒介有兩件。樹立維基尼亞和馬薩邱塞者，是以牟利爲目的而組織的貿易公司。由住居倫敦的股東所創辦、因而得名的倫敦公司，於一六〇六年取得特許，准其在北緯三十四到四十一度之間樹立一個殖民地。股東住居普里穆斯和布里斯托 (Bristol) 等處的普里穆斯公司，在同年得到在三十八至四十五度之間樹立殖民地的特許。這些公司有權分配土地、開礦、鑄錢、和組織其殖民地防務。頒給特許勅書的國王，操有殖民地政府的最終裁判管轄權。一六二四年，倫敦公司經過重大虧空，廢除特許，英王把維基尼亞收爲王家殖民地。普里穆斯公司創辦多處小殖民地和捕鯊站，可是沒有獲到贏利，改組之後，於一六三五年請求撤銷特許，叫他自己爲「沒了氣的死屍」。

倫敦普里穆斯兩公司倘使不獲贏利，都已在殖民事業上有了見效的工作。倫敦公司在實際意義上是維基尼亞的父母；普里穆斯公司和它的承繼者新英格蘭公會在緬因 (Maine)、新漢布什爾 (New Hampshire) 和馬薩邱塞先後建立城鎮多處。又一個團體，馬薩邱塞灣公司，另有一種特別性質和一個特別前途。這公司當初是個股東的團體，大多數股東是具有商業和愛國動機的清教徒。他們深信較好的管理能夠獲利，不因以前諸公司

分息的失敗而挫折勇氣。一六二九年年初，查理第一世頒給一道特許勅書。意外的發展跟着而起。當英王和大主教勞德 (Laud) 做英格蘭教會的主人，許多清教領袖都自願移殖海外。他們有財產，有社會地位，有獨立的精神。他們不甘到馬薩邱塞單單做倫敦一家公司的家臣；他們所希望的是獲到自由來建立他們志願的一種教會政府。因此，公司中主要的清教徒只有購買全部股票，拿特許勅書，帶它航海來美洲。一家商業公司便這樣轉變成一個自治殖民地——馬薩邱塞灣殖民地。

殖民事業的另一個主要媒介是財產執照。產業所有者是英國紳士或貴族中人，用錢向國王買到在美洲的土地，好像在他本國受頒賜一樣。英國法律的舊規矩，一切土地，除却這樣所有者外，全屬於國王，美洲也適用這規矩。巴爾的摩勳爵受馬里蘭；威廉·彭，一位海軍上將也是國王的債主的兒子，領受彭西凡尼亞；查理二世手下的一羣寵臣領受兩卡羅來納。這些業主都得到籌畫一個政府的大權。有斯圖亞特朝 (Stuarts) 專制觀念的巴爾的摩勳爵，不願意把立法權力給他的殖民，但終究對公選的議會讓步。彭氏較為聰明。一六八二年，他召集一個議會，全體議員都出於殖民選舉；他又允許他們制定一個憲法或「大憲章」。這憲法把許多種統治權賦與人民代表——彭氏接受這計劃。

美洲生活一經人們證明它有繁榮的希望，一個自然而然的移民事業從歐洲開始。它受到種種鼓勵，竭其全力而來。最初兩個大潮到馬薩邱塞和維基尼亞。自一六二八至一六四〇年，在英倫的清教徒，處於抑鬱危懼水深火熱的環境。王室從事恢復教會的舊日狀態，並且決計把它放在國王和大主教們指揮之下。政治和宗教的騷動使全國陷於不安。英王解散國會，獨斷國事十年之久。他又拘禁為首反對者。當王黨企圖傾覆英國自由，許多清教徒深信脫離島國，在美洲建立一個新國家是上策。在一六二八至四〇年間的大移民中，英國人離開家鄉的約有兩萬人。載着殖民、牲口、和家具渡洋的船班，不下兩百艘。波士頓成爲世界上重要海港之一，喧鬧活躍的區域。哈佛學院創立了。殖民中間有佛蘭克林、亞當斯 (Adamses)、愛默生 (Emerson)、何桑 (Hawthorne)、和林肯諸人的祖先。這運動的一個特徵是：清教徒的移民不是以個人或家庭、而是以整個社會而

來。有幾個英國城鎮人口空了一半。新殖民地不僅擁有商人、農人，而且有醫師、律師、學校教師、事務人員、技工、和宣教師。新英格蘭宛然成爲舊英倫的縮影，有着將來成長的極好的種子。

當一六四二年英國內戰興起，清教徒的出國因之減少；但所謂豪俠的出國不久便開始。在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被斬時，出國人數很多，直到一六六〇年復辟時，陸續不停。清教徒的移民把新英格蘭人口提高到三萬以上；豪俠的移民是維基尼亞人口增加的要素，一六七〇年左右，那裏人口幾乎到四萬。人口的流入帶來大量財富，新來者當中，豪俠雖然居其少數，但許多是資產階級中人。有了資本，他們購買并且耕種大地產。維基尼亞先前是個貧民居多的殖民地，這時却充滿小康之家。這次移民帶來美國歷史上的幾家大姓。華盛頓的曾祖約翰華盛頓，一六五七年來到維基尼亞。馬沙爾 (Marshalls) 的家庭傳說說他們的來美始遷祖是英國戰爭時期中一位王軍隊長，王黨失敗後，才來到維基尼亞。在人口流入後，我們在維基尼亞歷史上遇見這些大族，像哈禮孫 (Harrisons)、凱立 (Carys)、麥孫 (Masons)、卡德 (Carters)、和台勒 (Tylers)。

但馬薩邱塞、維基尼亞兩處的殖民，在社會地位上，彼此分不出什麼高下。使這兩地成爲偉大的人民，來自同樣的中等階層。華盛頓氏在英國，只是鄉紳，在諾坦普頓郡 (Northamptonshire) 有一塊小小地產叫做蘇爾葛萊扶 (Sulgrave)；同族中有一位曾做過諾坦普頓市長。約翰·馬沙爾 (John Marshall) 的曾祖是個木匠。維基尼亞的藍多爾夫 (Randolph) 淵源於窩威克郡 (Warrickshire) 一個無足輕重的鄉紳家庭。這些豪俠的出身，沒有能比上清教徒溫斯洛普的。他出身於一個富裕人家，薩福克 (Suffolk) 的格羅頓 (Gronon) 田主。論家世的華貴，沒有能比上薩爾頓斯太爵士 (Sir Richard Saltontall) 或布留斯脫，前者的後人很多是新英格蘭的顯貴，後者曾做過次長並在法庭上有過很大影響。一六六〇年以前，馬薩邱塞和維基尼亞的殖民大多數是身分平等的鄉農、技工、店主、和書記；在美洲各地許多是傭工，靠着定期的勞力爲生。他們的真正資產是他們的忠實、自信心、與精力。



## 自治的興起

殖民所到的地方，在理論上，他們隨帶着自由英人的權利，承繼有英國人爲自由而奮鬥的傳統。在維基尼亞的第一次特許勅書裏，特別確定這點。它宣稱殖民應有一切自由、公民權、與免役，如同生長在英格蘭領土內一樣。他們應受大憲章與一般法律的保護。這是極可注意的基本原則。但殖民爲使這原則有效起見，須時常警醒並且不時嚴厲奮鬥。幾乎從他們的歷史開始，他們便着手建立其本身的憲政機構，爲了一個較強的代表制度、財政管制、和較完備的個人自由保障而奮鬥。

誕生於一六一九年的維基尼亞立法議會立即開始制定多種法律。當英王廢止維基尼亞公司的特許勅書，市民議會繼續表現不退的氣勢。幾年之內，議會在它本身權利的立場上，奠定某數種基本法規。它宣告長官不經立法當局同意不能徵收任何賦稅，稅款的用途須受立法議會指揮，及市民議員不受逮捕。不久之後，議院宣告立法議決案不得違反，又採取陪審制度以保護審判。維基尼亞議會是個有力團體，和在英倫的共和政治相終始。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後，它不幸變成柔弱。但它對王家長官的卑屈不久便引起劇烈的反響。

在馬薩邱塞灣，不久也發展有一個代表制度。特許勅書的範圍，似乎給溫斯洛普與其十二位助手以治理全部殖民之權。一六三〇年秋天，一大羣殖民向這統治羣請願把他們作爲合作組織的自由民。統治者決定第二年批准這請求；但「這平民團體須以保有良善誠實之人爲目的」，所以「除幾個教會的分子在同樣限制下，任何人不得享受這團體政治的自由」。一個神權政治，或教會政體，就這樣成立了。同時十二位助手決議他們的任期，非有自由民的特別投票，將年年保持着。他們實際上握有一切司法立法權，這種任期之穩固造成一個小小的寡頭政治。長官、助手、宣教師，把殖民地捏在他們手心裏。

可是微幸的是叛亂並未長此停頓。一六三二年，當窩特鎮（Watertown），被派繳一種防禦稅，沒有代表名額的市民，怨憤不平，恐怕把自己和子孫帶上束縛，因此拒絕繳付。爲平息怨聲起見，當局決定長官和助手

對於徵課捐稅這事，應受代表團體的指導，這團體由每鎮兩人的代表所組成。真正的立法議會便這樣奠定基礎。這市鎮代表團體，與長官和助手集會，事實上即構成一個單院制的立法議會。當它在一六三四年開會，它掌握有立法全權；通過法律，認准新自由民的加入，並主持效忠宣誓。大陸上第二個平民代表團體這樣開始活動了。單院制進行得不好，十年之後，它分成兩個，助手們組成上院，市鎮代表們組成下院。馬薩邱塞灣殖民地繼續為一個清教共和國，由自己的立法者治理，有半世紀之久。當一六九一年的新勅書把它改為王家屬省，立法議會仍然是個有力組織。那時以後，國王選任省長，但人民選舉議員，而議會緊握財政權。

這時有兩個永久的小共和國出生在美洲土地上——羅德島和康納第格。首次從馬薩邱塞灣的移民在下康納第格建立幾處城鎮。一六三九年，它們的自由民集會於哈特福（Hartford），起草康納第格的基本法，一個美洲國家為它本身制定的，亦即西方世界的第一部憲法。它規定長官一人，助手若干人，和一個每鎮四名代表組成的下議院，都出於民選。斯圖亞特朝復辟以後，康納第格得到英王特許勅書，但它的內容自由得可驚；自由民有依照自己意願而自治之權，唯一空泛的限制是他們的法律不得和英倫的相抵觸。羅德島所受待遇之優與這相同。當各市鎮初次相聯絡時，威廉斯為它們達到一道允許最充分自治權之特許勅書。復辟事件使他們需要從新要求。但一六六三年的新勅書規定羅德島為不列顛帝國內的一個小共和國，像康納第格一樣，這種地位一直相沿到革命時候。選舉它自己的官吏，制定它自己的法律，它大概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會了。

一七〇〇年左右，殖民地政體的一般系統已經形成。康納第格和羅德島保持完全自治領土的特殊地位，選舉全部它們自己的官吏。其它殖民地或屬於業主，或屬於王室，無論如何，它們很有同樣的政治體制。長官歸國王或業主所任命。另有個參議會，在某種範圍內，襄助長官，除馬薩邱塞外，也歸國王或業主所派。長官雖然常是英國人，參議官却常是美洲人；雖然他們通常代表富有階級，但他們所持見解却常和長官的不同。當初，他們的職務主要的是行政和司法，但他們漸漸發展成爲一個立法議會上院。每個殖民地有它的代表大會，由有若干財產和其它資格的成年男子選出。這民選議會着手立法，規定經費，徵課賦稅。它的力量基於它代表

公共意見的權力和財政的管制上——同樣的要素使一六八九年以後的英倫國會如此有權。

在獲得和保持代表制度上，殖民爲他們本身和他們的後人費了不少氣力。他們的政治制度有三件顯著的基  
本事實。第一是他們對特許勅書的尊崇，看爲自由的保障。英國沒有成文憲法。但從最早時期，殖民就已認定  
寫入特許勅書、頒給貿易公司、業主、或人民的權利爲神聖不可侵犯。這對基本法的成文制度的重視，在美國  
史上有深刻的影響。第二件重要事實是長官和議會的時常衝突。他們代表兩派敵對分子：長官站在受委託權利  
和帝國利益的立場，議會站在人民權利和地方利益的立場。末了，殖民地政治的一個特徵是議會對管理經費的  
主張。他們所爭的有幾件事——時常的選舉，軍人被任王家官吏的禁止，選舉他們自己的議長的權利；尤其重  
要的是他們主張只有他們可以承認或駁斥經費用途。他們很遭反對，但他們的要求常能達到。

英國殖民地實際上沒有受暴政損害。大體看來，它們所享受的政治自由，在十七、八世紀中，爲世界上任  
何地方所不及。但它們很經驗階級政體。教權政體的新英格蘭有權力無間斷的小數統治者。在南方，貴族地主  
和大商人企圖建立一個政治專制。

階級暴政時常抬頭——殖民地給它痛擊。第一次這種打擊表現於一六七六年維基尼亞的培根（Bacon）暴  
動。滿期的傭工、耕種邊地的移民、小農、無數工人、和奴隸監視者，感覺得他們自己被人虐待。一六七〇年  
以後，無土地者沒有選舉權。在其它種種方面，他們被褫奪政治權利。議會實際上長久未曾改選——某一次，  
從一六六一至七五，共十四年；官吏缺子被用來安插王家長官和最富地主的私人。貧民夠不上教育。他們難免  
即第安人的侵襲，因爲長官和他的同僚垂涎於皮貨交易，結交野人。賦稅繁重；市場和外間農田脫節，當煙草  
一跌價，農民就陷入嚴酷的窮困中。

一個印第安人的侵襲無掩護的殖民地終於引起一場意外亂事。殖民呼籲保護，當長官柏克立（Berkeley）和  
沿海地主們延宕着答覆時，他們憤怒了。培根（Nathaniel Bacon）爲首率領從詹姆斯和約克兩河上游來的怒  
民，猛力進攻，毀滅印第安聚寨，屠殺一百五十名野人。當他後來到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出席議會，做

慢的長官拘禁他，但兩河上游各地立刻發生騷動，逼得長官釋放他，他逃了。他再來時，却帶有四百名武裝者在背後。柏克立和參議員急忙跑出議事堂與這青年農人相見。長官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大叫：「這裏！槍斃我！上帝，好個目標，開槍！」但培根回答，「不，請多原諒，我們決不傷你毫髮，也不傷任何人。我們是來請保護以免印第安人的危脅，如閣下屢次所答應，在我們走前，我們必要得到。」培根的黨羽在議會窗前，手裏搖着火槍，一齊喊「我們必要得到！」向議會慷慨陳辭半點鐘之久，培根要求保護殖民，檢查公共帳目，減輕租稅，和其它改革。

亂事急轉直下，如同夏天暴風雨衝過維基尼亞的田野。長官柏克立和他的同僚所訂誓約，有眼光的觀察家不相信他們能遵守。不久，長官召集格羅斯特 (Gloucester) 和密德爾塞 (Middlesex) 屯兵一千二百名，要求他們幫他壓服反叛的培根。因此起了一片嘈雜之聲，「培根，培根」，屯兵出動時，也吵着「培根，培根」。接着便是開火。培根攻陷詹姆斯城，在一個晴朗的夏天，燒掉全城，又佔領在詹姆斯河上裝有二十門砲的一隻船。正在激戰中，他害瘧疾而死，他的叛變就此瓦解。這次事件開始的動機是完全正當的擁護小農、工人、和邊民之對抗野人的侵襲，及爭取財政上公平待遇的權利；它終於公然反抗王家政府。不久，懷着仇恨的柏克立，帶着諷刺神氣，欠身向一個被俘的培根部屬，說：「德魯蒙 (Drummond) 先生！歡迎之至。鄙人得見閣下，比見到任何維基尼亞人都高興。德智蒙先生，半點鐘內，你將被處絞刑。」叛亂看來雖無結果，可是已經以可紀念的方式替邊地的獨立精神和堅強的自主心——美洲精神——留下一個例子，令人永遠不會忘記。

### 殖民地的教會與國家

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在美洲成長着，跟渴望政治自由一樣。英國殖民地從來就是各派別的家鄉，它們習慣於和平相處。

英格蘭教會隨着首次的殖民移殖到維基尼亞。最初修蓋在詹姆斯城的建築物之一，是一座禮拜堂，現在已

經修理得挺美，屹立在河畔。一六一六年德拉瓦勳爵來做長官的時候，他修理並擴充它，成爲一座莊嚴的建築，裏面有杉木的座位，胡桃木的祭壇，高大的演講壇，和一座洗禮盆。殖民和一艘一船載來的少女在這裏舉行婚禮；他們的孩子在這裏行命名禮。跟着維基尼亞成長，新教區開闢了，新禮拜堂建築了，由公共賦稅負擔，像英國的國教一樣。多少年來，殖民每人要給傳教士繳納一布許 (bushel) 穀子和十磅煙葉。這並不够；一六三二年，立法議會通過一個條例，強迫殖民在原來貢品以外，再給傳教士繳納牛、羊、豬，各二十分之一。斯圖亞特朝復辟後，教士的年俸煙葉加多也加嚴。此外又擬賜與教士土地，不取代價，名爲教產，以及其它賞賜。英格蘭教會在維基尼亞具有深厚的勢力，在南方各地亦復如此，尤其在馬里蘭和在南卡羅來納。

可是維基尼亞教會在物質上既不是個繁盛的機構，在精神上又沒有感服殖民。社會和經濟的環境多不利於它的成長。大多數教區散佈在人烟稀少的廣大地土上。許多區的疆界，緊緊沿着河岸，有三十至六十哩之長。上禮拜堂的人，要走討厭的長途或費幾個鐘頭苦划上下水。參加禮拜自然不規則了；甚至像華盛頓，一位虔誠的教會委員，也因常不到禮拜被人責備。在冬天天氣不好時，宜教師會看見坐位大半空着。有一個人，歎氣說他有時走五十哩路來做禮拜，看見到者寥寥可數。在這些殖民稀疏的教區裏，傳教師的供養時常缺乏。到物價跌落，以煙葉牲口作徵集品的地方稅，不能充足，當立法議會徵課它們的時候，較爲貧瘠的教區都怨聲載道。

薪俸低薄，享有權不安全，又要應付種種艱苦，所以找有才幹而且虔信熱誠的傳教師，不是一件容易事。最優秀的傳教師不願意離開英國到殖民地上來；他們能在本國找到較好的前途。來的往往心地糊塗，身體懶惰，品行不明。我們不久便聽見長官和其他人士的閒話，說維基尼亞教士是一羣匪類，衣冠禽獸，并且好起誓，喝醉酒，和打架。他們像斐爾定的脫魯里伯牧師 (Fielding's Parson Trulliber)。改革運動已經着手在做，其中一件做到一六九三年殖民地第二所學院的創辦，威廉馬麗 (William and Mary) 學院，起初爲訓練青年

傳教師的學校。但直到革命時爲止，這學校還是不愜人意。

在維基尼亞與南方其它各處，英格蘭教會接受公共接濟，但對國家沒有任何管轄。在馬薩邱塞和康納第格，清教會幾十年來與國家大致不分，明顯的控制政府，事實上長久保持一個嚴格的教會專政。

清教移民到馬薩邱塞的根本原因是建立一個教會國家，不是尋求宗教自由。清教徒不是宗教的極端主義者；他們是宗教的保守主義者。在英倫，他們敬崇英格蘭教會，但希望修改它的教權政體的專制主義，廢除天主教形式以達到改革的目的，嚴格守安息日，并且注重品行。他們的希望不成，他們於是找到美洲曠野上來建立他們自己的教會，歸公共賦稅支持，和政治相連繫，不容許反抗。當恩狄科特 (Endicott) 在撒冷建立第一座禮拜堂，他的同伴中有兩個人從行李中搬出一本英格蘭教會的祈禱書，想在禮拜時念讀。他立刻把他們和他們那本討厭的書送上船遣回英國。清教徒立刻創立一個組織嚴密的教會國家，把權限交給意志堅強、有能力、而且專制的教會統治者所組成的貴族式政體。

這凱爾文派教會國家的勝利，和它的嚴厲紀律，表示禮拜者或分離派的自治集會的理想已經消失。在普里穆斯，禮拜者建立一個小小的教會民主政體，人民自己料理他們的宗教事務，不必服從牧師或宗教會議。但清教徒認這是無政府而且不道德的，因爲他們信仰的是十分集權的管制。

這種建立在馬薩邱塞的教會國家，有四個步驟：第一是一個主要條款，規定非有地位的清教徒，便無選舉權，不能擔任公務。第二是規定人人必須參加禮拜，這樣便防範教會和殖民地裏有不信教者。第三是任何新教會的組合須得到教會和國家雙方的認可。異派教徒或非信徒不能棲身在馬薩邱塞的任何地方，想樹立與清教方式不十分切合的教會者，必須移植到美洲別處去。最後是一個國家支持的規定，使國家能和教會首腦合作，來懲治反叛或違背紀律者。一六四六年清教會的宗教會議公佈所謂劍橋綱領，規定任何教會組合違反宗教會議時，政府將停止傳教師的薪俸，辭退他，并且以肯服從者接替他的位置。

這馬薩邱塞的教會國家，這傳教士和地方官聯合的統治，漸漸衰微下來，直到一六九一年威廉和馬麗頒布

一道改善的特許勅書，把馬薩邱塞改做王家屬省。教權政體只有一個大成就值得稱道。堅強的清教組織決心抵抗查理二世的侵害，在新世界政治自由的發展上，有它的地位。這種抵抗替後一世紀政治獨立的工作開了先路。但教權政體有幾件事玷辱它的聲譽。它是壓制人們的暴政；它犯過虐待教友派及其他人士的不名譽行爲；它仇視思想和言論自由；它的瘋狂使撒冷以巫術著名，在那時有男女十九被絞死。到人口增加和新思想確立，一個強大的自由黨起來與英克利斯·馬得 (Increase Mather) 和他那一知半解的兒子考登 (Cotton) 這兩位波頓士名教士所領導的保守派鬭爭。教權政體衰微之日，便是美洲快活之時。

馬薩邱塞產生有兩位宗教自由的大使徒，威廉斯和赫欽孫 (Anne Hutchinson)。威廉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出身英國劍橋，最虔誠的基督信徒，是一位全部清教教會政權觀念的激烈反對者。他深信教會和國家應當完全分開；強迫參加禮拜是件蠢事；異派應當被寬容。照他的見解，政府對一切正當的派別應該一律予以保護。威廉斯被馬薩邱塞當局命令他回英國，他却冒雪逃到羅德島，把那地方造成一個適合自己的主義的所在。赫欽孫並非一位這般顯著的人物。她宣傳的主義近乎後來愛默生時候的超絕論。她說每個人的天職，是遵從一個內心的、超自然的光明之鼓勵；真正使個人得救的是在內心的聖靈，不是做好事和清淨的什麼結果。一度住過羅德島，她後來慘死於一個紐約的印第安屠殺案裏。

在中部殖民地全境裏，信教自由早成爲規則。單在紐約一處，任何建立英格蘭教會的重大努力，幾乎完全失敗。大多數人民屬於其它派別。像當代歷史家威廉·斯密 (William Smith) 所寫，人民以平等的、普遍的新教信仰自由爲目的。猶太人支持一個猶太會堂。在彭西凡尼亞和德拉瓦的教友會殖民地，各種派別都受歡迎，許多小派和特殊派別，主要的像日耳曼，都在那兩地生長。天主教也不受阻礙，彌撒祭禮在費城公開舉行。馬里蘭也是各敵對教派和平相處的地方。一個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大會，在一六四九年通過一個信仰自由條例，是宗教自由的大標識之一。它對待非基督教徒及一神論者很嚴酷，但把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放在平等位置上。馬里蘭的信仰自由條例中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語句：它的作者，宣言信仰自由是一件聰明之事，因爲

「強迫人家接受有關宗教的正義，往往發生危險的結果」。幾十年後，大多數殖民漸漸領悟到聽任人們自由信仰是一件公平明達的事。



## 第二章 殖民地遺產

### 發展的美洲精神

在殖民地時代，美洲民族的發展，有兩件顯著的主要因素，這民族特徵在革命開始時便已確定。一件是新民族——不同種族的混合。另一件是新土地——富庶而人少的土地，只需要新來者帶來勤力和勇氣當作獎勵的代價。一七七五年左右，顯然有他自己社會、經濟、和政治特徵的美洲社會，正在出現。從某些觀點上看，它密切的和歐洲模型相近：波士頓和紐約的商人、專門職業者、技工，與倫敦和布里斯托的同類集羣相比，簡直不容易辨別出來。但大多數美洲人漸漸與故鄉的歐洲形態不同了。

向美洲的移民幸而在一個方向下進行，這就是英語和英國制度到處居主要地位，因此美洲保持有一般的統一。日耳曼人或法國新教徒 (Huguenots) 原可以建立一個分立的殖民地，但他們都沒有這樣做；他們和初來的英國人相雜處，採取英國語言和外表。英國移民不久便壓倒在赫德孫流域的荷蘭人。可是這可喜的語言和基本制度的一致，與種族來源的駁雜同時存在着。

要緊的是，我們既不誇張也不漠視殖民地時代的民族混合。在革命時候，大約四分之三至十分之九的白種殖民仍是屬於英國血統；但荷蘭、日耳曼、法國，和其它大陸種族的流入也很顯著。殖民的前幾個主要潮流是來自英國，新英格蘭和南方低地各處幾乎依舊是純粹英國的。原來的潮流雖是陸續而來，但在十八世紀裏，有兩股移民大浪從歐洲來到——日耳曼的和蘇格蘭、愛爾蘭的。當革命爆發時，每方面的殖民都要拿上萬的數目字計算。

最初成爲重要的是日耳曼殖民的移人。日耳曼西部各區，尤其是萊茵區，充滿窮困和不安。路易十四的法

國軍隊，騷擾已經達到極點。跟着是路德派和其它派別信徒的有計畫的被虐殺，加之以日耳曼小諸侯們的暴政。當女王安那 (Anne) 和她的後嗣保護在英國國旗下的宗教自由，成千成萬的日耳曼人湧進英國和它的各殖民地。一個先鋒早在一六八三年從克來斐爾 (Crefeld) 到威廉·彭的領地上，把日耳曼城 (German town) 做成一個繁榮手工業的所在。黎登豪斯 (Ritshouse) 氏在那裏開辦殖民地的第一家紙廠，釀造啤酒和織布也都興辦了。但真正的浪潮一七〇〇年以後才開始高漲。有些到紐約的摩和克 (Mohawk) 流域，有些到新澤西 (New Jersey) 的布倫斯威克 (Brunswick)，但大多數到彭西凡尼亞。年年過去，日耳曼人和瑞士人每一年來到的有幾千人。

這種人口流入數目之鉅大，據佛蘭克林估計，革命前夕，彭西凡尼亞人口三分之一是日耳曼人。很有些區域裏不通行英國語言；在一七三九年，有一家德文報紙創刊於日耳曼城。路德派、摩拉維亞派 (Moravian)、梅農派 (Mennonite)、和聯合兄弟會的殖民地散布在彭省。斯第格爾男爵 (Baron Siegel) 的鑄鐵廠、玻璃廠，沙奧 (Sauer) 的印刷廠，都負盛名。但大多數日耳曼人是勤勉的農人，他們艱苦的工作，把彭西凡尼亞的石灰石地帶做成極大的麥倉。他們並不急於開墾，但寧願在已經殖民的地帶裏購買，加以保護和部分改良。他們澈底清除土地；在費力於房屋之前，先建造大穀倉；把牲口餵肥，圍籬築得高而堅固。他們生活極儉約，儘可能的把生產品出售。婦女也到田裏工作，但她們還養育大家庭。

蘇格蘭、愛爾蘭人，一個比較積極進取的民族，構成彭西凡尼亞、辛南多阿 (Shenandoah) 流域、和卡羅來納上部的主要開墾分子。他們因為遭受在愛爾蘭的英格蘭教會之虐待，英國對愛爾蘭製造家的法律又損害他們的紡織工業，所以被迫逃亡。一船一船的來到，他們隨着帶來仇英感覺。他們的蘇格蘭成分比愛爾蘭成分厚些，大多數是前一世紀內遷移到厄爾斯特 (Ulster) 的長老會信徒；長老會組織已經給他們一個民主制度的自然了解和愛護。他們有些定居在新漢布什爾，有些在紐約的厄爾斯特郡和奧倫治郡 (Orange)；但他們的主要避難處是彭西凡尼亞和向南伸入維基尼亞及卡羅來納的各流域。他們投身荒野，靠着狩獵為生，淨除土地，建

築起木頭房子，開闢森林成爲耕地。這些彭西凡尼亞官吏所稱爲粗野貧困的外來者，不耐煩守法和役稅，被彭氏和其他地主們所厭斥。他們嫉恨印第安人，好向印第安人尋釁。他們的貪慾增加了舊批評：「他們保持着安息日和其它一切能下手的東西。」他們成爲效能驚人的墾殖者。向西南兩方向擴展，革命以前使到喬治亞上部并且深入肯特基 (Kentucky)，養育大家庭，在政治和攻打印第安人中表現特別天才，蘇格蘭、愛爾蘭人開始給美洲生活一個深刻印象。在他們當中，後來成名的姓氏有卡爾洪 (Calhoun)、波爾克 (Polk)、豪斯登 (Houstan)、麥金萊 (McKinley)。

在辛南多阿和其它內地各流域，蘇格蘭、愛爾蘭人、英國人、日耳曼人、荷蘭人、和其他民族不久便混合他們的血統在一個新美洲民族的大鎔鑪裏。最後成立的殖民地喬治亞也表現民族的混合。奧格爾託普 (James Oglethorpe) 將軍，得其他慈善英國人的幫助，在一七三二年林喬治亞取得國王特許勅書，把那地作爲負債者和失意者的逋逃藪，與抵抗西班牙和印第安侵略的外衛。愛民如子的董事帶來優秀的英國人，一大羣日耳曼新教徒，和一些蘇格蘭高原人來到喬治亞。奴隸制度首先被禁止。一切非天主教的信仰都受鼓勵，英格蘭教派、摩拉維亞派、長老會派、再洗禮教派、路德派、和猶太教派同受崇拜。在沙凡納 (Savannah) 的英格蘭教會，藉衛斯理 (John Wesley) 和懷德斐 (George Whitefield) 兩位名傳教師而著名。

其它非英國各羣，雖是較小，但不是不重要。南特勒令 (Edict of Nantes) 的廢除驅遣了幾百——可能是幾千——法國新教徒到英國殖民地上來，他們的姓氏像南卡羅來納的勞倫 (Laurens) 和勒卡瑞 (Legaré)，維基尼亞的毛里 (Maury)、紐約的德亞諾 (Deano) 和傑氏 (Jay)，馬薩邱塞的芮佛爾 (Reveré) 和范內意 (Faneuil)，表示他們分布之廣。零星少數的瑞士人隨着日耳曼人同來，沿德拉瓦有一些瑞典人、芬蘭人，小羣的意大利人和葡萄牙猶太人大半住居城鎮裏。城鎮的名字，如彭西凡尼亞的刺德諾 (Radnor) 和布林馬 (Bryn Mawr)、南卡羅來納的威爾士峽 (Welsh Neck)，告訴我們，威爾士人也有他們的貢獻。很明顯的，甚至在殖民地時代，美洲已經像一座鎔爐了。

構成明晰的美洲民族的第二個大因素是土地，尤其是邊地。從開始時，海岸本身，穿進幽暗的森林，那是邊地。初期殖民毫無經驗，至令人難以置信。遠遊教徒搜索普里穆斯的叢林，尋找香料，聽見野獸的呼嘯，以為是獅子；有些執斧子弟以為詹姆斯城的生活，會同倫敦街頭差不多。但新來者要適應於凶險原始的環境，否則唯有死亡。最初有船長約翰·斯密和斯坦狄士 (Miles Standish)，這些人的勇敢堅忍讓我們記起後來的英雄如羅哲士 (Robert Rogers)、博恩 (Daniel Boone)、和卡森 (Kit Carson)。殖民從印第安人學到播種和加肥穀類，烹調玉蜀黍和豆子，製造獨木船和雪鞋，窺伺野獸，硝製鹿皮，和雕做木器。經過艱苦的經驗，開墾者成爲一身兼獵戶、農夫、和戰士。新農業、新建築、新家庭經濟，都興起了。十年之內，新世界上已經有人與他們離開英國時的老隣居很不相同了，他們的子女更與英國人差異。他們在生活上有更強壯、實際、樸素的狀況。一七〇〇年左右，邊地推進到各河流的最高航行點；一七六五年左右，到阿利根尼山脈 (Alleghenies)，到革命前夕，已經超過那山脈。後人受這影響，并且從經驗現出，如同在巨大無比的模型中所鑄造出一樣。

在邊地上，社會情形通常是一個大概的平等——這種平等盛行於少數大城鎮之外。美洲社會這餅上沒有加冰。英國的贖身者以五年勞力賺到盤費，窮苦的欠債者從獄裏被釋出，日耳曼人從殘破的帕拉第內特 (Paradise) 逃亡，蘇格蘭、愛爾蘭人被英國商法所驅逐——都毫無所有。他們要爲財產而努力。他們身爲平民，所以厭惡得到大片土地賞賜的貴族和營商投機致富者。無論如何貧苦，一般殖民在美洲感覺到一種機會和獨立的意識，這他在歐洲所不知道的。這種感覺，由美洲的地大物博而產生。一位法國士人克萊夫哥 (St. John Reveocent)，大約在一七五九年到過美洲殖民地，寫道：「富者留在歐洲，僅中產者及貧民移植出外。」又說：「事事有助於他們的革新；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會系統；這裏他們做了人。」他又用一段流暢的文字，描寫在資源豐富的大地上無拘束活動着的美洲精神：

一個歐洲人初到時，眼光目的，好像都有限；但他極快的改變他的尺度。他不久呼吸到我們的空氣，定出新方針，着手他在本國從不會想到的計劃，那裏社會的富庶閉塞許多有用的思想，並且常常撲滅在這

裏可以成熟的最可讚美的計劃。……他開始感受到一種復活的效果；在今以前，他沒有生活而只是生存着；現在他感覺到自己是人，因為他被人家這樣看待；他本國的法律在他的細微末節上監視他；這裏的法律給他保護。試判斷這人的心理和思想上起了什麼一個變更！他開始忘記他以往的卑賤和依賴性，他的心不自知的擴張而且充滿熱情，他的第一次自尊心以那些帶有美洲特徵的新思想鼓勵着他。

但一個美洲特徵雖正在發展，至少在一七五〇以前，少數殖民對這事實有真正認識。他們起初以忠實的英國臣民自居，其次是維基尼亞人、紐約人、羅德島人自居。那時十三殖民地的基礎已經穩固，人口幾乎到一百五十萬。他們分布着整個海岸線，從安德洛科金 (Androsoggin) 流域的樅樹林到聖約翰的棕樹林。各殖民地各有它的特色，形成四個很明顯的區域。

一是新英格蘭，區域狹小，多巖石，有耕作得精細的農田，有採木業和多種航海業；工程像朗斐洛 (Long-fellow) 造船 (The Building of the Ship) 這書裏所描寫，捕撈鱈魚像吉卜令 (Kipling) 勇敢船主 (Captains Courageous) 裏所描寫，海外貿易像達那 (R. H. Dana) 航海兩年 (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裏所說的。二是中部殖民地，構成的成分是部分小農場，部分大田產，不少小規模工場，及紐約和費城的航船產業。三是南方殖民地，那裏大田園由成羣黑奴操作着，主產藍靛、米、煙草，雖不是最普遍，可是最主要的特色。四是最具美洲特色的一區：長條的邊地或內地，從緬因 (Maine) 伸展到喬治亞，那裏墾荒的獵戶、堅苦的住木頭房子的殖民、和零星小數耐勞的農人，朝着內地開發。這種邊地，不論南北，情形都相同。在西馬薩邱塞、西彭西凡尼亞、和西卡羅來納，同樣的產生勇猛機智的人，不務學問，不耐煩束縛，并且極端樂觀。

### 新英格蘭殖民地

新英格蘭沿海殖民地有巨大的擴展力。我們已經看見馬薩邱塞人民的移殖建立羅德島，另一次移殖建立康納第格和新港 (New Haven) 兩殖民地，後來併為一區。另一羣清教徒向北散布在原屬非清教區域的緬因和新

漢布什爾，并且極快的佔取優勢。一六五〇年左右，馬薩邱塞執有新漢布什爾和緬因兩殖民地的政權，但到十七世紀之末，前者被改爲一個分立的王家屬省。這顯著的新英格蘭擴展性，一代一代的繼續下去，把清教徒的子孫源源向西遣送，一直到達太平洋。

在這個殖民地時代裏，新英格蘭始終保持淵源相同的人口，革命時候它的七十萬人民幾乎純粹屬英國血統。各地方在語言、習俗、信仰、和思想方法上，大致相同；只有羅德島，因爲它的政治極端分子和異派教會團體給它一個特別性質，所以稍和各地相異。新英格蘭人 (Yankees) 大半出身於剛強獨立而且聰明的英國民族，很自負他們的身世——像一位首領所說，是篩選出來的穀粒，播種在曠野。農民漁民有舒適的生活，商人、船主、和小製造家常積蓄有相當的財富。一七七〇年左右，只波士頓一處的海外貿易便使用六百隻船；馬薩邱塞漁業，大量輸出到歐洲和西印度，估計每年值到一百二十五萬美元。殖民地以鱈魚爲徽章，不是沒有理由。新英格蘭家庭大都自給，自己生產食物，製造衣服和家具。勤勉、節儉、精明的企業心和褊狹的信仰是英格蘭人的特色；這種人民倘使不被別處人所喜歡，就到處被別人所敬重。

教會和學校都在新英格蘭佔特別尊嚴的地位。清教羣衆不但把他們的宣教師看爲宗教上而且是精神上的導師，把禮拜堂看爲大部分的社交場所。傳教士們強幹進取，不但有學問，而且擅長於領導羣衆，被信徒所尊敬。他們宣講地獄刑罰之說，津津有味，愛德華茲 (Jonathan Edwards) 的圖：畫着罪人輾轉呻吟於地獄的苦痛中，很是著名。考登 (John Cotton) 說他每晚睡前，喜歡唸一段嚴正的凱爾文書，使「口中有味」。但傳教士常是有力、正義、和學識的人。他們深通神學和古文字。哈佛校長喬恩息 (Chamney)，上午聽讀希伯來文舊約，下午希臘文新約，用拉丁文注釋這兩書；許多其他宣教師也有能作這的。至於公共教育，早已有成規。哈佛創辦於一六三六年，同時十年之內，多處地方設立初級學校。馬薩邱塞雖然還在幼稚時代，可是立法議會規定每有五十家的城鎮需要維持一所學校。

初期新英格蘭生活中的剛氣，隨着時間而改變。運輸貿易和商業不但帶來財富，并且帶來新觀念。律師醫

師和其他專門職業者人數加多，馬薩邱塞和康納第格兩處嚴守從星期六六時到星期日日落為止的安息日，禁止旅行，禁止酒館接客，甚至三五成羣在街上說話都要遭逮捕。但時裝流入，例如假髮。英格蘭教會傳入耶穌誕節的慶祝，并且政治、牟利、戀愛、和行樂，開始在生活上佔公認的地位。

塞華爾(Samuel Sewall)的日記可以作馬薩邱塞新舊兩個時代大轉變的寫照，沒有別的能和它比。塞氏一六七一年畢業於哈佛，三年之後開始寫日記，直到一七二九年。這位嚴肅守舊的清教徒，後來做過大法官，喜歡喝杯馬得拉(Madeira)葡萄酒和駕馬車一遊，但痛恨一切革新。我們讀他的三冊書，有聲有色的景象起於眼前。我們看見小小的波士頓城，堅固的建築在地峽上，有三座小山，禮拜堂的尖頂，礮臺，和船舶林立的港口。我們聽見更夫報時刻和號丁傳呼巡行。我們感覺到當時城裏傳聞海岸上海盜消息、或富龍德納伯爵(Comte de Frontenac)將要率領他的法軍和印第安軍下新英格蘭時的驚慌。我們看見市民尋找迷路的牛，像塞氏自己做過一樣，「從城的這一邊走到那一邊」；聚在一堆一堆來討論公會的選舉提名；拿出殞當娛樂看。當港口到島上城堡冰凍得堅實，我們聽見聖餐麵包落在盤中碰得又響又碎，我們爲可憐的參加禮拜者起寒顫。城裏天花流行。兒童生產率很高，因爲每個婦人都能生育；但死亡率跟着並進。我們看見訓練日的平民慶祝，與古舊高級礮隊及其它同伴穿着制服，嗚礮歡騰，男女們在草地上帳篷裏聚餐。我們帶輕視態度看紅衣人，討厭的聽到王家長官在他的宮中舉行跳舞會直到早上三點鐘。我們雜在人叢中，出去到布魯頓山(Broughton's Hill)看絞決犯人。我們看見警察驅散比康山(Beacon Hill)的九柱戲，好議論的清教徒叫這山爲淫山(Mount Whoredom)。我們看見塞華爾做地方長官時，星期六傍晚坐車過查理城(Charlestown)或波士頓，命令商店關上窗子。但我們看見清教舊時的嚴肅風氣已漸漸向摩登時代讓步了。

在勤奮且有秩序的新英格蘭，犯罪的事和貧窮情形比較其它殖民地少些。雇傭的僕人，初時所沒有，在十八世紀裏漸漸普遍，但他們和其他勞力者都容易得到獨立，奴隸制度也衰微了。城鎮政治，一切公共事務處理於合格選民的城鎮大會，助長自立心。波士頓和新港等各大中心有無數貴人，華美的房子，紋章器具，表式階

級的特殊。但世界上別處平民，沒有表現自尊心比新英格蘭人更剛強的。

### 中部殖民地

中部殖民地有一個更繁雜、都市化、且寬大自由的社會，比較不高雅也不嚴肅。彭西凡尼亞和它的姊妹省德拉瓦在革命時有人民三十五萬，紐約和新澤西兩處所有與這數目差不多。如在美洲的別處一樣，人民大都靠土地爲生。在這幾省較好的地帶裏，地主富得很快。例如彭西凡尼亞的教友派農家，誇耀他們堅實的磚房子，裝板襪紙的房間，沈重的家具，和優美的瓷器玻璃器。農家主僕同桌吃飯，吃的東西雖簡單但有變化。每天三餐有肉類，這在歐洲許多處所少有。農具的數量增加得很快，一七六五年左右，彭西凡尼亞以有九千輛四輪車自豪。農業比別的區域種類較多；穀類有各種，果木園子不少，各種牲口繁殖，許多地主自己有養蜂場和魚塘，赫德孫流域以范任賽勒 (Van Rensselaers)、柯特蘭 (Cortlands)、黎溫斯敦 (Livingstons) 等貴族家庭的田產著名，他們有大宅子和成羣的僕人，他們收年租的日子帶有封建性質。但長島和上紐約也充滿小資產。

彭西凡尼亞和紐約，農民之外，大小商人和技工人數都在增加。運輸事業，側重於木材、皮貨、穀類、和其它天然產物的出口，與製造品、糖、酒的進口，範圍廣大，贏利豐厚。在革命前夕，航行德拉瓦灣外的船近五百隻，海員七千餘人，赫德孫河和長島海峽都充滿船隻。費城和紐約都成內地貿易的大集散地。運輸穀類和乾魚到西印度，運回奴隸或糖蜜，是生財之一道；運阿爾巴尼 (Albany) 的皮貨到倫敦換精細織品、瓷器、和家具，是生財之另一道。小製造業正獲得立足地。冶鐵興起於彭西凡尼亞及新澤西；鐵產的出口，引起英國國會通過一個限制軋鐵廠的條例。玻璃器皿和呢帽製造於紐約。財富增加，專門城業者也更普遍。主要城市裏的律師取得政治領導地位，和其他人物一樣的有助於革命的成功。

紐約，甚至沈靜的費城，都較新英格蘭有混和文雅的社會。商人船主，和歐洲有密切的接觸，華麗、趨



時，有好客的風氣。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 去費城，路過紐約，驚於房屋的壯麗，銀器的細緻，和烹調的精美。紐約誇耀它的俱樂部、跳舞廳、音樂廳、露天花園、咖啡館、和私家戲院。一個紐約殯儀往往耗費數千元。荷蘭人表現一種對休息節日的興趣，漸漸為英國人所染習；富者穿最時式的倫敦裝束，披絲飾絨，戴撲有香粉的假髮，佩掛小劍；教派和種族的混合，助長新觀念的迅速傳播。費城街道寬闊，兩旁行人道掃得整潔，風塵挺肅靜。但它以公共設施著名，並且產生科學研究，使佛蘭克林、刺士 (Benjamin Rush)、和植物學家巴特蘭 (William Bartram) 博得盛名。整潔、實在、繁盛，在哲斐孫心目中，它比倫敦巴黎更為動人——哲氏不是淺陋的鑑別家。宗教信仰在紐約的自由引起教會人士對「自由思想」的怨言，政治又喚起更大興趣，為英屬美洲中別處所不及。在教友派優勢下的彭西凡尼亞，見解比較保守；但在革命前夕，教友派在政治上的優勢被蘇格蘭、愛爾蘭人和日耳曼人所搖動了。

在整個中部殖民地裏，巨大的黑種人口增加生活的色彩。教友派信徒深惡奴隸制度，在殖民地時代後期，產生一位聞名世界的反奴隸制領袖伍爾門 (John Woolman)——藍勃 (Lamb) 稱他為「美麗的靈魂」。蘇格蘭、愛爾蘭人和日耳曼人都自己操勞得很勤，在他們的社會裏奴隸制度並不盛行。但在赫德孫流域農田上卻是普遍。總之，中部各省生活的性質比較新英格蘭要豐富些。氣候、土地、人民，都比較適宜於生長發育。在北部，沒有什麼能比得上紐約新年，天亮時鳴礮慶祝，男人們到城裏拜年，大吃大喝，喝酒多到常常須要坐車回家。紐約迎接新任王家長官的隆重典禮，或一個地主子女結婚的喜筵，也沒有什麼能比得上。

### 南部殖民地

南部殖民地，尤其是最富庶最有影響的維基尼亞和南卡羅來納，有三個明顯的特徵。南部生活，幾乎完全是農村性質，查理斯頓 (Charleston) 和巴爾的摩是僅有而不重要的城鎮；大地產佔卓越的地位，有成羣的奴隸，堂皇的邸宅，浮華的生活；社會階級，層次顯明。白種人中，上層階級包括小康者和貴族地主，構成唯一

能領導政治的一羣；中層階級由小地主、農民、和少數的商人、代理商、及技工所組成；下層階級由於貧困的白種人。三級之下是奴隸，一七七〇年左右，在維基尼亞的人數略少於人口總數四十五萬的一半，在馬里蘭佔二十萬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南卡羅來納則超過白種人，成二與一之比。

人口的散布，部分由於田園制度的結果，每區地產都極度自足，部分由於南方人對城市的嫌惡。大地主進行直接對英國或對北方城市的貿易，不需要巨大的商業團體。隸奴制度只壓滅一個有前途的手工制生活。維基尼亞通過法律，設計建造大城鎮，並無效果——如規定每郡在威廉斯堡建一所房子，便是一個例子。革命初起時，殖民地最大中心是諾福克（Norfolk），人民約七千人，而威廉斯堡只有二百所散落的房子。白德（Byrd）上校記一七三二年菲德烈堡（Fredericksburg）的情形，說除却當地的首腦以外，只有一位商人，一位裁縫，一位銅鐵匠，一位公共食堂主人，和一位婦人身兼醫師和咖啡館主人。南方各處情形多半如此。查理斯頓在革命前是一座撲實如同鄉村的城鎮，街道不砌，盡是沙土，人民一萬五千人，一半是黑人；巴爾的摩是一個面積相等而比較粗陋的口岸，靠着它從內地運來農產物的交易。缺乏城鎮有幾個不好的結果。波士頓早在一六九〇年已經有報紙一種，但維基尼亞報（Virginia Gazette）到一七三六年才出版。直到革命時代的二十五年内，維基尼亞還沒有職業團體的舞臺表演。海岸區所用的掃帚、椅子、鋤頭、和粗陶器，甚至依賴帝國裏比較能經營的區域，這使有眼光的領袖起了責備。

馬里蘭、維基尼亞和南卡羅來納的大田園散布在低地，大都面對着能供給水運的大小河流。各家有它的磚或石築的私宅、倉房、鐵工場、桶工場、其它外圍建築物，和零零落落的黑人區的小房子。許多大宅，如林歌德（Ringold）將軍的泉石（Fountain Rock）、白德（William Byrd）的衛斯特俄佛（Westover）、麥孫（George Mason）的賈斯頓堂（Gunston Hall）、和查理斯頓附近茹特勒治（John Paulding）的私邸，設計建造都極華美。裏面有鑲玻璃片的廳堂，精巧的樓梯，寬大的房間。最講究的房子裏有桃心木的家具，有些是美洲做的，但大多數是從倫敦運來的，又有倫敦製造沈重的銀器，絲質或絨質壁衣，家人畫像，雕刻（何格 Hogarth

尤受歡迎)，和一些圖書。諾米尼亞 (Nomin Hall) 的卡德 (Robert Carter) 有書一千五百餘冊，白德第三世四百冊以上。許多地主在安波里 (Annapolis)、威廉斯堡、或查理斯頓也有私宅，每到秋天，駕他們的家庭馬車進城赴跳舞會、宴會、紙牌戲、賽馬，和參加立法活動。地主階級常被人指摘他們的懶惰。但大田園的適當管理，需要不少心力；華盛頓監督他的佛農山 (Mount Vernon)，工作很勤；諾米尼亞的卡德，他的產業有散布在維基尼亞的六萬英畝地、一所紡織工場、一所鐵廠的股份、幾處礦場、幾處手工場，也忙得不停。地主又被人指摘他們缺乏智力上的趣味。但他們對政治有熱烈的興趣，保持大多數的選民職務，討論并且寫作政府問題的文字都具特殊才能；對科學發生興趣的也很多，并且有被選入王家學會者。

南方的小地主是一班勤奮、聰明、進取的人——哲瑟孫的父親彼得，以親自勸導管理來獲得廉價的邊地，是個好例子。他們削平荒野，建築樸素的房屋，獲得資產；許多人藉奴隸之力耕種大片土地；有些，像彼德·哲瑟孫，通婚權貴人家。他們是剛強的種族，富於自恃心和獨立性，并且堅決保守他們的英國式自由。假使他們缺乏涵養和教育，他們也明暢有條理，并且產生特出的民主政治領袖，如哲瑟孫、麥迪孫 (James Madison)、和巴特里·亨利 (Patrick Henry)。南方上中兩階級間的區別，實在常趨於含混，通婚趨向於它們的連結。在十八世紀，尤其在馬里蘭，有一個有力的傾向，便是累贅的大地產分裂為小而有效率的農田。商人和代理人的地位似乎比較地主略低，幾世以來，開商店被看為卑賤，像過去在英國一樣。巴爾的摩和諾福克的商業羣衆，顯然比殖民地資本居較低面層。但土地投機事業和在北方一樣，盛行於南方最好的社會中。一七三七年，白德第二世把上詹姆斯一塊地產割成小段當作城市區段出售，因此建立里士蒙 (Richmond)。

南方社會中最低的白種階層分畫得極清楚。從歐洲來的罪犯、被釋放的負債者、和傭工，墮落在邊地環境下，構成不識字并且粗野無能的一羣，甚至被黑人所輕蔑。退化和雇傭，自然並無必然的連屬關係。許多身份高的移民以債券付作他們赴美的川資。他們包括英國和大陸的手工藝者——細木匠、裁縫、銀匠、珠寶匠、鎗匠等等——雖然給南方一個更高度的工業制度，但促成奴隸制的迅速擴展。有聲譽的人藉受援助的移民逃出倫

敦海軍監獄。罪犯常因無關緊要之罪被遣送，在貧困的時候，有些英國人，願意因犯小罪而得到被遣送海外。他們到後，出賣勞力給出價最高者。無論如何，南方得有很大成分的流蕩、頹惰、而且囂張之徒，構成懶惰的農民和窮困的市民。不久，科學指示我們，氣候、不良的飲食、和寄生的鈎蟲，比任何天賦缺點對他們的疎懶和任性都有更大影響。奴隸制度又引起手工勞動的被鄙視。白德在他所記載的一個調查探險隊的紀錄（分界史，History of Dividing Line）裏，以談諧且渲染過分的文字描寫這些無能的鄉民，安於低級享受，仇視法律、租稅、和國教，喜歡「無所事事的順境」：

他們大清早便把妻子叫起來，自己仍然躺在床上打呼，直到日高三丈，霧氣消散。伸半個鐘頭懶腰，打半個鐘頭呵欠，他們點着煙斗，噴滿屋子煙，才走出露天地；倘使天氣稍冷，他們打着寒怔，趕緊回到爐子旁邊。遇到天氣暖利，他們舒開兩只胳膊，靠着田地上籬笆立了，沉思去不去耕作，會不會受暑氣；常是託故偷懶，推諉到下次。他們這樣懶散過日子，攪着兩手，好像所羅門（Solomon）的懶漢。

黑奴的主要來源是非洲西岸，北從塞內岡比亞（Senegambia），南到安哥拉（Angola）。十七世紀末年以後，王家非洲公司的專利已經結束，這種貿易轉入許多英美商號和私人手裏。波士頓、紐博德（Newport）、紐約、和南方各港多有藉這運輸貿易發財者。最活躍的市場要在查爾斯頓，許多商號在那裏競爭。一七五〇年以後以多年從事這營業著名的勞倫（Henry Laurens），說地主有從遠道來買年輕黑奴，出價到四十金鎊者。在北方，奴隸平常是由輸入者直接售與買者，現錢交易；在南方，常由商人或中人整批經手，拿來換煙葉、米、和藍靛。田裏工作者穿的是粗衣，住的是破房，在嚴厲的監工者之下辛苦的耕作；家庭奴僕境遇比較好。南北各地，混血兒漸漸多起來。南方奴隸增加了，所以傭工和白種勞動者之耕作大片煙草田稻田的，更是少見。

新英格蘭和南方低地顯然很相差異，中部殖民地則兼有兩地的幾種特質。新英格蘭只適宜於小農田；維基尼亞低地、南卡羅來納、和喬治亞適宜大田園制。新英格蘭人民在有刺戟性的氣候中親自工作；在維基尼亞炎熱的日光下，勞力的工作由監工者驅使奴隸羣去做。在新英格蘭，小產業和大片無主之地鼓勵父母均分地產給

他們的子女；在南方，奴隸耕作的大地產，非遇經濟虧損，少有分割，人們藉長子承繼和限定承繼的法律將它們保守在一起。新英格蘭人民團結在緊密的鄉村裏以維持他們的教會組合；在南方的大部分，教會組合很少，大田園分布區域的廣闊使鄉村成爲不可能。在新英格蘭，鄉郡雖也經設置，市鎮却是自然的政治單位；南方以鄉郡爲最主要。新英格蘭的地方官吏由人民選舉，已經成爲定規；在南方，有些由省當局任用，有些由權貴黨徒揀用，例如教會委員，並不由教區民衆選舉，而擇定他們自己的後任。清教徒雖常被視爲囂強、狂熱、不務快樂的民族，可是顯然有冷靜的正義感和自修功夫；南方人比較愉快、自由、并且喜歡行樂。從多方面看來，中部殖民地介於兩者中間。

十八世紀漸漸過去，人口和財富漸漸增加，社會漸漸更複雜，社會和經濟的配置橫貫分區的界線。查里斯頓、樸次茅斯 (Portsmouth)、諾福克、和波士頓的大商家公事房裏，充滿奔走忙碌的事務員，陳設的桃心木家具、貴重飾物、玻璃器皿，都很相像。無論勞倫或漢科克 (Hancock)，都善於款接應酬。海港上的技工——粗野、叫囂，富有階級觀念的極端主義，隨時衝出酒店聚衆滋事——從卡羅來納到馬薩邱塞都有這種現象。新漢布什爾、馬里蘭、彭西凡尼亞、和維基尼亞的農民，都節儉勤勉，甚至自給自足，例不勝舉。邊區的開發者，又是到處具有同樣特性。

### 內地

第四大區，邊地或內地。成立於十八世紀。它從勇敢的綠山少年 (Green Mountain Boys) 出沒之處和摩和克流域的森林聖地沿着阿利根尼山脈的東麓伸展下來，經過維基尼亞的辛南多阿流域，進入卡羅來納的皮壇 (Piedmont) 地帶。那裏的人民粗陋、淳樸、勇敢，具有純粹美洲的外觀。

他以每英畝一兩先令的代價購買賤價的土地，或以武力佔有，清除荒野的地區，焚燒叢林，把穀類和麥子播種在殘樹根裏。他們建築粗陋的胡桃木或柿木的小房子，把木頭鑿了槽，互相堆疊成四角，用泥土封塞罅

隙，鋪設短柱地板，以豬油或鯊油浸過的紙做窗子。男人穿手工製的獵衣和鹿皮褲，婦人穿手工紡織品，家家都有織布機。他們用木板釘成桌椅；他們用家製的磨白麵粉；他們用錫匙子在松木切菜板上取食物吃；他們赤脚步行或穿鹿皮鞋子。他們的食物有豬肉玉蜀黍飯、烤鹿肉、野火鷄或鷓鴣、和附近河裏所產的魚。散居的殖民在有泉水處的中心建築堡壘，帶避彈的木房子和柵圍，以防禦印第安人。他們有他們自己豐富的娛樂——政治集會時的大宴會，燒烤全牛；結婚時的喜筵，跳舞和喝酒；射擊競賽，填做被褥競賽。和維基尼亞土風舞。決鬥和隨地的仇鬥，像在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較野蠻地帶一樣，令人驚駭。彭西凡尼亞邊地的蘇格蘭、愛爾蘭人和日耳曼人從事於報仇的鬭爭。在維基尼亞和兩卡羅來納，私鬭不知有法律，被人用手指挖掉眼睛的獨眼者很不稀罕。邊地居民都仇視印第安人；印第安部落有和睦的，但殖民常和荒野及紅人不斷的戰爭，由此練得活潑強壯而且有褊狹的團結心。

邊地產生活動頑強的對印第安人貿易者，如北方的克羅幹 (George Croghan) 和西南那多才而有修養的阿德爾 (James Adair)；兩人都是野人的朋友，遠程冒險家，有疾速開發西北的觀察力者。克羅幹在殖民地晚期致力於保持對紐約意羅魁意族的和平，及開闢俄亥俄河上流的土地；阿德爾以熟悉二十里的印第安路線自豪。邊地產生土地投機者如北卡羅來納的亨德孫 (Richard Henderson)，在革命之前不久，他決定向浙洛岐族 (Cherokees) 購買現在肯特基的大部分并且把它改爲一種地主的殖民地。又產生勇敢的戰士如羅哲士，一個新漢布什爾的條格蘭、愛爾蘭人，以在對法和對印第安人戰爭中立功而成爲東北邊地的英雄。又產生塞末爾 (John Sevier)，在田納西誇耀他的「三十五戰三十五勝」。又產生自強不息的先鋒典型如博恩，一個祖居德文 (Devon) 的北卡羅來納人，他在二七六九年經過昆布蘭峽口 (Cumberland Gap)，——貫穿阿帕拉幾山、進入肯特基的門戶。他藉累次在這富庶的印第安獵場上寂寞的探險，引人入勝，大有功於肯特基的知名；他對亨德孫和許多殖民團體也多所貢獻。但最重要者，邊地產生強壯的開墾農民，他們專心致志來擴展殖民地和文化的地帶。

許多人心目中的內地，雖是艱苦危險之地，也是極奇極幻的所在。白德的書透露出對這自然魔力的印象。敘述他如何推進邊界於荒野，他描寫甜美的葡萄，黑白兩種雙雙生得滿樹；成羣野火鷄，呼呼的鼓翅膀；大堆鴿子飛過海灣與加拿大間，遮遍了天，有時折斷桑樹和橡樹的大枝；肥大的熊，泗水渡河；鼯鼠吃野果子；狼攪擾他們的大半夜；水牛慢慢的嚼着草地，白德的同伴殺了一隻兩歲大強壯的公牛；鱒魚夏天在河面上晒背；崖石有紫白兩色的大理石；澄清的水注在沙土的河床上，雲母在日光中像黃金似的閃耀；森林富有橡樹、胡桃樹、和刺槐；遠峯和斜陽相映成趣；輕煙瀰漫中，卡陶巴或塔斯卡洛拉人 (Catawbas or Tuscaroras) 縱火叢林驅獵野獸；襲擊印第安人的營帳，令人心驚；看勇士們嚴肅莊重的風采，面上常帶一些偉大莊嚴的氣象；銅色少女的優美，雖不是很潔白貞純，但在白種人面前現出差怯。荒野的樂趣一經嘗試，許多開墾者覺得它比別的環境更可愛了。

## 文化

殖民時代的後期，文化開始在得天獨厚的羣衆間猛進。尤其在新英格蘭，教育大被看重。各殖民地雖還在幼稚時代，除却羅德島，都已實施一些強迫初等教育。有幾個文典學校已經存在。哈佛、耶魯兩學院已經創辦，達德穆斯 (Dartmouth) 和羅德島學院 (現名布朗，Brown) 也正穩固。哈佛有寬廣的磚房子，藏着五千冊的圖書館，良好的科學設備，可是神學、哲學、和古典文籍的講授則稍遜於歐洲最好的各大學。

在中部殖民地，只馬里蘭有公共教育制度，可是組織不善，力量薄弱。教友派信徒和日耳曼人都在某種範圍內受教會監督之下辦理學校，彭西凡尼亞有許多私立學校，特別在費城及其附近。紐約有幾個良好的城市學校在長島和幾個文典學校在紐約城，可是沒有一般的教授系統。在南方，教育大半在私人手裏。傳教師和其他人士辦有很多私立學校，如維基尼亞牧師蒲歇爾 (Jonathan Boucher)，收男生，每人費用二十鎊，學生中有華盛頓夫人前夫的兒子。該處和卡羅來納般富的地主從英國或北部殖民地聘請私人教師，講授寫、讀、實用數

學、和拉丁文希臘文。免費的學校只有在維基尼亞和南卡羅來納的兩所。幾個學院創立在中部和低部殖民地——維基尼亞的威廉馬麗，出身該院者有哲斐孫和許多其他名人；費城學院（現名彭西凡尼亞大學），佛蘭克林曾在這裏讀過；普林斯登（Princeton）的學院，紐約的英王學院，現名哥倫比亞大學，哈密爾敦（Alexander Hamilton）和古凡訥·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皆從這裏出身。紐約和南方富家常送他們的兒子留學英國各大學或倫敦的四法學院（Inns of Court）。

新聞紙、雜誌、一覽、甚至有永久價值的書籍，已出版於殖民地。美洲最老的印刷所在一六三九年開辦於劍橋，工作從未間斷。在革命的前夕，波士頓有報紙五種，費城三種。書商漸漸成爲殖民地重要人物，幾個圖書館成立了（波士頓圖書館成立於一六五六年）。費城一個出版家運進一千部勃拉克斯東所注書（Blackstone's Commentaries），自己又印刷一千部。博得歐洲永久稱譽的作家有兩位，愛德華茲之於神學哲學，佛蘭克林之於科學及文藝。塞華爾——新英格蘭人，富有資財，曾任法官，一位保守、倔強、勤勉的官吏，和佛基尼亞的白德上校——有修養的地主，王家學會研究員，維基尼亞的第一位紳士，都著有日記，像伍爾門的日記一樣，令人不能忘記。平凡的教友派農人巴特蘭（John Bartram），一位精細的科學觀察者，被林內（Linnaeus）稱爲世界上最偉大的自然植物學家。忙碌好勝的紐約柯爾登（Cadwalader Colden）以著印第安五國史（History of the Five Indian Nations）得名。彭西凡尼亞的黎登豪斯（David Rittenhouse）以天文學數學馳名於國際間。維基尼亞的密浙爾（John Mitchell），王家學會研究員，以植物學、醫學、農學享盛名。博學超人的考登·馬得，被稱爲新英格蘭的「文魁」，刊行書籍和小冊子不下三百八十三種，其中他的美洲基督教奇觀（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一書，本身幾乎是一個書庫。晚期殖民時代史家赫欽孫（Thomas Hutchinson）的書，至今讀來還有趣味和益處。優異的藝術家工作於殖民地，著名的衛斯特（Benjamin West）在革命前不久到英國繼芮諾爾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任王家學院院長。

文化應用增加的途徑，可從佛蘭克林自傳中看到一個生動的印象。佛氏於一七〇六年生於波士頓，他說到



他的家庭，大到十三個孩子同桌吃飯，他的教育大半是自修的。他的父親，來自英國諾坦普頓郡，有一個小書庫，藏有論辨神學的書籍外，有狄福的投影論 (Defoe's Essay on Projects)、考登·馬得的爲善論 (Essays to Do Good)、和普魯塔克的英雄傳 (Plutarch's Lives)。十二歲時充當印書店學徒，這聰明的孩子又讀到班揚 (Bunyan)、洛克 (Locke)、沙甫瑟里利 (Shaftesbury)、柯林斯 (Collins) 諸家作品和若干古典文籍的譯本。他以幾個便士買到一本愛迪孫的旁觀者 (Addison's Spectator)，燃起他寫論說文的雄心。當他到費城求深造的時候，他見到文學正在那裏樹立基礎。印刷家開美 (Keimer) 設備有一架破舊的印刷機，一小副陳舊的英文活字。在一度僑居英國以後，孜孜不倦的佛蘭克林自己擔任起改進教友會城的事業。

他創立一個「互進會」，起初只有九位會員，後來散布出分支，影響很大。又在一七三一年舉辦美洲首創的流通募捐書庫，擴充得很快。又創辦一所學院，受了彭氏等的歸併和捐贈，發展爲大學。又辦一種期刊，名「星期六晚報」，以避免爭辯和報道真實消息爲宗旨。又於一七四三年創立美利堅哲學會。佛氏敘述懷德斐的流暢的說教著有奇效，誘致有吝色的教友派信徒爲之解囊。他又敘述奢侈物品，如瓷器銀器，如何潛入人家，替代樸素的陶器錫器，佛氏家裏便是如此。他又敘述種痘如何傳入——痛自責備因疏忽了它，以至喪失一個四歲的好兒子。科學常給他興趣；不久，他放一隻風箏高入雷雲，作那著名的試驗，被一位法國銘文家稱爲從天上收電。他的政治活動，正像銘文後半段所說——「王權來自暴君」——熱誠的開始於一七五四年，那時他代表彭西凡尼亞出席第一次全殖民地集會，即阿爾巴尼大會。從一七五三至一七七四年，他任殖民地郵務部長，他對郵遞的改善大有貢獻於美洲文化。總之，佛蘭克林的經歷，顯示殖民地文化資產所能成就的有多少，及一位多才的領袖所能加強於文化的有多少。

財富的積聚一天快似一天；更華美的房子正在興築，錦衣玉食正在增加，時髦的習俗正傳得更普遍。一七五〇年左右，我們可在沿海的任何地方遇見一個小康而熟識歐洲最好思想的社會。波士頓、紐約、費城、查理斯頓各地風致的高雅比得上倫敦巴黎以外的英法各城。邊地同時向西不斷的推進，最初的幾股移民穿過阿帕拉

幾山脈各峽口，注入俄亥俄和肯特基。勇敢的邊地先鋒，帶着長火銃和快斧頭，對奢侈、時髦、思想，毫不關心；他們一生的使命是馴服荒野。介於趨時的地主商人和殘殺印第安人的邊民之中間者，是中等階級的平民大眾，他們是一七七五當年的真正美洲人。自耕農和小地主，強健的技工和嘈雜的店主，生長到大，除開美洲，對任何地方都沒有真知識，除開美洲式生活，對任何事物都沒有趣味。他們是英王的忠實臣民，贊美英國，以他們的英國出生的權利相炫耀；但他們至少潛在的感覺到美洲自有它的前途。

### 殖民地遺產

殖民地傳給青年國家的一部分遺產，一目瞭然。共同語言的英語有難量的價值。它是結合要素之一，它使一個真正的國家成爲可能。長久、無間斷的、具有代表形式政府的廣大經驗，是遺產的另一無價部分。我們將認爲當然，直到我們回憶法國和西班牙殖民地在代表自治制上毫無表現；只有英國人允許他們的殖民建立民選議會並產生選舉人和代表都有真正政治責任的政府。結果英國殖民關心政治並有政治經驗。幾種主要民權的被尊重，是遺產的又一要素，因爲殖民對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有堅強的信仰，像英國人之在本國。這些權利並未完全穩固，可是被愛護培養着。殖民地的一般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和承認不同宗派的能夠且需要完全和平相處，應當包括在遺產之列。各種信仰都受英國旗子的保護；一七六三年後，若干殖民甚至於指摘英國國會不顧英國對天主教的傳統的畏懼而過分袒護該教。同等有價值的是種族自由的精神，因爲不同血統的民族——英國人、愛爾蘭人、日耳曼人、法國新教徒、荷蘭人、瑞典人——彼此混合通婚，並不較量彼此有什麼差別。

我們且必須提到表現於殖民地的強烈的個人事業精神，這個人主義常顯著於英國本土，在富庶但未開闢的地域的生活壓力下，更爲增高。英國人從不許可那種專制行於殖民地之內，像它在法國和西班牙領域內撲滅個人的努力。事業心對機會是個難壓制的答復。總之，殖民地遺產的這幾部分是個寶庫，它的價值遠過於多少船

的黃金或多少畝的寶石。

有兩個基本的美洲觀念已經確立於殖民地時代。一是民主政治的觀念，意思是說人人有在機會上應該大略平等。爲了本身以及子孫找機會，所以大眾的殖民來到新世界。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社會，使人人不但有一個機會，并且有一個良好機會，可以從梯子的底級升到頂高處。這種對機會平等的要求，在美洲社會結構上生出更大的變化，破碎各種特權。它在教育和精神生活上引起顯著的變化，使美國成爲世界上教育最普及的國家。它所產生的政治大變化，給平民一個更直接的政權。總之，民主政治觀念是爲着大眾進步的一架有力的發動機。

另一個基本觀念，是一個感覺，一個特殊的命運等待着美洲人民，他們面前有一個前途，不是別的國家所能成就。這一般的才能，人民的精力，和自由的空氣，包羅一切。它給與美洲人一個新鮮活潑的樂觀主義和一個進取的自信心。特別幸運的觀念是使美洲人向大陸迅速擴展的一個主要力量。它有時發生不良的結果，就是引導美洲人，在需要費勞苦的思想以應付困難時，太輕易倚賴一切於上帝；在需要批評自己時，却使他們自滿。但從全體上看，它和民主政治觀念，給美洲生活以新鮮、廣闊、和愉快，沒有別處能比得上。新大陸真是有希望而不斷擴展的大地。

### 第三章 新法蘭西的征服及獨立運動

#### 英法諸戰爭

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逐漸擴展強大，它們和在西、南、北三面的鄰人——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無疑的勢將衝突。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在舊大陸上的鬪爭又無疑的將要牽累到諸國在新大陸上的臣民，捲入旋渦，因為無論今昔，美洲並未孤立於西方世界之外。北美歷史上可歌的故事之一是拉丁和安格魯撒克遜間的一串緊要的爭鬪，更有戲劇趣味者，因為它們所牽連的不但有種族，并且有思想和文化兩件事。這些戰爭是專制與民主之爭，嚴格獨裁與自由制度之爭，不容信仰異教者與互相寬容異派者之爭。有廣大的荒野作背景，有印第安人作參與者，有才能超卓的軍人如富龍德納 (Frontenac)、蒙坎 (Montcalm)、伍爾甫 (Wolfe)、安麥斯特 (Amherst)、華盛頓作領袖，這些戰爭以殘忍、英勇、和巧妙的戰略這幾種穿插為特徵。這鬪爭的目標是大陸的統轄。

西班牙人最先在北美獲得強大的立足地。接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西班牙人不久就佔領西印度主要各島。一五一九年，好勝的軍人柯德茲 (Hernando Cortez) 帶領一小支軍隊開路進入墨西哥的中心，打敗阿茲特克族 (Aztec) 皇帝蒙特助馬 (Montezuma)，掠奪其地。二十年後，又有一個意志堅強的西班牙人索託 (Hernando de Soto) 登陸於佛羅里達 (會數度為西班牙冒險事業未成功的活動地)，打敗印第安人，留兵戍守後路，自帶六百許人進發，四年不停，走遍現在南方各州，遠至西部的俄克拉何馬 (Oklahoma) 和德克薩斯 (Texas)。其他西班牙探險家，如柯羅納多 (Cortado)，以墨西哥為根據地，向北進展，搜索傳說的奇蹟，如七座大城，位於高岡上，有珍珠裝飾的門戶和金匠充斥的街道。西班牙人於一五六五年在佛羅里達設置他們

最初的居留地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十六世紀終了之前，西班牙軍人教士，血戰之後，在新墨西哥取得立足地，那時以後，有一長串軍政長官從聖大費 (Santa Fé) 統治這令人欲睡的省分。那時勇敢的意大利人耶穌會士吉諾 (Eusebio Francisco Kino) 已經探險加利福尼亞和阿利桑那 (Arizona)，建築小禮拜堂并且給驚異的印第安人行洗禮。至一七六九年，西班牙軍人才佔領加利福尼亞本部，塞拉 (Junipero Serra) 領導的方濟各 (Franciscan) 會士跟着同來，幫助建立聖第亞哥 (San Diego) 和蒙特瑞 (Monterey)。

英國殖民定居維基尼亞以前，法國人還未穩固其在加拿大的根據地。不列丹尼 (Britany) 航海家卡第 (Jacques Cartier) 於一五三五年帶着法國旗子上溯聖勞仁斯到蒙特利奧 (Montreal) 的地址，後來六年間，他想在這新地域的一部分上殖民，沒有成功。印第安人的敵意和冬天的嚴冷使殖民失望而回。直到一六〇三年，才出來新法蘭西的建立者——商勃連 (Samuel de Champlain)，一位三十六歲、老於海陸行伍的軍人，因為敘述他在中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的冒險經驗，說得娓娓動聽，所以國王命他為王家地理官。一六〇八年，他奠立魁北克，最初在新法蘭西的歐洲永久居留地。第二年，他以探險為目的，聯合一隊休倫人 (Hurons) 和阿爾貢金人攻打羅魁意人，渡過現在帶着他的名字的湖，在狄貢德羅卡 (Ticonderoga) 附近，與敵對的野人開仗。這事件的結果，使羅魁意族對法國人抱長久的仇怨，但那仇怨也產生自地理和皮貨貿易，印第安五國便是英人與西方諸部族間的貿易媒介者。由黎許略 (Richelieu) 提倡在一六二八年組織的新法蘭西公司，曾經鼓勵殖民的嘗試。當一六五八年路易十四親政，賢明的柯爾伯 (Colbert) 為國務大臣時，法國當局不吝惜的給加拿大殖民地以援助。

西班牙、法、英諸國的殖民事業，同是偶然的且無計畫，但在別的地點上，則顯然有差異。西班牙人的征服，使人數衆多而且安靜勤勉的土著，不得不服從以疾速歛財為目的之少數冒險軍人、商人、和冒險家。這就是西班牙遷移封建制度的多種特徵到美洲。只幾千精明有力的西班牙人，手段殘酷，不久便統馭了數百萬印第安人。慈悲的教士，像拉斯卡薩斯 (Las Casas)，想着法子減少西班牙人統治的嚴酷，成功極小。西班牙人開

掘富庶的礦藏，役使成千萬的印第安人至於死亡；他們又開闢農場養牲口，種植熱帶產物如甘蔗、嘩呢拉香 (vanilla)、可可、和藍靛。西班牙人是君主；印第安人、黑人、和三個種族的混血兒是農奴或奴隸。(黑人不久便大量輸入，到卡利比安 (Caribbean) 海各地和葡屬巴西者更多。) 這種制度產生大量財富，但都到少數貪婪的手裏，而大眾依舊貧困。沒有明確的中等階級發展出來。西班牙人願意做農場主人、傳教士、或軍人，但不願意做商人或工業家。外國人，尤其是新教徒，非常受排斥。結果信仰自由始終沒有發展。代表制度，除卻偶然的城鎮會議，從來沒有這會事；一切統治都是從上面下來。

法國人來美洲者只是少數；他們的文化，主要的由地理和經濟環境、法國政府的專制、和天主教會所鑄成。法國人所搜求的不是金銀牲畜而是魚類和皮貨。他們侵入天氣惡劣寒冷的地帶，那裏有流動無常的印第安人口，許多是含有敵意的。他們所建立的農業殖民地又少又弱，所以更把他們的守戍遠遠的向荒野推進，沿着聖勞仁斯、諸大湖、威斯康辛、意大利諾、華巴士 (Wabash)、和密西西必各大水道，甚至到了曼尼托巴 (Manitoba) 的各水道。英國殖民雖已造成自治的大眾且已表現無限的個人創造力，巴黎則給與法國殖民地一個專制而且嚴厲的政府，雖有勇敢的領袖，但人民從來沒有習慣於自立自治。英國雖鼓勵各宗派信徒移殖海外，法國只許天主教徒立足於加拿大。後來鬭爭發生時，英國殖民地幾乎有二十人來對每一個法國人；英國殖民地已經耕種得良好，法國殖民地還多半荒棄着；英國殖民地極富於資源，法國殖民地則依賴着一個集權的當局。

新法蘭西的歷史經過有五個清楚的時期。第一期是從開始接着到商勃連的事業的三十五年。一六〇三年他航行上溯聖勞仁斯後，第二年在現在新蘇格蘭之地建立王港 (Port Royal) 即安那波里。直到一六三五年他的死亡，他致力於發展加拿大為一個法國殖民地；致力於督促探險工作，親自到過喬治、昂達里奧 (Ontario)、休倫 (Huron) 諸湖；并且致力於使皮貨貿易獲利。第二期的顯著特徵是一羣教會熱心人的活動，參加的教士有方濟各派、苦行派 (Recollects)、烏蘇林派 (Ursulines)，耶穌會士尤其是重要。有些人，像波意羅魁意人

所慘害的若格 (Issac Jogues) 和勃來波 (Jean de Brebeuf)，表現過不可克服的勇氣。在他們自己的紀事 (Relations) 中，他們爲天主教史寫出最動人的幾頁。他們最成功的努力範圍是耶穌會士在休倫部族裏的成就，但當一六四九至五〇年意羅魁人掃滅休倫族，他們的前功全遭破壞，意大利 (Iroquois) 族在一六五四年同遭滅亡。從商業上看，這期的殖民地是個失敗。一六六〇那年定居在加拿大，朝不保夕的法國人只有數千。

第三期較爲成功。新法蘭西成爲王家屬省，有一位長官、監督、和其他官吏，依照法國各省之制。路易十四深切關心於新法蘭西的命運，在命令和訓示之外，又給它寬厚的獎助。新殖民源的被派遣出來。首任主教拉伐爾蒙莫倫塞 (François Xavier de Laval-Montmorency) 於一六五九年到魁北克，決意加拿大須由教會統治，在一個嚴肅的政體之下，像新英格蘭的清教教權政體。他常和歷任長官起衝突，常常自行其是，他的目標至今還在魁北克的生活上。

意志堅強的富龍德納伯爵於一六七二年來任長官，野心的傳教士，終於遇到強敵，第四期也從這時開始。富氏有極大的才力與決心，主張官吏權限在教會之上；他一時打敗意羅魁人的力量；他又打退飛普斯爵士 (Sir William Phips) 在一六九〇年國王威廉戰役中所率領攻打魁北克的三十四艘船的大艦隊。在這時期裏，法國的大探險家正忙於遠西——拉迪孫 (Radisson) 和格洛塞葉 (Groselliers) 穿過蘇必利湖 (Lake Superior)；若利 (Joliet) 和馬格特 (Marquette) 測繪密西西必流域上部的大半；拉薩爾 (La Salle) 沿密西西必下到河口。在十七世紀末富氏死前，富氏已經開始準備新法蘭西來應付對抗英國人的殊死戰，這戰事已被一般有想像力的人士看出是不可避免的。這一戰開始於西班牙繼位和奧大利繼位兩戰爭（王后安娜之戰和國王喬治之戰），終於七年戰爭，佔新法蘭西歷史的第五期亦即末期。

在遷延的衝突中，法國人也有某數種優勢。他們已經從事於有戰略力量的守戍。他們專心致志，以一條嶼和皮貨貿易的守戍，畫成一個月牙形的大帝國，從東北的魁北克，經過狄特羅 (Detroit) 和聖路易伸展到南方的新奧爾良 (New Orleans)。他們期望佔有并且發展這大內地。把英國人限制在阿帕拉幾山以東的狹窄地

帶。法國在軍事上強於英國，並且能派遣有力的軍隊。高度集權的新法蘭西政府，比較調合不佳的殖民地政府的稀鬆聯結，更適宜於作戰。

但有三個主要的原因使英國的最後勝利確定無疑。第一、一七五四年英國殖民地的一百五十萬人是個增加極快的團體，團結堅韌且富有機智；新法蘭西人口不上十萬，散布得疏闊，訓練又不良。其次，英國人佔有較好的戰略地位。他們據着內圍線作戰，能夠充分進攻，向西攻現在的皮芝堡 (Pittsburgh)，向西北攻尼亞格拉 (Niagara)，向北攻魁北克和蒙特利奧。他們又有較優良的海軍，能夠迅速的增援并且給養他們的部隊，又能由水道圍困魁北克。最末，他們能產生較優良的領袖。他們到底有政治領袖如查坦 (Chatham)，將帥如伍爾甫、安麥斯特、和何威勳爵 (Lord Howe 馬薩邱塞曾爲他建碑於西明寺)，都不是法國人所能比得上；至於殖民地將領，如帶領布刺多克 (Braddock) 軍的神速的華盛頓，打退法軍於喬治湖的李門 (Phineas Lyman)，和攻陷富龍德納要塞的布刺斯特立 (Bradstreet) 上校，都是聲譽卓然。英國的最後勝利和克萊武 (Clive) 在印度的同等勝利東西相吻合。

結束於一七六三年的七十年鬭爭，充滿驚人的事件。令人注意的人物出現於法方者有：卡第亞 (Cadiac)，建立狄特羅和易北維爾 (Derville)，向赫德孫灣至西印度的英國人挑戰；卞維爾 (Bianville)，建置新奧爾良，爭奪俄亥俄流域之地。在英方者有：機警進取的馬薩邱塞長官薛立 (William Shirley) 勇猛的戰士裴波瑞爵士 (Sir William Pepperell)，和敏捷的馬里蘭長官蕭普 (Horatio Sharpe)。故事包括有：頑強的圍困，如路易斯堡 (Louisbourg)，的兩度被帝國軍隊所攻克；流血成渠的激鬭，如狄賓德羅卡的幾仗，打勝者起初是法人，後來是英人；討厭的印第安人的侵擾邊鎮，如馬薩邱塞的狄非爾 (Deerfield)，以及可怕的野戰。一七五五年布刺多克將近皮芝堡地方，被法人和印第安人所擊潰，是一個恥辱的奇禍。但這敗北不久被福勃斯 (Forbes) 克服那戰略據點所洗雪。一七五九年，伍爾甫打算在魁北克和蒙坎肉搏，作孤注一擲，乘夜攀登懸崖，引誘敵人在控制魁城的亞伯拉罕平原 (Plains of Abraham) 接仗。他和蒙坎都死在這仗上。這位英將，



年紀不滿三十三，頭一夜還說他寧願寫葛萊的悲歌 (Gray's Elegy)，做個詩人，勝過建立討伐法人的盛名；但他的真正光榮是同英語民族在北美的優勝永垂令名，因為魁北克的陷落決定戰事的全局。

由一七六三年的靖和條約，英國從法國取得全部加拿大，從西班牙取得佛羅里達，西班牙也經參加對英帝國戰爭。北美洲從大西洋到密西西必，除卻新奧爾良，都成英屬。同時路易西安那從法國轉入西班牙統治。

### 帝國關係

對於英國，勝利的七年戰爭搖動美洲殖民地進入一個完全新地位。它解除法國武裝良好的根據地對西北兩方的威脅，這些根據地好像帶齒的鐮刀，成個半圓形，包圍着英國殖民地。它又解除西班牙人對南方較小的壓力。這幾仗給殖民地許多軍民有價值的戰事訓練，並且提高他們的自信心。它稍稍引起謀各省聯合的情感；經人提倡的聯邦計畫有數起，最著名的是一七五四年阿爾巴尼大會所起草的，參加大會者有七個殖民地的代表。這計畫的主要部分由佛蘭克林負責規畫，要求總統一人，由國王任命，和一個聯邦議會，議員須由各殖民地議會選舉。議會得規定共同防務，管制對印第安交涉，和徵課為共同目的的賦稅，總統則得有不認可權。這計畫雖未得到擁護，但已經教人民對聯邦的觀念有深切的認識。使各不同省份的人並肩作戰者也歸功於它。

正因戰爭減少殖民地舊時對英國的依賴，所以它對母國的尊敬也因之減低。殖民地部隊雖配備不佳，訓練不精，但在多次戰場上見出他們和英國正式軍隊一樣的能戰，並且在荒野中作戰得更好。他們看出英國將校許多盲進失措，正像英國人看出殖民地人許多力不勝任；他們看見勇敢但愚昧的布刺多克如聽從青年華盛頓的忠告，結果將要良好。新英格蘭人以民主標準選舉他們的軍官，判定了英國任命將帥的貴族政治制度的不良。

戰爭勝利的結局和帝國的大擴展，終於引起殖民與英政府間實際分裂的題目。有意的暴政那是沒有的。但帝國的行政則趨向於緊密和系統化。它需要準備防禦猜忌的鄰人，準備就是賦稅。它在航行法或貿易法下的經濟組織，勢須修正并且加強。

英國對殖民地的行政管轄這時已是極度鬆懈。國王之下，主要的帝國政府代理人是貿易拓殖委員會，在一六九六年，大約已經完全成立。主要的大臣是當然人員，但大部分工作通常歸一小羣專家和幹練的官吏所擔任。它保護母國和殖民地的商業利益，監督殖民地的財政和司法制，度指導殖民地企業，建議新帝國政策。它有幾種審查權；它起草給王家長官的命令；殖民地官吏有缺額出來時，它提名推薦；它又有權向殖民地官吏索閱報告。英國國會，當然在殖民地上運用相當的立法權力。事實上，國會是能夠大規模處理英帝國內外的商業和其它關係的唯一機關。國王也有廣泛的權力。他不但任命八個王家屬省的長官（因為一七六〇年左右只羅德島和康納第格是自治特許殖民地，只彭西凡尼亞、德拉瓦、和馬里蘭是公司所有殖民地）；它也能拒絕殖民地立法機關通過的任何法律。這種否認或拒絕，通常由樞密院在貿易拓殖委員會諮詢之後，從中干預。樞密院也可以受理殖民地案件，如控訴院一樣。

直到七年戰爭的結束為止，英國國會所制定主要的條例是各種航行法，應用着某幾種被假定為英帝國幸福基礎的經濟原則。當時的重商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財富是直接與它的產業和金銀資本成比例，個人或集體的企業應由政府管制以提高這種力量。帝國不被看成一個聯邦，而被看成一個單位，一個統一的國家。在這單位裏，人們假定殖民地能夠以服務帝國航業和供給英國需要向外國購買的物產——糖、烟草、米、海軍軍需品、和其它原料——以貢獻於國家財富。母國能以製造品供給殖民地，作為報答，帝國中這兩主要分子因此而得相補充。早在一六五一年英國國會驚於荷蘭航業的成長，通過一種航行條例，規定一切運往英本國的殖民地出口貨，應由英國所有及英國管理的船隻裝運。一串後來的法令擴大這種制度。它們給與英國及其殖民地一個帝國運輸事業的專制；又規定某數種運往歐洲大陸的殖民地出口貨應在英國海港換船；又管制歐洲貨物向殖民地的輸入，以利英國製造業。倫敦多方面限制殖民事業，但又從其它方面給以鼓勵。

這種法律起初並未徹底實行。但當一七六三年英國開始重造並加緊殖民地制度的時候，重商主義的法令才再被檢討。

## 帝國中的聯邦制度問題

全部帝國制度經過重新檢討，這種程序，牽涉到殖民地對母國關係的重新考慮，促成革命。這初次以明顯形式表現的帝國組織問題，很給後一代複雜且紊亂的歷史以統一和意義。如何組織並治理一個帝國，使中央權力與地方自治雙方的利益都能保存，是一個問題，並且是各時代政治家所常遇到最難問題之一。能否設計一個制度，使倫敦的總政府藉以控制一切帶全帝國性質的事——戰爭、媾和、外交、西部土地、印第安人、貿易等等——而馬薩邱塞、維基尼亞、南卡羅來納等地方政府被限於管理純粹地方事務？能否在一般的及地方的事務間畫出這樣精巧的界線，把充分的權力授與中央政府，但不侵犯人民在他們地方事務上的自由？

這當然是聯邦制度問題。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帝國，在運用和事實上，如不在理論或法律上，是個聯邦帝國。它是個中央與地方政府分權的帝國。一世紀半以來，國會管制一切關係一般的事；地方議會自始就實際管制一切關係地方的事。這種情形假使已經清淨，帝國也許在一七五〇年便凝結了。

但在法律上，帝國不是聯邦的而是集權的。在法律和理論上，國會有一切權力。一七六三年以後，英國政治家演說改組帝國的工作時，他們就拿國會之法律的和理論的最高權做根據。他們在一七六六年的宣言案(Declaratory Act)中，主張殖民地應永久隸屬於大不列顛帝國國王與國會，國會在任何情形下有制定法律以約束美洲殖民地及人民之全權。

面對着一個真正聯邦制度的機會，英國政治家沒有好好的處置它。但問題並未解決於一七七六年，也未以殖民地與母國分離而終止。問題僅僅轉移到合衆國上去。從一七七五至一七八七年，美洲人面對着相同的問題——造成一個為共同目的的统一政府，對地方關係則完全維持各州政府的自治。美洲第一次謀解決這問題的努力——聯邦條例——是一個失敗。經過痛苦的經驗，美洲人重新嘗試，於一七八七年在聯邦憲法中造成一個永久聯邦制度。

這革命時代的大題目之一，在戰雲瀰漫和民主政治勃興中，不容我們忽視者，就是帝國組織問題的解決與聯邦制度的出現。這後來苦心經營成的制度，建築在英帝國百年的經驗、一七六三年以來在英美的辯論、戰爭的憂患、和聯邦的艱苦之上。一七八七年憲法中聯邦制度的最後成就，是這時代中最有建設性的一個大成就。

### 不平的一般原因

革命開始於何時，不容易說，但它不是開始於一七七五年，可無疑問。約翰·亞當斯曾試分它爲革命本身與革命戰爭，說後者開始以前，前者實已終了。他說，「革命是在人民心裏，與殖民地爲聯合，兩者都已完成於戰端開始以前。革命與聯合逐漸形成於一七六〇至一七七六年。」亞氏是一位善於觀察且有宏志的青年律師，這是他所應該知道的。但他說革命「在人民心裏」需要我們另外尋找一個清楚的認識。一七七六年七月那時候，美洲殖民確信脫離英帝國是件聰明事的，究竟居其少數。那時約有半數的美國人仍願避免政治離婚。據亞當斯自己所說，從戰爭開始到終了，殖民仍然反對變亂者盤有三分之一，漠不關心者又是三分之一。因此，說一七七六年以前革命已在一部分人民心裏，一七七六至一七八一年的鬭爭是強求其它部分人民贊成革命并且使英政府承認它，應當更正確些。

論到革命的經濟原因，我們應該明確辨別各不同的地區和利益團體。北方商人與南方地主各有完全不同的套困難，西部土地投機者又與南北不同。

商法或航行法損害北部殖民地遠較南部爲甚。北部各殖民地沒有貴重的主要產物可以直接運往英國以換取製造品。他們大致要用現金支付從英國輸到的入口貨，要和西印度交易以取得現金。他們運小麥、肉類、和木材到西印度以換取棉花、藍靛、和糖。他們又換得糖蜜，製成甜酒，運到非洲換取奴隸，把奴隸賣給西印度或南方殖民地。一七三三年，英國國會通過糖蜜條例，寓禁於徵，限制新英格蘭的對西印度貿易，只准對英屬各

島。這法律如果嚴格施行，新英格蘭將要蒙受重大損失。可是這糖蜜條例被人們以最健全的方法規避了。例如羅德島每年輸入糖蜜約一萬四千好格海特 (hoghead 量名)，其中一萬一千五百是從法屬和西班牙屬西印度來的。走私不算罪惡。英國當局裝作沒有看見，有些人並且直截痛快的指出，說這種違法貿易所得的金錢究竟是歸英國商人和製造家所得。紐約的黎溫斯敦家和馬薩邱塞的漢科克 (John Hancock) 都以走私發財。

一七六四年的糖類條例，實質上是一七三三年舊糖蜜條例的重新制定，這樣規定使它實行。每加侖六便士的舊稅率減到三便士，扣留逃避法律的船隻亦經規定。二便士的稅率或者可以說得過去，但英國國會的西印度應接室把它推高。這是對新英格蘭的經濟利益的一個重大打擊。羅德島提出抗議，說西印度商業是它的對英貿易的整個基礎，並且它的一千四百好格海特糖蜜，英屬西印度至多只能供給二千五百。條例中有一項規定糖類條件下的案件，任何駐美海軍中將法庭得施審判，意思是說商人的船隻和船員勢將被帶往哈立法克斯 (Halifax) 受審。他如果被釋放，也不得要求賠償損失。殖民地領袖印格索 (Jared Ingersoll) 說這種辦法無異焚燒倉庫來烹雞蛋，一定會激怒倉庫主人。

另一件不痛快的事實是大陸貨物從英國運往殖民地的出口稅，一七六四年，從百分之二·五提高到百分之五。稅關官吏奉命嚴格執行，加強實施的方法，如軍艦的駐美洲水上以拘捕走私者，與「輔助勅令」的發布授權王家軍官搜檢有走私嫌疑者。

南方的地位完全不同。它對西印度的貿易很少，或竟沒有。南方輸送它的主要產物——烟草、藍靛、海軍軍需品、木材、皮革——直接到英國以換取製造品。但這種對英貿易以利於母國不利於殖民地為原則。貿易操在英國商家與其所派遣駐在殖民地的代理人手裏。代理人低價收買烟葉等貨品，高價售賣布疋、家具、酒類、車輛等貨，價格常常不公平。懶散的地主養成從倫敦定購心愛物品的習慣，用票據付價，弄到債臺高築。許多債務父傳於子，成為世襲，像革命後哲斐孫所說：「這些地主是附屬於倫敦某某等商家的財產的一種」。他計算革命開始時維基尼亞欠英商的債款總數超過二百萬鎊，估計這欠款約當於在維基尼亞境內流通的金錢之二十

倍至三十倍。地主自然討厭他們的英國債主，好像後來西部農民討厭東部的承受抵押者。他們很知道消除這種沉重負擔最容易的方法是聯合起來反叛英國束縛並且以戰爭所產生的延期付款法或取消付款法逃避債務。

一七五〇以後的二十五年中，南方有幾處的立法議會通過自由的破產條例和延緩法，有利於欠債者。這些條例到英國時，樞密院幾乎常不予以裁可。結果引起殖民憤激的情緒，認為英國富人剝削貧民。國會又謀阻止殖民地的憑藉紙幣。一七三〇以後，多數省分發行大量紙幣，且有定爲法幣的；但它們更遭到倫敦的反對。一七六四年，國會斷然禁止殖民地以紙幣用爲價債的合法貨幣，因此在全部英屬美洲的債務羣內造成一個新的而且重要的不平。

又有一種經濟的大利益關係於西部的土地投機和殖民事業。在西部地帶，致富的要道有兩個：與印第安人作皮貨貿易，及組織土地公司以獲得、分派、且售賣大片的荒地。那時的皮貨商人和土地投機者願意能自由行動，好像現在的探勘油礦者和採伐木材者之能在西部自由行動一樣。一七六〇年以後，又有參加過七年戰爭的舊軍人，領受西部土地作爲獎勵的頒給。特別是維基尼亞，用這方法酬勞它的軍士，長官丁威迪(Dinwiddie)以二十萬英畝許給部隊之能驅逐據守俄亥俄流域法國人者。

彭西凡尼亞、維基尼亞、和兩卡羅來納的平民許多是渴望著土地。在戰爭終了時，不久將有向西的大潰竄，顯然可見。土地公司相繼開辦；大陸上的大人物——佛蘭克林、華盛頓、約翰孫爵士(Sir William Johnson)，都有密切的興趣；當時曾有爭取所有權和購買查勘的紊亂。

但當這些衆人爭着握取西部土地，英政府正決定一個嚴格管轄並巡護西部的新政策。爲對印第安人保持和平計，爲阻止西部殖民向西散布太遠並越出英國管轄計，爲終止爭所有權的重疊混亂計，英國國會於一七六三年宣告一切殖民事業須到阿帕拉幾山的高峯爲止。這「宣告線」以外的土地，暫時擱開，作爲王家領地；任何印第安土地除售與王家外，不得出讓。理論是說遲些時沒有妨礙，說讓頑冥好動的印第安人慢慢可以安靜下來，說土地可以逐漸的開放給殖民。不久，貿易拓殖委員會支持一個新的西部殖民地名梵大利亞(Vandalia)

的計畫。但這宣告激怒了皮貨商人、土地公司、獎助持有者、和一般渴望西部土地的人士。美洲人戰敗法國人，才得開闢的門戶，這宣告無異於砰然把它關閉。

殖民地教會事業的怨望集中於對英格蘭教會的關係，該會是德拉瓦以南各地及紐約一部分地方的國家供給的教會。有三處殖民地有聯合教會組織，但聯合教會組織雖更嚴正，而激起反抗者到是英格蘭會。

這種反抗，立在兩個主要基礎上：一是許多殖民激烈反對給教會納稅，一是他們害怕監督教會派教職政體的政治趨勢。南方的英格蘭會教士，每人有他的住宅、會產、從賦稅支給的薪俸、和其它用費。在各殖民地，監督教會或聖公會信徒佔絕少數。在維基尼亞低地，諸大族如華盛頓氏、利氏 (Lee)、藍多爾夫氏、卡德比、麥孫氏、凱立氏，幾乎全是聖公會信徒。但里士蒙以西，異派信徒如教友會派、浸禮會派、路德教派、長老會派，人數遠較爲多。北卡羅來納當局雖是試令人民維持九位聖公會傳教師，可是聖公會信徒卻寥寥可數。在南卡羅來納，該會比較有力，但那裏異派的團體大約有八十個，佔絕大多數。虔誠的異派信徒，沒有樂於出錢供養聖公會傳教師像供養他所崇信宗派的教師的。

另一個爭論的範圍是在帝國防禦問題。印第安戰事有確然可見者，法國人渴望着報仇，密西西必那邊的西班牙人也未可聽任。英政府不信殖民地能夠自衛。它責備諸殖民地在晚近的戰爭中發兵的迂緩吝嗇，與未能和衷共濟。唯一的動作力是在倫敦的帝國政府。因此英政府在格林維爾 (George Greenleaf) 領導之下，決議保持軍士一萬人在北美，軍費三分之一歸殖民地賦稅支付。這使諸殖民地每年籌款約三十六萬鎊。格林維爾於一年前預先公告，並且向殖民地保證，倘使它們繳納這軍費，他將採取一個更好的計畫，他因此提出一個新聞紙與法律和其它文件之印花稅的議案。國會於一七六五年通過它，「比較通行稅案所遇的反對爲少」；又附帶一種辦法，規定殖民地要供給軍隊的燃料、燈燭、牀被、烹飪器具、和襄助尋找營房。這對英國似乎是件小事；但對殖民民，印花稅法是無代表的賦稅的一個顯明例證。

美洲究竟是和共和性質或准共和性質的主義的沃土。一百五十年來，人民生活在民主或平等的空氣中。經濟

的差別很少；經濟機會對人人公開。貴族政治的曾經存在只是刺戟民主主義的增長。掌握大部分財富的海岸階級或黨徒是沒有的；其中幾省，如維基尼亞和南卡羅來納，政治勢力與興起於內地的民主主義相對立，進行着長期鬭爭。內地的小農，蘇格蘭、愛爾蘭和日耳曼移民，城市的勞動者和技藝工人，常以對抗舊商人和地主來維護本身的權利地位。他們在革命前的一代，就已致力於此，驚駭了他們的上層階級，這同樣的精神對他們反抗母國的革命熱誠頗有貢獻。

我們列舉對英革命領袖，可以看出他們屬於兩大羣。一是一班知識分子和作家思想家，如散曼爾·亞當斯 (Samuel Adams)，約翰·亞當斯，約翰·傑 (John Jay)，奧替斯 (James Otis)，哈密爾敦，司各脫 (John Morin Scott)，克林敦 (George Clinton)，黎溫斯敦 (William Livingston)，佛蘭克林，狄更生 (John Dickinson)，卡羅爾 (Charles Carroll of Carrollton)，哲斐孫，理查·亨利·利 (Richard Henry Lee)，麥孫 (George Mason)，瓊斯 (Willie Jones)，和茹特勒治。幫忙他們的是一班技工和邊民起家，教育受得少或沒有受過的激烈份子，如在紐約的麥克杜格 (Alexander McDougall)，息斯 (Issac Sears)，和藍勃 (John Lamb)；在彭西凡尼亞的羅伯道 (Daniel Roberdeau) 和布賴安 (George Bryan)；在維基尼亞的巴特里、亨利、在北卡羅來納的勃生 (Thomas Perain) 和布勞德傑斯 (Timothy Bloodworth)；在南卡羅來納的卡茲登 (Christopher Gadsden) 和薩謨特 (Thomas Sumter)。第二羣諸人性質急躁，傾向於激烈的政治見解，喜歡純粹的民主政治或近乎它的主義。他們受知識分子如哲斐孫和撒穆爾·亞當斯的鼓吹，但他們當革命運動初起時，給過這運動極大的勇力。無論如何，在促起革命這事，第一羣人更為重要。知識分子用着喉舌筆墨，發出大堆的單冊子，充滿論文在報章上，並且用公開集會散播他們的政見。

殖民地作家和政論家傾聽於南羣有力的英國思想家：一是證明清教共和國的主義是正當的作家，一是證明一六八八年民權黨革命是正當的。他們也就是從錫德尼 (Sidney)、赫林敦 (Harrington)、密爾敦 (Milton)，最重要的是從洛克 (John Locke)，找出他們的論據。洛氏政府兩論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的第



二卷包含美國獨立宣言的胚胎。洛氏主張國家的最高作用是保證生命、自由和財產，這些都是人人應有的權利。又說政權只是爲着人民的福利而受信任以存在。人類的天賦權利倘被侵害，人民有起而廢除或改變政府的權利與義務。這種主義被寫入獨立宣言的序言裏。洛氏主張無所本的力量之真正救藥是反抗這力量。他又在他的論信仰自由書 (Letter on Toleration) 裏解釋教會與國家恰恰佔有各別的範圍並且需要分立的理由，給革命奠立另一個大基礎。他指明：在最健全的性質，教會是一種志願的組織，自由受它的團體分子所支持而不是受國家的租稅力量所維持。

洛克和符合洛氏意見的作家，深爲一切有政治興趣的美洲知識分子所讚美。當英國人與洛氏諸人的思想正相違異的時候，美洲人承繼他們的政治哲學。一六八八年以後的英國憲政設施發展成一個畸形且不民主的代表制度。一個寡頭政治發生，基礎於人口已經減少而還有選舉權的市邑的制度，基礎於拒絕授與新興工業城市代表名額，基礎於有計畫的剝奪大部分人民的選舉權。選舉權的剝奪與人口減少的市邑或同等情形也存在於美洲，但不至像英國的程度。爲推廣選民團及依照殖民地授與新郡和西部區域以公平的代表名額的努力，不斷於全十八世紀的美洲。美洲有一個真正代議政體的實質標準；英國有一個偽代議政治的制度。美洲人信仰以公平的民主制度表現出來的天賦權利；英國人許多信仰國會絕對主權和一個曲解附會的政治制度。到一七六五年與母國糾紛開始，美洲人自己覺得已經有一個已完全成型的政治哲學足以應付他們的需要。

### 誤解

兩個爭執者的完全互相誤解，少有比得上革命前十年間的美洲殖民與英政府的。我們必須重複申說，英國初時的步驟，並無意思要在美洲行暴政。解決印第安問題，爲保護本身的殖民地守成、與稅務的加強，這些事上的努力，在倫敦的諸大臣眼裏看來，認爲公平溫和。但在美洲羣衆眼裏看來，這些設施不啻是密集的壓迫機器。艱苦的日子隨着戰爭而至。失業且貧困的人們想在山外尋找新的家，可是「宣告線」擋住他們。貿易不

佳，現金缺乏；可是英政府乘這時機厲行新關稅來誅求殖民地的金銀。這時它用印花稅法賦歛殖民，不經他們的同意。歛得的錢用於養多數殖民民認為沒有真正需要的常備軍；這些厲害的戍兵又加強苛重的海關章程和不公平的稅法的執行。王家軍官認為向法院要求「輔助命令」是正當的；但殖民民認為這些命令，適用於任何人，給執行命令的軍官以專權，許其搜檢任何人的家庭或商店，是不能忍受的。英政府通過某幾種法律以限制或禁止殖民地的製造業。政府認為這是公平的，因為深信殖民地如果集中精力於生產原料，英國集中精力於製造貨品，可使帝國臻於最富強的境地。但許多殖民民卻怨恨這種干涉。

在這種事實上糾紛的幕後，有一個理論的齟齬，使這整個爭執加深，並造成一個不可連接的鴻溝。

大多數英國官吏堅持國會是個帝國組織，對殖民地運用同樣權力，如同在本國一般。國會能為馬薩邱塞通過法律如同為柏克郡 (Berkshire)。事實上殖民地有它自己的政府。但殖民地只是團體，因此服從一切英國法律；國會能隨時限制、擴展、或解散它們。美洲領袖認為這是不對的，因為並沒有帝國國會存在着。他們立論，說唯一的法律關係是對國王。同意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是國王，國王以政府給與殖民地。國王同是英王與馬薩邱塞王。但英國國會無權為馬薩邱塞通過法律，如同馬薩邱塞立法議會之無權為英國制定法律一樣。國王倘使從殖民地要錢，可以要求它們給他，但國會無權藉印花稅法或其它稅收法律來獲取。簡單的說，不列顛臣民，不論在英國或美國，只被他自己的代表且經由他自己的代表，加以賦稅。

我們必須認清，英美兩方的感情都顯然分判於主要的爭端；正在發展中的爭執不只是殖民與母國間的鬭爭，也是殖民地內部和英國內部的內政糾紛。國會中著名的民權黨領袖查坦、柏克 (Burke)、巴瑞 (Barre) 和福克斯 (Fox)，都極傾向於美洲志士；殖民地中一羣剛直的保王黨分子支持英政府。我們必須認清，雙方激烈分子有想利用爭鬭來推進各人自己的見解者。巴特勒 (Lord Bute) 想用暴力掃蕩殖民地以減削約翰·威爾斯 (John Wilkes) 等在英國所提倡的民主精神。撒穆爾·亞當斯 之在馬薩邱塞，與巴特里·亨利 之在維基尼亞，同是想利用爭執來推進他們的殖民地政治的激烈思想，並且根據一個比較接近平民的基礎以改造社會。

## 組織起事

反抗英政府的起事不是個廣泛自然的運動，而是大陸上機智的人們所謹慎計畫，多少最活動的人物所勞苦敏捷實行的。倘是無組織，絕不能成功。因為志士們有良好的組織而保王黨或忠於英國者沒有，所以前者能夠制勝。

運動的初步是反抗英國法令的騷動的出現，散布並且不相連繫。一七六五年的印花稅法，在幾處殖民地獲到反響。各地立法議會提出抗議，維基尼亞更通過有力的議決案。但最有效的行動是暴民所做的事，他們在馬薩邱塞、紐約、維基尼亞、北卡羅來納各省搗毀印花票和其它財物，強迫印花稅吏去職或逃亡，甚至危脅王家長官的生命。這種騷動起初很得民衆擁護，但殷富和守法的市民卻加以非難。團體名叫自由子弟團 (Sons of Liberty) 的也誕生了，它以繼續反抗國會的壓迫為任務。

第二步是商人團體的經濟抵制機構，有時是受省議會所支持的。引起它的是一七六七年徵課茶、紙、玻璃、和顏料稅的湯森條例 (Townshend Act)，商人和認真的市民紛紛約定不輸進和不消費，抵制英國徵稅的貨物。波士頓於一七六八年三月採取這種手段，兩年之內，傳遍各殖民地，完全受這影響。有幾處殖民地的英國入口貨減少到將及一半；有幾處這種規定實施得不好。當英國國會廢除湯森條例中茶稅以外的各稅，抵制運動於一七七〇年停止。

第三步是地方和殖民地間的通信委員會系統的組成。馬薩邱塞的撒穆爾·亞當斯，天才宣傳家組織家，是這種任務的主要領袖。他在馬薩邱塞立法議會居領導地位時，是開會於范內意堂 (Faneuil Hall)，控制波士頓的自由民大會中最有力的人物。在一七七二年夏大，市民知道英政府擬定發給與長官和最高法官經常薪俸，藉此使他們脫離民衆控制。十一月二號，一個城市大會召集了，採取「包括整個革命」的步驟。它設置一個通訊委員會以和全省各城通消息。不久各地都有類似的委員會，全省闕然像一窠怒蜂。從馬薩邱塞到各柏克

郡，人民排成整齊的對壘。一位保王黨作家後來稱論道，「這是叛亂的起原。我看見這小粒種子當它種下時。它小得像一粒芥子。我注意着它的生長直到它長成像一棵大樹。」其它殖民地設立相似的地方委員會；維基尼亞市民議會於一七七三年委派一個全殖民地委員會系統中的第一個單位，這種系統極快的散布於全大陸。

朝朝起事的第四步驟是革命立法議會的產生，或像一般所稱爲省議會的。舊時定期的立法議會不爲激烈分子所用，有兩個原因。議員大半是保守分子且有產者，安於現狀，緩於動作；他們部分的在王家長官管轄之下，長官能任意延閉議會。最早的各省議會成立於一七七四，是波士頓港口條例通過的消息的結果。各省議會產生的方法常是極簡單。

例如在維基尼亞，波士頓港口條例的消息於一七七四年五月傳到，全省憤激。立法議會這時開會。哲斐孫、巴特里、亨利、理查·亨利·利，與其他四五人立刻在議事廳集會。他們決定宣告一個絕食祈禱日。這是一個異常莊嚴的儀式，因爲是七年戰爭以後所未嘗有的。他們回顧克倫威爾 (Cromwell) 時代國會中的前輩，並且引導市民議會規定以一七七四年六月一日爲這一天。長官鄧摩爾 (Dunmore) 以市民議會所爲不軌，毅然把它解散。他們八十九人整隊走入長街到刺里酒店 (Raleigh Tavern)，店裏的阿波羅廳 (Apollo Room) 正在酣飲慢舞，他們秩序井然，擁着議長藍多爾夫 (Peyton Randolph)。激烈份子建議一個新的不進口約定。理查·亨利·利要求採取附加辦法，但有些人退縮了，因爲他們當時的地位與市民議會的時候，中間已有顯著的差別。可是他們退縮得並不久。五月二十九號，騎馬者從波士頓來，帶來其它各殖民地首邑的信件。他們帶來消息說停止一切對英貿易現在已經擬定。藍多爾夫，與二十五位市民議員商議停當，決定於八月一號召集前會議員；由這次召集，產生在殖民地的首次省會議或革命立法議會。

## 第四章 革命與聯邦

## 武力憑藉

殖民地的憤怒和騷動逐漸增加。英軍開到各城，給激烈派領袖一個煽動羣衆的機會。一七七〇年紐約發生不流血的「金山戰役」(Battle of Golden Hill)。像柯爾登所說：「一股怒氣恰巧被激起於城市民衆與軍隊之間；」到後來，「城市居民有些開始武裝，兵士則從營裏突出，來幫助他們的同胞；」軍官和地方長官出來勸解，僅僅得免衝突。波士頓發生較嚴重的衝突。兩團戍軍在星期日換防，軍笛戰鼓的聲音激怒若干嚴正清教市民，粗野份子歡喜嘲弄惹動「蝦背人」。(英軍制服紅色如龍蝦。)軍隊奉命要極度自制，所以激怒的舉動愈來愈幽莽。

三月五號那天，終於有士兵兩名被市民襲擊毆打。鐘聲召集民衆聚到街上。一個放哨於海關房子的守兵被人辱罵並且用冰塊等物所打。當隊長普萊斯登(Preston)和一小隊上來保護他時，嘲弄和投擲更加厲害。一羣暴民喊着「敢開槍嗎，開槍，叫你們下地獄！」兵士極力自持，終於有人把一名兵棒打仆地，這兵站起來後就開槍。接着一場混亂，旁的兵士也不待命令即開起火來。當場有三人斃命，兩人重傷。軍隊擊鼓集合，長官到場維持秩序。一個重傷者臨終時說他曾在愛爾蘭見過羣衆暴動，可是沒有見過兵士能忍耐着不開火像這次的。但許多人以為波士頓慘案是英國暴政上限於風土的例證。它的週年紀念日莊重舉行，它的喚起民衆，也是前此所無。

諾爾斯勳爵(Lord North)領導下的英國殖民地部，沒有能從這方輿的猜疑和仇怨得到適當的教訓。一七七二年又有一件重要事變發生。裝有八門礮的小軍艦喀斯比號(Gaspée)，正忙着在羅德島不上取歸走私，於六

月間擱淺於普洛斐登斯附近。一羣市民襲擊它，壓服船員，並把這討厭的船放火燒掉。湯森條例所徵課的各種稅，除茶稅還被保存着以實施那原則外，其餘全已廢除。在殖民地，喝茶的習慣實際上已經停止，東印度公司陷入財政困難。為扶助東印度公司計，殖民部於一七七三年准許它把茶葉價格降到很低的情形下，輸運這貨品到美洲；諾爾斯勳爵仍然堅持在殖民地每磅三便士的稅，說國王認為它是主權的試驗。這試驗直接引導美洲的起事。美洲人認為試驗的話是個託辭，這喚起了痛切的憤慨。公司遣送去多隻船。各港口人民都決定抵抗。查理斯頓把茶葉封進地窖；費城紐約原船遣回。波士頓的騷擾尤其厲害。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夜裏，有大約五十人的一羣，打扮成印第安人，由撒穆爾·亞當斯親自領着上船，拆散三百四十三箱茶葉，一齊拋入港裏。城中官吏，沒有打算阻止這毀壞財產者。這暴動從緬因到喬治亞到處被人讚揚，波士頓拿它向英政府挑戰，英政府很快的接受了。

喬治三世和大多數國會議員決議懲反叛的波士頓。柏克和查坦爭着一個傾向和平的對策。但殖民部提出五種激烈的條例，通過於國會。一是根本變更馬薩邱塞所珍愛的特許勅書，毀棄其中最自由的若干項特徵。一是任駐美英軍指揮蓋治 (Page) 將軍為馬薩邱塞長官，輔助以四團兵，授以得駐軍民房之權。一是規定軍官執行職務時被告重要罪名者得連同證人被遣回英國受審。一是停止波士頓港的一切商業，至交付毀壞茶葉之債金及提供忠實完納稅收之諾言為止。最後，魁北克條例伸展加拿大疆界到俄亥俄以北和阿利根尼以西的全境。這最後的一個法令並非懲罰性質；它久已在考慮中，是根據於專家研究，目的在得到西北皮貨貿易的較好管制，並把密西根和意大利諾兩地的天主教居民置於性質相似的主權之下。但這已非其時，沿海各殖民地的人民自然認為這是對着他們封鎖西北。

國會這幾種嚴酷的條例引起憤怒和恐怖。殖民地間的通訊委員會被激採取行動。集會舉行了，報紙論文刊布了，論文小冊子廣泛的散布了。維基尼亞立法議員，集會於刺里酒店，發出召集一個年度大會來討論美洲聯合的利益，得到立刻且熱烈的答復。維基尼亞的省議會選舉代表，其餘各省接着它。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首

屈的大陸議會開會於費城，各殖民地除喬治亞外，都有代表出席。五十一位代表中有華盛頓、佛蘭克林、約翰·亞當斯和其他才能之士。他們置英國國會於不顧，而請願於英王和英美的人民。他們起草一道強硬的殖民地權利宣言，主張各省有爲它本身事務立法的「專有權」，服從着國王的不裁可權；但約定它們在爲帝國之善意利益的對外商業上，將同意於英國國會條例。

但最重要的是大陸議會採取兩項正對英國殖民地部絕交的政策。一是準備散布一個約定，約束簽字各省於三個月內停止一切英貨的輸入，一年之內停止輸出貨物於英國港口，包括西印度在內。這是個嚴重的犧牲。維基尼亞的地主不能再把他們的烟草輸與英國消費者；馬薩邱塞的船主不能再從西印度貿易中牟利。殖民地中的十一區（紐約和喬治亞置身事外）批准這種結合，在全十三个有力的地方委員會裏着手推行。他們舉行宣誓，公布違反者名單，有時訴諸鞭撻的場所或塗黑油被羽毛在犯者身上，以表示懲罰。其它一個步驟是起草一件決案——實際上是一件哀的美救書——大陸議會不但藉它認可馬薩邱塞最近對英國國會條例的反抗，並且宣言倘有對該殖民地的人民用武時，全美應援助他們，起而抵抗。

衝突現在成爲不可避免。或者宣告英國國會的條例無效，或者用武力執行它們。沒有一方能讓步。英國國會宣告馬薩邱塞在反叛狀態並把帝國的力量供給國王以鎮壓亂事。全境各地都在購買軍械操練軍隊。蓋治在波士頓，以爲一七七五年春天他的軍隊將受攻襲。四月十八夜，他命令八百名的一隊出動，決意奪取在康科特（Concord）的幾處非法軍庫。殖民地志士正在守望，北教堂樓上的一盞燈打了個閃，傳話給查理斯河那邊的芮佛爾（Paul Revere），他立即奔往鄉間喚醒羣衆。天亮時，曾經戰陣的農民攜槍集合，像後來愛默生所說的，放出一顆聲聞全世界的槍彈。撒穆爾·亞當斯離得不遠，當他聽見破響，失聲喊道，「今天是何等光榮的一天！」

## 革命戰爭

幾天之內，一羣未經訓練、半武裝、但不可侮的義軍，已經圍攻蓋治和他的軍隊於波士頓；幾星期內，各地最後的王家政權都在傾覆。第二次大陸議會（雖向英王呈遞一封最後的和解請求書），以公然反叛的團體，於五月十號開會於費城，把在波士頓四圍的部隊編爲美洲大陸軍，委派華盛頓負責指揮。狄貢德羅卡要塞，控制着到加拿大的主要進路，被綠山少年領袖阿倫（Ethan Allen）所帶人馬勇敢的佔領了。美軍愈進逼波士頓，蓋治看出自己的駐地將受在南之達徹斯特高地（Dorchester Heights）和在北之查理斯頓背後各山來的威脅。當六月十六、七兩天義軍謀佔後一據點，他們猛然進入戰爭的第一次大戰役，邦格山（Bunker Hill）之役。

像八十年後的牛奔（Bull Run）之役一樣，邦格山有一個直接結果無比的重要性。約有三千五百名美洲人，夜裏在布里德山（Breed's Hill）和邦格山佔定立足地，並在布里德山築起一座堡壘。天亮時，他們的活動被發覺。蓋治召集軍事會議，他雖可以切斷美洲人的後方工作，可是他決計在正面攻擊他們。這件艱苦的事大約是受英人渴望堂堂正正的戰鬥的影響。步兵紮在美軍陣地之下，排列成行，在極熱的一天下午三時開始襲擊。英軍穿着正式制服，背着行囊，裹着三天糧食，和槍彈藥，每個人大約負重一百二十五磅，整隊徐徐而進。當他們距戰壕四十碼遠近，美人平腰瞄準，猛力開槍；英軍卻退，重整陣容，再上前來，在二十碼外遇到又一場猛烈槍火；他們退而復合，當義軍放到最後兩顆槍彈，英軍這次掃平壕塹。這情形是壯烈的，但是罪惡的，無必要的。同等力量的一支軍隊，在海軍掩護之下佔領查理斯頓地峽，會切斷美人糧食，迫得他們早降。總計英人死一千零五十四，美人只死四百四十一。

這一仗證明美洲人雖無適當的組織或配備，但他們卻能擊退歐洲最精的正規軍，大大的增強信心。英方最密切的指揮官何威，厭惡這次大殺戮甚至永不能忘。當蓋治被黜奉召回英，何氏繼任，不敢迫着美軍來作消耗英國力量的戰爭。

## 美洲的弱點



衝突拖延六年之久，各殖民地都有戰鬪，重要的對仗有十幾起。義軍結果屢次失利。從混雜且訓練不良的隊伍依照計畫組織一支真正軍隊，是華盛頓的艱苦工作，更難的是統率它。忠英的情感傳布得很廣，漠不關心的心理更是普遍。新英格蘭、維基尼亞、和兩卡羅來納中幾部分的人民，表現熱烈的戰鬪情緒。但紐約的保王氣息不下於義軍聲勢；彭西凡尼亞的教友派信徒不願意作戰，大多數日耳曼人不願意離開他們的農場；北卡羅來納的高地居民嫌惡低地人民，加入英王的隊伍；喬治亞多受克里克部族的威脅，並感激於王家特別補助金，因此置身爭鬪之外。據取低的推測，美洲人服役於英王者有二萬五千人；忠英者倘使有專心的培養、謹慎的統率、和有能的指揮，戰爭的結局將不相同。

義軍組織，起初很壞，一七七八年，菲德烈大帝的參謀官史條本男爵 (Baron v. Steunon) 以志願到美改善局面——不久升為總監——看出部隊實力的配列，從三到二十三組。高級軍官素質不佳，因為在幾處殖民地裏，巧言令色之徒可以哄人從軍，列為自己的部屬，或用酒食金錢賄賂人家舉自己做高級將校。新英格蘭和各地的民主造成犯上的風氣；農民村民曉得他的長官是鄰人者便不願意聽他的命令，所以華盛頓說新英格蘭人看着他們的軍官不過是把掃帚柄子。士卒也多沒有受深刻責任心的影響。他們自以為從軍期限可以隨便進退。冬天一到，他們聽見莊稼成熟，沒人收割，或者想家喪氣，他們便棄營潛逃。華盛頓向議會請求長期兵役，於一七七六年九月得到認可；但所遇到全是惡弊。為加嚴紀律起見，華氏終於力請議會授權軍事法庭，以最重五百下的鞭刑處罰犯罪者。

軍隊屢次幾乎凋落。一七七六年三月義軍佔領波士頓及華盛頓移軍紐約後，華氏發見自己只有八千人適於作戰；英軍總計三萬五千人，何威又至少帶兩萬能作戰的在長島登陸。他打潰在佛拉布希 (Flatbush) 所遇到的小支義軍，自然不是難事。在他面前的義軍只剩有五千五百人，倘使他進兵敏捷，義軍將寡不敵衆，全師就擒；但他坐失機會，竟使華盛頓趁霧脫身，逃往曼哈坦島。接着是義軍在曼哈坦和在白平原 (White Plains) 的敗北；當華氏退兵過新澤西，他的軍隊消散得幾乎完盡。紐約和新英格蘭民軍成羣私逃。他喪失很多糧秣輜

重大戰。他到達德拉瓦河以前，新澤西和馬里蘭軍也背離他。他紮定冬營時，約有三千三百人，其中被他難信爲有毅力者佔半數。只有那冬天他在特仁登 (Trenton) 和普令斯登幾番勝仗裏的勇敢練達，解救了美洲。他能以一萬一千人開始一七七七年那仗，保王黨叫那年爲「三絞臺年」。那人數是他一七七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軍經過費城時所有，當時有位作家稱爲「襤褸、污穢、裸體的部隊。」何威帶領訓練過的兵兩萬，進攻費城，華氏敗於日耳曼城，被逐退到鐵鎚谷 (Valley Forge) 過一個嚴冷的冬天。

義軍又被其供給軍需的無能所掣肘，極可驚人。他們無法募集公債。賦稅幾乎不可能。大陸代表無權課稅；議會須向十三州要求徵課；各州已是猜忌創痛，政治又不善，所以給的援助既不充分，又是吝嗇。到一七八四年爲止，爲國家用途所收的州稅，總額用硬幣價值計算，不到六百萬元，每人平均不到兩元！借債所得也不充足——內債近一千二百萬元，外債（主要來源是法國，荷蘭，西班牙也有捐贈）不到八百萬。合衆國從事革命戰爭的主要憑藉勢必靠着紙幣。

美洲前後被壓在紙幣底下。紙幣貶值之快，至於面值雖然高到二萬四千萬元左右，而硬幣實際回庫的不到三千八百萬元。一七八一年春天，大陸紙幣的價值幾乎等於零，聖斐南拿它們糊牆壁，好玩笑的水手們遊弋回來，拿領餉所得的幾把紙，做成衣服，穿着招搖過市，襤褸得煞是好看。貶價的紙幣自然是不義不平和紊亂的原因。當代觀察家韋白斯特 (Paltuh Webster) 說：「紙幣污辱我們法律的公道，把法律變成壓榨的機器，腐化我們公共行政的正義，毀滅千萬信任它的財產，衰弱我們國家的貿易、家政、和製造業，甚至毀壞我們人民的道德。」

各殖民地對議會的不信任，和各地間的互相猜忌，又使義軍的主義蒙受重大損害。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大陸政府，頗不可能。各殖民地正反抗集權管制，信仰着地方自治。並且義氣的初次決溢一過，各地便少有友愛的感情。維基尼亞人不喜歡新英格蘭人，把他們看成一班鄙野貪婪且過度民主的權謀家，甚至緘默的華盛頓也含着譏諷的意思敘述他們的惡習。新英格蘭人覺得南方人有驕傲和貴族的傾向。各殖民地都只掃自己門前雪，如

約翰·亞當斯到大陸議會，還不認識紐約和彭西凡尼亞主要領袖的姓名，便是一個例子。議會籲懇各地支持軍隊和財政，它的理由常常不被人注意。

不久，瓊斯 (John Paul Jones) 雖在海上建立幾起驚人之功，奮勇侵擾過英國領海，但那時美洲人實際沒有海軍。直到一七七八年，英國人還掌握着海洋的全部控制權，那時以後還掌握着部分控制權。英國人幾乎能隨意襲擊千五百英里海岸的任何地方。他們有充分的金錢和給養；他們招到日耳曼傭兵約三萬名；他們的軍官具有最優良的軍事訓練。他們起初便斷然期待着勝利，並不足怪。

### 美洲的優勢

但美洲人雖有其障礙，也有其大優勢，這些優勢終於扭轉大局。一是衝突場所。他們在自己地上作戰，人烟稀少，大半還是荒野，與英國相隔着三千哩。一支軍隊或許敗於這處，另一支軍會在幾百哩外起來。英國人不能據守這樣一個廣大區域，其困難甚於把果醬釘到牆壁上。運輸軍士軍需橫渡大西洋，耗費大且事情難，而全部英軍的適當的軍路措置則不可能。另外一個優勢是美洲軍隊在某種危險時刻中所表現的戰鬥精神。這羣農兵，新從獵戶和農夫的路上出來，富有個性和奇氣，能夠整天愁悶，但作戰起來，有時像受了靈感。以消滅一七七七年柏圭因 (Burgoyne) 襲軍而集合的北軍，和一七八〇至八一年屢戰屢北的南軍，常常轉敗為勝，直到最後勝利蒞臨，證明義軍之不可欺侮。另一個優勢是一七七八年以後對法同盟——法國切望着報復英國仇恨，這同盟帶來人力、財力、鼓勵，和在最後決定期中的海岸指揮權。柏圭因、何威、克林敦 (Clinton) 給英軍的乖謬措置，至少是義軍的幸事。伍爾甫已經死了，還沒有惠靈敦 (Wellington) 出來。

美洲最大的優勢是領袖人才——因為美洲人有華盛頓。議會不知道他的才能而揀選了他，他完完全全證明他是愛國主義的南誠柱石。在狹義的軍事立場上，他真有可議之處。他從來沒有帶過大於現代一師的軍隊，他犯過許多過失，他屢次打敗仗。但他四十三歲時身給軍符，成為戰爭的靈魂。因為他有不屈不撓的愛國心、沈

着的智慧、和寧靜的膽識，因為他在最黑暗的時刻裏從不失去他的尊嚴、平衡、和決心，因為他知道怎樣結合事業和謹慎，因為他的純厚、高尚、從不缺乏的大度、和從不畏縮的堅忍，使這維基尼亞的邊地地主上校成爲戰事的啓示人物。他知道如何待時而動，所以他的有耐心的謹慎替他博得「法比烏斯」(Fabius，古羅馬大將名)的勇號。

他激怒到不能忍時，能猛然失去他的自制，像叛逆的查理·利 (Charles Lee) 在蒙穆斯 (Monmouth) 一仗中所知道；但他通常有堅定的自制力，甚如晚幾年衛因 (Wayne) 慘敗於印第安人手裏的消息傳到，那時他正在總統宴會席上，當着賓客面前，不動絲毫聲色。他於事毫無苟且，驅使部隊和懲罰軍犯都很嚴厲，但他對部屬的正直熱誠博得人們的絕對忠心。當他在紐堡 (Newburgh) 向未關到銀餉心懷怨望的部隊演說，「諸位，你們該許我戴上眼鏡吧，我不但頭髮已經灰白，並且爲我的同胞效力，眼睛幾乎都瞎了，」許多人聽得落淚。又可以稱道的是，他除却爲他革命事業的費用外，不受分文，並且這些用賤記得極仔細。戰事終了，像新新納圖斯 (Chinnatus，古羅馬執政官) 一樣，他只想解甲歸田，想把他的田地做成美洲最好的一份；他曾寫，「農事是我生平最喜愛的娛樂」。但他仍被責任所召。以他品格的偉大，意志的高尚，胸襟的明達寬廣，雖不若共和國其他英雄們自己表白的親切，他仍是傑出的人物。哥爾溫·斯密士 (Goldwin Smith) 曾公平的評論革命中最優良的三件事，「是華盛頓的品格，華氏軍隊在鐵鎗谷的風範，和忠英小康階級的忠誠。」

### 獨立

以「英國人權利」和僅僅賄補損害爲目的的戰爭不滿一年便成爲獨立的戰爭。這是完全自然的。起初，議會熱烈的抗議它的效忠英王。但流血和破壞所引起的悽慘，喬治三世難恕的態度所引起的怨憤，和美洲人有決定他們自己命運的自然權利這一個觀念，不久便導美洲於完全分立。早在一七七六年，華盛頓的軍隊懸出美國自己的旗子。同時有新從英國來的著名青年激烈分子裴因 (Thomas Paine)，著有論文小冊名曰「常識」

(Common Sense)，影響很大。他主張獨立是唯一的救藥，拖延愈久，獲得愈難，唯有獨立才使美洲的團結有可能。到六月間，議會中許多人忍耐不住了。維基尼亞代表理查·亨利·利建議獨立，約翰·亞當斯附議。一個五人委員會，由哲斐孫執筆，起草正式獨立宣言，議會於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採取，七月四日宣布它。

起草和採取這劃時代文件的人不愜意於僅僅的獨立宣言。他們公認「對人類意見的適當尊敬」，他們苦心詳細陳說「逼迫他們分離」的原因，並證明分離是正當的哲學。這些原因——被列舉的約有二十五或三十項——本身也未被引用來證明這一個激烈步驟是正當的。在喬治第三世的方面，這些原因寧可被列舉來證明「把它們陷於絕對專制下的計劃」。美國人在他們的國史的最初時候，依據主義，宣布一種哲學，是很明顯的。

具有不朽意義的政治原理是什麼？「我們認定這些真理是本身解釋明白的」，哲斐孫說：

人人生而平等，他們的造物者賦與他們若干種不可割離的權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爲了保護這些權利，政府建立於衆人中間，其正當的權力來源於受統治者的同意，——任何政體倘使破壞這些目的，人民有權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新政體，置其基礎於這樣原則上並以這樣形式組織其權限，如他們認爲最能實現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的。

我們在這裏所有的，自然是民主的哲學，向來沒有說得如此簡明流暢的哲學。像美國人所說，有幾件事是自己解釋明白的真理，明理的人沒有能懷疑它們的。人人生而平等，在上帝心目中與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個真理。可是，甚至哲斐孫說，在美洲有許多不平等的事：貧富、男女、黑白。但社會的未能進於理想，並未使理想失去效力，且一經宣告過的平等主義，在美洲思想上，像酵母般的發生作用。不久到處有人發問：倘使人人人生而平等，何以我們發見他們不平等？在這大理想的衝擊力下，美洲人開始實現這理想爲事實的工作。

宣告中所宣告的另一個大真理是人人被賦與不可割離的權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這些並不是由仁慈的政府賜給人民，也不是政府所隨意持有着的權利。它們是人人人生而有之且不能失去的權利。這

原則也像酵母般的在美洲人心中——且在世界各處人心中——起了作用，直到讓我們可以看見：不給與人民任何這些權利的政府，將無理由以存在。

像宣言所指出，政府的建立，第一正為保護這些權利。我們在這裏有堅實的政府理論——這理論是說人類會生於未開化的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中他們不斷的受危險，為保護他們本身起見，他們相結合並建立政府，給與政府管轄足夠的權力以保護他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簡言之，人民締造政府使它為善，不是為惡；締造政府使它保護人民，不是損害人民。政府失去初設時所為的目的時，不應再受人民的支持或效忠。

倘使人民能造成政府，則人民也能毀滅它們，因為改變或廢除一個不良的政府，和建立一個新的，是人民的權利。這常被目為革命且常經暴力和流血才得成就。但這時美國人正說那既不是革命又不是必要的暴力行動，而是一個正當且合法的行動。

他們不久便證明這不僅是個理論。雖當革命進行途中，戰爭緊張騷擾之際，他們着手化這理想為事實。他們依法相聚於會議，廢除他們的舊政府，建立新的；他們把生命、自由、幸福的確實保證寫入他們的憲法裏。幾百年來為哲學家財產的觀念，從哲學領域被取出來，作為法律了。

### 進軍與會戰

戰爭的大決戰，在軍事意義上的轉捩點，是薩刺拓卡 (Saratoga) 之役。一七七七年年初，英人有大軍駐加拿大，和何威所領一支精兵駐紐約。假使這些軍隊集中在紐約的話，英政府可以有配備堅強的正規軍三萬五千人出動作戰。假使有得力的英指揮官用他們來痛擊華盛頓那小小的八千大陸軍於新澤西，像一八六四年格蘭特 (Grant) 之痛擊利氏 (Lee) 於維基尼亞，起義無疑的已經崩潰。華盛頓所最怕的是這軍隊的集中來消滅他。但倫敦當局，被休假回國的柏圭因的報告所誤，決議使他們的軍隊仍然分散着。柏圭因所率的一軍從加拿大向南朝着阿爾巴尼移動，直指哈德孫航路的上端；紐約的何威一軍向北移動，上溯哈德孫，直指阿爾巴尼。英王

同意這計劃。倫敦以詳細訓令致加拿大當局進行聯合征討的北路。但沒有明確的命令給何威，——何氏不攻阿爾巴尼，却向費城進兵。

柏圭因計劃的根本缺陷是它阻礙英軍力無敵的統一。另一個缺陷是北路英軍一旦深入美境，離開自己的基地太遠。當柏氏到達上紐約的愛德華要塞 (Fort Edward)，他離開蒙特利奧一百八十五哩，每進一步，給他與接濟中間增加一點困難距離。他勢須在四圍附近尋找軍糧。在柏寧敦 (Bennington)，即現在佛蒙特 (Vermont) 南部的地方，有大糧庫和牲畜，只有少數民軍守衛着。爲搶奪糧畜且痛擊這地方，像他所說那裏「充滿大陸上最好動好亂的種族，逼人像密集的暴風雨」，柏氏派遣一千三百名日耳曼人等進攻柏寧敦。他們跑進一個蜂巢裏。新英格蘭農兵集合的有兩千人，在法蘭西戰役的老軍人斯塔克 (John Stark) 率領之下，大敗英軍。

這時一支增加得很快的美軍與柏圭因的主力軍對峙於哈德孫上游。一七七七年九月十九號，兩軍接觸於自由人農場 (Freeman's Farm)，美軍約九千人，英軍約六千人。又幾次交仗，完成柏氏的敗績，他陷入荒野，氣盡力竭，喪失奇重，美軍却增到兩萬人。十月十七號，四面楚歌，柏氏的部隊放下武器。他帶兵遠征基地二百哩外敵兵盪起的荒野，證明是件蠢事。

柏氏的失敗有遠達的影響。英王在美的精銳，在一擊之下，喪失幾乎四分之一。哈德孫永遠歸美國管轄。義軍再振起精神。佛蘭克林在巴黎極力活動，遊說法國外長衛仁 (Vergennes) 給美人援助。當何威到費城和柏圭因取下狄貢德羅卡的消息傳來，法人的熱誠爲之冷淡。但薩刺拓卡的消息一到，佛蘭克林的朋友波馬謝 (Beaumarchais) 高興極了，相傳他忙着去稟告國王，手舞足蹈，至於手腕子脫臼。一七七八年二月六日，法美兩國簽訂一個同盟條約，給戰事一個完全新形勢。自備用費來美，不論資格、服務美國的勇敢的拉斐葉 (Lafayette)，已經被議會任爲少將。法國西班牙兩國王已經給美國祕密借款，用來購買大量軍械軍火。現在法國準備遣派六千以上精兵，命令羅香波 (Rochambeau) 率領去增援華盛頓，他們供給更大量的金錢和給養；

法國艦隊的行動又大加英人接濟其軍隊的困難。

征服北部失敗之後，英人轉向南方。他們的計劃是奪取以脆弱著名的喬治亞，再向北方猛進，獲得所到之地忠英者的援助。一七七八年底，他們攻下薩凡那，一七七九年，佔領喬治亞和南卡羅來納的內地。美人派上將本哲明·林肯 (Benjamin Lincoln) 應付局面。他坐視自己被圍於查爾斯頓，一七八〇年五月，英人俘獲他和他的五百名部下，又佔領這南方要港。這是革命的嚴重打擊之一。全南卡羅來納不久便遭到蹂躪。另一位美國將領，薩刺拓卡的英雄蓋次 (Horatio Gates)，南去阻抑軍勢。可是他的三千人小隊，一半是新募民軍，一七八〇年八月十六那天，在卡謨登 (Camden) 被康華理勳爵 (Lord Cornwallis) 所打潰。他們死傷和被俘總計二千人，蓋次逃脫，奔跑將近二百哩還不駐脚。

但有一支來自西卡羅來納的忠英軍一千人，這時在王山 (Kings Mountain) 被一支較大的義軍所打敗。又有一位美國將領格林 (Nathaniel Greene)，才能遠勝於他的前輩，這時身臨南方戰場。他也於一八七一年在季爾福廳 (Guilford Courthouse) 吃了敗仗，但他在長途迅速的進軍中，表現驚人的巧妙。他雖在九個月內，敗過四次主要之戰，但已經叫英軍疲勞，他和居民敵愾心聯結的威脅力終於逼得英軍退入查理斯頓和薩凡那。像華盛頓一樣，格林輸了交戰，贏了決戰。

格林掃蕩南方下部時，另一支英軍正接近着慘運。春末，康華理從恐怖角 (Cape Fear) 鄉間北進，和叛逆阿諾爾德 (Benedit Arnold) 會軍於維基尼亞。康氏追擊拉斐葉所率美軍，不能得勝，退到約克河口的約克城，築寨而守。這時華盛頓約有六千名兵駐紐約附近，羅香波約有五千名兵駐羅德島的紐博德。康華理剛退到海邊，美人得到西印度法國海軍上將德格拉斯 (De Grasse) 的通知，說能出來相助。華盛頓看見這機會，赫然把握住它。用極快的進軍，他帶美法聯軍一萬六千名到約克城下。康華理的八千人被德格拉斯的艦隊所攔阻，不能從海上逃脫。康氏的外郭失守；他的內部防禦工事被美砲隊所轟擊。十月十九號，他解下他的佩劍送與華盛頓，華氏命令將軍林肯受了；英軍架搭起武器，樂隊奏着世界迴轉之曲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戰事這時實際上已經告終。英王喬治一時還不肯承認失敗。但在一七八二年中，英軍已經放棄南方各港；各地已經沒有英軍行使主權，只在紐約一城，還聽得到英國戍軍的號角聲音。

## 和約

在一七八三年結束戰爭的條約中，英國答應了寬大的條件。假使英政府有所選擇，則對疆界要斤斤較量。羅德尼 (Rodney) 所率英艦隊正在西印度大勝法國人；紐約英軍，沒有人能把他們驅逐出去。可是克拉克 (George Rogers Clark) 所帶的美國槍兵已經侵入俄亥河以北的荒野，攻陷英國在印第安那、意大利諾、密西根各地的屯戍。應付美國全權使者佛蘭克林、約翰·亞當斯、和約翰·傑的英國大臣錫爾本 (Sheburne)，原可在這些略取地的週圍擬劃一道緊迫的界線。但他卻把阿利根尼與密西西必中間的全部讓與新共和國，它的北界幾乎與現在相等；他把佛羅里達讓與西班牙，並把加拿大沿海大量的捕魚權給與美國人。

這種雅量收得有價值的結果。倘使英國人想掌握着西北的大部分，則與合衆國的磨擦（無論如何沒有）將會頻繁而且嚴重。共和國的自然進展是向西的，它的擴張力用在這一方向，後來逼得法國人讓出路易斯安那，墨西哥人讓出大河 (Rio Grande) 以北的區域——但這擴張，尤其在一八一五年以後，使英帝國無須憂慮。加拿大和合衆國並肩擴展到太平洋，今天握着大陸最好的部分，以忠誼的友誼和同盟相處着。

## 民主的生長

在對外關係上，美洲已經完成一個顯著的革命。但對內也發生一個同等重要的改革。它在那幾年給美洲社會一個強烈的變更，像斷絕對英國關係一樣的重要。

脫離英國，自然是政治民主上的一個直接收穫。現在長官已經出於民選，不由國王派任；立法議會的上院

改爲選舉的，替代任命的；民衆要求的法律不受否認權的損害。但同等重要的是對內改革，擴大參政權並使代表制更爲公平。在一七七五至七六年，有一個爲兩項民主步驟的巨大要求起於彭西凡尼亞：一是要求給人被忽略的西部各郡一個與它們人口適當的代表額，一是要求廢除選舉上有利於少數被惠階級的財產條件和國籍資格的限制。這兩改革都確然得到。一七七六年三月，立法議會增加代表十七名，大多數是從西部區域來的；參政權不久也擴大了，予每個男性納稅者選舉權。有幾州裏，如維基尼亞，開闢較早的各區在議會中仍然保持着不公平的優勢，又如馬薩邱塞，投票仍然要財產條件。但在彭西凡尼亞、德拉瓦、北卡羅來納、喬治亞、和佛蒙特，選舉都已解放，所以不久，任何「森林裏的兩足動物」——像一個令人作嘔的保守分子所說的——都可選舉了。

忠英者的消散是對民主政治的又一大貢獻。有保守性和財產的保王黨，大多不喜歡赫欽孫 (Dorothy Hutchinson) 所稱的「污穢的亂民」。他們皈依着舊制，隱退在嘲笑憂愁的感情混合中。當何威退出波士頓，隨着同走的忠英者幾乎有一千人，不久接着又是一千人——他們的格言是「地獄，船，哈立法克斯」(「Hell, Hull, Halifax」)。紐約省的重要產業主人幾乎全是保王黨人。當英人退出查理斯頓，一百隻船的半月形艦隊載着出走的忠英者駛出海灣，確是一番悲壯的景象。加拿大和沿海各省容納六萬名以上難民，西印度更多，英國成爲沮喪的居停主人。有人記載，說「英國鄉村，當我們在安靜休息的時候，少有不染美洲塵土的」。他們去後，樸素耐勞的農人、店主、手工人，得自由創造一個合於自己意思的文化。此後尊嚴、悠閒、和文明見輕，精力和堅強的自己主張見重了。猛進的商人和投機者抬頭於美洲社會。人人被看成平等的，人人都倉皇匆促，並且幾乎人人想着多得金錢。

三個特權障礙的受打擊也有助於朝向民主的大推動力——這三個障礙的被打擊是長子承繼權和限定嗣續的破壞，保王黨產業的分裂，及所在英格蘭教會組織的推翻。維基尼亞是限定嗣續和長子承繼權根深蒂固的殖民地。它們的作用是保持着大家庭產業不致分裂。像哲斐孫在他的維基尼亞筆記 (Notes on Virginia) 裏所說，

維省有這樣一羣貴族家庭，組成一種貴族制度，以他們的宅第的輝煌奢侈著稱。衛斯特峨佛、謝萊 (Shirley)、杜喀和 (Thukahoe) 的主人們和其他地主的宅邸得到廣大領地的邊頭。哲斐孫於維基尼亞議會中領導對限定嗣續的攻擊，在一七七六年初次襲擊中，幾乎掃除了它。一切財產此後都可以無限制的買賣。一七八五年，哲氏又成功長子承繼權的廢除。有人建議長子至少應得雙股。哲氏回答說，「不行，除非他能吃雙份糧食，做雙倍分量工作」。法國旅行家華維爾 (Brisot de Warville) 不久以前到過維基尼亞，能夠說：「階級區別開始消滅」。大地產很快的分給與兒子們，或分塊的賣給與新來者，子女們得到錢使去西部。其餘南方各州——喬治亞、南卡羅來納、馬里蘭——很快的學了維基尼亞的榜樣。

在同等情形，大業主和殷富保王黨所有的大片土地的被沒收，形成小業主的民主制度。兩家主要的業主是彭西凡尼亞的彭家和馬里蘭的巴爾的摩勳爵家。彭西凡尼亞給與彭家十三萬鎊以紀念彭州的建立者，但哈福特 (Harford) 只從馬里蘭得到一萬鎊。維基尼亞沒收多起地產，特別是華盛頓的好友第六世菲爾法克斯勳爵 (Lord Fairfax) 的。北卡羅來納奪取格蘭維爾 (Granville) 的幾百萬英畝地產。紐約接收一切王家土地和五十份列舉出來的保王黨地產，包括着約三百方哩的菲力普斯 (Phillips) 產業在內。衛斯特吉斯特 (Westchester) 的德藍茜 (De Lancey) 地產和普特南郡 (Putnam County) 的莫利斯 (Roger Morris) 土地出售與五百多位主人。在紐約的約翰孫爵士 (Sir John Johnson) 的被沒收地產終於分做農民一萬人的家。馬薩邱塞奪取多起產業，包括在緬因的裴普瑞爵士 (Sir William Pepperell) 的，這位小貴族能騎着馬在自己地上跑一條三十哩直線。從溫德華斯爵士 (Sir John Wentworth) 喪失他的土地的新漢布什爾，到來特爵士 (Sir James Wright) 遭遇同樣命運的喬治亞，小農歡躍的得到以前只拿他們做佃戶的富庶土地。

和英國統治相關連的宗教貴族政體，與地主和官吏的貴族政體同歸沒落。在新英格蘭無所事事於英政府的組合教會，仍舊保持着特權。馬薩邱塞甚至於加強它們。但在南方，英格蘭教會的特權就消失了。革命徹底破壞北卡羅來納的國教，那裏沒有一座講教臺仍舊被用着。在其餘各州，革命給與政治激烈分子

和異教派如浸禮會、長老會的信徒一個絕好機會。北卡羅來納於一七七六年採取一個憲法，保證宗教自由並禁止任何國教的建立。喬治亞於一七七七年，南卡羅來納於一七八年，採取同樣辦法在它們的憲法裏。但維基尼亞發生最猛烈的爭論。這裏的國教深溝高壘，因為大多數貴族家庭都是英格蘭教會信徒。甚至於政治煽動家如巴特里·亨利，深信國家之維持宗教，對於虔信和美德，是必要的。但反對派有兩位生長於英格蘭教會中的領袖，自由主義者哲斐孫和麥迪孫（James Madison）。

這幾位領袖以獲得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證為得到第一道戰壕，這不是件難事。麥迪孫在一七七六年的憲法中寫入簡單的宣言：「人在宗教的自由信仰上有平等之權」。但國教仍舊存在着，需要十年的戰鬪來推翻它。哲斐孫說它是他所參加過的最嚴重的鬪爭。從一七七六年以來，他和他的朋友們年年相繼為停付教會稅而奮鬪，並於一七七九年永久廢除納給教會的年稅。但他們的反對者於一七七六年提出決議，宣稱為一切教會的一般稅這問題應予保留，在這要求一般宗教稅的背後，並集成一個有力的黨派。在本質上，這計劃想建立一切基督教派別，把它們定為平等的國教，以公共財政支持它們。這計劃的最可畏的主張者是善辯的巴特里·亨利。

危機來到於一七八四至八六年。亨利藉他的難敵的辯論力，帶入市民議會一個決議，宣稱：「本共和國的人民應繳納一種適當的稅或捐獻以供給基督教、或基督教會或宗派、或基督信徒的羣衆。」但當這意見被作為一個特殊議案來努力完成時，反對黨集合全力。在亨利與麥迪孫的一場大辯論中，後者獲得一切榮譽。這議案被擱起，這使自由主義諸領袖得以進行教育之戰。在一七八六年，這爭論終於埋沒不再看見，同時哲斐孫的著名的宗教自由議案被通過——宣告政府必須不干涉教會事務或信仰事項，且不以宗教意見強加於任何無能力者。這劃時代的法案不但是維基尼亞的，並且是西部諸新州的宗教自由的基石。

各州加強教育基礎的法案，多有值得一說的。衝突在私立學校學院上，有個令人煩悶的結果。耶魯學院一度停辦；英王學院，即現時的哥倫比亞，也是如此。直到一七九七年，威廉馬麗的校長教的是一羣赤腳男孩

子。一八〇〇年哈佛教職員只有一位校長，三位教授，四位導師。在一七八〇至八四年間，波士頓的大報紙上看不見一家書店廣告。

但革命有一個可喜的效果，就是喚起平民訓練，也就是免費公立學校的普遍要求。民主自治需要教育的選民，這不久已被人們看出。紐約州長克林敦 (George Clinton) 在一七八二年說過：「一個最高位置公開於各級公民的自由國家，它的政府的特殊義務是努力以學校來普及文學程度，這事業對公共責任的建立是必需的。」哲斐孫說：「在一切事情之先，我希望平民教育將被注意到；確信在他們的良善意識上我們可以最大的安全依賴着以保持自由的正當程度。」各州起初被貧窮所累，但這新要求屆時在初等教育上得到遠較戰前良好的利益。在教育上，又有深遠的重要性的是一七八五年土地章程的規定，以公地數百萬英畝充作公立學校補助金之用。

### 國家政府的缺乏

青年共和國的景況這樣的有希望且有進步。可是有一片暗雲在地面上。十三州從未建立成功一個真正的國家的政體。它們在一七八一年三月採取了某種聯邦條款，但這種制度只是友誼同盟，微弱且不充分。並無真正的國家行政者存在。國家法庭制度並未建立。大陸議會包括每州只有一票之權的一院，力量太薄弱，不能發生作用。它不能徵課賦稅，不能徵募軍隊，不能懲治違犯它所通過的法律者，也不能強迫各州遵守它與外國所訂立的條約。最壞的是，它不能籌集足夠的款項來進行政府的機構或支付國債的利息。

簡單的說，革命給與美洲人民在國家家庭中一個獨立的地位。它給與他們一個改變了的社會秩序，在這新秩序中，遺傳、財產、特權被看為無足輕重，人類平等卻被重視；文明和風俗的標準暫時降低，公道的標準卻提高了。它給與他們成千的紀念以加深他們的愛國心：華盛頓在劍橋一棵榆樹下的拔劍，邦格山麓的血戰，蒙哥美利 (Montgomery) 在魁北克城下的死，黑爾 (Nathan Hale) 說：「我只恨我只有

一條生命為我國家犧牲

牲」這句話，哈德孫河的浮屠船，賣國賊阿諾爾德的傾覆，鐵爐谷的酷寒，麥利翁 (Marion) 在南卡羅來納的遊擊戰使他博得「濕地狐狸」的綽號，佛蘭克林說「我們必須團結否則我們將各別上弓」這句話，愛國財政家莫利斯 (Robert Morris) 的熱心爲革命募集錢款，哈密爾敦的猛攻約克城外郭，英國艦隊在大逃亡中的駛出紐約灣。

但美洲人民仍須表現他們有真正的自治能力——造成他們的共和國。他們仍須表現他們能解決帝國組織問題。可是他們還未證明它。他們的友誼聯盟似乎正變成一個內訌之羣。他們的議會正極端被輕視。各州間的紛爭正在生長，確是危險。在混亂情形之下，受損害沒有再比得上軍隊的，它所需要的糧餉被服都未領到。軍官們常舉杯相祝：「這籬子可以做桶子用」——倘使沒有一個籬子，桶子也許早散成一堆木板了。

## 第五章 制定憲法

### 劃時代的成就

由於共同的同意，合衆國有一個空前的最巧妙最有效的憲法。不像英國的憲法，它是成文的，但它已同着國家而柔韌的擴張了。它是如何產生的，這故事非常有趣味。格萊斯頓（Gladstone）說過，「如英國憲法是從進步歷史以來常在進行的最微妙的有機體，則美國憲法是人類思想和意志在一個固定時間內所造成的絕妙的作品。」實在它也是個大部分進化來的產物。但它在近代一個最非凡的會議中成了一般的形狀。

革命將終了時各州所採的聯邦條款顯然有缺點，大約是個幸運的事。如果它們有了一個幾分較好的政治體制，人們或許費大氣力去彌縫它們，而國家或許要在一個拙劣的憲法下苦惱幾十年。因為它們幾乎完全潰壞，所以它們被拋棄在一邊；因為潰壞產生自它們的弱點，所以新憲法被造得格外堅強。一七八六年左右，流行着一個嚴重的商業不景氣，美洲大局到了這樣絕望的頂點，這也是個幸運的事。只有一個顯然的危機才能引導許多懷疑的美洲人來接受一個有力的新中央政府。

### 聯邦政府的弱點

在一七八六年，狀況似乎是暗黑的。美洲不但沒有任何真正有力的國家政府機構，十三州弄到這樣無秩序，人們說着它們間可能發生戰爭。它們正為疆界而爭執着——在彭西凡尼亞和佛蒙特，甚至於爲這打破了頭。它們的法庭傳下互相衝突的判決。國家政府，應該有權力徵課任何必需的關稅，並管制商業，可是沒有做。這政府應該有權徵課爲國家用途的賦稅，可是也沒有做。它應該有唯一的對外關係管轄權，但有幾州已自

已開始對外國談判。國家應該有唯一的對印第安關係管轄權，但有幾州處理着野人以適合自己，喬治亞並開始且結束一個印第安戰爭。

當內部以無秩序威脅各大區域財產的安全，清醒的中等階級着慌了。當一七八五至八六年不景氣到最厲害的時候，到處人民生活緊接着生存水平線，產生嚴重的艱苦。各邊地上，金錢缺乏，市場疲弱，農作物因為缺少需要者而腐爛。人民依賴着以物易物。債戶們要求各州政府印刷紙幣來收他們的收穫品並償付他們的債務。他們要求一觸延期償還債務的法令和規定以牲畜或穀類作為法償的章則。一七八六年一月馬薩邱塞州格林威治鎮 (Greenwich) 的申請書，敘說每天有取消抵押者贖取權的出賣土地，價格只賣到實價三分之一；牲口只賣到半價；五年來的賦稅已等於田地的整個租額。政治的爭論表現於債主債戶兩階級間的紛爭。在許多州裏，窮人與富有份子間的敵對強烈起來了。一個南卡羅來納人們切責州長茹特勒治 (Rutledge) 和其他貴族的宣言可以代表：「這州的富豪，他們下賤的諂媚者是欺騙，他們和諂媚者的工具和諂媚者，又是欺騙。」

在一七八六年，有七個州立法議會為紙幣勢力所支持。羅德島通過法令，使人人可以用實際上無價值的貨幣來滿足他的債務。一位小詩作者寫過：

債主尾追破產者，含着憤怒；

債戶叫，沒有停止，沒有寬恕。

因為紙幣可以完全用來償付欠別州人民的債務，康納第格和馬薩邱塞憤慨的通過報復的法案。紙幣勢力沒有能支持住兩個在新英格蘭全北部位置的立法議會——馬薩邱塞議會和新漢布什爾議會；這裏突起武裝變亂。現行的馬薩邱塞憲法很具保守性。它已在選舉資格和公務資格中為財產樹立特別保護。這保守的議會已經徵課重稅以償付革命債款，債權大半操在投機者手裏。一個農民變亂發生，不足為奇。議會在一七八六年七月的休會是變亂的信號，這變亂的領導者是一位邦格山戰役的老軍人，它在歷史上被稱為謝士叛亂 (Daniel Shay's Rebellion)。



馬薩邱塞州在州長包德溫 (Bowdoin)、將軍林肯、和一些在危局中出借款的富人們領導之下，採取強力行動。阻止謝士進奪斯勃令菲爾德 (Springfield) 國家兵工廠的企圖並擊散他的勢力，是件易事。但短期的爭鬪深深的驚駭全國的保守派人物。它似乎預兆一個左傾的革命運動。諾克斯 (Knox) 將軍寫信給華盛頓說新英格蘭有一萬二千或一萬五千亡命之徒抱着現在所謂的共產見解。「他們的信條是，大家的共同努力已經保護合衆國財產免除了英國的沒收，所以這財產應該是大家共同的。」他們已經恐嚇「新英格蘭每個有主義有財產的人」。華盛頓認為馬薩塞當局應該更嚴酷，顯然驚惶的說：「每個州裏都有容易燃燒之物，一星火就會引起燎原。」這是一般見解。合理的斷定是需要一個較強的國家政府來幫助各州對付亂事。馬薩邱塞的喜金孫 (Stephen Higginson) 寫信給丹氏 (Nathaniel Dane) 說：「我看得清楚，在我們的現行制度下，我們不能長久生存；除非我們想法使聯邦更有力，叛徒將會起來，最後並從我們手裏奪去統治權。我們將必然被摔進大變亂裏，那變亂的結果將以許多流血造成一個或更多的政府。」

各州政府間的紛爭，已經使依靠同等方法為生者發生嚴重苦惱。商人以缺乏統一幣制而陷於絕望。他們要應付一堆混雜的錢幣，鑄造者有十幾國，許多是剪了邊和重量不夠的，又有偽造的，又有種類不計其數的州票國家票，價值都在猛跌。這很明白，沒有標準國幣，不會滿足。出口商人都歎着缺乏為他們在國外市場銷行美國貨的保護。微弱的大陸議會認為重建對英帝國、尤其是對西印度的舊商業關係，勢不可能。西班牙已經大膽的對美國商業封鎖密西西必河口。甚至在國內，交易者沒有方法能確定收到應該付給他們的錢。一個紐約人在彭西凡尼亞要賤，要惟彭西州法庭和陪審官之命是聽，他們自然是袒護着他們本州人。發展迅速的美國製造團體聽命於來自歐洲的極大價格的競爭。

最糟的弊病起於對抗各州間商業交際的故意障礙。有幾州切望阻止歐洲貨物的傾銷且獲得稅收，對一切進口貨物徵課關稅。在這程序中現出三個主要段落。當戰爭時期，維基尼亞單獨範圍寬廣的在貨物上課稅，因為它保持有相當的商業，輸出煙草並輸入多種貨品，它能夠這樣做。其次，在媾和後的三年內，除却新澤西，各

州都對進口貨課稅，但爲的是稅收，不是保護。最末，一七八五年左右，新英格蘭和中部各州的大部分已發展前途有希望的本國工業，且蒙受歐洲競爭的損害。所以它們建立保護關稅。

一個各州間相報復的原素很快的潛進來了。南部各州和北部幾個小州沒有多少製造品，需要進口貨物。德拉瓦和新澤西爲歐洲貨物開創自由港口，康納第格也通過法律來鼓勵歐洲貨物的直接裝運。限制又加到船隻的行動上，所以，例如新澤西人，沒有繳付重費，不能渡過哈德孫而在紐約售賣蔬菜。自然，各州間的情緒變得不高興。北卡羅來納人，痛斥維基尼亞和南卡羅來納，比喻自己的州是個兩頭鑿了漏洞的桶子。愛爾斯烏斯 (Oliver Ellsworth) 說他的小小的康納第格好像「老依薩加 (Issachar)」，一匹健驢正在兩頭擔子中間蹲伏下了。」

除却商人和製造家，一般債主羣，慨歎國家權力的需要——這權力能予極端的立法議會的均勢以有效的束縛。他們包括有放債者和抵押品執有者，這班人對「延緩」法令和大批紙幣的發行感覺煩悶。他們包括有英國所有權的美國持有人，因爲控制着幾個立法議會和法庭的激烈分子把欠英國人的債務作成不能償付。他們包括有許多官兵，這班人因革命的服務受到土地憑證作爲部分的酬報。他們包括有土地投機者，這班人廉價購買軍人的或充公的大片土地，並急着轉賣出去。有地產者需要一個能保護邊地、抵抗印第安人的國家政府，以保證新近拓殖地區裏的秩序，並保護權利。

最末，聯邦證券、州證券持有者的一個重要團體含痛看有當時混亂的財政局面和一般對賦稅的嫌惡。最後十四個月中，在聯邦條例下，國家內外債的利息大約有一千四百萬鎊，而國家稅收只有四十萬鎊。華盛頓在一七八五年寫信給華仁 (James Warren)，概括當時的局面，說「政府的輪子是塞住了。」

## 西北法令

聯邦政府獲得一個大成功。對着如何處置阿利根尼山以西未拓殖地帶的問題（因爲各州在這陸續讓與權利

給總政府），一個大有幫助於合衆國這國家的聰明計劃被想出來了。它決定開放土地與有秩序且進步的拓殖；鼓勵居民依照有規律的階段發展自治；最後，建立新州，和原來的十三州相似，這計劃具體表現於一七八七年的西北法令，以俄亥俄以北的地帶爲對象，最後並準備建立三州至五州。奴隸制度永遠不許加入。政府的階段被列爲三段。大陸議會首先創立一個「地方」，任命長官一人和法官，他們創制法律，服從議會的不裁可權。其次，當人口達到五千時，人民得有一個兩院的立法議會，下院由人民自己選舉。最後，當地方有了六萬人口時，地方就改爲組織完備的州。合衆國便這樣的解決它的殖民地問題。立下一個模範使國家效法着到它擴展至太平洋，最後並形成四十八州。

但在多數其它方面，聯邦是件失敗。華盛頓寫過，說各州只是薄弱的結合成的，另一位觀察家宣稱「我們的不滿正醞釀着內戰。」大陸議會現在有能力的人太少，它的威信太低，不能使它計劃出一個更好的政府方式。裴因早就提起「開一個大陸會議，以制定一個大陸憲章。」少數眼光遠大、會合討論商業問題的領袖成就這個。

### 召集會議

憲法會議的準備是個平易的故事。有思想的人們正對着國家的薄弱和各州的爭執感覺頭痛，一個特別的商業問題正需要注意。馬里蘭固執着整個波陀麥克河的主權，這河是它和南岸維基尼亞的分界。維基尼亞人怕馬里蘭會干涉他們在那寶貴的水道上的自由航行；一七八五年，維馬兩州的代表聚會於佛農山，華盛頓也出席，討論波陀麥克河和折沙比克灣的航行。麥迪孫也在會，大被一般商業的擾亂所沮喪，深信需要舉行一個更大的會議，目的是使各州把這規程授與大陸議會。會議於一七八六年在安那波里舉行，只有五個州的代表出席，似乎是一個完全的失敗。

僥倖的是哈密爾敦是代表之一，從失敗中攫取到勝利。他勸誘這會議要求各州委派委員在來年五月集會於

費城以考慮合衆國的局面並「籌畫進一步的準備——像他們所認為必要的——以提出聯邦政治的憲法使能應付聯邦的危境。」大陸議會起初對這大膽的辦法表示憤慨，但它的空虛抗議因維基尼亞選出華盛頓為代表的消息而停止。議會就範了，規定一七八七年五月第二個星期一為開會日，在那秋冬兩季內除却頑強的小羅德島，各州都選出代表。

代表是州立法議會選出的。有些議會被激烈的農民團體所控制；各議會裏辯護州主權者又都強固。可是多數議會訓令它們的代表創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政府，並向費城遣派一羣政治思想極端保守、見解極端國家主義的人們。這是一部分因為那時的人還不易了解現代意識的政黨觀念；一部分因為注重商業章則，所以聯想到需要選商業事項的專家；一部分因為維基尼亞選出華盛頓的早期宣告，激勵其它各州來選堅強沈着的人物。

五月初，代表們三三五五的前來費城。華盛頓是特別按時的，於十三日到達；他穿着黑絲絨衣服，佩着禮劍，立刻成為衆人注意的北極星。佛蘭克林於十六日盛大宴請到會代表，開了一位朋友送給他的一桶黑啤酒，無疑的是十足馬得拉陳貨。來賓有維基尼亞的麥迪孫，身材細小但是位政治分析力偉大的人物。出身普令斯頓，一位律師，墾殖家，勤讀藏書，他是會議中僅次於佛蘭克林的博學者。他可作代表中最勤勉且有建設心的分子的證明。其他來賓有六十五歲的韋斯 (George Wythe)，他教過斐孫、麥迪孫、馬沙爾、和其他維基尼亞諸先覺的法學。又有維基尼亞州長藍多爾夫 (Edmund Randolph)，一位七千英畝地皮和二百奴隸的主人。

在彭西凡尼亞人中，有莫利斯，肥胖的銀行家，當革命最黯淡的日子，他曾籌款供給華盛頓的軍隊作戰。開會期中，華盛頓就住在莫利斯的華美的宅裏。又有古凡訥·莫利斯 (Governour Morris)，一個紐約富家子，現在是費城的一位主要律師和理論家。印格索，曾在倫敦中院攻習法律並已成彭西凡尼亞最優的律師之一，也在座中。又有詹姆士·威爾孫 (James Wilson)，一位粗暴而精明、具有蘇格蘭血統和教育的人，美洲最博學的法學家。在一七八七年的世界任何處，都難得聚集這樣多的人才於一席；舊世界的團體裏，絕無比莊

重威嚴的華盛頓和愉快聰明仁慈的佛蘭克林更動人的人物，當時有人記述佛氏，說他似乎「散布無拘束的自由和快樂」。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曾經醞釀過和參加過革命的活動份子不是這會議的代表。哲斐羅在法國；巴特里·亨利拒絕選舉；裴因，撒穆爾·亞當斯，和卡茲登這三位煽動家，沒有被選。簡單說來，激烈份子是不適宜於代表的。

### 會議工作的進行

這會議是不常有的創造，一個實在有深思熟慮的團體。由允許每州可以任意派多少名代表，這事看來——因為投票時每州作爲一個單位——這是可注意的。但因經濟的原因，大多數州都派了小小的代表團。出席者全數只五十五人；有些只出席短期，所以到閉會時席上只三十九人；有少數人，包括華盛頓在內，在辯論時常守緘默。大約一半是大學畢業生，絕大多數是律師，所以發言正確良好。沒有逐字的報告記錄下來，麥迪孫和其他人士日記裏的本子，無疑的已削去許多繁冗；但是讀這些摘要的人，沒有不被多數發言的理論力所感動的。他們在討論中受會議嚴格遵守的祕密規則所幫助。公開會擴大紛爭；它會引誘代表們爲聽衆或報紙而說話；它會暴露他們，讓他們受其選派者的壓力。穩重的費城市民們因爲他們拒絕窺探會議工作而得到讚美。佛蘭克林有一次在餐席上向朋友們提起一個舊寓言，說一條兩頭蛇因爲兩個頭爭着向樹的各自一邊走，不能決定，以至餓死；佛氏說他能從會議的新近事情裏舉出一個例子；但他的朋友們向他提醒了祕密的規則，並阻止住他。

代表們自始就緘默的同意不修改聯邦條例，而創製一個完全的新憲法。在這決議上他們超出他們的權限。大陸議會召集這會議的唯一和特爲的目的是修改聯邦條例。但如後來麥迪孫所說，代表們對他們的國家具剛毅的信心，簡直把聯邦條例擱在一旁而另進行一個新的政治形式。這如哈密爾敦所觀察，是個革命的辦法並且是個崇高的權威。柏澤斯 (John W. Burgess) 後來說，假使拿破侖幹下這樣一件事，它將被稱爲政變，可是我

們該記得許多州已經特別訓令它們的代表創造一個能適應時局危機的聯合體。

敘述會議的工作，重要的是要注意幾個一般的事項。代表們知道應該建立一個複雜機構，單純的政府是不夠的。開始他們須謹慎嚴密的和解兩個不同的權力：半獨立的十三州已經在行使着的地方控制權，和新創立的中央政權。只有英帝國的歷史供給這工作以前例。一七六三年以前，在帝國中，有個對一切目的的聯邦制——中央和地方政權的治權區劃。但到那時為止的其它聯邦全是疆域狹小的；它們幾乎全是極度鬆弛的；它們少有長時期成功的。麥迪孫和幾位其他人士會普遍的對政府作過深切研究，又特別研究過希臘、瑞士、和荷蘭的聯邦，多數代表對政治思想也很有研究。採取的原則是，國家政府的職分和權限應該謹慎規定，其它職分和權限應該解釋為屬於各州。國家主權的權限，是新的，一般的，包括的，只是應該指定出來。

### 最後的工程

國家機構的建造同着這種陳述的進行並行。這裏並有一個一般的原則支撐這工作。這是自然的，政府須建立三部分：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這樣適合並連結着，使它們能和諧的動作，但同時這樣均衡着，沒有一個權力能始終獲得統制。這十八世紀的權力均衡觀念是個政治的牛頓觀念。這原則自然是從殖民地經驗得來，並由大多數代表所熟悉的洛克和孟德斯鳩的著作加強了它。美國對暴政的定義是單一份子承擔主要職分。這並不是自然的假定立法部分須包括兩院，如同各殖民地立法議會和英國國會一樣。不是每個人信仰單一的行政；但主張複數行政者，被訴說一個對殖民地和州的一般例子所壓閉口了。

建立兩院制立法機構的決議使會議中對小州與大州權力的根本爭執更容易調正。各小州主張它們應同大州一樣的具有正確的平等，如在聯邦之下；大紐約絕不應蹂躪小康納第格，大維基尼亞不應蹂躪馬里蘭。各大州則主張權力應當照面積人口和財富比例分配。

藉最後所採取的妥協，各小州在參議院中得到和大州同等的代表額，但在衆議院裏，額子以人口為根據。

至於行政，最大困難在擇定選舉方法。總統應由議會選舉嗎？那將很使他依賴於立法部分。這樣並傾覆權力的均衡。他應由民衆選舉嗎？合衆國的人民散布在一個廣大且正在擴張的區域上，而且交通不發達。因此，使民衆集中在一個或少數候選人上是件難事；很多的選擇將被提出，沒有人能接近到大多數的選票。所以最後決定建立一個選舉團，每州所有選舉人的人數與它的參議員衆議員相等。這制度決非像制定者所期望的而進行，因為他們未能先見到不久即發生的政黨發展。至於第三部分，聯邦司法機構，法官經參議院的諮詢和同意，由總統任命之，在良善行爲下，爲終身職。

憲法作者的精巧和聰明，同樣值得我們贊許。它們建立起人類設計的最複雜的、均衡且守護得最好的政府。三部分各是獨立的並且是調和的，但每部分都被其它兩部分校正着。議會議法規未經總統認可，不成爲法律；總統須提出任命的一部分及條約的全部於參議院，並得被議會彈劾且撤消。司法機構聽取在法律與憲法之下發生的案件，因此，有解釋基本法和法令的權力。但司法機構是由總統所任命，經過參議院所批准，可是議會也得彈劾他們。因爲參議員由州立法議會所選舉，任期六年，總統由選舉團選舉，法官是任命的，所以政府沒有那一部分暴露直接的公共壓力之前，除却衆議會。此外，政府官吏的任期有很大的差別，從終身職到兩年，除非革命，否則不會發生全部人事更動的。

會議確定聯邦政府要有能夠維持秩序保護財產的力量之決議，在其它情形下，頗有危險性。但大多數的決議只費簡短而和平的辯論。聯邦政府自由的並完全的受到課稅之權，這樣確定了方法給它以償付久欠的債務，以恢復債權，並爲一般公益事業籌集款項。它可以舉債，可以徵課劃一的關稅、輸入稅、和土貨稅，可以通過劃一的破產法。它受有權力鑄造貨幣，規定度量衡，發給專利權和版權，建立郵局和郵路。它受有權力與舉並維持陸海軍。它可以管制各州間商業。它受有全權管理對印第安關係、國際關係、與戰爭。如果任何州內發生內部暴動，而立法議會或州長請求援助，它能出來干涉以恢復秩序。它可以通過爲外國人入籍的法律。管制着公共土地，它可以允許新的州在與舊的完全平等的原則上，加入聯邦。它應有它自己的首都，在一個不超過十

方哩的區域裏。簡單的說，國家政府開始便強有力——不久被最高法院給憲法的解釋使得它更強。這種強力量是聯邦的薄弱的自然反動。

可是各州仍舊強有力。一切地方政府的權力在它們手裏，它們管制着人民日常內政的大部分。學校、法院、警察、城市的特許設立、銀行和股份公司的團體組織、橋梁道路運河的保護——這些和其它許多事業，在州的手裏。各州決定誰有選舉權，如何選舉。它們主要的負着保護平民自由之責。在一個長時期裏，人民先覺得自己是喬治亞人、彭西凡尼亞人、或維基尼亞人，後來才覺得自己是美國人。

最後，這會議面對着最重要的一個問題：給與新國家政府的權力如何使其實行？舊聯邦有巨大的——雖然不適宜的——紙上權力。但實際上，它的權力幾乎等於零。因為各州並不注意它們。如何能使新政府不遇到恰恰同樣的障礙和拒絕？在開始時，大多數代表只提供一個答案——運用武力。維基尼亞建議：應當授權議會「用聯邦的武力以對付任何不履行聯邦條例之義務的分子。」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因為武力是國際法的一種手段。在實際上它是能有害的，因為它的意義是內戰。運用武力曾使聯邦在流血和破壞中很快的分裂了。

那末怎樣辦？討論進行着，一個新的和完全的策略被推定了。決定政府完全不須依從各州，而直接依照各州內的人民而行。它為全國的人民立法，而不管州政府。麥迪孫曾對哲斐孫說過：「一切分子都自動遵守聯邦法律是永遠不可希望的。強迫的遵守顯然是永遠不能實現，如果它能，無罪的和有罪的都不免同樣的不幸，總之，是一種很類似內戰、少類似正規政府治理的狀態。因此包括一個政府的選擇權，這選擇權不運用於各州，而應不受各州干涉，運用於組成它們的個人。……」會議採取下列一段簡單的條款為憲法的柱子：

這憲法，與應依照此制定的合衆國的法律，一切在合衆國的權限下已訂定或應訂的條約，應為國家的法律；各州的法官應受其約束，不論任何一州的憲法或法律和國家的抵觸。

在這規定之下，合衆國的法律在它自己的國家法庭內，經過它自己的法官和執行者，付諸實施了。它們也在州法庭內，經過州法官和州的法律官吏來實施。這規定給憲法一個活力，是不能以其它法子得到的，並呈現



常識和靈悟、技巧和想像結合的一個也許唯一最好的例子，使憲法顯然是個統一體。

經過一夏天空前審議集合的工作，這會議於九月十七日星期一舉行它的末次會。

只有三位出席的代表拒絕簽字，大多數分子都感覺得愉快。老佛蘭克林宣稱他雖不贊成憲法的一切部分，可是他已經驚異的覺得它這樣的近於盡善了。他請求不喜憲法某幾要點的人稍稍懷疑自己的不錯誤，並且接受這文件。勇敢青年的哈密爾敦發了大致相似的辯護。他希望一個更集權更專擅的政治形式，但他發問，一個真正愛國者如何能在無政府和變亂的一方面與秩序和進步的另一面中間猶豫？十二州的代表前來簽字。許多好像被當時的嚴肅所壓服。華盛頓莊重沈思的坐着。但佛蘭克林以一種特有的機智緩和了緊張的空氣。他指着華盛頓椅背上亮金畫的半邊太陽，說藝術家常難辨別一個初升和一個落山的太陽。「我時常又時常，在開會時間裏，在我對它的結果抱着希望和恐懼的變遷裏，看着主席背後的太陽，不能說出它是上升的或是下落的；但現在，到最後，我很高興我知道它是個上升的，不是個下落的，太陽。」

### 批准

但各州會批准新憲法嗎？對普通人民它是十分危險，因為它所建立的強大的中央政府不會壓制他們，讓他們負擔重稅，把他們拖入對外戰爭呢？會議決定，它被十三州中的九州認可時，就發生效力。在一七八七年年底以前，德拉瓦、彭西凡尼亞、新澤西批准了，但其它六州會隨着嗎？這新制度的作者們大大的感覺着急。

由批准的爭執發生兩個黨，聯邦主義者和反聯邦主義者；贊成一個強大政府者和只需要各州聯盟者。這爭論熾烈於報紙上，於州立法議會和州會議裏。雙方傾吐出激奮的辯論。最有力的是哈密爾敦、麥迪孫、和約翰·傑爲新憲法寫的聯邦主義論文 (Federalist Papers)，一套成爲政治上的模範作品。爭執得最嚴厲的三州是馬薩邱塞、紐約、和維基尼亞。在馬薩邱塞，波士頓造船工人、五金工人、和其它技工有力的援助，加強律

師、商人、和一大部分農民，把憲法帶到勝利。在紐約，哈密爾敦的辯才結果轉變却反對派主要的辯論家，打破敵對的勢力，以很大的多數獲得批准。在維基尼亞，華盛頓的影響（到處都有力）和麥迪孫堅強的議論獲得勝利。當維基尼亞最後有所決定時，其它的九州都表示贊成，所以新政府已確定能實現了；但人們覺得華盛頓的州的全力贊助是不可缺少的，並且帶着盛大的快樂歡迎着它。

費城在一七八八年七月四日集合一個盛大遊行，慶祝採納新式政府。一隻象徵的船表示破損的渡船「同盟」（代表聯邦條例下薄弱的政治），船長是「無能」，已經沉沒下去；另一隻表示牢固的船「憲法」，準備航駛大海。它已準備好了。為選舉總統和國會，並為一七八九年春大實行新政府的布置，已準備好了。在人人嘴上，有一個為新國家首領的姓名，華盛頓一致無異議的被選為總統。

這樣在幾年幽暗之後，美國見到佛蘭克林在獨立大廳裏於歡呼的光明的朝陽。早期美國歷史中快樂節目之一，動人且可歌的，是華盛頓從他在波陀麥克的美麗的田園上赴紐約執政的那次行程。他起程於四月中旬，那時正值維基尼亞山的晚春。他向北走的路，有幾點正和他在一七八一年俘獲康華理的路線相合。在每個村落鄉鎮城市裏，人民爭先恐後的來給他歡呼。在費城，騎兵列隊遊行，華氏策馬經過常青樹和桂樹的凱旋門。他在一個晴和的下午到達特仁登，十二年前他於昏暗和暴風雨中在這裏渡過德拉瓦去作他最著名的一次軍事進擊。這裏有一羣白衣少女在他面前散椰花朵並謳唱短歌。在紐約灣岸上，他乘坐一隻華美的駁船，由十三名穿白色制服的船夫護送登船，到達時紐約城鳴砲十三響；他到岸上，看見這城擠滿愉快的羣衆，包括着許多革命老軍人。四月三十日，在廣大羣衆之前，他站立在華爾街聯邦大廳的陽台上宣誓就職。紐約大法官主持典禮，宣誓畢，轉身向羣衆高呼「合衆國總統華盛頓萬歲！」下面的大衆歡聲雷動。

## 一七八九的美國

這是一個強壯的共和國，現在準備開始它的前途。華盛頓就任次年的戶口調查指明它有人民約四百萬，其

中約三百五十萬是白種人。這人口幾乎全部是農村的。值得提起的城市只有五個：費城人民四萬二千，紐約三萬三千，波士頓一萬八千。查理斯頓一萬六千，巴爾的摩一萬三千。人口的大衆居住在田園上或小鄉村裏。交通欠缺且緩慢，因為道路拙劣，馬車不舒適，航船無定期。但取通行稅之道路的公司正開始組織（不久從費城到蘭開斯德（Lancaster）築成一條模範道路），運河不久也開掘了。大多數人民過着比較隔離的生活，只有簡陋的學校，少數的書籍，和稀罕的報紙。美國給與歐洲旅行家的印象，同着獨立、物質幸福、和無限量自信心的是粗野、不舒適、無禮貌、和膚淺文化。可是文化上和物質上一樣，它的情形正在改進。

這國家正長得強健。從舊世界來的移民大量的來到，使美國人有時以為半個西歐流進來了。良好的田地可以小小的款子買到；勞力的需要很切，報酬也很好。政府歡迎這種移民，華盛頓更贊成從英國帶進熟練的農民和維基尼亞辛南多阿的富庶地帶，不久都成產麥的大區域。新英格蘭人和彭西凡尼亞人向俄亥俄發展，維基尼亞人和卡羅來納人向肯特基和田納西發展。

製造業也在生長並受州津貼的鼓勵。馬薩邱塞和羅德島正奠定重要的紡織工業的基礎，私自從英國得到紡織機和阿克來機器的標本。康納第格開始出產洋鐵器和時鐘；中部各州出產紙、玻璃、和鐵。但美國那時還沒有人口完全從事工廠工作的工廠城市。實在，許多製造業還在家庭裏進行。農民在冬天的長夜裏能做粗布，皮革物件，陶器，簡單的鐵器，楓糖，和木質器械。當工廠興起，主人往往傍着手來操作。

航業正開始繁盛，合衆國在海洋上的地位僅次於英國。為沿海貿易、為捕鱈魚、為捕鯨魚、和為運輸麵包食料、煙草、木材及其它貨物往歐洲的船隻，大量的建造了。當皇后號這隻船航行到廣州並帶回東方貿易可能性的消息，震動新英格蘭人，革命幾乎因之終止。新的商業興起。它如此繁盛，在一七八七年有五隻船帶着星條花旗到中國。東方人士極想得到皮貨；有些波士頓商人決定派船到西北海岸，向印第安人收買毛皮，將它運往中國，帶茶絲回來。這新計劃證明是成功的。更大的，它引導哥倫比亞號船主新英格蘭人葛萊（Robert

(Hay) 進入上太平洋海岸的大河，這河由他的船得名，並如此奠定合衆國領有俄勒岡的基礎。

美國活動力的主要推進是向西的，始終西向。從俄亥俄的橡樹林開墾出來的地帶到喬治亞松林的隙地，森林居民的斧子和行軍的鼓聲一般的響着。移民隊伍的白頂康納斯託卡 (Conestoga) 大車爬上阿利根尼的長坡；穿鹿皮衣的獵戶和墾殖先鋒載着木器、種籽、簡單農具、和家畜，經過昆布蘭峽谷曲折而進入肯特基。在許多初墾的地上，表示土地肥沃的胡桃樹，被剝去樹皮使其枯死，邊地農民和他的鄰人造起木頭小房子，用泥土糊上木頭裂口，用橡樹薄板遮蓋房頂。從俄亥俄和密西西必順游而下新奧列良的木筏和平底船，載着糧食、醃肉、和木炭，一年比一年多。西部的城鎮，如俄亥俄河上的辛辛那提 (Cincinnati)，田納西中心的諾格斯維爾 (Knoxville)，肯特基的勒克星敦 (Lexington)，一年比一年重要。印第安戰事、瘡疾、野獸、流浪邊遠的土匪，和其它危險紛至沓來；困苦、貧窮、和疾病招致大量死亡。但仍有千萬移民的川流注入荒野，邊地的界線仍然向前推進，柏克萊 (Berkeley) 牧師所說殖民地時代「帝國的路子是西進」仍然是適用的。

## 第六章 共和國的地位

### 華盛頓時期的政府組織

一七八九年，紐約一時繁榮成爲一個國家首都。它的最好的房子改造得盡量高雅；它的街道那年夏天擠滿國會人物、候補官員、運動議員者、和觀客。總統華盛頓起初占用在城外佛蘭克林廣場的一所府邸，後來用「下百樂匯」(Broadway) 堂皇的麥康勃 (McComb) 邸第，這邸第有一間華美的客廳。副總統約翰·亞當斯占甲里士蒙山上的一所大宅。國會開會於華爾街和寬街 (Wall and Broad Streets) 的聯邦大廳——美國初時政治首都。在它後來財政首都的地址上。宴會跳舞會在舉行。總統舉行肅靜威嚴的宴會，並時常和朋友們赴約翰街的戲院。當國會開幕總統出席時，他乘坐乳白色大車，六匹維基尼亞產矯健的白馬駕着，駕車者和騎衛隊護衛着，國會辯論不許公民旁聽，但羣衆聚集在外面街道上討論當時嚴重的結果。

華盛頓聰明的領導，對新政府是不可缺少的。在政治上，他不是個有想像力的人，也不是個顯赫的開創之才；他寫作生硬，演說拙劣；他對行政原則所知很少。但他不單有服從心，並且有一種威嚴；他象徵統一的觀念，爲他人所不能。各黨各部的負責人士都信任他的公平、寬宏、和賢明。常是威重的，他的「共和朝廷」以莊嚴的禮制著稱。在接見賓客時，他將穿着黑絨和緞子，帶着鑽石膝扣，撲有粉的頭髮結在一個袋裏，軍帽夾在胳膊下，一付綵鞘的禮劍掛在腰邊。在他與國會和行政官吏的關係上，他保持着超然於黨派的態度，企圖只表現國家觀念——雖然他同情於聯邦主義者。他始終警覺且努力，照規定的時間表工作長久的鐘點。他不斷的致力給政府以高尚和原理，並在二七九六年的「告別演說」裏，以訓戒感服全國：「要團結——要做美國人。」

八月間，國會休會到那年十二月再在費城開會——因為費城清潔安靜，又是始終和氣的，它將成爲後十年內的首都。這時許多力量用在使國事上軌道。

政府的組織不是一件小事。國會接二連三的建立國務部，陸軍部，和財政部。華盛頓把第一個職務任命剛從駐法公使任上回來的哲斐孫；第二個職務任命馬薩邱塞的諾克斯 (Henry Knox)，一位平凡可是學衆望的將軍；第三個職務任命以財政專門知識著名的哈密爾敦。國會又建立檢察長的官職，它起初不是一部的首長而只是政府的法律顧問；華盛頓以維基尼亞人藍多爾夫充任。哈密爾敦和諾克斯被人們知道有聯邦主義傾向，哲斐孫和藍多爾夫有反聯邦主義見解。國會同時進行創建聯邦司法機關。它不但設立一個有總法官一人和副法官五人（後來擴大數目）的最高法院，並且設立三個巡行法院和十三個分區法院。一切法官，像聯邦各部的首長一樣，由總統任命並經參議院認可。在一七九〇年年底，最初三個國家的部，和國家的法院，同相當數目的屬員，都竭力在工作。

政黨政治早已出現——雖然許多美國人夢想不染政治的共和國。它的早期表示之一是關於修改憲法的爭論。有些州帶着急切要變更的勸告接受憲法。國會起初似乎不願留意這些建議。巴特里·亨利等大聲疾呼，引起注意，國會才把建議交付給一個委員會。結果是國會大多數否決一切要改變政府組織的提案，但給與各州一種權利法案性質的十二項訂正書。這些公民自由的保障，有十項獲到批准。反聯邦主義者憤慨於多數沒有做到，他們的抗議響入雲霄。這時，原來的聯邦主義與反聯邦主義的陣線消逝了，因為國家已有憲法作爲永久的固定物。新的結局在發生，擁護強大中央政府 and 代表新興實業商業利益的聯邦主義黨，與擁護州權利和代表田地均分論的反聯邦主義黨，正取一個新特徵，新領袖們正出現。

革命的美國產生兩位著名世界、有德望的人物，華盛頓和佛蘭克林；而青年共和國得名於兩位蜚聲海外的特出人才——哈密爾敦和哲斐孫。他們的才幹雖然大，但最博得人追念的並不是他們個人可驚的天才。事實是他們代表美國生活中兩個有力且不可缺少的——並在某種範圍裏是敵對的——趨勢：哈密爾敦代表較密切的統

一和較強大的國家政府之趨向，哲瑟孫代表一個較寬大自由的民主之趨向。在一七九〇和一八三〇年中間美國史上最有意義的事實，次於不可抗的向西發展，是國家主義和民主主義競爭所贏得的勝利。

### 哈密爾敦

哈密爾敦誕生於內維斯 (Nevis)，在西印度小安提爾斯羣島 (Lesser Antilles) 的一個產糖小島上，父親是蘇格蘭人，母親是法國新教徒。他生長成蘇格蘭式的人，像史蒂芬孫 (Stevenson) 在錫騙 (Kidnapped) 這小說裏描寫的布瑞克 (Alan Breck) 一樣——有大志，有雅量，誠懇，自重，容易發怒也容易饒人，悟性敏捷，精力飽滿，他的成就全是來自光明，志向，和勤奮的結合。他怎樣早熟的展開這些特質，是值得注意的。他是個窮孩子，沒錢進大學。但一個可怕的颶風掃蕩安提爾斯，他寫一篇描寫文字，很引起人注意，結果他的姑母們送他到美洲大陸。他進紐約英王學院，一個可喜的選擇，因為這使他容易與紐約城的激烈分子相接觸，這些人正領導着反對王家當局的起事。他發表兩篇長文字的小冊子，一篇在十八歲以前，另一篇剛在以後，用它們有力的來與紐約省主要的保王黨大人物較敵。二十歲時，擔任一個砲兵隊長，他把他的書帶進營裏閱讀直到夜間，表現無所不採納的精神。

除了光明和大志，哈密爾敦還有別的特質，對他頗有用處。他具有很大的個人吸引力。有紅棕色頭髮，棕色發亮的眼睛，華美的前額，堅實的嘴角和下頷，他格外漂亮，他的面貌，說話時活潑暢快，工作時嚴肅沈靜。他喜歡活潑的宴會，他在任何具有好酒，聰明的交遊，和生動的談話的場合上照耀着。迅速而且機警，他有很大巧妙的特質——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他的演說使他成爲紐約愛國者的領袖，使他得到華盛頓的注意，並做華盛頓主要的幕僚，使他能在圍攻約克城中領導一次戲劇性的襲擊，使他成爲紐約律師界的領袖，使他成爲華盛頓時代主要政治人物，使他領導一個大政黨。他有顯著的執行和組織的天才。他寫說都具有大可贊賞的銳勢和勇氣。可是他也表現顯著的缺點。他易於發怒，遇到失敗更是斷然急躁。在蒙程斯戰役中，當華盛

頓斥責查理·利將軍撤退時，哈氏從馬上跳下，拔出佩劍，喊道「我們被賣了！」華盛頓用鎮靜的命令壓住他：「哈密爾敦君，上馬。」他與華盛頓爭執到戰爭將結束時，他寫給他的岳父一封自負的信，關於這件風波，他駁斥華氏補救難局的進軍。他的烈性，他的急於準備鬪爭，他的急性的傲氣，使他與人們發生不必要的嚴酷的衝突——與哲斐孫的衝突分裂了華盛頓的行政，與約翰·亞當斯的衝突分裂了聯邦主義黨，與柏爾 (Aaron Burr) 的衝突結果自己死於決鬪。

哈密爾敦的公共生涯，主旨是他喜好效率，秩序，和組織——這個主要的推進力可以解釋他對青年國家不可磨滅的貢獻。從一七七五至一七八九年他看出在他週圍的無能和懦弱的實證。他痛恨因此面生的無秩序。做華盛頓的秘書時，他是個代理人，經過他華氏做了許多事，我們只要看一看革命時代華盛頓的書札，便可見華氏如何被政府的無力量攔着損耗。他焦急着因為各州不願供給他足夠的軍隊、軍火、衣服、款項，因為國家的這部分努力在做事，那部分却退後，他焦急軍隊的缺乏紀律，因為部隊潰散、掠奪，並且常常草率的託辭收拾行李回家。哈密爾敦替華氏分憂這一切。後來在黑暗的聯邦日子，哈氏是個接近紐約商業團體的活動的辯護人，並且密切熟悉他們對貿易障礙和財產不安全的慮憂。他的讀書，使他對國家適當性質的想像是歐洲的甚於美洲的，他畢生以為英國的是最可稱贊的政治方式。他為什麼願望在政治上的效率和勇氣——一個強大的聯邦主權——是容易看出來的。

### 哲斐孫

談到哲斐孫，我們從一個行為家轉到一個思想家。哈密爾敦的天才是執行的，哲斐孫的是默想的和哲學的。哈密爾敦喜歡設置起強大的機器，看着它有效的動作；哲斐孫喜歡人民，看着他們感到滿足，不論有無效率。他做維基尼亞州長的無能被形容得過實，可是他因不信任而去職；他實際上也不是位有效率國務卿。但作為一位政治思想家和作家，在他的一代裏，從柏克去世以後，全世界上無人能和他比。當他擬定他自己的



墓碑刻文，他不想題寫他的官職事業，只題他在思想上的三大貢獻。碑文是：

美國獨立宣言作者、維基尼亞宗教自由法令作者、維基尼亞大學創建人、湯馬斯·哲斐孫葬此。

哲斐孫生長在維基尼亞的寬大，和藹，和無憂慮的智識空氣中。在少年時他從事於跳舞、宴會、和戲謔；他嗜好騎馬，觀察野動物，奏提琴；他讀斐爾定、斯摩勒特（Smollett）、和斯騰（Sterne）的小說，酷愛奧錫安（Ossian）。他後來的生活，充滿與自然、書籍、和人的接觸，只刺激他的多才多藝。他學到五六種語文、數學、測量、機械、音樂、建築、法律、政治等的知識。他熱切的蒐集一個大書庫並收藏有非凡的刊本。他寫作關於動植物、歷史、政治、和教育的文字，常常具有新意和識力。他設計他在蒙蒂塞樂（Monticello）的著名的房子和維基尼亞大學的美麗的廳堂。他在他當代是個優良的談論家，喜歡深長的、推理的、和多方面的談話。這蒙蒂塞樂的哲人，常接待五十人到夜裏，對一個受過教育的黑人和對一個歐洲貴族一樣的很殷勤和親切。他一生喜歡自由，閒適，和廣闊交接。

政治上，哲斐孫的一切直覺和哈密爾敦的相反，他的訓練使它們愈強。他和維基尼亞相合了許多年，起初為立法領袖，後來為州長。在這早期裏，他從未居一個地位，以識得清楚華盛頓和其他大陸領袖所着急的事。反之，他看得明白各州供應他們的一切要求是如何困難。當他出國赴駐法公使之任，那裏他受美國借款償還的催迫，他覺察到一個強大國家政府在對外關係上的價值，但他在許多別的觀點上，不願意要它，坦白的宣稱：「我不是一個很有力的政府的朋友」。他甚至於說那懦弱的聯邦條例是「十分完美的工具」。他擔心一個強大政府將束縛人民。他從英王爭取自由，從教會管制爭取自由，從土地貴族制度爭取自由，從財產的大不平等爭取自由。我是一位主張平等的民主主義者。他不喜歡城市，大的製造事業，大的銀行和貿易組織——他們促進不平等；在他後幾年裏，他雖然承認工業化在給國家的獨立經濟上是必需的，可是他深信美國倘使以農業為主，將是個最幸福的國家。

哈密爾敦的大目標是給國家一個更有效率的組織；哲斐孫的大目標是給個人們一個更寬廣的自由。這兩種

影響合衆國全需要。它需要一個較強的國家政府，也需要不束縛平民。倘使這國家只有哈密爾敦或只有哲斐孫，它將遭受到苦惱。這是件大好幸運，有這兩個人，並且及時鎔化而且調和他們特殊的主義到很本的程度。

### 哈密爾敦的財政政策

做了華盛頓的財政部長，哈密爾敦實行一套政策使他成爲美國史上最偉大的財政部長。他的計劃不但範圍驚人而且性質是創造的。許多人想抵賴大約五千六百萬美元的國債，或只償付它的一部分；哈密爾敦反對他們的意思，實行一個改組並清償全部的計劃。他實行一個計劃，由聯邦政府負擔起各州幫助革命所用的未清債款，大概一千八百萬餘美元。他大體模倣英格蘭銀行，建立一個合衆國銀行。他創辦國家造幣廠。寫出一篇有名的製造業報告，他主張適宜的關稅以發展國家工業；國會通過一種關稅法，雖然徵課很低的稅，可是給美國製造業確實的幫助。最後，哈密爾敦制定一種法律徵收一切蒸餾烈酒類的國產稅。

這些政策有個速效，達到三個方向。它們把國家政府的債權放在穩固如巖石的基礎上，並給它所需要的一切稅收。它們鼓勵工商業。最重要的是，它們把各州有權力的人們附着到國家政府。國家債務的償還，各州債務的擔任，使得一羣執有大陸和州債券的人們期望着新政府給他們錢。靠着新關稅法以繁榮的製造家朝同一方向期待着。國家銀行得到富有人士的有力團體幫助，因爲它把一切財政事項做得更便利更安全。國產稅不但獲到稅收，並且因在各地徵集，使平民認識聯邦政府的主權。總之，哈密爾敦的政策創立一個立在國家政府後的有財產者的堅固陣形，準備抵抗任何削弱它的企圖；它使政府給人的印象比以前更深刻。

### 憲法的解釋：「包含的權力」

這並非全部，因爲哈密爾敦的政策需要對憲法新的且奧妙的重要解釋。當他提出他的國家銀行計劃，哲斐孫爲一切信仰州權利以對抗國家權利而說話，爲恐懼大組合和金錢勢力者而說話——提出反對。哲斐

華盛頓一篇有力的議論。他宣稱憲法明白的列舉出屬於聯邦政府的權力，並且保留一切其它權力給各州；憲法上沒有說聯邦政府可以建立銀行。這似乎是很好的邏輯。華盛頓將要不裁可那法案。但哈密爾敦呈遞一件更確實的議論。他指出國家政府不能把一切權力用明白的文字列舉出來，因為那將瑣細得不堪。一大堆的權力包含在概括的語句裏，並且有一句授權國會「制定一切必要且適當的法律」以行使其它當然的權力。讀到這一句，哈氏特別着重「適當」這字樣。例如，在憲法的軍事權下，政府明白的有征服土地之權。隨着那權，它當然有一種「由此而生之權」以治理這區域，雖然憲法沒有有關的規定。憲法上說政府得管理商業和航運；隨着使有一種「由此而生之權」以建築燈塔。現在，憲法規定國家政府可以有權徵集賦稅，償付債務，舉借債款。國家銀行實質上協助政府收集稅款，以票據匯付款項到遠地，並協助借款。所以在它的「包含權力」之下它有權建立國家銀行。華盛頓接受這議論並且簽准哈氏的政策。

### 威士忌酒叛變；傑氏條約

哲斐孫認一七九一年哈密爾敦的國產稅法為可惜，寫信給華盛頓說它並不智的，因為它把政府的權限用在抗拒最可能而威迫最無效的部分上。他最初藉此指出西彭西凡尼亞。彭州人民是勤奮的蘇格蘭、愛爾蘭人。他們無法運他們的穀類往東越過山到市場上去；他們需要錢；他們知道蘇格蘭做威士忌的法子，因此差不多各農場上都設立蒸餾器以製造這易於運輸的貨物。國產稅似乎不公平的落在這種錢的收穫上。況且它是宗教裁判所的。皮芝堡以南區域的四郡被暴怒的領袖所激起，公然抗拒。華盛頓發布一道警告布告，但被漠視了。在一七九四年，當政府打算拘捕反抗稅吏者，暴動發生了。暴民逼得一個聯邦檢查員逃命並威脅駐在皮芝堡的小部隊。州長原可以用民軍，但他恐怕引起西部選民對他不滿，所以沒有這樣辦。

因此，華盛頓受哈密爾敦的密切建議，決定採取嚴厲的行動。一個一千名兵的力量便能容易的壓平這叛亂——實在比無秩序的示威遊行差不多。但哈氏渴望着為政府絕大的力量做一例子。因此從維基尼亞、馬里蘭、

和彭西凡尼亞召集部隊一萬五千人——這一支軍隊幾乎和俘虜康華理的同樣大。向着擾亂區域進發，軍隊很快的嚇服懷怨政府的分子。哈氏隨着他們同去，看見捕拿十八名送到費城去審判。只有兩名定了罪，可是華盛頓赦免他們。

這威士忌酒亂事製造下大刺戟，聯邦主義者頌揚政府的嚴厲政策，反聯邦主義者斥責這政策爲無理由的且軍國主義的。哈密爾敦的政策無疑問的提高國家當局的威信。但它也是無疑問的引起許多普遍的反對和不信任，並且是個錯誤。等到哲斐孫派當權，國產稅便被廢止。

關於對外關係，許多人同樣不滿意於華盛頓治理下的方針。一七九三年英法兩國在歐洲開始戰爭。在合衆國起強大的感覺。商業階級和許多篤信宗教的人民，特別是在新英格蘭的，害怕且痛恨法蘭西共和國，因它傾覆財產利益並建立起理性的女神；南方農民和城市技工同情法國人。華盛頓聰明的公布一道中立宣言。這可痛被斥責，法國駐美公使，暴躁的奚內（Genet）認爲他可以不理睬它。他寫信給他的政府說華氏是個衰弱老人，受英國影響；他說到取決於人民大眾；當政府禁止他用美國港口做法國武裝民船的行動基地，他不服從命令。華氏含怒的問，「他是泰然蔑視這政府的法令嗎？」奚內被命回國。但他知道斷頭台等候着他，他採取好辦法——在美國住下，娶紐約州長的女兒，順利的活到老年。他的不謹慎引起美國親法黨的不安。可是這黨在一七九四年開始要求對英宣戰，主要的根據是英國人非法掠奪駛往法屬西印度的美國船隻，他們並佔有西北區域的貿易場所，無可掩飾的違反一七八三年的條約。

對這時的美國，實在沒有會比這種戰爭更不吉的事。爲解決多種與英國的爭執，華盛頓派遣一位有經驗的外交家、現任總法官約翰·傑爲特命公使，前往倫敦。這人選再好也沒有。傑氏深信「一點小小和藹的智慧時常比大機詐能成許多事。」和平開明的做，他訂一件條約，替美國獲得能正當期望的利益。那是，他得到許諾，英國人仍然佔着的西部要塞當於兩年以內放棄。他得到美國要求英國賠償掠奪船隻的損失提交到一個委員會。最後，他得到在英屬東西印度重要的商業特權。這條約遇到一場激烈的憤怒。傑氏被野蠻的暴民做芻像

焚燒；憤怒的辨論家和編輯人把咒罵堆積到華盛頓身上。但華氏傑氏都很聰明冷靜，不被一時的民衆叫囂所動。商人和船主人再有理由帶着感謝的心情看待國家政府了。

### 約翰·亞當斯

華盛頓退休後，約翰·亞當斯，有能、高尚、但嚴正、固執、大有特性的人，掌握國柄。他的剛愎的、不圓滑的特質無疑的使他的總統職位遇到困難。太自立，不能接受哈密爾敦的指導，甚至在他就任總統以前，已和哈氏衝突。這樣，他受在他背後一個分裂的政黨，在他旁邊一個分裂內閣的掣肘——因為各部的首腦在政黨的事上贊同哈氏的見解。許多南方人不善歡亞當斯因為他是個新英格蘭人，政黨的感覺變得非常尖銳。國際天空上更是密雲四布，空前未有，使事情更壞。

這時有和法國戰爭之虞。治理法蘭西共和國的執政內閣，被傑氏條約所激怒，拒絕接待亞當斯所派的公使並且實際以逮捕威嚇他。這種恥辱的事情引起美國強烈的感覺。當亞當斯派遣三位委員到巴黎試行調整困難，他們遇到新的侮辱。負責外交的達來蘭 (Talleyrand) 無禮的謝絕和他們接洽。祕密的代理人，後來美國使節敘述的甲、乙、丙，暗示他們如果肯出二十五萬美元的賄賂，有些事情也許可以辦到。達來蘭最後以一道粗魯的侮辱的公文譴責美國的奸詐，實際決裂了談判。被稱為甲、乙、丙文書的發表，引起美國的憤怒到一個激昂的頂點。軍隊徵集了，海軍加強了，在一七九八年一串海戰發生，美國船隻一致打败法國人。公然戰爭一度似乎不可避免。

在這危機裏，亞當斯嚴正的個性為國盡力得很好。推開要戰爭的哈密爾敦，他忽然遣派一位新公使到法國。這時拿破侖已經當權，優渥的接待他。衝突的危險迅速的消逝了。在內政上，這時亞當斯不幸的舉動狹窄且不圓通，使美國人民不能寬恕他。他和聯邦議會要負責四件不適當的法律，這些法律大有損於行政。第一件是外國人取得公民資格須在合衆國居留的年限從五年延長到十四年。第二件是授權總統兩年以命令任何有危險

性的外國人出境。第三件是規定戰時外國人應被放逐或監禁，時期長短由總統命令之。第四件是認定圖謀反抗政府法令者，或阻礙或甚至批評官吏者爲重罪。

這些外僑和擾亂行爲法律似乎荒謬的嚴厲，個人和平民自由的一個總違反。哲斐孫和麥迪孫，認爲聯邦主義者正集中危險的權力於國家政府，決定取一個反對它們的主張。他們寫有兩套決議，哲斐的被肯特基立法議會所採用，麥氏的被維基尼亞大會所採用。發表理論指出國家政府是基礎於各州的同盟，這些肯特基和維基尼亞決議宣稱州得採取手段，以不裁可不合憲法的法令。

一八〇〇年美國變化的機會成熟了。果然，這年被證實爲政治大改革年。在華盛頓和亞當斯治下，聯邦主義者在建立政府和使它強大上做了許多事。不像一七八九年那麼多，現在沒有人懷疑國家和憲法會持久。但聯邦主義者未能認識美國政府在本質上是平民的。他們隨着的政策，做了許多事，把管理權和利益給與特殊階級。哲斐孫，一位天才平民領袖，已經專心在他背後集合大羣小農、技工、店主、和其它工人。他們意思是要看國家有個人民的政府，不是特殊階級的政府；他們以極大可驚的權力擁護他們自己。在一八〇〇年的選舉，亞當斯獲勝於新英格蘭。但反對黨掃蕩南方各州，並在中部各州贏得極大多數。笨拙的選舉制度結果使哲斐孫和柏爾，一個巧言令色而無主義的同黨紐約人，發生關係。但人民明白的希望哲斐做總統；哈密爾敦，在常足以表現他生涯的良好決議的一次裏，擔任着參議院決定哲斐的勝利。

哲斐寫信給一位朋友，說：「我們的大船（Argosie）堅韌的邊緣都已澈底試過了。我們要把它放入共和的航程，它現在會用它動作的美觀表現出建造者的巧妙。」

## 第七章 舉國一致的興起

### 哲斐孫的行政

一八〇一年哲斐孫就任總統職的風度顯示民主主義已得到權力這事實。就職典禮初次在定爲首都的華盛頓舉行。那時華盛頓只是在波陀麥克北岸的森林鄉村，它的泥濘的道路建築於叢林和泥沼中間，只有少數破爛的房屋，據一位啓程的內閣團員說，「多數是窄小可憐的土房子。」古凡納·莫利斯讚評首都有偉大的將來。「我們這裏不要別的，只需要房屋，地窖，廚房，受過好教導的人，和氣的女人，和此類不重要的事物，把我們這城市弄得完美。」哲斐孫和平常一樣穿着不講究的服飾，從他的簡單的宿舍，一些朋友跟着他，步行上山到新國會議事堂。他走進參議院會堂，和他新近政敵莽撞的副總統柏爾握手。另外一位是哲氏所不信任的，新近由亞當斯任命爲總法官，哲氏的遠親戚，維基尼亞人馬沙爾，立在他身旁。哲氏舉行就職宣誓，安詳的發表了一篇爲歷來就任總統所未嘗有過的、最好的演說。

哲氏演說的一部分是爲和解很需要的辯護。剛終了的政治運動是非常冒犯的，許多人，尤其是在新英格蘭，深信哲氏是個無神論者、平權論者、甚至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他懇求公民記住政治的不自由和宗教的不自由一樣壞，並求他們團結爲美國人，保持聯邦，使代表政治有力，且發展國家資源。演說的餘下部分奠定新施政的政治原則。他說，國家應有一個聰明且節儉的政府，政府應保持人民間的秩序，但須讓人民自由以管理他們自己勤勉和改進的經營，不應從勞動的嘴上拿走它已得到的麵包。它應保留各州的權利。它應探求和一切國家誠實的友誼，但「不和別國陷入同盟」——一個長被記憶的語句。哲氏約誓支持聯邦的完整的憲法力量，保持平民主權高於軍事當局，並支持民衆選舉作爲唯一的仲裁，除却革命。

哲斐孫做了兩任總統這事大大鼓勵全國民主的進行。他廢除華盛頓拿來圍繞在總統一職的一切貴族式裝飾物。每星期的引見停止了，府廷儀節嚴正的被刪除了，尊稱如「閣下」被放棄了。對哲氏，最平常的公民與最高的官吏同樣的受尊敬。他教他的屬員看待他們自己只是人民的受託人。他以購買印第安土地並幫助他們向西移民來鼓勵農業，提倡殖民。深信美國應為被壓迫者的避難所，他用自由的入國籍法來鼓勵移民。他竭力與別國保持和平，因為戰爭的意義將是更多的政府活動，更多的賦稅，更少的自由。任命卡拉廷 (Albert Gallatin)，一位瑞士人的後裔，眼光遠大的財政家，做他的財政部長，哲氏鼓勵他減少開支並償清國債；結果一八〇六年左右國家稅收是一千四百五十萬，開支八百五十萬，盈餘六百萬美元。在一八〇七年年底，節儉的卡拉廷已經縮小國債到七百萬以下。一個哲斐孫的感情的浪潮捲過國家，一切平民皆大歡喜。各州陸續廢除選舉和服公務的財產條件，並通過更人道的法律，如為債務人的、和為犯罪者的。

可是命運把哲氏和國家轉到他所沒有用意的一個方向。他，憲法的一個「嚴密構造」的傳道者，用兩個措雷仲張聯邦政府的權力到極點；當他去職時，他所痛恨的戰爭正橫在面前。

#### 賈易斯安那的購買，和爾陰謀

他的一件措置加倍了國家的面積。西班牙久已據有密西西比西的土地，和靠近河口的新奧爾良海港。但哲斐孫就職不久之後，拿破侖逼着懦弱的西班牙割讓名為賈易斯安那的大片土地還給法國。他這樣做時，有識的美國人士帶着憂慮和憤激的震顛了。新奧爾良為美國在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流域出產物運輸所不可缺的港口。拿破侖的正在合衆國以西造殖民大帝國的計畫，與安格魯撒克遜在北美洲的領土相均衡，危脅一切內部居留地的貿易權利和安全。薄弱的西班牙，甚至已經給西南部許多煩惱。世界上最強的國家法國，什麼不要做！

哲斐孫主張法國如果佔有賈易斯安那，「那時我們必須使自己與英國和英艦隊結合」；歐洲戰事第一聲砲火將是一支安格魯撒克遜軍隊向新奧爾良進軍的記號。拿破侖明白美國和英國必定會起來打仗。他知道匆促



的亞眠條約後的再度對英戰爭逼近了，當戰爭起來，他一定會喪失路易斯安那。他又因未能鎮服在法國治理海地的黑人領袖圖桑（Toussaint Ouertere）的大起事，那裏在一八〇二年叛變者和黃熱病毀滅却二萬四千人的軍力。他因此決定，免得路易斯安那讓英國人染指，並為獲得美國友誼起見，把這區域售與合衆國，充實自己的財庫。這廣大的面積以一千五百萬美元代價轉入美國之手。哲斐孫購買這地，「伸張憲法到它的破裂」，因為並無條文授權購買外國領土，而他未經國會同意，這樣做了。

合衆國以這愉快的一舉手得到一百萬方哩以上的土地和一個有價值的港口新奧爾良，在密西西必的新月形灣口上的磚瓦灰土建築的城，背着一片幽黑的杉樹林，風景絕佳。在一八〇三年一個秋天，一羣各色人等聚集到閱兵場——穿華麗制服的法國兵士，衣服入時的西班牙人和法國士著，穿臘衣的墾殖者，黃褐色的印第安人，烏黑色的黑人——看着法國國旗降下，美國星條旗上升。合衆國獲得一大片富庶平原，八十年內便成世界的穀倉之一。它得到大陸的整個中部水系的控制。美國人初次能說，像後來林肯在內戰時所說的，諸河道之父暢快的流入於海了。四年內，福爾敦（Robert Fulton）在哈德孫河開始應用一隻成功的汽船，決解便利且便宜的利用這些內地水道的問題。噴氣的船隻不久充滿西部各河流，載着移民移殖到地方，將皮毛、穀類、醃肉、和百種其它物產帶回市場上。

哲斐孫在他的第一任將終時，博得廣大的民望，因為路易斯安那顯然是個意外大財，實業繁盛了，總統也竭力向各地討好。他的再度當選確有把握，在一八〇四年，他實際上得到全數一七六票中除却十四票的數目，甚至在新英格蘭，除却康納第格，也由他勝了。能夠以有力的手腕管制他的政黨，他用方法壓倒野心的且不斷好詐的柏爾。狡猾的紐約人，被褫奪一切在聯邦職務分配上的份子，並實際上被指出黨籍，轉向新英格蘭的最厲害的聯邦主義黨賣弄風情。一八〇四年春天，他在聯邦主義黨的選票上運動紐約州長，但經哈密爾敦的反對——哈氏真確的懷疑柏爾和這些新英格蘭計謀家如異克林（Timothy Pickering）等正陰謀分離——他遭到恥辱的慘敗。為得到報復，無主義的柏爾激怒哈密爾敦決鬪，在一個七月的大早晨，於哈得孫河澤西岸上舉行，

結果哈氏的命。這樣光明並得人望的領袖喪失，引起羣衆的哀怒，柏爾只得躲避起來。他在東部的前途是毀滅了，但他帶着不知儆戒的驕橫轉向西部尋找新機會。

平常的獎賞和榮譽不曾滿足柏爾這樣一個好勝的野心。治理或毀滅是他的格言，他定下計畫建立他自己的國家。這國家該在那裏，他該怎樣創造它，仍然是爭論的問題。許多學者深信他打算在西部集合一小支軍隊，順着密西西比而下，奪取控制新奧爾良，從合衆國扭去路易斯安那。他把這些企圖敘述給英國和西班牙官員，想從倫敦和馬德里得到些錢。他告訴英國人他要把他的國家置於他們的保護之下，而告訴西班牙人他要把它做成墨西哥與合衆國間的一個緩衝國。英西兩國都不幫助他。但別的學者深信柏爾的真目的是招募軍隊，率領它以對抗在委拉克路斯 (Yera Cruz) 和墨西哥城的西班牙當局，獲取控制墨西哥。實在，他告訴這些領袖像痛恨西班牙的田納西的賈克孫 (Andrew Jackson)，說這是他的企圖。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目的是路易斯安那或是墨西哥；可能他甚至打算過兩個。

無演如何，柏爾完全失敗得和魯錫弗 (Lucifer) 一樣。西南的忠實人民得到他的陰謀的風聲，遲到一八〇六年他們起來控告他。他被拘捕送往維基尼亞的里士蒙受公訴叛逆罪的審判。馬沙爾是審這案件的主席，他的主要的尺度有利於柏爾，而證人是不得已曖昧。柏爾因此被開釋——但他現在卻無可補救的毀損了。

### 美國的中立；停止通商法令

普羅孫第二次例外應用聯邦主權以圖維持英國與拿破侖巨大戰爭中的美國中立。他知道年青未成熟的共和國需要和平；當戰爭在海陸上猖獗，他希望保持合衆國於火焰圈子以外。英國正爲防止全歐大陸被一單個強國所征服而戰鬪着。商戰自然是它最利的武器之一。覺察到商戰的價值，英國人急行封鎖拿破侖的帝國，拿翁用柏林和米蘭法令來封鎖英國作爲報復。在它們的鬪爭中兩國給美國商業重大打擊。英國人的動作截斷美國船隻裝運法屬西印度產物的富庶運輸業，並實際封閉它們於整個歐洲海岸從西班牙到易北河之外。法國人下令捕拿

任何服從英國搜查或接觸到英國港口的美國船隻。這就是，戰爭不久達到這地步，使美國船隻沒有能與去國管制的廣大帶貿易而不被英國人所掠奪，也沒有能和英國貿易而不被法國所掠奪（如果它能夠得到）。在這些情形之下，商業幾乎不可能。英政府十分有力，而法國人沒收美國船隻，不輕放過。

特別激起美國反對英國的情感者是強制徵發問題。爲打勝戰爭，英國人被迫建造他們的海軍到有現役軍艦七百艘以上，水手水兵將近十五萬人。這種橡木的城牆保住英國的安全，保護它的商業，並保持它和其殖民地交通。它對英國的生存最關重要。可是艦隊上的人這樣餉給得少，吃得壞，待遇不好，以自由應募來得到水手是不可能的。許多水手私自逃跑，特別喜歡以較愉快較安全的新英格蘭船上做逃逃數。在這些情形下，英國軍官認爲搜索美國船隻和捕出英國臣民之權是必要的。他們沒有要求徵發美國海員之權，但他們不肯承認一個英國人能入美國籍。然而美國見解和這種要求澈底相反。美國船隻置於英國巡洋艦的瞰下，一員海軍上尉和一班水兵令水手排隊受驗，是一種恥辱。而且許多英國軍官傲慢且不公平。他們強徵幾十幾百的真正美國海員——最後，據有證據的陳述，至幾千的人。

爲不用戰爭而使英法兩國取較公平的態度，哲斐孫終於要國會通過停止通商法令，完全禁止對外商業。這是個可驚的試驗。第一、運輸業幾乎被這辦法毀滅，很大的不滿意起於新英格蘭和紐約。其次，農業界覺得他們遭受重大損失，因爲南部和西部農民不能把他們的剩餘穀類、肉類、和煙草運往海外，以致價格猛跌。觀察家拿一位外科醫生割斷一條腿以謀救一條性命這事比喻這辦法。在一個年頭裏，美國的出口貨落到他們過去數量的五分之一。但接着這停止通商會使英國挨餓因而改變政策的希望却未成功——英國政府不肯讓步。國內怨言增加，哲氏因而轉向較溫和的辦法。一個禁止交際法替代了禁止通商。這法律禁止與英國或法國的商業，包括他們的屬地在內，但允許當兩國中的一國停止對中立商業的攻擊時，這法律就停止。一八一〇年拿破侖正式宣告他已經放棄他的辦法。這是個說話——他還維持着它們。但合衆國却信他並把它的禁止交際限於對

## 一八一二年戰爭

這使對英關係趨於更壞，兩國很快的驅向戰爭。多起事件喚起惡感。例如英國軍艦「豹號」命令美國軍艦「折沙比克號」交出若干名英國逃兵——雖然實在只有一名在船上；遇着猶豫，豹號向折沙比克開火一刻鐘之久，甲板上盡是鮮血，後來英兵又上該艦，帶走四個人。不久之後，總統向國會提出一篇詳細報告，舉出六千零五十七件例子證明英國人在三年內強徵美國公民這事。別的原因加入這局勢。西北部居民被一個有能的酋長特康塞 (Tecumseh) 所組成的印第安部族同盟所侵襲，遭受損害，他們以為在加拿大的英國代理人曾經鼓勵野人。西部許多渴望土地的人士，有善辯的肯特基的克萊 (Henry Clay) 在國會裏代表他們，想合併加拿大領土，而有些南方人希望從現在英國的盟友西班牙手裏略取佛羅里達。結果是，當麥迪孫在總統任上，美國於一八一二年對英宣戰。

一八一二年的戰爭在多方面看是美國史上最不幸事件之一。第一個原因，它是無需要的；國會剛宣戰時，引起最大憤怒的英國樞密院審議之勅令已無條件廢止了。另一原因，合衆國遭受最嚴重的內部分裂的損害。西南兩部贊成戰爭，紐約和新英格蘭大體反對它，到終了時重要的新英格蘭分子幾乎走向攜貳。第三個原因，在軍事意義上，這戰爭絕不是個光榮的。

美國軍隊，一八〇九年經過杰孫治下的節儉減縮到不滿三千人。一班無訓練無紀律的民軍烏合之衆幫襯着，在可憐的狀態下作戰。許多正規兵士是監獄和酒店的廢物。一位幾年前開始光明的軍隊生活的維基尼亞青年，司各脫 (Winfield Scott)，告訴我們，說指揮官分成兩個集團。一般老軍官或流於懶惰愚蠢，或沾染狂飲的習慣。新軍官大部分是由於政治原因而得到委任；少數是好的，多數或者是無知識的下等人，或者雖受過教育，可是是吹噓者、飯桶、腐敗份子、和一些什麼都不會的人。戰爭開始時的上級陸軍少將是第爾本 (Henry Dearborn)，六十歲過了多年的人，從來沒有帶過一團以上的單位作戰。上級旅長是尉爾金孫 (James Wil-

Inson)，現在爲人所知的合衆國的一個叛逆、受西班牙雇傭的人、柏爾的同謀者：腐敗，放肆，犯上，知道他的都輕視他。唯一有寶貴經驗的旅長是赫爾（William Hull），在革命時他已到上校階級，但現在卻衰老了。他不發一彈而以狄特羅投降，開始戰爭。

災禍隨着災禍。美國侵入加拿大的努力，結果是完全失敗。在第一年，像一位英國史家說的，「民兵和志願兵不像有決心要打仗，也不會這樣做。」在北方邊疆上打得最厲害的尼亞卡拉附近蘭第徑（Lundy's Lane）之役，是不分勝負而罷的一仗，後來雙方都宣告爲勝利（一八一四年七月）。但當它一時粉碎美國攻入加拿大的計劃，英國人有更好的歡喜題目。

營拿破命的兵敗於西班牙，英國人有了力量以惠靈敦的老軍人大大增援他們的軍隊。一支準備的兵在商勃連湖上的普拉茲堡（Plattsburg）攻進紐約，但在那些水上的英艦隊却慘敗於二十八歲青年海軍副少將麥克頓諾（Thomas MacDonough）手裏，英國陸軍，交通成了不穩，迫得退却。另一支不滿五千人的英軍登陸於華盛頓附近，在布雷茲登堡（Bladensburg）遇到以民兵爲主的較大兵力。在死十人傷四十人後，無勇的防禦者崩潰了，急忙跑向華盛頓，使許多英國人因想追蹤他們而晒得中暑。爲報復美國人破壞約克（現名托倫多，Toronto）的公共建築，英軍破壞國會議事堂和白宮。當英艦隊使巴爾的摩附近的麥克亨利要塞（Fort McHenry）遭受長距離夜間砲火——淺灘下能用近的砲火——它並無成功。一位華府青年辯護士凱氏（Francis Scott Key），曾在一艘英國戰艦上進行布置交換俘虜，被國旗在早晨微風裏波動的情景靈感他寫「星光燦爛的國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

美國人只在海上得到些光榮。華盛頓和亞當斯治下有系統建築的海軍，曾在對法的短期戰爭中，又曾在二八〇三年至〇四年勦擊掠奪美國船隻令人不能忍耐的黎波里（Tripolitan）海盜中，堂堂的盡過它的本分。不像陸軍，它受過一位早期大組織家之賜。這是普勒布爾（Edward Preble），給地中海艦隊嚴酷但有效的管理，灌輸他的部隊一種有膽量、勇氣、和服從的精神，成爲傳統，並訓練青年軍官如德開特（Stephen Decatur）到

高深的才能。海軍在數量上是很小的，因為哲斐孫守着一個建築岸防戰船的頑固政策。在一八一〇年，各式的船總數只一打。但在一套各船的各別行動裏，如「憲法號」即「老鐵邊」(Old Ironsides)和「格黎爾號」(Guerrière)，「合衆國號」和「馬其頓人號」(Macedonian)，美國的船長們一致的打败同等或更大的英國船隻。在諸大湖上，美國人也證明他們的勇氣。繆長培理(Oliver Hazard Perry)，不到三十歲的軍官，在利湖上建築一支艦隊，搜出一小支英軍，經過頑強的攻擊後，以簡明的急報刺激全國：「我們遇到敵人，他們是我們的了。」可是最後更強的英國海軍建立海洋的全部支配權，驅逐美國商業使隱藏起來，並保持美國海岸的嚴密封鎖。

當戰爭結束，約翰·坤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和克萊等所談判的根特(Ghent)條約，一個字也不提起它表面上或主要原因之強制徵發和中立權利。只有印第安戰爭的老戰士賈克孫所領導古怪而可驚的邊民軍，在新奧爾良打败靈敏部下勇敢的副管柏根漢(Edward Pakenham)所指揮的強大英軍那一戲劇性勝利，給這國家一點真正狂歡。這是一八一五年一月八日，和約已經簽字後，但在美國還未得到消息以前的事。

### 舉國一致

可是在某一觀點上看，這戰爭對共和國的發展有顯著的貢獻。開始並繼續於不滿和爭論之中，它仍然增強舉國一致和愛國的情緒。這幾個原因是可以指明的。零零碎碎的成功，特別是海軍的勝利和柏根漢的老兵在新奧爾良的敗仗，給美國人一個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基礎。他們祛釋哲斐孫的屈服政策所培養出來的低劣感。第二點，各州人民又並肩作戰的事實，維基尼亞人司各脫是北方部隊中見出最有能的指揮者，增加舉國一致的意思。西部部隊打勝他們所不忘記的幾仗，他們與原來十三州的人民比較起來，對他們的州較少連繫，對國家較多忠誠，從這時以後，西部在美國生活上更有足項，西部在感情上常是國家的。

最後，人民由戰爭而對有些自私自利和褊狹的人們所表現的不愛國心情發生唾棄。新英格蘭的怨望分子晚至爭派代表到哈特福(Hartford)會議上考慮他們的損害，這「赫德福會議」成了一個鄙視和恥辱的別名。

總之，這不祥的戰爭做了許多事使共和國更成熟更獨立；使它團結，加強它的特性。卡拉廷斷言戰前美國人成爲太自私，太實利，太傾向於思想地方範圍；他說：「戰爭更新且恢復革命所給予而天天在低落的國家情緒和特性。人民現在有更普遍的聯繫對象，他們的自尊心和政見與這些對象相關連。他們是更美國人；他們更以一個國家感覺和動作；我們希望聯邦的永久存在因此臻於安全。」國爲這戰爭打得這樣急促，它留下很少惡感。當英國人美國人下次相遇於一個戰場上，一百多年以後，他們是軍事上感情上的伙伴。

事件證明無論那一黨當權，哈密爾敦的聯邦主義者或斐孫的民主主義者，國家的團結增長，中央政府權力增加。這是因爲國家成長的條件需要它。爲得到路易斯安那，爲對法對英作商業鬭爭，爲攻擊巴巴利(Barbary)海盜，爲繼續對英作戰——這一切需要一個有力的中央政權。

我們該加說的是政府同時爲最高法院的決斷所加強。令人信服的聯邦主義者，維基尼亞的馬沙爾，剛在斐孫爲總統前受任爲總法官，在職直至一八三五年逝世。法庭以前柔弱且不被重視；他把它變成一個有權且有威的裁判所，佔一個與國會或總統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他的興趣和態度上，馬氏屬於他故鄉閒散的農家社會。他穿得樸素，自己從市上買食物回家，喜歡紙牌，調合酒，和馬蹄鐵或鐵環的遊戲。但在思想上，他可是代表城市的如波士頓和紐約的實業和專門職業界。他的重大的決斷，心思透澈的作品，表現他被兩個根本的原則支配着——一是聯邦政府的主權，一是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

馬沙爾是位偉大的法官。他的判決帶着練達的邏輯寫出，差不多每個例子都使讀者感服。格式簡單，它們基於深刻的學識和透澈的分析。馬氏的習慣是先把他的大前提建立完備，再進行演繹推斷，削減對它們的每個異議；最末陳述他的結論，充分的以引證和實例支持它。他居最高法院首長地位，給法院以和諧，所以不一致

的見解和不同的意見很稀少。但馬氏不止是偉大的法官——他是一位偉大的憲政政治家。判決將近半百明顯涉及憲法論點的案件，他根據十分成熟的政治哲學以處理它們。它們幾乎完全是有關憲法的重要部分的。結果，當他的長期服務終了時，法院應用於全國的憲法是大部分馬氏解釋的憲法。我們可以說他已經依照他的清晰的眼光改鑄了這工具。

這裏不能再甚於枚舉他的主要判決。在一八〇三年馬百里 (Marbury) 對麥迪孫一案中，他確然建立最高法院審查國會或州立法議會的任何法律之權力。他說：「說法律是什麼，明顯的是司法部分的職分和義務。」在一八二二年柯亨斯 (Cohens) 對維基尼亞一案中，他掃淨了宣稱在州法律下引起的案件應以州法院的判決為最終的的議論。指出這將引導國家入於紊亂——因為各州可取種種不同見解如對聯邦憲法或聯邦條約下的法律效力——他主張最終的判決必須是國家法院的。在一八一九年麥克克羅 (McCulloch) 對馬里蘭一案中，他處理憲法下政府所包含的權力這舊問題。這裏他勇敢的挺身而出，為哈密爾敦的理論辯護，說憲法以包含的辦法給政府並未明白說明的權力。在一八二四年吉本斯 (Gibbons) 對奧格登 (Ogden) 一案中，馬氏充分發揮這原則。憲法授權國會管制州際商業；在一件爭執哈德孫河汽船權利而起的案中，馬氏認為這國家管制之權應解釋得寬泛，不應狹窄。在達德穆斯學院一案中，馬氏應用憲法的省縮語句以認可團體特許狀的有效，否認後起的州權力能變更它。總之，馬氏和任何領袖一樣的做了許多事把美國人民的中央政府做成一個有活力的且生長的勢力。

國家主義不可抗的在前進。國家文學產生了——布賴安 (William Oullen Bryant) 的「死的見解」(Thanatopsis) 出現於一八一七，歐爾文 (Irving) 的「見聞錄」(Sketch Book) 於一八一九，柯伯 (Fenimore Cooper) 多種小說的第一部於一八二〇，而一八一五年重大的「北美評論報」(North American Review) 開始問世，模倣英國的季刊但大致專於美國興趣。哈德孫河派畫家，雖然仍在歐洲影響之下，從事於美國風景的讚美。哲斐孫巧妙的配合意大利的和古典的建築於美國需要，維基尼亞大學的建築物表現一個和諧的建築羣，可以親切



的和海外任何過去的相比較。一個較好的國家土地制度建立了，一八二〇年的法律減低國家所有的地產價格每畝從二美元至一又四分之一美元。商業把美國人民團結成一個國家單位。一八一六年的關稅繼續相當高的戰時稅率並給製造家一種真正保護的意味。在同年，第二個合衆國銀行（因為第一個被聽着消滅了）組成，以輔助政府的財政運用並供給穩固的紙幣。指出更好的道路和運河能把東部和西部連結起來的克萊、與南卡羅來納領袖卡爾洪（John C. Calhoun）等熱烈的主張一個內政改良的國家制度。當國家的團結在前進，民主也在前進。

## 第八章 賈克孫派民主主義的得勢

### 門羅主義

「小乾蘋果」麥迪孫於一八一七年讓位給高瘦不活潑的門羅。門氏表現一個平庸的人和一個極顯揚的公共生涯的不非常混合。他先後曾任參議員，州長，駐法駐英公使，國務卿，以至總統。雖然那時代，與其說是好感覺的毋寧說是壞的；政黨却是暫時在停頓中。因此門氏在一八二一年有連任的聲譽，所有選票都投他，只有一票，投者是一位新漢布什爾選舉人，這人願意華盛頓獨享全場一致的榮譽。可是缺乏吸引力的門氏，從來不很爭衆望，他的夫人，一位拘泥、沉默、優美的婦人，遠在不如活潑的麥迪孫夫人（Dolly Madison）討人喜歡。門氏的兩種例外的性質是他的敏捷的常識和堅強的意志。像約翰·坤西·亞當斯所說，他有「一個在最終判斷上健全、在最後結論上穩固的心。」

他在職的大事使他姓名不朽的是所謂門羅主義的宣言。這主義由兩個主要觀念結合在一起，它實際上只是一八二三年度門氏致國會咨文的一部分。一是不殖民的觀念，主張應禁止歐洲在西半球建立任何新屬地。另一是不干涉的觀念，宣稱歐洲須不再干涉世界各國的事以致危脅它們的獨立。這些觀念起於兩個區別的局面。

最初引起第一個觀念的，是俄國宣告阿拉斯加以南直至北緯五十一度地帶的所有權，一個和美英兩國在西太平洋所有權衝突的要求。引起第二個觀念的，是歐洲反動的神聖同盟對新近解放了的拉丁美洲諸國的威脅。同盟國會用手段壓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民主運動。它們在一八二二年開會於佛羅那（Verona），討論派遣軍隊渡洋到南美洲以壓迫至少幾個柔弱的新共和國回到西班牙的屬下。法國將在這樣一個遠征軍裏做重要的

角色，並且可得到它自己的土地。

聽到這些消息，聲名赫赫的英國外務大臣甘寧（George Canning）深為吃驚。他提議合衆國和英國取一致的方法來阻止這種干涉；有一時期，美政府似乎真的認可了。哲斐孫和麥迪孫勸告門氏，贊成聯合行動。但約翰·坤西·亞當斯，以國務卿資格，正確主張合衆國應單獨行動，門氏終於傾向他的見解。在他致國會的咨文中，他宣告，第一、南北美洲此後不應被認為任何歐洲國家未來殖民事業的屬國；第二、任何歐洲干涉，目的在壓迫拉丁美洲各國者，或以任何其它方法控制它們的前途者，將被視為對合衆國不友誼的證據。

### 密蘇里妥協

奴隸制度雖然這樣很不得到社會注意，但它極快的成了一個大勢力，在一八一九年，以驚人的意外——哲斐孫所說，「像夜裏的火警鐘聲」——它產生的可怕問題招起公共注意。在共和國初年，當北方各州正準備立刻或逐漸的解放，許多領袖推測各處奴隸制度不久將會消滅。華盛頓於一七八六年寫信給拉斐葉，說他熱誠希望採用計劃，以緩慢、確實、和不知不覺的程度廢除奴隸制。在他的遺囑裏他解放他的奴隸。哲斐孫主張奴隸制應當用解放和放逐連結的法子來掃淨它。他宣稱，「我為我國戰慄，當我想起上帝是公平的。」巴特里·亨利、麥迪孫、門羅、和許多其他人士說過類似的話。遲到一八〇八年，當奴隸貿易被廢除，許多南方人士以為奴隸制度只證明一種暫時的罪惡。

但在次一代，南方轉變成一個大部分可怕的團結在奴隸制背後的區域。這是怎麼來的？為什麼廢除主義的精神在南方幾乎不見了？一個原因是，熾熱於革命時期的哲學的自由主義的精神逐漸衰弱。另一個原因是，嚴正的新英格蘭與有奴隸的南方間的敵對變成顯明；它們在一八一二年戰爭、關稅、及其它重大問題上，意見不同；南方感覺愈不滿於所謂北方的解放觀念。但最重要的是某幾種新的經濟因素，使奴隸制度比較它在一七九〇以前遠為有利。

經濟變遷中的一個因素是熟練的——南方大產棉工業的興起。這一部分是由於有更好纖維的改良種類的開始，但大部分是由於一七九三年輝特尼（Eli Whitney）的軋棉機器的劃時代發明。棉花的種植迅速的向西發展，從兩卡羅來納和喬治亞，分布於南方下部，到密西西必河，最後到德克薩斯。把奴隸制度置放在新基楚上的另一因素是糖產，路易斯安那東南部富庶炎熱的土地合乎種植甘蔗的理想；在一七九四至九五年，一位善於經營的新奧爾良士著博瑞（Etienne Bore）證明這種收穫能得大利。他立起機器和大桶子，從新奧爾良來看煎熬的衆人，當頭一堆糖結品在冷卻液體中現出時，甚是歡喜。「他起顆粒了！」這呼聲在路。斯安那開一新紀元。結果是一個大暢銷，因此在一八三〇年左右，這州供給國家大約它的全部糖供給額的一半。這需要奴隸，他們成千的從東部海濱被帶進來。

末了，煙草的種植也向西散布，同着奴隸制度並進。不變的收穫已經消耗一度爲世界上最大煙草區的維基尼亞低原的土地，種植者願意移進肯特基和田納西，帶着黑人同去。從此以後，上南部加倍很快的奴隸大大的流往下南部和西部。這奴隸制的散布忘却許多監督者，因爲他減少這種奴隸叛變的危險，如一八三一年維基尼亞奴隸六七十名起事的特納叛變（Nat Turner's Rebellion）——這叛變意外的大大增加南方對解放主義學說的恐懼。

北方的自由社會和南方的奴隸社會向西散布，在它們中間保持一個大致的均等似乎是合意的。一八一八年，當意大利諾被准加入聯邦時，那時有十個奴隸和十一個自由州。一八一九年，阿拉巴馬和密蘇里都請求加入。阿拉巴馬以喬治亞的原有土地割讓的條件要成一個奴隸州，它的加入將恢復奴隸和自由間的平衡。但許多北方人士立刻聯合反對密蘇里的加入，除非它作爲一個自由州。紐約的衆議員陶爾美治（Tallmadge）對加入議案提出一個修正案，要求密蘇里採取逐漸的解放。一個可怕的風潮捲過全國。有一時期，自由地的人士控制衆議院，奴隸制人士控制參議院，國會完全陷於僵局。人們甚至擔心流血。

後來，在克萊的和平領導之下，商定一個妥協。密蘇里被准加入作爲一個奴隸州，但同時編因以一個自由

州進來，國會布告奴隸制度應永久摺除於「路易斯安那購買」所得的地域以外即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北，蘇里的南界。天空重新晴朗了。但每個眼光深遠的觀察家知道暴風雨將再發生。哲斐孫寫過，說這夜裏的火警鐘在他看來似乎是聯邦的喪鐘。「它果然一時寂靜了。但這只是一個緩刑，不是一個最後判決。一度被人們熱情所想像並贊成的、與顯著的道德和政治原則相吻合的地理界線，永遠不會被消滅；每個新的激怒會使它的痕跡更加深刻。」

兩片不比手掌大的雲或許對南方宣告迫切的暴風雨。一八二一年，一位青年教友派信徒蘭第 (Benjamin Lundy)，在俄亥俄創辦了一種反奴隸制的雜誌，名「普遍解放的精神」(The Genius of Universal Emancipation)。一八二三年，英國改革家威爾伯福斯 (Wilberforce) 創立一個反奴隸制會，加入者有馬考萊 (Zachary Macaulay) 和其他名人。

### 賈克孫的出現

一八二四那年有五位重要的總統候選人在國家前。這五人中，約翰·坤西·亞當斯、克萊、和卡爾洪都是十分有才能的人，喬治亞的克洛福德 (W. H. Crawford) 是一位敏捷的政治家。但沒有問題，最享衆望的候補者是第五位，賈克孫。西部讚美新奧爾良英雄把他看成現在最偉大的軍人。有些人以為檳撒、拿破侖、和馬爾波羅 (Marlborough) 比起他來，無足輕重。在東部，許多保守派的人們不信任他。他們回憶起他和哲斐孫在參議院辯論常常氣憤噎到不能說話；他們記起他爲軍隊指揮官時怎樣猛烈的侵入西班牙屬佛羅里達並怎樣橫暴的在那裏絞死兩個英國人。亞當斯以爲他將做一位理想的副總統。那對他將是個尊貴的職位；他的名譽將恢復它的光榮；那不會有他要絞人的危險。

但選舉表現賈氏最佔上風。可是誰也沒有得到選舉團的大多數，這選擇交到衆議院，衆議院最後還有學問、有經驗、有政治家風度、但倔強難測的亞當斯。

亞氏帶有兩件使他成名的國家大功進了這職位：因為門羅主義最初是他的作品，而在一八一九年催促西班牙政府簽訂條約讓佛羅達予美國的也是他。他是個有異常才幹、優良性質、和大公精神的人，但被他的冷酷嚴肅、粗暴態度，和劇烈偏見所妨礙。做了總統，他所能成就的很少，因為賈克孫派痛恨的反對——賈派攻擊他用與克萊腐敗的磋商進了白宮——在每個機會上阻礙他。黨派的對立少有比這些年起得更高的。苛刻的羅阿諾克的藍多爾夫 (John Randolph of Roanoke)，引證斐爾定的「湯姆瓊斯」 (Tom Jones)，論起亞氏和克萊，比為「勃立斐 (Bible) 和黑喬治 (Black George) 的聯合——這種結合，後來沒有聽到過，直至清教徒和黑腿 (Blackleg) 的。」亞氏被這種攻擊激怒得在他的日記裏寫道：「黨派誹謗的鄙夫曾經圍着衆議院含沙射人，後來流出且薰染聯邦的空氣。」他稱藍多爾夫為「燒酒卷子和啤酒廊子的一個老顧客。」

當亞氏當政時期，新的排列成形了，亞氏和克萊的黨徒取國家共和主義者的名稱，後來被代以自由黨員 (Whigs) 的名稱，賈克孫派給一個新稱謂為民主黨。亞氏忠實的有效的治政，可是白白努力於建立一個改良內政的國家制度。他的勤勉不倦，在他的日記裏有一段好描寫：

我過的日子恐怕比以前任何時期更有規則。習慣規定合衆國總統不得出外參加任何私人聚會；我遵從這慣例。我因此不得不在早餐前做體操。平常我在五至六點起床，即是一年中的這時候，在太陽出來的一個半至兩個鐘頭以前。我在月光或星光或無光中步行大約四哩，常準時回到這裏，看太陽從白宮東廳上升。我生起火，讀聖經三章，連司各脫 (Scott) 和休勒特 (Hewlett) 的注釋。看公文至九點。早餐。從九點到下午五點接見先後來客，有時沒有間斷——很少有半個鐘頭的休息——從來不讓我能夠做需要小心的事務。從五點至六點半晚餐；餐後我獨自在房裏過四個鐘頭，寫這日記，或看有關一些公務的公文，除却有時被一位客人打斷。在十一至十二點間我上床就寢，第二天早晨五至六點再起來。

一八二八年的選舉像一個地震，賈克孫派壓倒亞當斯和他的支持者。感情變得這樣難堪，當當選總統賈克孫到華府時，拒絕向總統作致敬的拜訪，亞當斯則不願意和他的繼任者同車赴國會大堂。

賈克孫的就任式久被人看成美國生活上新紀元的開始。它是全國從來未見過的這樣一個就任儀式。華府觀察家拿他和野蠻人侵入羅馬相比較。韋白斯特 (Daniel Webster) 記載說，幾天以前，城裏塞滿觀衆，找差使者，得勝的政客，和西部南部的平民。人們從五百哩外來看他們的英雄做了總統，他們談論，好像國家從什麼可怕的危險中得救了。他們湧過街頭，喝着賈克孫的采聲，許多人喧鬧得使斯文的人避開他們。一位觀察家留下一段寫實的記錄：

就職典禮非早晨，國會大堂的附近像一片大怒海；每條到目的地的路都擠滿了人，多得使隨從當選總統的儀仗幾乎不能穿過到舉行典禮的東迴廊去。爲遏止前面的羣衆，一船的大繩子用來張攔大約三分之二的路，這路走上那長段台階，可通到國會大堂；但這有時似乎都不足以限制羣衆的熱望，他們每個人都似乎傾心着和總統握手的光榮。我永遠不能忘記這在各方面表現的景況，也不能忘記那興奮的一刹那，當衆多混雜的羣衆的熱望期待的眼睛，瞥見他們所崇拜的領袖的高大堂堂的身材走出廊簷柱子之間；整個羣衆的顏色似乎被一個奇蹟所變化；衆人立刻脫帽，平常瀟灑於一雜羣人們面上的暗色，好像被一枝魔杖一揮，變成萬個翻身歡躍的臉上的光亮色彩，帶驟然的歡喜照耀着。呼聲轟動，響激天空，且似乎把地都搖動了。

但那時最有特色的景況是典禮後的那天。熱誠的民主主義者的各色衆人，一湧而進白宮。人人知道那裏要分送茶點；人人要做總統的座上客。許多桶橘酒已經備下，但衆人拿提桶和杯子把侍者都攪亂了。他們把賈氏擠到牆壁上，讓他的朋友們聯起胳膊來保護他。他們的泥靴子站到緞子罩着的木器上去。斯托立 (Story) 法官記載道，「我從未見過這樣一個混合。暴徒國王的統治似乎勝利了。」

### 賈克孫的觀念

賈克孫是心思和精神與平民一致的少數總統之一。他同情並深信他們，部分由於他常是他們之一。他生在

赤貧中。他的父親，一個厄爾斯德地方的蘇格蘭窮布販，來北到卡羅來納樹林開墾一塊田地，賈氏還未出生他便死了，這家庭甚至買不起一塊墓碑給他。他的母親做了一個伯叔的管家窮親戚。賈氏幼年，在困苦和不安定中長大，穿着最賤的麻毛混織物，常患一種神經上的病，多半一再被壓服。兒童時代的卑劣感或可幫助解明他的暴烈的性格，他的靈敏的感覺，和他終身對被壓迫者的同情。只是一個孩子時，他已參加革命作戰，他的兩位哥哥都在革命中犧牲生命。

賈氏又浸透對東部資本主義組織的劇烈不信任，部分由於他的西部邊地環境，部分由於不幸的個人經驗。學習法律後，他到田納西，那裏他準備進入世界。他買賣土地，馬匹，奴隸，一度擁有一打大商店。一個律師在那區域裏幾乎是一個貿易商人，因為他收受許多熊皮、蜂蠟、皮革、棉花、和土地，作為費用。一七九八年，賈氏在費城購買價值將近七千美元的貨物，為了付款，把地皮賣給一個商人，這商人的票據（經過賈氏承認）不久被人所拒收。這事使他負擔一筆重債，他感覺得總是東部的財政制度欺騙了他，抱着這感覺清償債務。他沒有賭注，只是拿一些票據在費城商人中間流通，當霧吹散後，商人們持有他的地和他的現款。

而且賈氏是一位邊地律師、種植地、和商人，他知道東部在西部商業上操絕對的勢力。他須在下游的新奧爾良出售他的棉花、穀類、和豬；他須在費城為他的那士維爾（Nashville）商店購買一般商品。這兩城裏的市場是在波動的。他或許送定貨單到費城，看見那裏貨物的價格已經漲到疲敝的水準。他或許輸送出產下密西必河，看見最低的價格從市場中落下。在這條綫的兩端上，控制債權的人長肥了，而賈氏和他的隣人使兩端相接近却困難。從這事實產生對銀行的不信任和嫌惡——同樣的不信任常常顯著於西部。賈氏深信錢的勢力得到它服務的報酬太厚。費城和紐約懶散的銀行家能有權力毀滅田納西勤苦的人民，這是畸形可怕的。

第三點，賈氏有西部的信心，以為平常的人能做非常的事業。西部人士深信一個能指揮民兵團、經營園地、和作政治演說的屹立的人幾乎適合任何職位。他們一分也不信公共生活的大目的是保留給富人貴人和有



教育者。在他們看來，獵狸者和哈佛畢業生一樣好有權利。他們有理由解釋這見解。在田納西，和印第安人作戰的戰士賈克孫，他的夫人吸的是玉黍稈子的煙斗並且連歐羅巴一字的拼音都錯了，還得到一種訓練使他成爲一位偉大的國家領袖。在意大利諾，一個瘦長的劈欄干的人，完全不懂什麼客廳規矩和拉丁文動詞變化，但他被注定拯救聯邦。賈氏會看見內地森林居民鞭打惠靈教的老軍人。他曾看見以自己力量起來的人如本頓(Benton)和克萊支配國家的國會。他知道西部巨大的勢力和它的特質的力量。

總之，賈氏主要的信條能聽括成幾句短語：信仰平常人；信仰政治平等；信仰平等的經濟機會；嫌惡專利，特權，和資本主義財政的紛亂。

在擁護賈克孫的烏合的民主黨中，有兩個主要的原素可以辨別出來。大致最大的要素是由國家的農村投票者，墾殖者，農人，小地主，和鄉間小店主所組成。橫過阿利根尼的西部，在一八三〇年左右大約有人口的三分之一，是顯著有特別的特徵。在情感上它是極國家主義的；新地區的州感情很少，對聯邦的聯繫很大，遠過於原有十三州。在西部，政治平等又被認爲當然。那裏每個白種成年男子都有資格投票和擔任公務。參政權的限制在東部仍然存在，廢除它們的運動被這些保守份子如馬薩邱塞的韋白斯特，紐約的肯德法官(Chancellor James Kent)，和維基尼亞的馬沙爾所吃驚的排斥。但阿拉巴馬、密蘇里、印第安那、意大利諾，都給每個白種人以投票權。

西部人又喜歡一個民主的直接方式。賈氏的黨人攻擊國會預選會提名總統候選人的舊方法，擁護一八三六年左右成爲確立的直接提名會議的新方法。他們寧願選舉的法官而不願任命的。未了，西部的鄉村投票人有興趣於一套新的政治要求。他們嫌憎銀行業在東部控制下；他們表示好感於債戶對抗債主；他們痛恨一些專事專利，從輪船和銀行特許狀到專利權。他們需要價格低廉條件容易的購買土地的權利。

賈克孫派民主主義的另一顯著的成分是東部城市的勞動大眾。被禁止通商、一八一二年戰爭、和保護關稅所刺激，工廠在新英格蘭和中都各州開始成爲重要。麥立馬克(Merrimack)流域和普洛裴登斯四圍的地帶成

爲繁盛的紡織中心。馬薩邱塞的婁愛爾 (Lowell) 在一八三〇年約有五千個工廠手。那年左右，紐約的二十萬人民大部分是工廠和船塢工人。多數移民——英國人，愛爾蘭人，日耳曼人——覺得民主黨比自由黨更意氣相投。新的勞動階級突然把紐約從聯邦主義的轉變爲民主主義的城市，並把費城和皮芝堡做成賈克孫派情感的中心。他們在這賈克孫時期中組成許多會社（起初常稱爲貿易會），並在這種領袖如熱烈的勒格特 (William Leggett) 之下，猛烈攻擊在舊的謀叛法律下懲罰罷工的反動的法院。當賈氏於一八三六年在國家船塢創立每天十小時制時，他們熱烈的稱讚他。（因爲那時馬薩邱塞的工廠每天令人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每星期工資五元。）

### 賈克孫的政策

一度當權，賈克孫把他的主要觀念有力的施諸實行。不同意國會爲地方道路運河表決款項的辦法，他以「梅斯維爾 (Maysville) 否決」——不准肯特基境內梅斯維爾至勒克星敦的一條路——來嚴厲的制止這些在國庫止的侵奪。他嚴正的應付南卡羅來納，當南卡州想取消一八二八年的保護關稅。在一九三〇年斐斐紀念日宴會上，他替賓使眼色注視南卡羅來納領袖卡爾洪，舉杯說出句不朽的話：「我們的統一——它必須被維持。」當南卡州繼續它的有意的方針，賈氏表示他要從事派遣司各脫 (Scott) 將軍和一支海軍到查理斯頓，並發布一道布告宣稱「以武力造成的分立是叛逆」。他準備必要時絞決卡爾洪，在晚幾年，他遺憾他沒有做。韋白斯特在一篇巧妙的演說裏壓倒南卡州在參議院中主要的戰士海恩 (Robert Y. Hayne)；他的結論是，「自由和統一，現在和水久，整個和不可分離！」成爲一個國家的歡呼。徵幸的是，南卡羅來納未能團結南方，放棄取消之議，而克萊，常是和平的一位朋友，訂立一個減縮關稅的妥協。

賈氏對第二合衆國銀行拚命打成功的一仗，推翻那東部財政和專利勢力的城寨。它的首腦，機警的畢德爾 (Nicholas Biddle)，爲克萊和自由黨所支持。整個說來，這銀行管理得好，並對國家盡過有價值的貢獻。但

賈氏嚴厲的否決它的重新特許法案。後來，他向銀行提出政府存款，把它們存入重要的州銀行，使這些州銀行能取得這中央機構的作用。沒有問題，這銀行曾干預政治；沒有問題，它又是個私人專利，曾使內部一小羣人過分發財。社會感情傾向賈氏，雖然他努力使他的全黨擁護他，他已使他的意志發生效力。

在對外關係上賈氏也具有嚴正的決心以從事。當法國暫時停止償付欠合衆國的某種款項時，他獎勵奪取法國財產，並使法國就範。當德克薩斯背叛墨西哥，向合衆國申請合併時，他聰明的取期待態度。直到他第二任的終了，他保持着他的廣大的人望。

### 其它民主趨勢

，攝政洪潮的新民主大浪，在賈克孫時代，比哲斐孫的民主所到的還要達到更高的水平。成年參政表示在國事上的興趣增加了。在一八二四年的總統選舉，投票總數只三十五萬六千；一八三六年升到一百五十萬；一八四〇年二百四十萬——只十六年功夫便已七倍於前。這增加一部分是人口增長的結果，大部分可以追索到投票的解放和政治興趣的昇高。總統選舉人不再由各立法議會選擇（除却南卡羅來納），而由民衆投票選舉。在國事上，更快的輪流任職成爲規則。賈克孫坦白的宣言他對這的信仰，撤換許多政敵。他所作的更動雖比後來的總統們少，可是他接受紐約馬息（William L. Marcy）釋義的規則：「戰利品屬於戰利者。」

風俗趨向於更民主的，少拘束和細節。外國觀察家駭異普遍的吸烟，吃飯的快，不適當的好奇心，流行的唐突和誇張，和北方城市神經質的慌忙。美國化給人的印象又是怠慢和強暴。手頭上的事似乎比生命更重要，這在長足進步的國家中原是自然現象。輪船鐵路不顧什麼安全。決鬪成爲常事，在南部和西部，以任意用彎刀手槍爲特色的家族仇鬪也是常有。在不能依賴法院和法官的地區裏，私刑自然確立了。當哈禮孫（William Henry Harrison）在一八四〇年被自由黨選爲總統時，這黨假定這位有教育和相當財富的人，在星星那提附近有二千英畝地皮的鄉紳，真正是一個住居小木房子，喝烈酒的粗野的墾拓先鋒。可是實際上，風俗的平均水準

並不低於共和國初年的情形。它們比以前貴族的風俗壞些，但比無知識和粗野的工人的習俗好些。舊日上等社會好風采和庶民可賤的舉止中間的清楚差別，已經大半消滅了。

生活多方面變得更民主的。低廉的印刷興起了。模倣倫敦的一便士的報紙，戴氏 (Benjamin Day) 在一八三三年創辦廉價的紐約太陽報，兩年以後本耐特 (James Gordon Bennett) 創辦投時好的紐約先報 (Herald)，更著成功。最早的通俗的雜誌也出現於賈克孫時代，因為哥德婦女雜誌 (Goody's Lady's Book) 創刊於一九三〇；最早銷路廣大的文學月刊，紐約人 (Knickerbocker) 出現於三年以後。在教育上，發生過要求免費的、無宗派的、公共管理和賦稅支持的公立學校的巨大奮爭。在這努力中馬薩邱塞的曼氏 (Horace Mann) 居領導地位。這實在是比後來幾代的人所能想像的還要劇烈的奮爭。一邊排列着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人士，知識勞動者，凱爾文派信徒，和一神論者；另一邊是具貴族主義見解的人士，貧瘠的保守份子，教區學校的路德派、天主教、和教友派維持者，許多田園主人和農民，和私立學校的教師。苦戰之後，各州先後被迫成一陣形。一位新格英蘭人公然攻擊「讀書腐壞人心」；一位印第安那人要人家在他墓石上刻「這裏睡着一個免費學校的仇人。」但允許任何鄉郡或城鎮徵稅作免費公立學校用途的法律，被中部各州和西部所做效，以法律強制地方單位進行這事。

隨着邊地向西進展的宗教，甚至也民主化了。繁盛於西部大部分地方的宗派是浸禮會派，美以美會派，康伯爾派 (Campbellites)，和長老會派，他們的政治形式都是民主的，並且趨於更民主的。前三派特別着重兩個邊地所喜歡的宗教要素：一是用情感的手段，與多呼喊、歌唱、和熱烈的祈禱；一是個人感化的觀念，引導到馬克杜溫「赫克爾柏里芬蘭人」 (Mark Twain's Huckleberry Finn) 一書中所描寫那種熱情的復活和喧鬧的帳幕集會。文學也露出民主的傾向。布賴安、柯伯、和歐爾文全是賈克孫的熱心擁護者。柯伯寫東部社會的書，和歐爾文關於荒野西部的作品，同樣用力於民主觀念。風行的作品像克洛克特的「自傳」 (David Crockett's Autobiography) (一八三四) 和郎斯特里的「喬治亞景色」 (Augustus B. Langstreet's Georgia Scenes) (一

八三五) 露出遠地的影響。班克洛夫特的「合衆國史」 (George Baneroff'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第一卷是不錯的「選舉賈克孫」。

## 第九章 西部與民主

### 移動的邊地

自始形成美國生命最出力的力量之一是邊地，它可以被解釋爲邊疆區域，它的稀少的人口（每方哩不過六人）大都從事於淨除並開墾土地和建築住屋。隨着人口前進，從大西洋移動，越過大陸到洛磯山，它深深的影響美國的特性。它不止是一條綫——它是一個社會過程。它鼓勵個人進取心；它爲政治和經濟民主而生；它使風俗粗野；它摧破保守主義；它養成地方自決的精神，和對國家當局的尊重相連結。

當我們想到邊地，我們便想到西部。但是大西洋沿海地帶是最早的邊地，並長久包含着邊區；一七九〇至一八〇〇年從較老的新英格蘭招徠到四萬殖民的緬因，在革命後一代還是邊地。第二片邊地是海岸諸河的水源並正過阿帕拉幾山脈的一帶。革命終了時的邊地，有西紐約，一七八七年有兩個資本家在那邊獲到六百萬英畝荒地；彭西凡尼亞的外俄明流域（Wyoming Valley），唐納第格殖民在那裏成立家庭；皮芝堡的四圍，一七九二年它有一百三十家和三十六名技藝工人；東部田納西區域，一七八四年有獨立心的墾殖先鋒在那裏組織過短命的佛蘭克林州；和上喬治亞。其次是一八〇〇年左右密西西必和俄亥俄流域成爲第三個邊地地帶。「俄，我們去吧，順着河下去到俄——亥——俄，」成爲千千萬萬移民的歌曲。在憲法制定後的那春天，帕特南（Rufus Putnam）率領第一批移民西進，建立馬立達（Marietta），這樣開闢一個二百萬英畝的區域，由國會轉移給俄亥俄公司。另一羣土地投機家在那年建立星星那提。這時人口以驚人的速度注入肯特基和田納西。和約後的第一年，一萬殖民進入肯特基；一七九〇年的第一次國家調查知道它和田納西的人口共有十萬以上。

向西的川流，不停的溢出於金西北和西南。一七九六年左右，肯特基和田納西早已是羽毛豐滿的州，俄亥俄帶着沿彭西凡尼亞邊境和俄亥俄河的一條已墾殖的土地，也將成爲一個；一八二〇年左右，在西北的印第安那和意大利諾，在西南的阿拉巴馬和密西西必，全已是州。第一片邊地已經和歐洲密切相連結；第二片連結到海岸地區；但密西西必流域是獨立的，它的人民與其注意東部，寧願注意西部。

### 邊地殖民

邊地殖民天然是多種人物的一個團體，但最早的觀察家區別爲主要的三羣。

獵戶或捕鳥獸者前進爲移民的先鋒。一位英國旅行家名福德漢 (Fordham) 的，着力描寫大都未婚的墾拓先鋒的粗野狀態：

一個勇敢堅苦的人種，住居如淒慘的小房子裏，這房子他們在和印第安人戰爭時牢固的修築。他們恨印第安人但衣服風俗卻許多和印人相似。他們不斯文，但肯接待人，對陌生人親切，忠實可靠。他們種植一點印第安穀和南瓜，養幾頭豬，有時有兩頭母牛，和三兩匹馬，屬於每家。但來福槍是他們主要的生活工具。

當他們聽見一個隣居的槍聲，這是動手的時候。柯伯曾描寫「奔波」 (Natty Bumppo) 以代表墾拓的獵戶，並在「草原」 (The Prairie) 這書裏描寫黑森林的生活。這人些熟練斧子，來福槍，羅網陷阱，和釣魚絲；他們焚燒小路，建築最早的小木頭房子，阻住印第安人，這樣替第二羣人開路。

這第二羣人，福德漢描寫爲最早的真正殖民，「獵戶農人混合的一羣。」代替小房子，他們建築大木頭房子，有玻璃窗，良好的煙囪，隔開的房間，並且像一座英國農舍一樣舒服；他們掘井以代泉水。一個勤勉的人能迅速的淨除樹林地帶，燒樹木造木灰並把樹根腐爛。種他們自己的穀類、蔬菜、和水果，搜搜硬林尋找獸肉、野火雞、和蜜蜂，在附近小河裏捕魚，飼養一些豬牛，他不會煩惱他生活的寂寞和粗鄙。更會經營的購買

大片廉價土地，道理是像愛格爾斯敦「印第安那教師」(Edward Eggleston's Hoosier Schoolmaster)裏一個人物所說的，「你去做你就得到的多」，那是聰明的；後來地價上漲，他們賣掉土地，向西搬家。這樣，他們爲最重要的第三羣人做路。

第三羣不但包括農人，而且有醫生、律師、店主、記者、傳教士、技工、政客、和土地投機家——一切供給一個有力社會機構的材料。但農民最重要。他們打算在他們居留下的地方度過一生，並且希望子孫也住下去。他們修蓋比他們以前人更大的倉房，後來又蓋磚瓦或木框的房子。他們修築更好的圍柵，帶進改良的牲口。更精巧的耕地，播種能多產的種籽。他們有些建造磨粉坊，鋸木坊，或蒸酒坊。他們修築好的大路，建築禮拜堂和學校。隨着城鎮成長，這第三羣中許多人，像銀行家、商人、或土地買賣者，成了富人。簡單說來，他們代表美國文化。西部成長得這樣快，在短短幾年內，這第三道波浪完成幾乎令人難信的變化。芝加哥在一八三〇年只是個無希望的帶一座要塞的貿易村子；在它的第一批殖民者有些還未死之前，它已是世界上最大最富的城市之一。

許不同的民族在西部混合它們的血統。南部的農人是顯著的，從這祖先裏出了林肯和戴維斯(Jefferson Davis)，同年生於肯特基的小木房子裏。精明的蘇格蘭愛爾蘭人，節儉的彭西凡尼亞日耳曼人，有進取心的新英格蘭人，和其它來源的人都盡他們的分。這一切人有兩種共同的特性——個人主義和民主。一八三〇年左右，一半以上美國人在一個沒有或很微薄的舊世界傳統和習俗的環境中長大。西部人民要立定自己的地位。他們的被看重，不是因爲家世，遺產，或學校的資格，但像巴利「可敬的克萊頓」(Barrie's The Admirable Critchton)一書中的破落戶一樣，因爲他能做什麼。人們能得到任何節儉的人所能出得起價錢的田地；我們已經看見，一八二〇年以後國有土地可以每英畝一又四分之一美元的價格買到，一八六二年以後只要在那地居住便是。他們能容易的得到器具來工作。後來，像格里立(Horace Greeley)所說，他們能「同國家長大」。這經濟機會平等養成社會和政治平等的意識，並給天才的領袖很快上進的機會。此外要提到的，海洋實



實際上是影響美國特性的另一個邊地。船隻很小，水手也少，許多漁船和捕鯨船在股份基礎上進行。進取心、勇氣、個人魄力、和堅強的意識，是一個良好的先鋒獵戶、邊地農人、或東部水手同樣需要的條件。

### 邊地道德和罪惡

由於習染和模範，這民主和個人主義成了青年共和國城市裏顯著的特徵。柯伯特 (William Cobett) 所讚美的正真的獨立立刻感動紐約和費城的歐洲遊客。這些觀察家注意到工人沒有脫帽稱「先生」以賺一先令。力夫們帶着給人便利的態度以接受一件工作。柯伯特首肯的提及美國僕人不穿僕人服裝；並且尋常和主人家庭在一起吃飯，且被稱爲「幫忙」。他在美國只見過兩個乞丐，且全是外國人。愛默生最真實的美國論說文之一是關於「自靠」。他述及當時一位模範的美國人，去到西部，更番做農人、店主、土地買賣者、律師、國會議員、和法官，無所不能，常自己立足。這不是形容過甚的寫照。內戰最有才能的諸將之一，錫爾曼 (W. T. Sherman)，先後當過學兵，在墨西哥戰爭中當兵士，在舊金山做銀行家，在勒文衛斯 (Leavenworth) 當律師，在干薩斯 (Kansas) 邊地做田地經理人，在路易斯安那當一個軍事學院院長，後來又當軍人。

但邊地如果助長道德，它也養成罪惡。邊地人民一般不受約束，不守紀律，太侵略性的自信——太性急。一八一二年戰爭許多次軍事的失利可以歸根到邊地的厭棄訓練和服從。邊地訓練出的美國人做樣樣事都傾向於急促淺薄。所以需要細心完成的工作似乎是浪費工夫。美國人趕造粗陋的木框房子而不造堅固耐久的磚石建築，他們修築粗劣的道路，權宜的橋梁，他們與其耕作毋寧是掠奪土地。紐約整晚在響火警鐘，因爲它的房子像火絨似的燒着了，一八三六年城中最大的事務建築有兩座簡直坍倒。火車相撞和輪船爆炸是常事。自然，人們對風俗文化沒有去注意；邊地沒有工夫注意它們。最壞的是，邊地生活顯著的有無顧忌的犯罪事件，數量多得可歎。社會的廢物一些是從邊地渦旋出來的。人們發展成不可管束的性情，並喜歡用拳頭手槍來解決他們的糾紛。法官要有鐵般的神經和快捷的彈機手指。

## 印第安戰爭

邊民無紀律的特性在他們應付印第安人時，尤其有悲慘的結果。他們常竊佔印第安土地，不顧條約；他們撲滅印第安人靠着來衣食的鳥獸；許多人準備見到紅種人便屠殺。當印第安人準備起來自衛，戰爭便接着而生。當然，野人常是侵略者，但白種人堅決的西進是許多衝突的主因。最令人驚心的是在南方與克里克族的戰爭，那裏，賈克孫贏得流血的勝利；在佛羅里達沼澤叢林地與森密諾爾族 (Seminoles) 的戰爭，和在印第安那與特康塞部下的戰爭。

青年的林肯是黑鷹戰爭中一位隊長，這戰爭尤其是殘酷的事。有些黑鷹部族的代表，騷克 (Sank) 和狐狸印第安人，割讓他們的土地約五千萬英畝給政府。酋長和部族的一大部份不承認這割讓的有效。在武力威脅前，黑鷹從他在意大利諾的穀地退到密西西西岸。但他的部族遇到饑荒，第二個春天，他們又渡河來投奔在威斯康辛的友好的文內柏哥族 (Winnebagoes)，且在那裏種穀子。他們有幼稚的信心，以為他們友誼的目的會被了解。但是白種人立刻襲擊他們；黑鷹退卻，提出和平建議。兩千民軍不理睬他。他的失望的部下又被驅逐經過南威斯康辛到密西西西必，那裏男女和孩子準備渡河時都被殘忍的切散。一位來福槍兵記載，「看見小孩子受傷且遭受最慘的痛苦，雖然他們是未開化的敵人，這是可怕的景況。」這是邊民所做最惡的事。

東部印第安人總遷移太久被認為不適白種人居住的密西西西必以外的大平原這觀念，在門羅時正式被採取，在賈克孫時有力的繼續推行。國會授權總統在西部以土地交換舊有印第安人的產業。一個「印第安國」成立了，起初從加拿大到德克薩斯。北部印第安人不費大困難便可搬到這區域裏來。但在南部，那裏部族比較強大，印第安人頑強抵抗，結果就悲慘了。所謂五個開化部族——克里克族，綽克托族 (Choctaws)，契卡索族 (Chickasaws)，浙洛歧族，和森密諾爾族——愛護他們的家。他們裏許多人，特別是克里克和浙洛歧兩族，已經是節儉的農民，已經建築良好房屋，學到養牛，修造磨房，送孩子進教會學校。他們至終守着他們的土地，有些只

是被武力驅逐走。大部分靠着馬車或步行走路，他們遭受饑餓、疾病、露宿，許多死亡。一八四〇年左右，密西西必以東印第安人差不多全部要遷到他們新的家去了。

這遷移使全國最富庶最顯明部分的密西西必流域的完全移民輕而易舉。威斯康辛，密西西必以東最後的一州，於一八四八年被准加入聯邦。在河以西，已經有一羣州建立起來，因為在一八二一年密蘇里加入以後，阿干薩斯於一八三六年，愛奧華於十年後都成爲州，明尼蘇達 (Minnesota) 區組織於一八四九年。一八三七年的恐慌，大部分是西部發達太快的結果，只是短期阻礙前進運動。麥克科密克 (Cyrus H. McCormick)，刈禾機發明者，於一八四七年在芝加哥設立工廠，開始製造機器，使西部草原容易種植穀類。一八五四年，一天內有七十四列火車開入芝加哥，這地方已經以世界上最大最主要的穀類市場自詡。那年卡來拿 (Calena) 和芝加哥鐵路一個月內載運三千移民到愛奧華，其餘的幾千人由大路前往。日耳曼人，斯干的那維亞人，和英國人也幫助來充實上游並定居於德克薩斯和阿干薩斯。一八五四年，一位英國觀察家驚駭的看見在遙遠的明尼蘇達有聖保羅城，人口七八千，旅館四五家，好禮拜堂五六處，每年有三百艘輪船來的碼頭，和有行人道的好街道，高大的磚建貨棧和大小商店，與在聯邦的別處一般。新的西部領袖在一八五〇年便已成名；這些人像在意大利諾的道格拉斯 (Stephen A. Douglas) 和林肯，在密蘇里的阿吉生 (David R. Atchison)，在密西西必的戴維斯，和在獨星州的德克薩斯獨立戰爭的英雄休斯頓 (Sam Houston)。

### 近西的殖民

幾條運輸大路是密西西必流域發展的較大因素。第一條到西方的大動脈是昆布蘭路，開始於一八一一年，大部分以聯邦的金錢築成。從馬里蘭的昆布蘭出發，經過諸山到俄亥俄河旁的惠林 (Wheeling) 和山斯維爾 (Zanesville)，以意大利諾的凡大利亞 (Vandalia) 爲終點。完成後約長六百哩；寬度六十呎，當中有二十呎的鋪設部分是照麥克亞當的原則構造的。

西部郵路和特別郵政經過這「國家尖端」之上。在適當的距離上旅館興起了。殖民者川流湧起，夏天的旅客至於相接不絕。成千的家庭容易且舒服的移往西部。從西部來的牛羊販和他們幾乎各種都有牲口經由那裏到東部找市場。自然，這種巨大的通行可以和有些人口稠密的城市街道相比較——步行者，騎馬者，乘車者在路面上相混着。這條路在惠林和俄亥俄相銜接，並且成爲行旅擁擠的動脈。它起初通行平底船、駁船、和一種方船，這些船隻和潮水維持着關係，並裝運穀類、獸肉、毛皮、豬肉、和麵粉到新奧爾良。那時，尼古拉·羅斯福，後來有名的家族，造出一隻輪船，於一八一一年在皮芝堡和新奧爾良之間完全行駛來回，不久便有許多攀做者。

但到西部去的最有名的大路是意大利運河，連接哈德孫河和大西洋和諸大湖，這樣造成通進大陸內部的水道。人們甚至在十八世紀時便已夢想到它。它可使移民和貿易開闢荒野的阿帕拉幾山脈。但是開鑿將近四百哩運河的工作是如此可怕，使領袖們避開它。末了，一位好勝的紐約人克林敦（De Witt Clinton），擔起這件事，把想像轉變成真實。他得到管理者職權，於一八一七年開始工作，經過刻苦的幾年，看見「克林敦渠」完成。一八二五年，一個快樂的慶祝式歡迎第一隊船隻，在歡呼的羣衆面前，克林敦傾倒一小桶意大利湖水於太平洋。這運河，使白法羅（Buffalo）成爲一個繁盛的港口，沿着這運河新城市興起，確定紐約在美國貿易和財政的領袖地位。

比那更重要的是它對於西部成長的貢獻。新英格蘭人和紐約人有固定趨勢的往西移動。這移民的潮流把克利夫蘭（Cleveland）、第特羅、和芝加哥造成熱鬧的城市，並且給西北的大部分以絕大的新英格蘭氣味。它在本身負責美國人口的顯著移動，它大有幫助於拯救聯邦，因爲在內戰發生以前，它把密西西比上游牢固的聯繫在北大西洋諸州。在這層，它受彭西凡尼亞的運河系統的幫助。受克林敦渠成效的刺激而起競賽，彭西凡尼亞人化費大約四千萬美元在連結相距四百哩的費城和皮芝堡的一個運輸系統上。他們一部分用河道和運河，在爬上阿利根尼高山，他們用一套傾斜平面，船隻、貨物、和旅客都用輪船拖曳上去。這是個非常的經營，雖然它

幾乎使彭州破產，但它做了一件有用的工作，並幫助彭州成爲主要工業州之一。

人口移動大致傾向於沿着緯度而進。阿拉巴馬和密西西必大都爲南部人所移殖，密西根和威斯康辛大都爲北部人。在俄亥俄，印第安那，和意大利諾這些州，兩股潮流會合。沿俄亥俄傾注的南方川流和意大利運河和諾大湖的北方川流，和平的相混合。城市像哥倫布、印第安那波里 (Indianapolis)、和斯普林菲爾德 (Springfield)，是由兩股互相通婚且和歐洲移民通婚的民族所建造。這裏產生了「民主流城」。

### 密西西必外的西部

當我們談到密西西必以西的大地，我們看見它的殖民有更其聲色的故事。由於哲斐孫派遣兩位富有邊地經驗的青年維基尼亞人，留里斯 (Meriwether Lewis) 和克拉克 (William Clark)，領導專去探險太平洋，這西部才被全國所知道。這在地理發現上寫出一章不朽的著名事業，聯邦經費只供給它二千五百美元！哲斐孫對西部的奇蹟常有熱烈的興趣。他後來曾寫過有關於他所稱讚的印第安人的文字，和有關於俄亥俄流域古代大象遺骨的發現。但當他派遣留克二氏到荒野未闢的地帶裏去時，他的目的卻有兩層。除了科學調查，他希望這些人爲美國皮貨貿易者開闢蘇里河地帶。那時，那區域中的印第安人運他們的皮貨往加拿大，賣給英國經理人。哲斐孫以爲他們運皮貨順河下來賣給美國願主將更感到便利。

兩個目的都達到。留克兩人，上溯密蘇里河，過洛磯山，順哥倫比亞河而下，到達太平洋，完成探險事業的一個偉大大片段，被稱爲「在世界史上這類事業中最完美無比的成就」。他們沒有遭到過真正危險，因爲他們避開好戰的蘇克斯人。十八個月內在外旅程走過大約四千哩，他們細心的測繪地圖並描寫這地帶的地理。他們又奠定美國與富有的英國皮毛貿易公司競爭的基礎。他們回來後，克拉克立刻幫同創設密蘇里皮貨公司，和密蘇里河上一串要塞。不久之後，阿斯德 (John Jacob Astor) 的有勢力的美國皮貨公司加入西北活動範圍。那時以後它以諸大湖附近爲主要貿易地，但阿斯德現在決定在哥倫比亞河口立一貿易站。一八一一年，阿氏的一

隻船，名東金號 (Tonquin)，圍繞豪恩角 (Cape Horn)，往北行駛，建立阿斯德利亞 (關於這地歐爾文後來寫有一部有趣味的書)，第二年有一支遠征隊取陸路橫過大陸，到達相同地點。

這是個好的開始。早在十九世紀的頭二十年，西部和它的貿易的發達有三件生動的事促成它們。一是沿聖大費至西南遠地的繁盛貿易的開始，以前在墨西哥人手裏。一位有冒險心的密蘇里人貝克內爾 (William Becknell)，湊合大約七十人的貿易團，驢馬馱載貨物，走過一個八百哩以上不平又危險的地方，在墨西哥的前哨聖大費出售好價錢。第二年他用馬車走這長途。其他貿易者效法他，有名的聖大費大路完全開了。走這路的貿易者遇到許多危險，因為這地方多半是半沙漠，被熱旱烘得透乾；他們要渡困難的河道；他們或者被仇視的科曼奇族，阿剌帕和族，和舍延族印第安人的侵襲。八十或一百人的大團體相當安全，十人或二十八小團體或者寡不敵衆。聖拓先鋒及時打出一條美國道路，大有助於共和國取得西南部。

第二件顯著的事是一八二二年洛磯山皮貨公司的創辦。創辦人阿士來 (William Ashley)，一位聖路易民軍將官，登廣告徵求一百名青年人上溯密蘇里河，在那上流住居一年至三年。這是最初的公司，開始與其靠着和印第安人貿易，寧可靠着它的雇員的捕機。它的人們裏，有些西部探險事業的大人物，有卡孫，做捕獸者，獵人，印第安戰爭中戰士，斥候兵，和導導時，遇過一串冒險之事，使他的生平像一部傳奇；又有斯密 (Jedediah Smith)，是一位不可及的探險家。第三件事是一八二三年一次開上密蘇里的軍事遠征，恫嚇阿里 卡拉族和其它兇猛的印第安人屈服。這「密蘇里軍隊」由國家政府和聖路易皮貨商人聯合裝備，明白表示合衆國要保護搜尋皮貨者。

教會活動也大有幫助於深入遠西。教會在邊地工作上活動已久，但一八三一年一件奇怪的意外事件給它們的熱誠以新刺激。上哥倫比亞的印第安部族從英國貿易者得到一些宗教端緒，並願意得到更多的知識。內帕色族遣派四個要人到聖路易向克拉克求天書。當教會刊物發表這事，引起人們熱烈的興趣。新教徒派遣幾位傳教士和輔助的人士進入遙遠的西北，他們在威蘭麥特流域 (Williamette Valley) 創立一處教會，又在蛇河和哥倫

比亞河的接合點建立另一處。這事業的領袖人物是虔信的惠特曼博士 (Dr. Marcus Whitman)。這些教習在基督教化印第安人上做過許多事。他們開辦模範農場，指示野人怎樣建造房屋，清除田地，種植穀物。他們所寫關於風景和氣候的熱心的信，這時燃起親友們的興趣；不久，每年有大隊殖民者越過平原和大山，到俄勒岡地方。

### 俄勒岡大路

從密蘇里移動到哥倫比亞的最早的探險家和皮貨貿易者，糶糊的追跡一條屆時被定為俄勒岡大路，且在十九世紀中葉四十年中是大路的路綫。足有二千哩長，它充滿危險和困難。在獨立時代，開始向密蘇里，它穿過落磯山脈起伏的原野，從較低的南方隘口渡過它們，穿過不毛和多山的地帶，前進到蛇河岸上的荷爾要塞 (Fort Hall)，從那裏這大路通過幾乎不能通行的藍山 (Blue Mountains)，到烏馬提拉 (Umatilla) 河，下到哥倫比亞。另一條在大鹽湖外的路綫通到加利福尼亞。第一批出發赴太平洋岸的移民羣，為畢德維爾 (John Bidwell) 所提倡，人數約有八十名男、女和兒童，在一八四一年先後迂回他們的路經過荒野的地帶到達俄勒岡。這是一個驚人運動的先鋒。一八四三年，有「大移民」，不下二百家，人數有一千，趕着幾百頭牲口，越過平原和山，達到他們的目的地。每小時走二哩，這牛隊在好天能走二十五哩，壞天只五哩或十哩。一八四五年，順俄勒岡大路的人的小溪流漲成一支闊大的河流。那年有三千餘人進入威蘭麥特流城。

這俄勒岡運動是個偉大的移民。「促住，促住」，發出早晨的呼聲；長串的篷車，由有才能的領袖們牽領着，從事行動。到傍晚，他個紮成一圈帳篷，車子、行李、和男人在外面、女人、孩子、和牲口在裏面。哨兵小心的守望着。在路上，一樣的煮食物，先衣服。求婚在進行，孩子在生產，衰弱的死了被葬在沒有標識的墳墓。當衰疲的牛不能再拉重車，寶貴的財物只有拖留下來。有些遇見印第安人，大熊，可怕的霍亂，或嚴酷的天氣，這行程將是個拖長的煩惱。有些人覺得這是興奮的。有人寫道，「這是個長期的野餐會，變化的旅行」。

情景，原野的獸類，印第安人，山地貿易者和獵戶。」這羣衆運動把俄勒岡造成一個美國社會，和外交一樣的做了許多事把它歸於合衆國。它有效的充實遙遠地帶的人民，使它在一八四九年組織爲一個區域，只十年以後，便成爲一個羽毛豐滿的州。

### 默蒙教徒

在西部最顯著且重要的宗教殖民地是在烏達 (Utah) 的默蒙教徒 (Mormons) 的區域。美國個人主義，異議，和佈道的傳統，結果發生許多奇怪教派的組成。它們大多數是現存團體的支派。但默蒙教却是個完全新組織。這末日聖徒教會的創始人是斯密士 (Joseph Smith)，一位上紐約的青年。他聲言在一八二〇年的一天，他休息在樹林裏，爲救世祈禱；有兩位光榮的人物出現在他面前，要求他等待福音書的完全復興；屆時有一位天使，名默羅尼 (Moroni)，來告訴他一件記錄，刻在埋於地下的金版上，內容是北美古代居民的神聖歷史；藉這天使送給的工具的幫助，他翻譯出這歷史。他於一八三〇年以「默蒙書」(Book of Mormon) 之名刊布這書。那年一個教會組織成，發展很快。它的總機關，經過許多變遷，移到意大利諾。這裏，默蒙教徒在密西西必沿岸建築繁盛的諾佛 (Nauvoo) 城，創辦一座大學，並開始建立一座大禮拜堂。他們又採取多妻制度。對這辦法和他們宗教的反對，與經濟與政治上的猜忌，引起亂事的爆發。一羣暴民從郡監獄裏拉出斯密士兄弟，把他們絞死；不久之後，由有能力的楊氏 (Brigham Young) 領導的默蒙教徒，被驅逐出州。他們渡過密西西必，決定在遠西尋找和平與安全。

結果是在這許多人認爲沙漠地帶的殖民地地上做出一件顯著的偉業。楊氏領導他的人們越過平原進入大鹽湖流域，那裏，他在高山圍繞之中找到肥沃的土地，適宜的氣候，和足夠灌溉的水。他指導山地的開墾，選擇城市的基址，並看視和東部的交通。第一年見得有些缺乏，但那時以後，烏達給人人以大致的滿足。田地和灌溉溝渠不久擴展於全流域上下。楊氏行使一個專制權力，但他的聰明和仁慈使它持久。他和他的教會人員組織烏



遠產物的市場；他們管理殖民地，遷遷地址爲新市鎮，派遣出正爲各處需要的匠人；他們造鹽湖城，有優美寬闊的街道，清水的溪流，和禮拜堂，成爲美國最有趣味的地方之一。它是最早的有計劃經濟的實驗，它是成功的。多妻制度有一時期繼續存在，有助於健全的殖民目的——因爲皈依者裏大多數是婦女，而邊地沒有未婚和無小孩的女人的地位。一八五〇年左右，烏達被組織爲一個區域。

### 德克薩斯的合併

德克薩斯的合併，與從衰弱的墨西哥征服得加利福尼亞和西南部，結果完成美國西部的領土。一八四〇年前的幾年內，合衆國擴展它的疆界於大陸上一些最富庶最有美景的地帶上。許多著書者認爲這從墨西哥掠奪地土是件不道德的侵略。羅愛爾 (James Rossell Lowell) 說，南方要德克薩斯正是要有更大的圈檻可以灌進奴隸。這話是不公平的。一個自然且不可避免的過程引起這地域的加入合衆國——以「明顯的命運」這詞語評它正是合式的一個過程。

德克薩斯當初是墨西哥共和國的一部分，土地面積同於德國，但只有很少的牧人和獵戶。它早被許多美國人和一些英國人所注意，奧斯丁 (Stephen F. Austin) 於一八二二年樹立最早的英美殖民地。自由的土地，容易通到南方各州，是主要的釣餌。墨西哥政府無效率，腐敗，又暴虐。一八三五年，殖民起義，經過幾次戰事，得到獨立。有一段是墨西哥人攻陷阿拉莫 (Alamo)，在聖安東尼阿 (San Antonio) 的一個要塞，那裏美國防禦者全數戰死：「德莫比利有它戰敗的使者；阿拉莫沒有。」一度建立的德克薩斯共和國繁盛起來，並吸收許多新的美國殖民。有一時期合衆國拒絕考慮任何合併這國家的建議。但由於多種原因，許多美國人漸漸改變他們的心理。一是他們認爲擴展到無人且未發展的西部是一種天職。另一是他們覺得德克薩斯人是親戚的民族，他們的天然地位是在美國國旗之下。第三個原因是他們恐怕英國要干涉德克薩斯並準備建立一保護國。最末，錢的動因在作祟。北部人士想出售農產物和製造品於德克薩斯，船主人看出他們的船隻能在航行到卡爾維

斯頓 (Galveston) 中獲利；新英格蘭紗廠主人想得低價的德克薩斯棉花來紡紗。許多南部人士想移民，可是不願意離開美國旗子。

在一八四四年的國家選舉裏，投票者的大多數表示他們已準備使這小共和國加入聯邦，第二年，它便被合併。

### 墨西哥戰爭與加利福尼亞和新墨西哥的獲得

這時許多美國人同等的想用同樣的和平方法取得控制加利福尼亞。他們認為這是可能的，因為它的特殊地位。加利福尼亞只有一萬一千或一萬二千人的貧瘠的人口，緊緊依靠在海岸。他們沒有錢，沒有軍隊，沒有政治經驗。他們的西班牙血統比墨西哥羣衆濃厚，且自認為在體質上在精神上是優越的；他們只是名義上屬於墨西哥。當然，他們如果不是爲了他們家族的猜忌和加利福尼亞南北部的仇鬪，他們已經會把墨西哥權勢一起拚棄了。過去，墨西哥沒有設施法院，警察，有規則的郵政便利，和學校。加利福尼亞和墨西哥城間的交通，稀少且無定期。墨西哥率直的承認它的主權只是個陰影，在十九世紀中葉四十年中，它表示把這地帶賣給英國的意向。美國分子在加利福尼亞，數量和侵略性年年在增加。美國船隻久已在沿海交易，希望在黃金的氣候裏居住和藉牲口小麥發財的移民，於十八世紀初期三十年間開始度過諸山。一八四六年左右，加利福尼亞有一千二百外國居民，大多數是美國人。有些人相信加利福尼亞將像一個成熟的梨，掉在合衆國伸出的手掌中，是無疑問的——不需要費什麼力。

如果不是墨西哥戰爭發生，恐怕也會是這樣做了。這衝突的遠因是兩國在增加的不信任，近因是關於德克薩斯的疆界糾紛。合衆國覺得這是個短短且光明的衝突。一支泰樂 (Zachary Taylor) 率領的美軍被遣進入墨西哥北部，攻陷設防的蒙特瑞城，並在頑強的布拿未斯達 (Buena Vista) 一仗中打败一支墨西哥大軍。另一支一八一二年戰爭英雄司各脫 (Winfield Scott) 率領的軍隊，登陸於委拉克羅斯 (Vera Cruz)，向西推進。

度過諸山，苦戰之後，佔領墨西哥城。這裏司各脫特助馬朝的殿堂上，升起美國旗。當和約訂立，合衆國不但得到加利福尼亞，並且得到在它和德克薩斯中間的大區域，名新墨西哥，這區域包括現在的內瓦達 (Nevada) 和烏達。在這區域和在德克薩斯，合衆國總共得到九十一萬八千方哩土地。

它又得到一座寶庫，因為在和約批准以前，黃金已在加利福尼亞諸小山上發現。立刻有一羣找財的人湧來，有些從水路，有些從陸上大路，到深溪峽谷裏，那裏能在水槽和盤子裏淘洗出金塊。各大山充填了轟動的輾鐮；舊金山隔夜功夫便一躍爲一座旺盛的小都會，充滿罪惡，奢侈，和活力；加利福尼亞一轉瞬間從一個西班牙美洲牧人疲倦和浪漫的社會轉變成一個安格魯撒克遜人人擁擠稠密的邦土。這些「舊的日子，黃金的日子，一八四九年的日子」是全美洲歷史中最有聲色的。加利福尼亞成長得這樣快，在一八五〇年它加入聯邦作爲一州。

這些西部廣闊的新地帶的獲得，逼得美國人引起興趣於許多疏忽了的問題——卡利比安海問題，太平洋問題，一條地峽連河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有擴張於整個區域威脅的奴隸制度問題。

## 第十章 區域鬭爭

### 奴隸制度：特別的制度

內戰前六年，敏銳的紐約觀察家奧謨斯特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訪問在密西西必的一家第一流的棉花種植地。他看見一所巨大漂亮的宅邸；差不多一千四百英畝地皮種植棉花，穀類，和其它農作物；還有兩百頭豬。一百三十五名奴隸裏，將近七十名做田地工作，三名手藝匠人，九名房屋或畜圈僕人。他們從早晨勞動到天黑，星期日和有時的星期六休息。在夏天，鋤草的奴隸羣這樣做十六個鐘頭的苦工，只其中午一段短短時間作爲休息。食物的給量是每人每星期一倍克 (Pork) 穀類和四磅豬肉，補充有奴隸們自己所生產的蔬菜、雞蛋、和家禽。每次耶穌誕節，慷慨的配給糖蜜、咖啡、烟葉、和印花布。黑人們從有樹木的沿澤裏找他們自己小房子用的燃料，在星期日他們也可以從那裏砍伐短木料去售賣，拿錢買小用品。一個黑工頭在田地操作者中走來走去，催着他們工作，抽響他的鞭子，有時讓皮條輕輕落在他們肩上。白種監工者告訴奧氏說紀律不壞，雖然他剛把一個想刺殺他的奴隸出賣掉。他說，「他的黑奴不常逃走，因爲他們差不多確信會被捉住。幾時他看見走掉一個，他便把狗放上。」

這是較好一種模範種植地。和其他觀察家一樣，奧氏看見奴隸制更嚴酷更殘忍的種植地；他能看到有些比較寬厚的地方。批評家指摘奴隸制度，因爲過度工作，時常的鞭打，由售賣而致殘忍的家庭分離，拒絕黑人的教育和進步。辯護者稱讚它，因爲它在失業、疾病、老年中保護工作者，因爲它使南方沒有罷工和勞動衝突，因爲它基督教化未開化的民族並逐漸提高他們，因爲（他們說）它使主人豪俠而僕人忠誠。作爲一種經濟制度，奴隸制有攻擊者也有擁護者。奧氏，像北卡羅來納作家，「迫切的危機」(The Impending Crisis) 的著

者海爾撥 (Hinton Rowan Halper) 一樣，認爲它使南方貧困，但許多南方人士以北方的擴大來解釋他們區域的落後。在社會觀點上，北方人士聲言奴隸制度同樣的傷害黑人和白人，但許多南方人士認爲它是控制黑人大衆和維持白種優勢的唯一可實行的方法。

實在，美國人，無論南北，很少真正了解這一面受劇烈攻擊、一面被熱烈辯護的特殊制度的性質的。因爲關於美國奴隸制度最重要的事實是它是個黑種奴隸：在奴隸制上最顯著的特徵，大部分是關係種族，較身分關係爲多。整個制度與其是被計畫爲釐定主奴關係，毋寧是主要的爲釐定黑白關係。黑人的身分雖然被內戰和十三條修正律所完全變更，可是黑白間的經濟和社會關係並沒有大變。助長承認奴隸制爲正當的大部分辯論，將具同等力量 and 關聯、適用於內戰後提出的白種優越權的主義；特殊制度的廢除主義者的批評，大部分都被修飾爲戰後的用途。當新英格蘭人立論說奴隸制度停滯南方的進步，當他們把南方農業、工業、和教育落後的責任放在奴隸制身上，他們實在正談論着廉價且無知識的黑人勞工的存在——一個解放後長久不改的局面。南方人士了解這個，但直覺的大於心理上的；他們未能解釋奴隸制度是種族關係進化上的一個過渡階段。並且因爲北方人士不體會這制度，他們也不明瞭什麼是解放的含義，使他們自己在它們的結果裏注定嚴重的失望。

一八五〇年左右，當美國人口總數超過二千三百萬（十年以後它超過英國的），奴隸的總數是三百二十萬。在南卡羅來納和密西西必，他們數目超過白人；在路易斯安那，他們幾乎與白人相等；在阿拉巴馬，他們大約居人口三分之二。南方有奴隸不到人民的十分之一的廣大區域，遠從馬里蘭到阿拉巴馬的阿帕拉幾山大部分沒有他們。它也有奴隸佔絕大多數的區域。正在查理斯頓以北，他們構成人口百分之八十八，在喬治亞海岸百分之八十，在阿拉巴馬中部將近百分之七十，在沿密西西必河下流一個地帶居百分之九十以上。氣候炎熱和土地平坦肥沃的地方，奴隸人口最大；多山和貧瘠的地方，它最小。南方人士有奴隸的只是少數。一八五〇年大約六百萬的白種人口總數中，戶口調查告訴我們只有三十四萬七千七百二十五位奴隸主人。雖然大部分黑人屬於只有小羣奴隸的主人，在南方下部的棉、糖、米地帶裏，三四千家擁有奴隸的大多數，生活於最好的土地

上，享受收入的四分之三。例如喬治亞的科伯（Howell Cobb），有一千名黑人，種植一萬英畝棉花。政治權力和知識先導相似的集中在一個小的且一般的貴族主義團體裏。

大約從一八三〇年開始，區域的界線在奴隸制問題上不斷的變得強固。廢除主義的和最重要的自由土地的情緒在北方各州變得更有力量。——烈性的卡利孫（William Lloyd Garrison）於一八三一年在波士頓創辦「解放者」（*Liberator*）。但卡氏的重要性被形容過甚；宣傳福音者芬內（C. G. Finney）和煽動家韋爾德（Theodore D. Wald）所領導的一個堅定的俄亥俄團體，和達班（Arthur Tappan）所領導的一個紐約團體，在道運動擔任同等有力的角色。他們是要求根本解放的有能的組織家。虐待只是火上加油。當羅夫爵（Elijah P. Lovejoy）於一八三七年準備抵禦意大利諾阿爾頓（Alton）一羣暴民襲擊他的廢除主義報紙，他被刺殺，改革事業贏得熱情。對公權的干涉使許多有能的人們承認人類自由的主義廣泛的被牽涉了。善辯的波士頓的斐立普斯（Wendell Phillips）被鼓勵參加暴民攻擊卡利孫的運動，上紐約富有的斯密士（Gerrit Smith）對在猶格隆（Utica）舉行的反奴隸制大會攻擊，俄亥俄有能的沙斯（Salmon P. Chase）攻擊他自己州裏的報紙。根本廢除主義者沒有一時博得很大的民衆力量。但主張奴隸制度絕不應再擴張一寸的自由土地人士增加到一個大羣衆。這時在南方的許多領袖們宣稱奴隸制度是個積極的福利。威廉馬麗學院的刁氏（Thomas Dew）刊布一部書辯護它，南卡羅來納的州長哈蒙（Hammond）於一八三五年稱它是「我們共和國建築的奠基石」，卡爾洪指着古代雅典，主張奴隸制度給一個燦爛的文化提供最堅固的基礎。

從一個早期時候起，眼光敏銳的人士看出這種區域爭論危及聯邦。約翰·坤西·亞當斯屢次在衆議院警告南方，說分離會成戰爭，又說「從憲法的戰爭權力伸展到干涉奴隸制度的時候起，你的有奴隸各州立刻成爲國內的、卑鄙的、或對外的戰場。」林肯是要證實那預言。

## 興起的風潮

當德克薩斯問題和墨西哥戰爭確定西南區域的大合併時，奴隸制的爭端進入一個尖銳的狀態。夜裏的火警鐘聲，用哲斐孫的詞句，又預兆的響了。直到一八四四年，奴隸制度只保持它的權利以繼續無擾現狀的存在。它被密蘇里妥協所限制，沒有越過它們。現在當它聲言它的擴展權利，一羣北方人士起來反對。他們深信它若保守在嚴緊的範圍內，它終究會腐敗；他們斷言華盛頓、哲斐孫、和其他共和國開創者抱過這種見解；他們指出一七八七年禁止它擴展入西北的法令是一個約束的先例。德克薩斯已經有奴隸制，它自然以一個奴隸州加入聯邦。但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和烏達沒有。當合衆國準備容納這些區域，一位彭西凡尼亞民主黨人名威爾莫 (David Wilmot) 的，在一件經費議案上附加一件附帶條文，宣稱在任何要從墨西哥取得的區域裏應永遠禁止奴隸制。衆議院通過威爾莫附加條文，參議院駁斥它。

對南方人，使他們用血賺得的區域不開放給他們，這似乎極不公平；對北方人，一羣自由置奴隸產業，如同別一羣置機器產業，一樣不平。對自由土地者，未開墾的區域將開放給一個摧殘自由經營的制度似乎是暴虐的，且違背他們的道德觀念。一個憲法問題和這政治的爭端束縛着。憲法是否允許國會擯除或管制在國家區域內的奴隸制？國會曾經屢次這樣做；但手段是模糊的；卡爾洪和其他南方激烈分子主張奴隸制隨着旗子進入共同領域，不能被拒在外。在一八四八年之役裏，一個有力的自由土地黨第一次出現。它提名范布梭 (Martin Van Buren) 爲總統，並以響亮的語句爲它的黨綱的結語：「我們在我們的旗幟上寫上『自由土地，自由言論，自由勞動，自由人，』在它之下繼續奮鬥，常常奮鬥，到一個得意的勝利酬勞我們的努力爲止。」這黨得到一個驚人的票數。主要的原因爲它的活動，民主黨人被挫敗了，自由黨選出它的最後總統、戰爭英雄泰勒。

在選舉運動的當時和事後，南方下部在屈服於威爾莫附加條文以前，將要脫離，是很明顯的。北方反對奴隸制的人們將絕不肯聽從卡爾洪的要求，奴隸制度進入全部新得地帶，也同樣的明顯。妥協是緊急的需要。一羣穩建派建議密蘇里妥協的三十六度三十分界綫延長到太平洋，以北爲自由州，以南爲奴隸州。另一羣由密

西根的卡斯 (Lewis Cass) 和意大利諸的道格拉斯所領導的穩健派，提議把問題交付「民衆主權」。那意思是，國家政府不應當插手；它應允許殖民者帶或不帶奴隸成羣進入新地帶。到組織那地帶爲州的時候，人民應爲自己決定問題。當一八四九年底國會開會時，南方人公然以退出來相威脅。喬治亞的童勃斯 (Robert Toombs) 恰在一個北方議案時喊道，「如果它要通過，我贊成分離！」

### 一八五〇年的妥協

在這個緊要關頭，克萊第三次以一個製得精細的妥協，遏止住危險的區域鬭爭。他的計畫建議加利福尼亞加入作爲自由州，新墨西哥和烏達組織爲無贊成或反對奴隸制度立法的區域，建立一個更有效的機構使逃亡的奴隸歸還他們的主人，廢除哥倫比亞區的奴隸貿易，和償還德克薩斯一些土地以補它割讓與新墨西哥的損失。這些建議大部分來源於道格拉斯，但克萊把它們銜接在一起，他的支持是必需的。他在各區域的聲名，他的善辯，他的深切的熱心，和他的有禮且動人的人品的影響，被需要使他的建議得到勝利。

錘鍊一八五〇年妥協成爲最後形式的辯論，在美國史上是最精彩的。那時參議院有三位議會的大人物，都是行將就木的——克萊、韋伯斯特、卡爾洪。它有一羣年事較輕的高才人物——道格拉斯、戴維斯、秀阿德 (William H. Seward)，和沙斯。這些人裏，卡爾洪和戴維斯反對妥協。認爲對南方不公平。前者寫有一篇動人的辯論，聲言南方的損害應予補救以免悲慘的衝突發生。他說維繫南北在一塊兒的繩索，一根一根的在斷。美以美會和浸禮會已經分裂成兩部分。「如果騷擾繼續下去，同樣的力量，具有增加的強度在進行，結果將折斷每根繩索，那時除却武力，沒有什麼再能把各州維持在一起。」他太衰老了，不能自己讀這篇演說，蹣跚的走進參議會，聽着一位維基尼亞同事替他宣讀。秀阿德和沙斯反對妥協，認爲對北方不公平。但克萊大大得到韋伯斯特擁護。在三月七號一篇有力的演說——他生平最後的大演說裏，韋比「不以馬薩邱塞人的立場，不以北方人的立場，而以一個美國人的立場，」爲統一辯護。他宣稱和平的分離是不可能的。他的擁護妥協激怒新



英格蘭的極端反奴隸制的人們，且需要大勇氣；但這是一個有政治家風度的舉動——他對國家最後的大貢獻。結果，克萊、道格拉斯、和韋伯斯特的穩健精神得勝。妥協政策被通過，全國呼吸了真心救濟的一口長歎。泰樂或許不裁可這些法案，但他已在初夏逝世，他的繼任者麥爾摩 (Millard Fillmore) 高興的簽准它們。

在短短三年之久，這妥協似乎把一切異議差不多全部解決。自由民主兩黨的大多數都親切的擁護它。但在表面之下，緊張依舊存在而且繼續增長。新的逃亡奴隸法深深觸怒許多北方人士。他們拒絕參與捕捉奴隸；相反的，他們幫助逃奴逃走，「地下鐵路」成爲更有效且不羞怯的。有些奴隸從沿海區域趁船逃亡。有些在夜間看着北極星走，從他們的種植地到俄亥俄河，再被引導進加拿大。有些沿着阿帕拉契山進入彭西凡尼亞。北方各州爲逃亡者的隱匿所在，好像蜂窩般多，像所謂「地下鐵路」的首腦科芬 (Lyri Coffin)，幫忙過幾十人達到安全。一八五〇年，約有二萬居住於北方社會的逃亡奴隸不免捕獲，但捉拿他們的努力常常惹起暴動。

斯陀維 (Harriet Beecher Stowe) 被逃亡奴隸法所感動，寫「黑奴顛大錄」 (Uncle Tom's Cabin)。這作品成書於一八五二年，描寫一幅奴隸制度的黑暗畫面，這樣生動，引起全南北部深切的情緒。斯夫人會住居在新新那提邊城，訪問過肯特種植者的人家。她對許多人道的大度的擁有奴隸者完全公平相看；她的一個暴戾的驅遣奴隸者，勒格利 (Simon Legree)，是原籍新英格蘭人。但她指示殘忍和奴隸制如何分不開，自由社會和奴隸社會如何根本不能調和。她的書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英帝國銷售一百萬部以上，被改作成劇本時，驚動極大的觀衆。北方新起來的一代的投票者大被這作品所激動。

後來在一八五四年，各區域裏奴隸制的舊爭端重新決裂；當鬭爭更成深刻，兩區都有新的領袖參加進去指揮。激烈的南方人士決定脫離密蘇里妥協，封閉整個密西西必上流於奴隸制度。當他們採取步驟完成這制度，北方像一個憤怒的巨人跳起來了。

密蘇里河以外的地方，現在包括肥沃的干薩斯 (Kansas) 和內布拉斯加 (Nebraska) 兩州，早已吸引殖民者。如果印第安人遷走，穩定的政府樹立，它有迅速發展的希望。「美洲大沙漠」在這區域內的舊觀念已被探

險家佛瑞蒙 (John B. Frémont) 等所攻破；許多北方人士深信這地帶若組織爲一個區域，殖民會蜂湧而來，能造一條鐵路從芝加哥穿過它以太平洋。這將佔有南方從新奧爾良向西築鐵路計畫的先着。人們要求及早的着手，因爲南方路線通過殖民已定的德克薩斯和新墨西哥區域，它不致受印第安襲擊，并且鐵路建造家可以取得租讓的公地。沒有人比道格拉斯更渴望清除北方路線者；道氏住居芝加哥，是一位活動的不動產投機家，並且是參議院區域委員會主席。但他遇到嚴正的反對。在密蘇里妥協之下，這全區被封閉於奴隸制，而密蘇里反對讓緊接它西邊的干薩斯成爲一個自由區域。它會使密蘇里奴隸太容易逃亡到這自由區裏去。而且密蘇里那時將有三個自由鄰居，並且向一位已經強大的運動屈服，自己也許不久成爲一個自由州。有一時期，在華府的密蘇里人，有南方人做後盾，杜絕一切組織這地帶的努力。

參議員道格拉斯後來在一八五四年以一件議案割開反對的意見，激怒起一切自由土地的人士。這是他所喜好的「民衆主權」主義的一個應用。在它的最終的形式裏，它宣稱密蘇里妥協已經被一八五〇年的妥協條款所替代，讓烏達和墨西哥自由決定它們自己的奴隸制問題；它組織成兩個區域，干薩斯和內布拉斯加，准許殖民帶進奴隸；它授權居民決定他們該加以自由或奴隸加入聯邦。道氏的動機無疑問是混合的。他被譴責諂媚南方以便贏得一八五六年的總統位置，他的政治野心無問題是強大的。他的民主黨同僚主要的是南方人；他娶有一位南方女子；他不厭憎奴隸制或反對它的擴展。他的主要目的是加速發展他認爲氣候無論如何，不適宜於奴隸制的地帶。

但他如果相信北方的意見將馴服的接受他的計畫，他已經很快的醒悟了。開放這些富庶的西部草原給奴隸制感動得幾百萬人不能忘記。憤激的辯論著明干薩斯、內布拉斯加議案的進行。自由土地派報紙猛烈痛斥它。北方宣教師從成千直解的講壇攻擊它。這時對南方有好感的實業家立刻翻轉過臉。大家集會舉行於北方各主要城市，攻擊道氏和他的政策。他自己認罪，說能從華府到芝加哥由於知道人們要焚燒他的塑像。三月的一個早晨，那議案在南方熱心家的噓聲中通過於參議院。當沙斯走下議事堂台階時，他告訴馬薩邱塞的薩謨訥

(Charles Sumner)：「他們慶祝一個現在的勝利，但他們喚起的迴聲將永不停止，直到奴隸制本身將要滅亡。」當道格拉斯訪問芝加哥演說爲自己辯護時，港裏的船業下半旗，禮拜堂鳴鐘一小時，一個一萬人的羣衆大聲叫罵歎氣，直到他盡力使人們聽見他的話，至於力竭聲嘶，最後他掏出他的錶，據有些旁聽者說，他喊道：「現不是星期上午；我要上禮拜堂，你們可以進地獄！」

道氏惡運的政策的直接結果是最重大的。對奴隸制擴張入各區域的問題取觀望態度的自由黨，沈淪以至於滅亡；替代着它，起來一個有力的新組織——共和黨。理想主義的，充滿熱誠，吸引有思想和魄力的青年，同樣取決於東部的實業和西部的農民，它開始時是不可輕視的。它的初步要求是一切區域應消除奴隸制。一八五六年，它提名以五次探險遠征遠西、博得相當聲名的勇敢的佛瑞蒙，並且掃蕩北方的大部分；它假使於十月選舉在彭西凡尼亞贏得的勝利，它甚至會勝過共和黨候選人布卡南 (James Buchanan)。自由土地派領袖如秀阿德和沙斯比從前升到更大的影響，隨着他們出現有一位在討論新爭端上表現偉大的邏輯力量的，高瘦的意大利辯護士——林肯。

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六號林肯在皮奧里亞 (Peoria) 發表的演說是自由土地原則上向來所未有的最好敘述。他說他不想干涉奴隸制固有的地位。「假使給我一切現世的權力，我將不知道做什麼，像對現行的制度。」他宣稱國會對廢止密蘇里妥協——一個區域的契約，比廢止反對從非洲輸入奴隸的法律，並無更大的道德權利。他主張一切國家立法應當適合於共和國諸創造者所採取的原則，奴隸制是個應受限制且最終應予廢除的一個制度。他辯說民衆主權原則是虛偽的，因爲西部的奴隸制不只關係那裏的居民，而是關係整個合衆國。「內布拉斯加的三十一位公民說第三十二位不應該有奴隸，比三十一州的人民說奴隸制不應該入第三十二州，有什麼更好的道德權利？」

南方擁有奴隸者和北方反奴隸制的人們流入干薩斯，產生尖銳的衝突，和野蠻的遊擊戰穿插。兩方都用方法派遣殖民佔領地方，北方的移民援助會尤其努力。他們武裝得很良好而去。得民心的布魯克梭 (Brooklyn)

宣教師皮舍爾 (Henry Ward Beecher)，參加一位教會執事爲一羣人取武器而召集的集會，宣稱一支蕭普 (Sharpe) 的來福槍比聖經是更大的道德作動力；從這觀察產生一個通行的詞語「皮舍爾的聖經」。北方佔到優勢，不久便已明顯。密西西必上流大量自由土地派人口的接近，把奴隸輸入一個不久將要自由的地帶的危險，幫助着它。許多邊地流氓從密蘇里渡河去非法投票或恫喝北方居民，而佔有奴隸的團體有在華府的布卡南政府支持它們。因此這衝突拖延下去，喚起全國的始終嚴烈的感覺。當旨進的布卡南準備勸誘參眾兩院民主黨佔上風的國會，允許千薩斯在公認奴隸制的勒康普頓 (Leecompton) 憲法下加入聯邦，一陣新風潮掃過北方，這格拉斯本人憤慨的和總統決裂。

這時，許多北方人，認爲南方已經破壞一八五〇年妥協中所造成的契約，拒絕執行契約一部分的逃亡奴隸條例。爲逃脫黑人的暴徒干涉成爲常事。北方許多州通過「個人自由法」，公然廢止聯邦法令。當奴隸朋斯 (Anthony Burns) 被捕獲於波士頓，有些波城最知名的領袖忙着出來替他辯護。憤怒的人民從東馬薩邱塞蜂湧而來，示威的羣衆充塞街道，這需要城市警察、州國民兵、國家陸海軍的聯合武力來把一個可憐的黑人拖回奴隸制裏。

### 陷入戰爭

一年復一年，國家走近戰爭。一面大鼓似乎一下一下打出衝突的進行。一八五六年一位暴躁的國會南卡羅來納議員布魯克斯 (Preston Brooks) 在參議院席上攻擊馬薩邱塞的薩謨訥，用杖把薩氏打得很重，薩氏病了好幾年。激怒的原因，薩氏的一篇粗鄙無禮的演說很大，但這舉動是不可迴護的。早在一八五七年，大法官丹尼 (Taney) 和最高法院的許多數在各脫 (Dred Scott) 案中宣告國會無權把奴隸制擴充出區域之外。這是個論證得不良的場解釋。自由土地派報紙和政治家空前劇烈的攻擊法院，聲言他們要看着它在合適的時間裏改正這種錯誤的結構。詩人記者布賴安寫道，「這種決定此後如果代表法律，奴隸州的人們至今所稱的奴隸制度，將

不是他們特有的而是一個聯邦的制度，一切各州的共同遺產和恥辱，屬於誇張自由頭銜的各州也屬於接受「束縛地」這污名的各州；此後，我們的司法權伸展到那裏，它帶着鎖鏈和鞭子同去——我們的旗子飄到那裏，那就是奴隸制的旗子。如果這樣，星光和紅條子應該從旗上抹去；它該染成黑的，它的紋章應該是鞭子和腳鐐。我們是要沒有問題的接受這些新的憲法讀法嗎……？絕對不！絕對不！

一八五八年林肯和道格拉斯在意大利諾作過連續的重大辯論，兩人都要在參議院找座位。這些辯論外形上沒有威嚴。道氏，一位肥矮大頭的人，林氏，一位不雅觀的瘦長漢子，他的醜陋的相貌上戴有一堆粗黑頭髮，表現出一個格外顯著的對比。但在英語中沒有比上他們所作辯論更敏捷，更明白，更具撒克遜力量的。他們盡很大力量喚醒國家注意政治爭點的意義。而且林氏繼續逼得道氏再三着重申說他的信念，認為司各脫決定並未必然推翻在區域內的民衆主權的原則。實在，最高法院認為國會或區域立法機構都不能干涉那裏的奴隸制。但道氏解釋，在敵對的社會裏，奴隸制不能生存，除非有積極的警察章程保護着；一個社會能以僅僅拒絕通過這樣的法律把奴隸制摧殘且毀滅掉。當南方人聽到這大膽的直言，許多人宣讀道氏名字出於民主黨以左袒布卡南。他贏得參議員一席，但這年以後林氏是個國家人物。

接着在一八五九年，發生布朗 (John Brown) 襲擊哈柏斯渡口 (Harpers Ferry)，一小羣希望解放並武裝奴隸的人狂熱的侵入維基尼亞。這空幻且犯罪的冒險事業完全失敗。南方正被這襲擊所激怒。但當布朗和六名黨羽被絞死，許多北方人尊崇這老廢除主義者，把他坐上殉身自由者的位子。兩年之內，兵士於「布朗團」 (John Brown's Body) 的歌聲中開進戰場。

把這些事弄到無可挽救的嚴重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南北兩方現在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已成很不相同的區域。南方幾乎是整個農村的，只有一座重要城市，新奧爾良。北方大部分已經城市化，紐約快近一百萬的人口。南方製造業很少，雖然有一些企業，像士蒙的特勒德格 (Tredgar) 鐵工廠繁盛了；它的紡織廠實際上出貨比馬薩邱塞的羅維爾 (Lovell) 一鎮還少。另一方面，北方現在充滿旺盛的工業建設，出產鐵、紡織物、

鞋子、鐘表、農具、和其它上千種大規模的生產品，造船、包裝肉類、磨粉，並在機械技術上進步極快。所有歐洲移民的大川流（一八五〇至六〇年十年間有二百四十五萬二千人），差不多都住在北部和西部，愛爾蘭人住居在城市裏，許多日耳曼人和斯干的那維亞人到農田上去，英國人散在各處。這區域裏已經有勞動管理和貧民窟的兩個痛苦問題。南方雖歡迎移民進去，但去的很少，因為移民無心和黑人奴隸競爭。鐵路建造，北方比南方遠是發達。三條幹綫從東部經過或繞着阿帕拉幾山脈敷設了——意大利綫，從紐約到布法羅區，完成於一八五一年；彭西凡尼亞綫，從費城到皮芝堡，完成於一八五二年；巴爾的摩與俄亥俄綫，從巴城到惠林，完成於一八五三年。西部路綫最大的是意大利諾中央綫，受一起二百六十萬英畝的租讓土地的大補助，把從芝加哥和海灣連接起來。一八五〇至六〇年所造的二萬哩鐵路，大都在北方。

北方人士信仰保護關稅的人數在增加，農村的南方，需要便宜的製造品，憎恨關稅。北方有興趣於公地更快的分配給小業主一個對無代價發給居民宅地的有力要求興起了：「爲你們自己一塊田地投票！」成爲一個民衆呼聲。南方希望着國家領地被保持並只賣好價錢。西北部需要內部改良——南方對這漠不關心。北方需要一個有效的國家銀行制度；積儲極少資本的南方，仇視集中化的銀行事業。在社會上，北方大城市裏雖是貧富走向極端，但比掌握大部分財富和勢力、擁有奴隸的寡頭政治的南方要民主些。

可是這些差異，雖是重要，若非恐怖和偏見放大它們，奸雄冒用它們，它們不致把各區域分裂。南方敏捷的注意到一個幾乎不能解決的種族問題在奴隸制問題下的事實。像哲斐孫所說，它抓住狼的耳朵，既不能抓住它，也不能放它走。廢除主義的激動醞釀成一種恐怖，覺得北方將攻擊已經存在的奴隸制，分裂南方有歷史性的勞動制度，和以種族制種族使它們同趨滅亡。北方的評論實在大多屬於自私偽善的，非建設的且煽動的一種。另一方面，甚至有理性的北方人像林肯，恐怕極端的南方人將準備把奴隸制傳播於全國。他們又恐怕南方下部將企圖重開奴隸貿易，像有些南方領袖所主張；在企圖擴張它的制度，它將引導國家進入征服古巴、或墨西哥、或中美洲的戰爭。一八五四年的俄斯坦特（Ostend）宣言，一個贊成皮爾斯（Pierce）總統所派往英、

法、西班牙三國的三位民主黨公使所簽訂合併古巴的陳述書，引起南方帝國主義的不信任。這樣便有不顧危險的傑爾克 (William Walker) 在中美洲剽掠的遠征。

許多北方記者、宣教師、和政論家很誇大奴隸制的罪惡和奴隸主人的用心。許多南方激烈分子很誇大工業社會的罪惡和自由土地者的目標。一位聰明的紐約領袖說，如果能把雙方最壞的煽動者裝在一輛大車裏，投入波陀麥克河底，區域和平可以保全；但這是個太樂觀的見解。其他人們將很快的佔有他們的地位。

### 林肯的當選：分離

催促南方分離的一八六〇年共和黨的勝利，是由民主黨的一個分裂使其可能。在這分裂的背後存有一件美國政治史上最戲劇性的故事。

多少年來，一個在增加的南方極端派團體要求國會通過法律保護屬地裏的奴隸制。當道格拉斯宣稱：給奴隸制自由輸入各屬地的司各脫決定能被敵對的地方法律使它失去意義時，請這種保護的要求加倍了。呼出這要求者有密西西必的戴維斯，阿拉巴馬的楊息 (William L. Yancey)，和喬治亞的童勃斯，三位棉花王國的議員。在參議院裏，密西西必的布朗 (Albert G. Brown) 反復申述這要求，轉向道氏，提出發問道，「假使屬地立法機構拒絕這樣做，你將這樣做嗎？假使它通過與奴隸制對立的法律，你將廢止它們，以贊成奴隸制的法律來替代它們嗎？」他說南方召集行動——「積極的，不適當的行動。」其他南方人士起來擁護他。

但道氏並不被威嚇。他聲言布朗的要求是對屬地裏民衆權利的一個侵害。在美國史上國會從來沒有為任何屬地通過一種刑律或保護一個屬地裏財產的法律。從一七八九年以來，國會已經把這些事讓給屬地立法機構。現在為什麼要破壞它的健全的成規？民主黨多少年來就聲言它擁護國會不干涉屬地的事。現在為什麼拋棄那健全的主義？道氏斷言，「你們倘使排斥不干涉主義，並用國會法令作一個奴隸法律，而一個屬地的人民拒絕它，你們必須走出民主黨講臺。……南方諸位先生，我完全坦白的告訴你們，我不信一位民主黨候選人能在講

壇上得到北方任何民主黨一州的擁護，說聯邦政府的天職是迫着一個不要奴隸制的屬地人民要它。」戴維斯接着說國會必須擁護美國公民的權利，又說當一個屬地立法機構沒有執行它保護財產的應當職分時，國會必須做。道氏叫道完全不是。假使俄勒岡不制定法令以鼓勵騾子，我決不在華府通過一個法律以騾子強迫給他們；假使俄勒岡不鼓勵長角牛，我決不以牛強迫給他們；假使俄勒岡不接受奴隸，我決不以奴隸強迫給他們。

這是民主黨集會於一八六〇年破裂在上面的石頭，這和道格拉斯與擁護布卡南政府者間的決鬪。代表們集合於查理斯頓，侵略性的奴隸制情緒的中心——卡爾洪、海因、芮特（R. B. Rhett）、和他的激烈的水星報（Mercury）的城市。他們集合來繼續現在參議院熾熱兩年的道氏戴氏間的爭鬪。如果道氏得勝，民主黨能繼續為一個真正的國家組織，在北部西部和在南部一樣的強有力。如果戴氏在他強迫不願意的社會助長奴隸制的壇上奴勝，民主主義將成爲一個區域的政黨，只在南方有力量。有一時期，似乎一位妥協的候選人將被擁上一座無所可否的講壇。但這些南方極端主義者如戴維斯、楊息、芮特、童勃斯、和路易西安那的班哲明（Judah P. Benjamin）都守着一個政黨政治或政黨毀滅的政策。

當極端派準備把他們的要求強加入講壇，道氏的發言人俄亥俄浦氏（Pugh）喊道，「南方諸位先生，你親會我們——你誤會我們——我們決定不做這。」大多數代表堅決反對戴維斯楊息主義。因此阿拉巴馬代表團起來抗議，退出會堂。南卡羅來納代表團接着退出；其它從南方下部來的就成行列。政黨完全分裂，查理斯頓集會沒有提出候選人便行休會。它的兩派不久組織成分別的集會，南方激烈分子提名肯特基的布勒根立治（John C. Breckinridge），他們的反對派提名道氏。這分裂的重要性比當時許多人覺察到的要大。不只民主黨肯定了他們的失敗。一個結合南北於一起的大盟約已經分開了。

共和黨以完善的團結參加競選。在一個在芝加哥的熱烈集會裏，它推定它的最得人心的中央西部人物，林肯；他的失望的政敵秀阿德和沙斯做先驅，忠實的集合於沿路演說家背後。政黨意氣被激到達頂。點一個堅強的決定，一種宗教的熱誠，給宣告過不願聽任奴隸制再傳播的數百萬投票人一個鼓舞。這黨在得到資本主義團



有力的援助上也是成功的，它比四年以前得到的錢多得多。一八五七年簡短不幸的恐慌刺戟工業社會要求保護關稅；它增加商業和財政社會對一個較好的銀行制度的要求。共和黨應允滿足這些愛慕的念頭。同時它向渴望土地的北方人提出保證，它將制定法律，無代價以宅地給予居民。簡單的說，它在經濟上向美國重要的羣衆提供有力的引力。在共和黨失敗於一八五六年的彭西凡尼亞，關稅的政綱條目大有助於達到勝利。在舊的西北部，內政改善計畫贏得幾千票。在西部中央地帶，宅地計畫同等的有了效力。

在選舉日，林肯得到一、八六六、四五二票，道格拉斯得到一、三七五、一五七，布勒根立治八四七、九五三，主張區域調和的田納西的柏爾 (John Bell) 五九〇、六三一。林肯有民衆票的少數，但在選舉團中得到一個絕大多數。民衆投票，沒有問題的是爲了統一和平。分離主義的唯一候選人布勒根立治所得票不到總票數五分之一。

可是極端分子在南方取得控制權。統一主義者喬治亞的斯蒂芬斯 (Alexander H. Stephens) 寫道，「人民瘋狂了。他們是帶着熱情和癲狂的紛亂了。」南卡羅來納已經決定分離。爲什麼？南方和奴隸制都未在任何真正危險中，似乎是真確的。在他的差不多整個第一屆任期中，林肯（假使南方各州仍舊在聯邦裏）將在國會面對着一個敵對的多數；最高法院也被南方人所控制；他的兩手要被束縛。關於那事，林肯最明顯的否認有任何干涉當時奴隸制的意思。在南方的奴隸制不能被廢除，除非用憲法的訂正；那時幾十年後都不可能的。但辦法被應用——雖然它的後果是確定的。斯蒂芬斯預言道，「人們立刻將互相割頸子了。」

辦法是被應用，但沒有結局的形迹可以看出它被南卡羅來納以外人民的多數所擁護。統一的情緒在整個南方都強烈——甚至於在南卡州——和平的情緒也是如此。在一八六〇年的選舉中，十四奴隸的州投票人投道格拉斯和柏爾兩位妥協候選人，比投極端分子布勒根立治多十二萬四千票。仔細分析南方幾州的投票，提示我們，假使分離的爭端被交付與一個公平公開的複決，它會失敗。甚至在分離和戰爭爆發之後，南方仍然有有力的團體，痛恨南方聯邦國。西維基尼亞脫離聯邦；徵兵不能實行於西部北卡羅來納；傳說田納西東部有幾郡貢獻它

們的人口做義勇軍，參加聯邦軍隊，比北方任何各郡比例都高。可是我們該記得，革命常是有決心的少數人的工作，分離在一八六〇年確是得到廣大的民衆擁護，像一七七六年反抗喬治三世統治的革命一般。

南方的下部被多種動機所激動：北方的仇恨，對選舉失敗的不平，不願意接受對屬地的判決，夢想在自己旗幟下的更光明的更好的日子。南卡羅來納於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做先導，宣言北方選出一個「意見和目的都反對奴隸制」的人作爲總統。密西西必跟着南卡州，斷言北方人民「已對南方各州取革命的地位。」但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南方極端分子看出現在是機會或永不再有機會。廢除已經被賈克遜總統所印定。由單獨一州的分離是不可能。關於南方，北方不斷成長得更有力。假使這危機被放過，不企圖建立南方的獨立，不會有這樣機會再來。一個南方的聯邦國可能在世界的國家中佔一個強大的位置，不久能向南擴張，圍繞卡利比安海。早在二月，七個分離州的代表集會於阿拉巴馬的蒙哥美利 (Montgomery)，組織美利堅聯邦同盟國，選舉戴維斯做它的臨時大總統。

南方上部其它四個勉強的州，忠實於它們的區域，不久也隨從分離。最後一分鐘的金圖也已用於謀妥協。但這些嘗試中最有希望的，克利騰登 (John J. Crittenden) 回到三十六度三十分的密蘇里綫的計畫，失敗於共和黨拒絕讓奴隸制進入任何屬地之上。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早晨，南方的砲在查理斯頓港薩謨特 (Sumter) 要塞開火。

## 第十一章 兄弟戰爭

## 人力與資源

錫爾曼將軍於一八六四年六月三十號寫給他的兄弟的信上說：「這夠使全世界起來看現在漸傳到海外的、可怕的死亡和毀壞的數目。過去兩個月內，這種事天天在進行；我看不出減輕的樣子，直到雙方軍隊的一方或兩方毀滅為止。……我開始把一兩千人的死傷當做小事，一種早晨衝鋒——我們變得這樣無情，也許是好事。」他又寫道，「最凶的戰事還沒有開始。」那句話是給喬治亞寫實，他正要蹂躪喬州的田園城鎮，遠遠的從山地到海邊，毀壞成一大片。那句話也是給維基尼亞寫實。這幾乎是實在的，因為格蘭特與利將軍的軍隊，他們最劇烈的戰爭正就緒。可是全國在無憂慮的氣概中開始這衝突，北方人喊着「打到里士蒙去！」南方人自負他們的豪俠的優越性在新英格蘭「廢物」之上，雙方都夢想着戰爭短期可了且光榮屬於自己。

薩謨特要塞衝突的震動立刻使北方團結，也使南方團結。一股暴怒的浪潮把維基尼亞從聯邦扯開，把它加入南方聯邦同盟；這舊領域給南方一個首都，因為戴維斯和他的政府遲至一八六一年六月到達里士蒙；又給南方一位最有才能的領袖，因為利氏 (Robert E. Lee)，墨西哥戰爭中塞洛哥爾多 (Cerro Gordo) 和察普特北克 (Chapultepec) 兩役的英雄，前任西尖軍校監督，德克薩斯部指揮官，認為他的州的號令比國家的號令強大。田納西倒入南方聯邦同盟的名簿。在北方，上密西西必流域，宣稱它和海灣之間將永不一條「海關綫」，採取一個和聯邦相同的熱烈主張。遙遠的加利福尼亞也是如此。南北接界的各州馬里蘭、肯特基、和密蘇里猶豫起來，因為它們情緒劇烈的分歧。有幾天，分離主義者控制巴爾的摩爾，有一時，他們似乎要爭制聖路易。但結果凱氏 (Francis Scott Key)、克萊、和本頓 (Thomas Hart Benton) 的三州都守着舊的忠誠。南北兩方政黨

界綫暫時消失。當林肯走上致他的就任第一次演說時，道格拉斯象徵的握着新總統的帽子；斯蒂芬斯，一位終身統一主義者，成爲南方聯邦同盟的副總統。

各方有若干優勢，北方在人口上，工業資源上，和財產上，遠較強大。一八六〇年的人口調查顯示星條旗下的二十三州（不久從維基尼亞忠誠各郡組織出來的西維基尼亞，或不久加入聯邦的干薩斯，都未計算在內）大約有二千二百萬人，對抗南方星條旗下的十一州和剛超過九百萬的人民。南方的人口包括有三百五十萬以上黑人。北方鐵道系統大約含有二萬二千哩，南方只有九千。北方在它的工業發展上握有極大利益，因爲單單紐約一處，在一八六〇年所生產的製造品，價值等於全南方聯邦同盟所產的兩倍以上，費城所產的將近全南方所產的兩倍。在戰爭的最後三年，北方差不多製造它自己的全部軍用品，而南方要依賴外國的礮，藥品和醫藥設備，並相當範圍的外國軍火。北方控制着海軍和海洋。它有更可應用和多樣的經濟。它有到葛的斯堡（Gettysburg）衰退而後重新迅速增漲的外來移民，給與它力量。南方在它的便利內，有它的人民的尙武精神，許多要塞和兵工廠的容易佔奪，它的農業的優越效力和組織，它在防禦方面作戰的事實，和它的軍隊在內圍綫作戰的能力。最重要的，它在它的便利內，事實它不須在軍事觀點上打勝這仗——不須侵入並征服北方，以達到成功。它所需要做的，只是久戰苦戰，足夠使北方相信它本身是不可克服的。吃敗仗甚至吃大敗仗，它能擔當得起；連打敗仗，它能擔當得起。假使它能使北方的意見覺得統一聯邦的勝利要費太大代價，而讓迷途的姊妹州們分離更好，那南方聯邦同盟便能獲勝了。

許多人深信南方在控制着世界主要棉花供給上也佔個大便宜——就是需要這棉花來維持它的工廠工作的英國，會幫助南方出面干涉。時間很快的顯示這是個錯誤估計，英國需要北方小麥不在南方棉花之下。卓絕的挑釁鼓勵起甚至不幸的南方，但有北方的決心和它相對敵。南方的將領大都比北方的敏捷有能；但林肯總統顯然是位偉大政治家，戴維斯遠非其比，戴氏有才智上的特質、威嚴、和嚴肅的熱誠，但缺乏大度，並且有時讓感情、急性、和個人偏見歪曲他的判斷。從全體上說，北方容易是較強的；南方的大希望在征服這樣大一塊地

域，一個這樣大且難調和像它自己的人口的困難。

那些深信戰爭短期可了的北方人受到牛奔 (Ball Run) 一役的教訓。約三萬人的一支軍隊，匆忙的在華麻糾合成隊伍，被遣上戰場，對抗大約同等人數的伏在北維基尼亞牛奔深谷後的南方同盟軍。北方部隊在七月十六號衝過南軍中心，只遇從生力南軍右翼來的一個痛擊。除却正規軍，都倉皇驚潰，奔竄回華府，路上填塞了人、轍、遺棄的行李、和來想看一種郊遊勝利的國會議員。其它北方的敗仗接着見於密蘇里，和波陀麥克河上的波爾崖 (Ball's Bluff)，後來最高法院的何謨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在那裏受傷。雙方都準備作一個拼命的鬪爭。

結果戰爭拖延四年以上，打得南方陷於完全精疲力竭才結束。它的金錢耗費，財產損失，生命死亡，令人駭怕。北方估計徵集共約二百萬人，當停戰時，大約有一百萬人在戰場上。南方估計徵集七十萬至一百萬人；沒有人會曉得確實數目。北方方面死於戰場上，因傷或病的，大約三十六萬人；南方方面死亡數目計有二十五萬八千。南方大部分化為焦土。辛南多阿流域從這頭到那頭都荒蕪了；錫爾曼在喬治亞毀壞值五十萬的公共建築和值幾萬萬的私人財產；城市如哥倫比亞、里士蒙、和亞特蘭大 (Atlanta)，都被火燒燬；鐵路工廠被毀碎，它的舊日勞動制度毀壞，它的物質財產破碎，南方經濟上是疲乏了。戰爭的傷痕還可見於那區域裏。當戰爭結束時，北方雖然享受着工業的大勃興，可是它所遭的損害也比它當初所想到的要多。

### 各次戰役

四個主要戰綫或戰場可以區別出來：海上、密西西必流域、維基尼亞和東部沿海諸州，與外交戰綫。第一個可以簡略的刪去。當衝突初起時，全部四十艘船的海軍事實上在北方聯邦手裏，但是分散腐敗。一位在華府的主腦衛爾斯 (Gideon Welles)，以他無價的戰事日記最負盛名，很快的改組並加強它。林肯宣告封鎖南方海岸，這在起初雖是極度薄弱，可是到一八六三年左右，成為十分有效。它阻止棉花輸往歐洲，和南方強烈需要

的軍需品、布匹、與醫藥材料的輸入。這時一位顯赫的海軍指揮官法勒格特 (David G. Farragut) 已經出現，並指揮兩陣有名的仗。在一仗裏，他率領一隊木質小軍艦進入密西西必河口，駛過兩處強大要塞，迫着南方最大最富的城市新奧爾良投降。在另一仗裏，他強闖一條路經過摩比爾灣 (Mobile Bay) 的要塞口，奪得一艘鐵甲船，並封鎖這港口。鐵甲船現在開始替代木船。戰事中令人着急的一時期是一八六二年三月，那時南方的新鐵甲船美利麥克號 (Merrimac)，從維基尼亞的諾福克出發，在詹姆士河口的漢普頓停船所毀壞兩艘北方巡洋艦，並且似乎準備襲擊華府或紐約。微幸有一隻樣式奇特的北方裝甲船，「木筏上的乾酪盒子」，蒙尼特號 (Monitor)，築成於紐約，匆忙南駛，恰在緊急時候出現，襲擊那戰士，阻擋住它的前途。當一艘英國建造的漫遊的南方巡洋艦阿拉巴馬號，被契爾薩基號 (Kearsarge) 擊沉於瑟堡 (Cherbourg) 港外，北方海軍贏了另一大勝仗。海軍在封鎖南方，幫助攻取重要海岸據點，和擊沉或捕獲南方商業驅逐艦上，都盡力得宜。

在密西西必流域，北方聯邦軍幾乎不斷的打一串勝仗。格蘭特，一位性情固執的意大利諾人，不富於想像力，但清楚熟悉戰略的主要原則，被任指揮強有力的西部部隊。他開始以攻陷田納西和昆布蘭河上的亨利和多納爾孫 (Donelson) 兩要塞，切斷在田納西的一條南方長綫，這樣可能佔領這州西部的大部分。南部不得不放棄重要的那士維爾城，北軍能夠進駐到田納西的南界——那就是進入南方的中心約二百哩。這裏南軍集中於約翰斯頓 (Albert Sydney Johnston) 和勇敢的波勃卡德 (P. G. T. Beauregard) 率領之下。一八六二年四月，他們猛攻格蘭特，幾乎打潰他。他們以迅速的襲擊，趁他的軍隊在田納西河上皮芝堡埠頭 (Pittsburg Landing) 還未準備好，它的背後是高漲的河水，前面沒有寨壘，擊中了它。突然的進擊幾乎壓倒北軍。但格蘭特恰巧及時得到救援，南軍却喪失他們顯赫的約翰斯頓將軍。結果是南軍退至密西西必的科林斯 (Corinth)。雙方在石樂 (Shiloh) 一戰中都死傷慘重——北軍六萬三千人中損失一萬三千；但林肯提到格蘭特，說「我不能避免這人——他打仗。」

一八六三年春天，格蘭特的頑梗的部隊，不屈不撓的但慢慢的向南推進。他們的大目標是取得密西西必

的完全控制，那河下游領域的南軍，在法勒格特佔領新奧爾良以後，已被肅清。格蘭特一度被困於維克斯堡 (Vicksburg)，那裏南軍在峭壁上堅固的設防，岸壁太高，爲海軍攻擊所不及。但格氏以勇敢的行動，率領他的在下面的軍隊包圍維克斯堡，指揮六個星期的圍攻，於七月四號攻陷這城，並俘獲在西南部的南方最強軍隊。如林肯所指出，現在這條水道之父（密西西必河）重新暢流入海了。南方同盟分成兩截，它幾乎不能從富庶的德克薩斯和阿干薩斯地方運輸物品東渡這河。

但在維基尼亞，北軍這時接二連三進到敗仗。從華府到南方作爲首都的里士蒙，其間距離只有一百哩，但這地方水道交互，供給堅固的防禦地點。而且南方有兩位將軍，羅伯·利 (Robert E. Lee) 和「石牆」賈克森 (Thomas J. [Stonewall] Jackson)，在顯赫的領袖之才上，遠過初期的北方將領。詳細描寫各次聯邦軍備攻取里士蒙和毀滅南軍而被打退回的血戰，勢不可能。早在一八六二年，麥克勒蘭 (George B. McClellan) 調動一支十萬人的精兵從海道往約克和詹姆士兩河間的半島上，進攻利氏的遠較薄弱的軍隊，在里士蒙前打了七天殊死戰。他的部隊一度能聽見南方首都禮拜堂頂上時鐘的響聲，但它們最後退却，損失奇重。盲進的樸普 (John Pope) 挫敗於第二次牛奔之戰，被逐回華府，北方擔憂着它本身的安全。另一位北方將領企圖猛攻非特烈堡背後的高岡，結果失敗，被擊退却，屠殺很慘。更有一位蒙受恥辱的被擊敗於張塞勒斯維爾 (Chancellorsville) 血戰，但南軍在那裏失去利氏的右臂，不屈的賈克森，賈氏於一八六二年在辛南多阿流域勇敢的襲擊，打敗全部北方軍隊並使華府起驚惶，恐怕是戰事中最驚人的功績。至一八六三年夏天爲止，南方在東部一切佔它的最優勢。

可是這些南方的勝利，沒有一個是有決定性的；北方聯邦政府只是集合同新軍隊，再來一試。假使北軍不能攻陷里士蒙，南方雖採取攻勢也無更好成就。一八六二年八月，利氏覺得攻入北方的時機已是成熟，但在西馬里蘭的安提坦 (Antietam) 戰場上遇見麥克勒蘭，被麥氏打得停頓住。這是個不分勝負之戰——但利氏撤退，林肯不顧一切的渴望勝利，認爲這成功已夠證明宣告解放宣言的正當。第二個夏天，在北方部隊一蹶不振的張

塞勒斯維爾敗仗之後，利氏向北進攻，侵入彭西凡尼亞。他的軍隊幾乎到彭州首府，巴爾的摩和費城陷入巨大驚惶；但一支更強的北軍在葛的斯堡攔截住他的前進。南軍在這裏以三天的交戰勇敢的企圖打破北方陣綫。他們假使在北軍正集中時迅速痛擊，或許勝了這仗。結果他們要對敵一支更強而據有較好地點的軍隊。皮略特 (Picketh) 在末一天拼命的衝鋒，朝着可怕的敵火，是戰史中最英勇的成績之一。但這失敗了；第二天，利氏的舊行伍在使他們永久殘廢的損傷之後，怨怒的退回波陀麥克，葛的斯堡的高潮顯然成爲南方一切的高潮。

格蘭特的軍隊那時正估領維克斯堡。南方海岸的被封鎖成爲一道鐵的警備綫，很少船隻穿過。南方同盟，它的工廠缺乏機器和原料，它的鐵路陷於腐敗，快要到它的資源的末路。在另一方面，北方各州似乎比以前興旺，它們的工廠在大活動，它們的農場輸出豐富的農產物往歐洲，它們的人力從移民的輸入得到恢復。

在東南田納西，密西西必流域諸戰役的終局也決定不利於南方。查大努卡 (Chattanooga)，這區域裏的一個熱鬧的鐵路接合點，對南方同盟的重要，只次於里士蒙和維克斯堡。指揮着往西南、東南、和東方的鐵路，這樣的位置，它阻遏住北軍向東南圍繞大煙山脈 (Great Smoky Mountains) 的小路，它是南方下部門戶之一。羅斯克蘭斯 (W.S. Rosecrans) 率領的一支北軍早在一八六三年九月到達查大努卡，發見對敵的是一支強大南軍，由次等的布刺格 (Braxton Bragg) 所率領。在可怕的吉卡摩卡 (Chickamauga) 一戰中，布刺格幾乎得勝，但最後却被一位忠於北方聯邦的維基尼亞人湯馬斯 (George H. Thomas) 將軍所沮而停頓。無能的羅斯克蘭斯那時讓自己被圍攻於查大努卡，要格蘭特被遣去援救。十一月，由錫爾曼和湯馬斯的好幫助，格蘭特打勝查大努卡之戰，他的軍隊一部分從傳教嶺 (Missionary Ridge) 以一陣猛烈的衝鋒追逐南軍，至於不能停步。北方部隊這樣的居於一個地位，開始進攻喬治亞，那一役錫爾曼得到這樣一個得意的結果。雖然一支仍由胡德 (Hood) 率領的在田納西的南軍，和一支北軍於佛蘭克林地方打了一個死傷衆多的無勝負，可是它實際上却在一八六四年十二月被湯馬斯滅於那士維爾，恐怕是戰爭中最一蹶不振的一擊。

假使南方承認它的迫近的挫敗，準備和大度的林肯談判條件，這對它或許遠爲有利。但是感情已經太痛



切，不允許那樣做。南方同盟繼續作戰直到再抗下去幾乎不可能。它在一八六三年喪失英法干涉的最後希望。北方聯邦政府在外交戰綫上佔大優勢，它巧妙的利用着它們，在葛的斯堡以後，歐洲公使不會賭注要輸的方面。而且在一八六二年，林肯已經發布他的解放宣言，把撲滅奴隸制作爲戰爭的主要目標之一；這博得英國大眾的道德意識傾向於他的方面。蘭開郡 (Lancashire) 貧困的工人，被北方封鎖襪奪了棉花，當他們堅定的同情北方聯邦，顯著的證明他們信仰那主義。

早在一八六四年，格蘭特被遣至東部，受任爲全北軍的指揮。一仗接着一仗，他殘忍的重擊利氏，逐漸使南軍疲乏下來。這時錫爾曼將軍於一八六四年五月開始他的征服喬治亞之役。九月初佔領亞特蘭大，他後來向海邊進兵，有系統的破壞在六十哩戰綫上的倉庫、鐵路、和其它財產。十二月他出現於沙凡那，他把那城作爲給國家的耶穌誕辰禮物。他再轉而向北，攻陷哥倫比亞，並逼迫查理斯頓投降。那秋天，勇敢的騎兵指揮薛立丹 (Phil Sheridan) 把辛南多阿流域的農業資源完全破壞，弄得「一隻烏鴉飛過那地方時，須要自帶糧食。」最後，利氏不得不放棄里士蒙，並於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在阿坡馬託克斯 (Appomattox) 以他的軍隊投降。

### 內部衝突

當可怕的鬭爭幾年中，南北兩方的內部衝突，可以提到的不少。兩方面的政府都沒有表現大效率。軍隊充滿淺薄的、混亂的、和不公平的制度。徵兵法被通過，但不公平的且不民主的抽拔；在北方，允許人們購買替身，他們結果在憤怒的強派中暴動。兩方都被內部政爭所擾擾。彭西凡尼亞的斯蒂芬斯 (Thaddeus Stevens)、俄亥俄的衛德 (Ben Wade)、和馬薩邱塞的薩謨訥所領導的共和黨激烈派，攻擊林肯在他的支配戰事上太懦弱，採取解放作爲戰爭目標之一太緩慢，重新建設路易斯安那和其它被征服各州的政策太寬大。在南方，有些州長像喬治亞的布朗 (Joseph E. Brown) 和北卡羅來納的樊斯 (Zebulon Vance) 以頑強的主張州權利嚴厲的妨礙里士蒙當局。在兩方，尤其是北方，政見在軍隊任命上做了一個不愉快的角色。它們進用無能的人像蒲特

勒 (Benjamin Butler) 和彭賽德 (Ambrose Burnside)，而勇敢且有爲的領袖像湯馬斯却被遺棄。私逃成爲南方普遍的事，結果嚴重的使南軍失去戰鬥力。

北方譴責南方里士蒙利比 (Libby) 監獄，喬治亞安德孫維爾 (Andersonville)，和其它監獄的可怕的弊病；但北方的兵營裏也是夠壞的。徇私，欺詐，和腐敗，都盛行於兩區域裏。華府充滿不誠實的立契約者，投機者，鑽營議員者，和其它貪狠之徒，而有些詭詐的南方人却藉機發國難財。南方紙幣的跌價把物價抬到瘋狂的高度上，毀了多數苦幹的人民。在此方，顯明的通貨膨脹鼓勵放肆的賭博和投機事業，並助長成一羣浮囂的百萬富翁。總之，這戰爭有它很不名譽的一面。但它也有它無數的英雄與忠誠，仁慈事業與愛國犧牲的故事。

### 利氏；林肯

戰爭給南方一位不朽的英雄利氏，最有義俠心的將領。他的領袖之才的顯赫，他的貢獻的熱切，他在戰爭中表現的仁慈，他承認失敗並勸誘南方人民和他們新近的敵人做忠實伙伴的大度，無疑的常引起稱贊。他的過失是剛勇的缺點，因爲他太客氣太謹慎，不使頑強的部下適當的服從他的意志。他的戰略優於戰術，他在揣度敵人的計畫上表現出精明，在用軍事心智上表現出分析的敏銳，在估計軍隊單位和據點的力量上表現出正確的判斷。以他的組織力，他對細事的謹慎注意，他對部下的深情的關心，他的勇敢，他的優美丰采，他令人信任並且博得他的部隊的信仰。他像華盛頓一樣有自制力，很少失却，即使失却也是暫時的。這位基督徒君子在勝敗上，在戰爭或和平上，都是偉大的。他戰後只生存五年，他專心致力於南方在經濟、文化、和政治各方面上的恢復。

對北方，這戰爭給它一位更偉大的英雄林肯。在戰爭的頭幾個月中，很少人看出這位外表粗魯、醜陋、不活潑、沒有受過良好學校教育的西部律師。他的第二任陸軍部長斯坦頓 (Edwin M. Stanton)，曾經名他爲一只大猩猩——雖然他後來宣稱林氏是空前未有的人類最大的領袖；敵對的報紙把他說成一個懦弱者。全國逐漸

了解他的非常賢明，由於他的謹慎研究和用心思考；他的酷愛真理，他的無窮盡的忍耐性，和他的無邊氣量。假使他有時候似乎猶豫不定，時間常證明他已知道如何等待國家利益，如何聯結力量 and 機智。他了解美國人民，知道在適當的時候暫停以使民衆情緒凝固，和在適當的時候勇敢的前進。他是領袖中最誠實的；雖是一位機巧的政客，可從未依賴過不公平的手段。他不變的訴諸選民的理智，從不訴諸他們的無識。他的思想和行爲仁慈，在整個戰爭的煩惱中，他從未發過一個要對南方人民復仇的字。他最渴望把國家團結成一個不是武力的而是心情的聯邦；當北方聯邦軍正贏得它們最後的勝利，他甚至建議爲奴隸出相當的代價給南方。他的外交政策表現出尊嚴、誠實、和堅定。他雖然須運用破格的權力，可是他熱烈的信仰民主自治，並且知道如何感動他的人民的忠心，所以結果他雖行使一個專制帝王的權力，却博得大衆的完全信仰。他的辯才跟着需要它而增長；他的葛的斯堡演說，即第二屆就任演說，和他的一些信札在英語散文中是最美的寶物。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號，阿坡馬託克斯休戰後不滿一星期，他的被刺，對國家是個非常的打擊，對勝利者和被征服者都是個悲慘的不幸。像羅維爾所記：

在那令人吃驚的四月早晨以前，從來沒有這麼多人爲一位他們向來見過的人落淚，對他，好像從他們的生命中被奪去一個友誼的存在，留着他們更冷落更暗淡。從來沒有這樣流暢的殞諷誄詞，使那天陌生人相見，彼此互相同情的注目。他們共同的人羣中喪失了一位親屬。

### 戰爭的遺產

在一位新的、無經驗的、且無平勻智識的領袖約翰孫 (Andrew Johnson) 領導之下，國家須要面對整理和復興的艱苦問題。林肯被刺後立即突起廣泛的復仇要求，使這些問題更不容易。自私的政治和經濟事項——共和黨想利用局勢來永保它的權力，自私的實業團體想利用局勢爲它們自己的利益，把問題很快的弄複雜了。要求高關稅的製造家，要求確定以黃金付息的債券執有者，要求土地租讓的鐵道建造家，全集合在共和黨統治

的背後。

戰事給國家留下一份混雜的遺產，有好結果也有惡結果。它救了聯邦，並給它一個不可毀滅的特性，但從熱鍋裏出現的聯邦不是開國諸元勳的聯邦。它已經永遠廢除奴隸制，但是用的是武力，並且沒有考慮到自由或他們須要生活的社會的福利，也沒有考慮到他們須要共享的經濟。它已經打倒在南方的一個貴族寡頭政治，但沒有別的階級準備負起那階級這樣大大獨佔的政府的責任；南方被奪去它的自然的領袖有一代之久。林肯曾爲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辯護，但沒有平心的觀察家能結論出這戰爭已經在任何直接或最接近的意識上使民主前進。

戰事留下南北間的一種幾十年憎恨——這憎恨林肯曾經希望把它掃去。它使許多人更不容忍，尤其在政治事件上。北方的共和黨煽動家長久搖着血衫來抓取選票；那就是，他們訴諸反抗南方民主黨的偏見。在另一方面，敵對的區域成爲一個民主黨旗幟下堅強的南方。這劇烈的黨派心理是最不幸的。直到戰後二十年，沒有一位民主黨進了白宮；直到將近五十年後，才有一位南方出生的人，威爾遜，做了總統。戰爭給北方一羣行伍老兵，持有選舉大權。他們不久開始要求政府發給養老金，逢迎的政客以可厭的草率情形把公款發給他們。戰爭在國家的社會和道德素質上也有一個不幸的結果。它使一種貪錢貪勢、趣味卑污、行爲放肆的人物突起成名。美國人的大眾，當然仍是勤勞的、方正的、愛國的。但一種下流的、不知廉恥的、貪得無厭的分子比從前更顯而易見。

### 南方的復興

南方現在是已經被打敗，它須要復興；這事業的進行佔去十幾年，從一八六五至七七。假使林肯活着，他會主張寬大的待遇南方人民，或許會博得國會中大多數擁護他的見解。但約翰孫，對這件事雖是心思正真的，可是鹵莽笨拙，而且脾氣不好。他在藉釋奴局扶助黑人法案的範圍和公權法令保護他們這兩件事上，和國會發

生爭執——這些法案過分侵害南方各州的權限；他自己讓那團體的頑固或激烈分子謀略勝過他，且不信任他，他完全控制不住局面。實在，他幾乎失去他的職位。國會在他的不裁可權以上，制定一種法律，禁止他不得國會同意而辭退若干官吏。他準備以辭退他的有貳心的陸軍部長斯坦頓來在法院試驗這法律。因此激烈分子在一八六八年二月彈劾他的「大罪」，在參議院前審判他，並差一票要把他驅逐出白宮。這時激烈分子藉獲勝一八六六年的國會選舉，已經保管復興事業，並逼迫南方屈服於一個恥辱不聰明的計畫。

由彭西凡尼亞有復仇心的斯蒂芬斯、馬薩邱塞狂熱的薩謨訥和其他激烈派領袖所實行的復興計畫有三個要點。第一、南方被置於軍事管制之下，創立五區，各區置將官一員，有良好軍隊輔助着他。第二、南方白種人不但被迫接受第十四項修正議案，這案竭力企圖保證黑人在每件事上的平等權利，而且被迫接受第十五項修正議案，這案給有色人投票之權（有色的人事實上全不識字並且幾乎全還愚鈍無知）。新近的奴隸，他們的祖父恐怕是非洲的野蠻人，他們目不識丁，他們畢生消磨在棉花地裏，被給予選舉公務官員和創制法律的全權。最後，一個有計畫的利用，從這些北方來的有色投票人，貧窮的白人，和找錢的或希圖僥倖者造出，在南方建立起新的州政府。

這些黑人和希圖僥倖者的政府，是在任何英語地方，也許是從來所未有的最壞的。黑人一度控制幾個州立法議會，選舉國會議員，充滿州裏的小官職；僥倖分子得到大部分有油水的差使。這些復興政府擔任一些築道路，修橋梁的有價值的工作，並且通過有關教育和慈善事業的法律，這是真的。但在整個上說，他們無能，浪費，並且腐敗。他們揮霍金錢並徵課賦稅使貧乏的白人絕不能擔負。南方有一時期陷於絕望。

但是不長久，那區域裏自重的白人逐漸得到權利統治自己。他們得到權力一部分是由於用暴力和恫喝。他們建立起三K黨（Ku Klux Klan），迫着許多僥倖者回北方，並把黑人從投票場所嚇走。他們在大部分上用舊政治機構的和平方法來做這事。許多黑人對於被北方來的狡猾政客把他們做爲工具這事感覺厭煩了，快快的放棄投票；有些甚至追隨他們的舊日白人領袖。一州一州的被民主黨重新克服，至一八七六年，只有三州——

路易西安那、佛羅里達、和南卡羅來納——仍舊在黑褐色的共和黨人手裏。甚至在這三州裏，黑人和德佛分子只藉聯邦戍軍保持權力。一八七六年的選舉，在美國史上最嚴密且最無秩序的一次，使大家明白南方非待軍隊撤去不會知道什麼和平。因此，第二年，海斯 (Rutherford B. Hayes) 總統把它們撤出。由這行動，共和黨領袖們承認他的激烈的復興計畫的失敗。它主要的因為兩個理由而被採取：因為這黨的理想派想保護黑人，因為它的實利派希望為選票、官職、和權力而握住南方。它的結果是阻礙且削弱黑人，並把整個南方交給民主黨。

我們回顧一八五〇年和一八七七年間的內爭內亂時期，好像是個幾乎不混雜的悲劇。奴隸的廢止如果能逐漸的、且給奴隸主人應得的報價而實現，像林肯長久所希望的一般，國家或可以遭遇得更愉快。那需要時間來教育黑人到他們在社會上的新地位。它可替國家免却六十萬精壯青年在戰爭中喪失生命，可能使他們將百萬兒童生到人世上來。它可能解救南方傷殘到今天的巨大毀壞；它可能解救雙方在貪財的「粉飾時代」中所明白顯露的粗野結果和戰後的鄙陋。

可是，在上面已經述及的各項以外，篇幅中也有光榮的記錄。這風潮團結國家且把它結成一個巨大的整體，較慢的辦法所做不到。在社會上經濟上，南方現在更密切的和北方相親近。戰爭大有貢獻於加深且成熟國家的特質；文學和教育在多方面更成熟了。戰爭給國家一套記載，有趣味，有戲劇性，加速它的心思，提高它的想像。幾百年後，它會激動的回憶它們——薩謨特要塞的起火；美利麥克號和蒙尼特號的決鬪；賈克孫的橫掃辛南多阿，一長陣戰敗的北軍在他背後；破船在槍林彈雨中駛入維克斯堡下的密西西必河；皮開特的灰色大軍與懷科克的藍隊在墳墓嶺 (Cometary Ridge) 的死扭不放；查大努卡上高地的被猛攻，格蘭特的命令甚至阻不住他的部隊，超過巴拉克拉瓦 (Balaklava) 的功業；胡德部下襁褓的老行伍的敢死勇氣，當他們襲擊北方隊伍於佛蘭克林，兩個鐘頭內他們死傷六千人；凱阿薩基號圍繞阿拉巴馬號直等它沉入海底；利氏帶着筭珠的劍，格蘭特穿着普通兵卒的衣服，握手於阿坡馬託克斯；林肯步行過里士蒙燒黑的街道；殉道總統的遺體出殯。

時千哩長的殞儀；東部西部軍隊無邊的队伍在戰爭將結束時的滾進彭西凡尼亞大路，它是個史詩式的故事，它將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傳述。

## 第十二章 現代美國的出現

### 戰爭的衝擊力

內戰在美國南北兩方的社會上和經濟上都促成一種革命。現代美國的基礎雖在戰前時代已是根深蒂固，可以我們能從戰爭本身起斷定它實際出現的年月。戰爭給與工業一個極大刺激，加速天然資源的開發，大規模製造業的發展，投資銀行事業的興起，對外商業的擴展，並且造成工業鉅子和資本主人的一個新時代。它大大的催速鐵路和電報網的建設，且引導進鐵道時代。它獎勵發明和節省勞力的方法，且證實這些發明物大規模的應用於工業與農業上。它開放廣大的新區做田地牧地，發展農產物的新市場，且開始農業革命和農田問題。它造成有利於都市發達的條件，並且提供工作給成千成萬不久擁擠到新世界的移民。在南方，戰敗大大毀滅種植者階級，解放黑人，革命化農田經濟，使一個新的中等階級佔顯著地位，為那出現於次一代的新南方奠定基礎。在北方，它給投資和投機開闢新園地，造成一羣戰爭富翁，加急集中控制資源、工業、和在大都市中心財政的過程，加急南部西部對東北的從屬情形，並且加急新階級區分的形成以替代舊的區分。

在阿坡馬託克斯停戰後的一代，我們現在社會和經濟的樣式已成形。區域、數字、財富、權力、社會複雜性，和經濟成熟性——各方面的增長是個最引人注意的事實。共和國的政治區域被畫成他們最後的形狀，十來個州被准加入聯邦，建立成一個美帝國。在一個四十年的期間裏，人口從三千一百萬增加到七千六百萬，一千五百萬移民——一個常在增加的部分來自歐洲南部和東部——傾注進天府之國；大城市如紐約、芝加哥、皮芝堡、克利夫蘭、和第特羅的面積一再加倍，印第安人接二連三的陸續被掠去他們在高原和背後山谷中的舊日出沒之地，聚集到特居地，礦業界和畜牧界一起一落，西部為移民所住居耕種；在世紀之末，邊地不復存在。大



量的鐵礦、銅、和油的新發現造成幾十種大工業，小實業長成大實業，公司成爲新經濟的有力工具，信託業和取締公司成爲它的組織的特殊形式。大銀行家，如摩根氏（Morgans）的各家，很快的進入國家經濟的指揮地位。鐵路網幾乎完成，哩數從三萬增加到約二十萬，給國家以世界上任何國最大的鐵道系統。戰前稀少而微弱的勞動組織，會員數目增加，且在經濟秩序上立穩它們的地位；以前微小而散見的工業糾紛，成爲有組織的且有威脅性的。小共和國成爲一個世界強國，擴入卡利比安海和太平洋；它的工業渴望着市場，它的銀行家熱狂於投資，發展爲經濟帝國主義的新技術。在美國史上，沒有別的時代見過這樣迅速或革命的變化，像林肯和利氏的農村共和國轉變爲麥金萊和羅斯福的都市工業帝國。

一串新問題，複雜又挫折，面對美國人民，使他們太無經驗來了解它們的性質，太繁忙來細細思索他們。這些問題中最迫切的是財富分配，管制大而有力的資本集合，在一個不民主的經濟衝擊力下維持政治民主，大規模的失業和勞動糾紛，都市的擁擠和外國出生者的同化，農田收入的衰減和農田租賃的增加，天然資源的保存很快的被胡亂開發所涸竭，海外統治和世界政治的責任，和爲一個小農業共和國需要而組織的政治制度適應到一個大工業國的急切要求。

### 南方的變化

戰爭和南方失敗的衝擊力是直接的且泛濫的。在美國史上無偶的糜爛，當老軍人在那士維爾和阿坡馬託克斯之後，疲勞跋涉回家，灰色呈現在他們眼前。維基尼亞和田納西的大部分爲爭鬪的軍隊所破壞；錫爾曼橫掃五十哩，穿過喬治亞和南卡羅來納的中心；韓德（Hunter）和薛立丹掃蕩富庶的維基尼亞流域；北阿拉巴馬，密西西必，和阿拉薩斯的廣大區域都是一片荒涼。盛大的城市像里士蒙、查理斯頓、哥倫比亞、和亞特蘭大都已被火燒燬或被敵火轟壞。橋梁倒坍，道路荒廢，千哩鐵道路軌被分裂，車輛被毀壞，碼頭船塢腐爛。正常的經濟生活幾乎癱軟。南方同盟的貨幣毫無價值，唯一的硬幣是曾經匿藏的，或是北方聯邦軍帶進征服地的。銀

行已經關門，保險公司無賠償能力，工業實業破產，貯藏在貨棧的棉花一大部分付之一炬或被軍事當局所沒收。

文官政府差不多消滅，沒有有力的當局來徵收稅項，辦理學校，維持道路，或執行懲治劫掠鄉間的匪兵和遊擊兵羣的法律。教堂被焚燬，禮拜會離散；大學的補助金喪失，它們的圖書館和實驗室被破壞；阿拉巴馬大學的圖書管理員設法從火中救出的書只一册古蘭經。許多公立學校已經關門，教育停頓了。

甚至農業也陷於絕望境地——成千的農田被委棄，籬牆倒塌，溝壑長着雜草，水開堤岸破決，牛馬死亡或被偷竊，犁頭在田裏生鏽，勞動制度完全破壞。卡羅來納的稻米業永遠毀壞，鹹水氾濫田地；路易斯安那的糖業也被毀壞。一八七〇年維基尼亞的烟草比一八六〇年少二百萬英畝；南方到一八七九年才收穫和分離那年數量相等的棉花。當一八六五年的冬天，饑饉流行於南方的大部分，白人和黑人一樣的受聯邦陸軍或新組織的釋奴局的援助。奴像南方詩人藍尼爾 (Sidney Lanier) 所寫，「整個生命大概只是未死」。

復興事業帶來新的悲哀和新的負擔幾乎與戰爭一樣沉重。南方同盟的債務已被掃去，起義的南方人爲他們緣故的投資當然也跟着掃去，但南方被期待着負擔國債的派額，和要負擔國家政府的雜費一樣；此外它被徵課在棉花上的土貨稅。這恐怕不是不公平，也不是非法的，但這樣不能說是爲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和賦稅。當僥倖分子統治下，南方被國會中激烈分子所蒙混，幾百萬美元浪費在奢侈品上——像給立法議員的香品，威士忌酒，和金痰盂——幾百萬公然被盜用，又是幾百萬冷淡淡的流入曖昧的鐵路和實業投機事業，連一元錢償還一角錢的事都很稀少。有些區域裏，財富衰減一半以上，但賦稅和債務堅決的增高了。僥倖分子和激烈派的統治增加南卡羅來納的公共債務從五百萬到二千九百萬，阿干薩斯的從三百萬到一千五百萬，路易斯安那的從一千一百萬幾乎到五千萬。賦稅飛昇得令人頭昏眼花——路易斯安那八倍，密西西必十四倍——直到成千的農民在完全絕望中把他們的田地拋棄給稅吏。

可是戰敗的南方以驚人的魄力着手物質復興的工作，和它的農業經濟的復原，與文明社會的制度的恢復。

喬治亞記者格拉德 (Henry Grady) 後來追憶說，「從來未有這樣壓倒一切的破壞，也從來未有更迅速的恢復。」里士蒙，查理斯頓，和哥倫比亞從它們的殘破中興起，戰事結束六個月之後，一位到阿特蘭大的訪問者報告道：

一個新城市以希有的速度興起。窄狹而不規則的街道從早到晚活動着大小載貨車，手推車和大馬車，拖運隊和喧嚷的人們，木料、磚料、沙子的裝載，木器堆和成千成百包裹箱件，泥水匠和瓦匠打雜的，木匠和石匠，搬運垃圾的和造房子的，一羣不斷的進取、擁擠、爭奪、熱烈、激勵、且冒險的人們，全決意於建造、貿易、和發財。

鐵道重新敷設，新的道路推進入西南，橋梁重新建造，水閘提岸修復；船隻一度又航行進諾福克、查理斯頓、和摩比爾港口；鄉村商人，小規模貿易者，與銀行和保險公司屆時開門。

舊工廠重新開門，資本被新工業所吸收——常常以極高的利率。無邊的白松黃松幼樹造成繁盛的木材工業的基礎。經過北卡羅來納達拉謨 (Durham)、且補助自己於一些杜克 (Washington Duke) 所做烟草的北方聯邦軍兵士，寫信回去要增加，巨大的北卡羅來納烟草工業基礎建立；一八八八年左右，達拉謨有世界上最大的烟葉廠，每年輸出烟葉一千萬磅。麵粉廠和碾穀廠興起，供給本地需要；種棉必需的肥料工業重新建立。富庶的煤鐵礦脈暴露於田納西和北阿拉巴馬。一八七〇年還是棉田的柏明漢 (Birmingham)，二十年內便成爲一個五萬人口的城市，一個勃興起來鐵工業的中心，有六條路軌的鐵路供它使用。一八九〇年左右，南方出產全國五分之一的生鐵。其它城鎮像查大努卡、達拉謨、文斯頓撒冷 (Winston-Salem)、和丹維爾 (Danville) 都變成繁盛的製造業城市。

從一八四六年格勒格 (William Gregg) 在南卡羅來納格蘭尼特維爾 (Graniteville) 開設他的棉紗廠以來，紡織並業已繁榮於南方沿海。它像多數其它工業一樣，完全被戰爭所破壞。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裏，它再度開始進行，利用着廉價勞工，水力接近，和原料易得幾件事相結成的便利。幾十個差不多完全由地方資本經營

的小工廠，興起於兩卡羅來納和喬治亞的腹地。一八九〇年兩卡羅來納有紡錘五十萬頭，全南方能以四倍這數目自豪；新英格蘭工業界人士已經對那區來的競爭感覺煩惱。一八九〇年左右，南方也有勞動問題的開始，這問題一年比一年嚴重。

南方的紡織工業仍舊帶地方性，並且——大部分從需要——一個奇特的封建特徵。被什麼高工資和穩定的工作所吸引，全家從沿農田的鄉村搬到靠近紗廠的鄉村，隨帶着他們發展於農業上的勞動習慣和態度。他們認長的工作時間為當然，也認全家——婦女和兒童和男人一樣——要擔任工作為當然。這些紗廠鄉村，散處在一些鄉鎮的邊上，是開設紗廠的運用者的財產，且由他們管理。工人住在公司房屋裏，進公司禮拜堂和學校，從公司商店裏購買他們的食物衣料，嬰孩由公司醫生接生，死人由公司牧師給埋葬在一個公司墳地裏。這是個新的封建制，它在起初的時候雖然進行得很好，它為將來充滿麻煩。

可是儘管鐵、木材、烟草、和紡織工業的興起，南方仍舊以農村和農業佔優勢；一九〇〇年以前，它除却新奧爾良有十萬人口外，並無一座城市足以自豪。甚至它的工業也與農業密切相關；烟草和紡織的出產雖大，但由製造增加的價值實際上比較的小。南方極大多數人生活在他們的農田上，出產可銷售的農作物。但農業也遭戰時的破壞——這破壞被奴隸制和建立其上的勞動制度的破壞所極加強。它也該經過一個整理的時期。

大種植家已經大部分被戰爭和復興弄得貧困。他們的奴隸資本掃空，他們的勞動力量分散，賦稅和普遍的費用高漲，他們多數被迫分裂他們的種植地，或把土地拍賣以償付賦稅和債務。結果是在我們歷史上土地所有權的最廓清的革命。好地每英畝售價三、四美元，幾千小農擴大了他們的地皮，幾萬貧窮白人、逃亡的奴隸、沒有土地的技工、和小店家都能滿足他們的土地渴望，成為地主。一八六〇年兩卡羅來納約有三萬三千塊農田；二十年後，數目已經高到九萬四千。一八六〇年密西西必十英畝一塊的農田不到六百塊；十年以內，數目增加到一萬一千。整個南方，一千英畝或千英畝以上的種植地減少過半，農田的平均面積在二十年功夫內從三百三十五降到一百五十三英畝。同時富庶的新土地被佔於阿干薩斯和德克薩斯，不久俄克拉何馬開放為居留

地。一度從寶座上顛覆下來的棉花大王，重建起並擴張開他的帝國。

奴隸制已經廢除，畫策出一個替代的勞動制度是急切的。種植家沒有錢來付工資，黑人沒有錢來租田地。由於需要，有第三種方法出現：無數自傳和日記告訴我們它的來源。當戰爭結束，種植家把他們舊日的奴隸叫來，告訴他們現在他們是自由了，要求他們仍舊住在老地方並且工作。工資是談不到，但當農作物收成時，種植家和工人股分。這是分物制的起原。它屆時成爲有組織的且規則化的。農民供給他們的佃戶小木房子、土地、器具、肥料、和一頭騾子，並且允許留用它們直至農作物上場。分得農產物者出他的勞力，收受三分之一的收穫物作爲報酬。這制度似乎進行得很好並很便利，不久擴展到白人佃戶上，如同對黑人一樣。

實際上這分物制是個幾乎完全的罪惡。小農們完全依賴可銷售的農產物，常常陷於負債並成爲一種動產，抵押給支持他們的地主和商人。因爲他們沒有財產作爲抵押品以擔保他們收受的供給物，他們典當他們正成長中的農作物，這樣演變成腐敗的「農產物留置」制度。這制度褻奪却一般佃農在他的農產品上的任何真利益，鼓勵散漫且不科學的農業，有利於種植家或商人放債者，並苦了佃戶。因爲棉花似乎是一種穩當的投資的農作物，債主們堅持他們的佃戶只種棉花，不種別的，這樣阻礙變化，並且責備深沉的南方使它陷於毀滅的獨產物的經濟中。在一世代內，一個廣泛的土地分配的前途和一個強健的自耕農羣已經漸次消失；在南方有些部分，農民百分之七八十是佃戶，並且每塊農田平均有一個留置權。一九〇〇年的南方不如一八六〇年的南方自足，在許多區域裏農田財富實際上一年比一年衰減。「烟草道路」(Tobacco Road)不久替代「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爲南方生活的一個代表。

黑人也看出他們的地位只是法律的而非實際的變化。布告他們自由的國會，未能給與他們經濟安全，但浪費它的努力只在保證他們政治平等的無益工作上。有一兩年之久，黑人在戰爭創傷的土地上像一羣難民。他們有幾千人成爲劫盜，無目的的從這郡跑到那郡：我們一定可以說，被自由第一年所破壞的家庭，比被奴隸制任

何一年所破壞的多。他們成千的死於疾病和饑餓或做了暴力的犧牲者。最後，經過較負責的南方人士的努力和聯邦當局的合作，秩序恢復；當黑人知道他們不會得到他們所輕信答應給他們的「四十英畝地和一頭驢子」，他們回到他們所知道的一件事上去——耕種。

有些較有冒險心的找他們路子到北方或南方正在興起的工業市鎮上去，但他們極大多數成爲分農產物者，這樣他們覺得生活過得和戰前差不多。他們在白人田上耕地割棉花，他們住在同樣的小破房子裏，吃着同樣的穀子，甘藍菜，和鹼肉，穿着同樣的碎布衫子和褪色的藍斜紋布，那些他們常知道的。他們不準備投票或送子女進白人的學校或在社會上超過他們自己。

這戰後一代南方最有望的發展，是一個自立的小農、店主、實業界人士、商人、銀行家、工業家、和專門職業者堅強的中等階級的出現。這些人現在已從奴隸制的重累被解放，他們從「迷途的原因」這心理重累及時解放自己。他們情願忘記月光和梔子樹的南方，並且得意的而非苦楚的回憶葛的斯堡和荒野狀況。他們自己奮力的着手合成南方與國家的經濟並重建破碎的社會制度。大學重新開設，利氏以出任維基尼亞掙扎中的小小華盛頓學院的院長，給全南方做個榜樣。各州民主化它們的教育制度，至少在紙上規定普遍的免費的初級公共教育。教堂重新建立；隨着黑人的增加，教會不久自負比戰前更多的會衆。在社會立法上，在貧窮和衰弱的供給上，和在向勞動立法的微弱姿勢上，都有明顯的進展。經濟、文化、和政治方面，南方一度把自己編結進國家的結構裏。

## 在北方的革命

南方正辛苦重建它的經濟，並整頓它自己使與新工業新農業制度相適應，北方也奮力的漸向前進。北方工業和財政，較其它任何區更完備，收穫到勝利的結果。從初起時，共和黨已被委任高關稅率，內政改良，鐵道土地租讓，和無代價農田。在薩謨特要塞事件以前，這計畫的任何有實質的部分都不能被寫爲法律。但在南方

各州分離以後，在國會廳堂裏再也沒有有力的反對，戰爭爲整個計畫的迅速的制定造成機會。一八六一年的摩利爾 (Morill) 稅則明確的翻轉關稅的長久向下趨勢，建立坦白的保護稅率；繼起的法令把關稅壁壘更抬高，在戰爭終了時，平均稅收從百分之十八增加到四十七。北方的製造家已經立定在一個幾乎不可攻陷的地位；直到一九一三年，沒有一個當局能實行關稅率的實質減低。進一步鼓勵實業利益，國會不久就廢止所得稅並取消戰時煤、鐵、和公司各稅。國會在一串鐵道法律下，以六千萬美元以上的貸金，和一萬萬英畝以上公地的直截授與，來補助橫越大陸道路的修築——這些授與由州與地方委員會所浮濫補充。

受這些贊助，被戰爭無壓足的需要，同樣被正擴張中的人口無壓足的需要所刺激，實業工業空前繁榮。約翰·錫爾曼給他的兄弟錫爾曼將軍的信裏說，「真相是：戰爭的結束同我們未受損害的資源，給與主要資本家的觀念一個興奮，一個眼界，比這國內以前從事過的任何事都高得多。當然，這有眼界，如果不是給他們觀念以興奮。工業熱烈的應付武裝勢力的巨大需要，並且應付戰事經濟的更大需要。十年之內，鋪設的路軌有二萬英里，大部分在西部，橫越大陸的路線在令人暈眩的速度之下推進平原和高山。電報線從這城牽到那城，不久穿過大陸；海底電線敷設過大西洋，電話在十年之內增加一個閃快的新交通方法。芝加哥的麥科密克 (McCormick) 收穫機廠對西部中央草原地帶的急切需要收穫機，供應不及；俄亥俄阿克隆 (Akron) 和坎東 (Canton) 兩處的工廠造出幾萬部割草機；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中間，沿中部邊界的工廠送出鐵刺的籬子給高原的農田。麥克開 (McKay) 靴鞋工業，芝加哥和新新那提的大包裝廠，兩城的麵粉廠，密爾華基 (Milwaukee) 和聖路易的釀造廠，皮芝堡區域的鋼鐵廠，俄亥俄和彭西凡尼亞的煉油廠，與上百種其它工廠晝夜工作，以應接擁到它們那裏的定貨單。戰事的終了看不出工業活動的中止。阿坡馬託克斯停戰後的五年，幾乎各種工業紀錄都被擊破。比我們歷史上任何以前的五年採掘出更多的煤、鐵、銀、銅，冶鍊更多的鋼，敷設更多的鐵道，鋸出更多的木料，建築更多的房子，織造更多的棉布，碾磨更多的麵粉，提煉更多的油。在一八六〇至七〇十年之中，工廠建置的總數增加百分之八十，製造品的價值增加百分之百。工業革命是個已成事

實。」

銀行家和投資家和工業家一同得到利益。國會以一八六三和六四年的國家銀行法令掃去賈克孫派民主黨人所重視的獨立銀行制度，代以一個更有利於私立銀行家的。州銀行的紙幣被課稅使其不再存在，好給國家銀行的紙幣有個明白的活動範圍。戰事期間，政府曾發行幾萬萬美元的紙幣，只以政府的信用做擔保，這價值很快的貶落。國會以停止這些「綠背紙」的增加發行，收回它們的大部分，和抬高其餘的價值使達到平均這決議，贊成一個消去膨脹的政策，大有利於債主和投資者的利益，但大苦了農民和勞動階級。

投機於綠背紙幣和國家債券，造成許多頗有體面的豪富。在最黑暗的戰爭時期中，綠背紙幣售價每美元只四十分，但它們仍然是購買政府債券的合法貨幣。當國會擔保以黃金償付這些債券的本息，那些夠狡黠點投資的人顯然將要證實一個相當的利益——約翰孫總統估計它在百分之三四百！政府的會計政策強調階級界線，比什麼都甚，因為它的意義是軍人以價值五、六十分錢的綠背紙發餉，公債持有者將以價值一百分為美元受償付；農民借貸值五、六十分的美分，他們須以值一百分的美分償還。這意義是能催全國償付一宗估計幾乎比原值加倍的國債。

但最大的財產是由於鐵路、礦業、木材、肉類包裝、鋼鐵、油，和類似的有關戰事或有關西部開發的投資而致富。不久，修築鐵路者的姓名如樊德比爾 (Vanderbilt)、史丹佛 (Stanford)、和德拉德 (Villard)，包裝家如阿爾摩 (Armour) 和斯尉夫特 (Swift)，木材大王如衛耶家塞 (Weyerhaeusers)，鋼鐵主人如卡匿奇 (Andrew Carnegie) 和休斯持 (Abram Hewitt)，煤油大王如羅克斐勒 (John D. Rockefeller)，是家常詞語，在一般人估價中，替代政治家或文人的名字。戰爭浮濫且輕易的重新分配國家財富，造成幾千體面的和幾百卑劣的富豪。金錢處置且讓受州政府 and 聯邦政府；金錢賄賂得社會歡心，不久樊德比爾和顧爾德 (Goulds) 諸家像舊時紐約荷蘭殖民地後裔 (Knickerbocker) 諸家一樣的受歡迎；金錢建築排列在紐約第五號路和芝加哥密西根路的美麗邸宅，供給學院和大學，支持教堂和教會，主持樂隊和藝術館。財富的集中，沿地理和沿階級界



線同樣明顯：紐約、彭西凡尼亞、和馬薩邱塞繳納一八六四年的所得稅百分之六十。

農民也從戰爭和戰後勃興中獲利，雖然比他們所想的少。共和黨以「爲你們自己投票一塊地」的口號號召民衆擁護，它接任政府以後，立即重新制定民主黨總統以前不裁可的家宅法。據這法令的條文，任何人得以應許耕作五年而有一百六十英畝公地。這開明的立法使幾十萬農民能夠位置在西部的新土地上，因此推進經濟的民主。可是同時更大的區域被給與鐵路和其它公司或賣給土地公司和投機家。這土地的大部分終於轉入農人手裏——但出一個代價。其它同時通過的國會法令，租讓幾百萬英畝公共領地爲農學院和工學院的補助金與維持費。

但戰時和戰後的農業擴充並不依賴政府補助或獎勵上。軍隊、城市中增加的人口、和海外幾百萬等待糧食者的需要，都給麥子和穀類的生產者，給乳場和牧人一個刺激。很快推進過平原的鐵路，接近到未開闢的土地，剛剛上市的收穫機、耕犁機、割草機、和捲索機使一個人或一個小孩做原來需要兩個人的工作。林肯當選後的二十年內，穀類、小麥、燕麥、和大麥的生產增加一倍以上，牛、羊、豬的數目也是如此。在新英格蘭和南方，農業實際衰退了，這增進的大部分是在舊日的西北部和密西西西必外的西部。當戰事的十年，密蘇里人口增加百分之五十，以將近二百萬人成爲聯邦的第五州。內布拉斯卡於一八六七年加入作州，一八八〇左右幾乎有居民五十萬人。蘇克斯族印第安人在戰爭時安靜散居的兩達科大 (Dakotas)，十五年後有五十萬以上的農民人口。羊毛出產從佛蒙特移到俄亥俄，西部山地諸州不久要佔首位；愛奧華、干薩斯、內布拉斯卡、明尼蘇達開始在調查表上被列爲主要的小麥和穀類生產地。農業領域不可阻止的向西移動。

可是好像豫料我們經濟的將來趨勢，農民因勃興的幾年而獲的利益，除却比工人，比其它任何階級爲少；他們最先感覺到困難時期的衝擊力。過度擴張引起過度生產；更大田地與耕種田地的高價農具的購買，意義是債務的重負，只有得到高代價才能負擔得起。開闢較早的東部的農民，痛切的感覺到來自西部新土地的競爭；西部農民，得富庶的土地的利益，可是去市場遙遠，又要聽命於鐵路。像過去時代，農民在烈日下耕作長時

間，過沒有社交舒適的生活，最後且沒有爲他們勞力的表現。

工人離開較大團體，沒有從戰事上收穫到物質報酬。在煤礦和溶鋼廠中每天勞動十或十二小時，工作於織機廠和鞋廠，造船和鋪設路軌，他們大有貢獻於聯邦勝利；從他們的階層中也來了大部分實際戰鬥的人。在戰事和物價高漲的衝擊力下，有些被一八五七年恐慌所破碎的勞動組織重新聯合了。勞動需要組織。工資上漲，但物價漲得更高，保守的估計指示出工人的多數在一八六五年比他們在一八六〇年更壞。由於一百萬以上軍人回到平民生活，和入境移民的活動，職業競爭劇烈了，熟練的技工忙着組織起來保護他們技藝。曇花一現的聖克利斯賓會 (Knights of St. Crispin)，一個鞋匠的同業公會，是這樣一個組織；它的早早的讓位證明反抗機器和工廠制度的無濟於事。更有趣味的是兩個較大較無定形的組合——國家勞動聯合會 (National Labor Union) 和勞動協會 (Knights of Labor)，兩會都創始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都代表團結最不相同的勞動、農民、和革新團體的努力。可是大多數工人仍舊在這些組織之外，並且遭受變化得快的經濟機構的一切興衰，簡單的說，就是恐慌和不景氣。政府，這樣熱心爲實業團體立法，可沒有替勞動的人民做事。一八六八年，它在公共工作上建立八小時制，但這可稱贊的例子沒有被普遍做行。違反這舉止，一八六四年的法令可以認契約包辦勞動爲合法。這法令不久雖被取消，但實行却繼續不減者有二十年之久。

## 政治

戰後幾年關於政治最顯著的事，就是它的不足道。其它政府——例如皮爾斯和布卡商兩任——已經是陰暗且無能；格蘭特政府更注定無能且腐敗。國家復興與開頭中急切需要的經世之才，不再需要，讓步給政客的政治；政客的政治被人以黨派、特權、和腐敗所擊中。

復興政治的基本原則是共和黨權力的建立。那黨，我們要記得，是比較的新並且幾乎完全是區域性的。當戰爭時，它做的事情完全照着自己的方法，並把自己的權力防衛得很堅固。但戰事終了，有些——最後全部

——南方各州回到聯邦，共和黨繼續控制政府各支的景象便失去光明。因為這時期自始至終，民主黨仍舊衆多強大，甚至在北方也是如此；而戰爭，尤其是復興，使南方堅強的爲民主主義。假使南北民主黨人能在候選人和政策上取得一致，他們大概可以把共和黨打下台，重新奪得政權。

存亡所繫的不但是黨的優越，還有黨所作爲的，也是黨所已經勇敢進行的那些政策的維持。存亡所繫的是新關稅壁壘，國家銀行制度，鐵道補助計畫，和——也許最重要的——消除通貨膨脹與以黃金償付政府債務的政策。這些經濟問題當然是絕望的和社會問題糾纏着——像黑人的地位——和感情的問題——像酬賞那些盡忠的和懲罰那些不忠的。

共和黨人深採取的大戰略和戰術是夠明顯的。保持且進行已經順利開始的經濟政策，需要黨的在位，直到那些政策澈底建立，不能被推翻掉。試驗的辦法已經被用在否認一大羣南方同盟領袖的參政權和擔任官職上，也用在擠除南方更頑梗的各州的國會代表上。但這分明不能無限制的做去。一個更有把握更永久的政策似乎在南方建立起一個共和黨。這樣一個組織的基礎將是那些白人分子，他們早就反對南方的統治階級——歡迎一個機會來使人們注意他的意見的貧民和次特權者。但這些人數不夠多以擔保能成功。只有授與黑人參政權，且看着他投票正確，才能擔保有數字上的力量，這起初由復興法令，後來由憲法增訂條款，安排出來。

計畫是夠清楚的，但它沒有做。軍事復興使南方的反抗倔強了；更重要的是企圖在政治上利用黑人。因爲共和主義藉此和種族平等的觀念成爲一體——一個南方人士在這時難忍的觀念。所以這些眼光短淺且不聰明的政策，沒有加強在南方的共和黨，反使它薄弱了。一旦聯邦軍事當局退出，共和黨組織便崩潰，南方民主黨很快的找到法子阻止黑人投票。那時以後，南方民主黨照着自己的辦法行事。從一八八〇到一九二八南方同盟中沒有一州投一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票。

可是，共和黨的經濟計畫如果不是由軍事復興或由憲法上黑人參政權的需要所永久擔保，它是受新近寫入憲法的一個其它條款所保護。當復興的初期，激烈分子與約翰遜總統還在爭鬪，國會的一個聯席委員會提出一

件含有多項的訂正條款，計畫給公民權下定義，保護釋放奴隸的公權，褫奪南方同盟領袖的選舉權，保障聯邦的且註銷南方同盟的債務。這是著名的第十四訂正條，它的第一款規定：

各州不得制定或施行任何削奪合衆國公民的特權或特免的法律；亦不得未經正當法律手續而褫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亦不得否認任何人在其權限內之受法律的平等保護。

這些著名的語句，在共和黨政策未能做到時，做了它們的：它們給大實業公司的財產和經營投下憲法的裁可。因為法院在適當時，解釋它們的意義是各州不想這樣立法以褫奪公司財產或在那財產上的公平收益。這種解釋直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還未完全發達——恰是達到並反抗人民主義的時候。

格蘭特政府主要的參與維持復興政策，它使南方隸屬於北方，民主黨隸屬於共和黨。在這上，它是很成功的。它的背後有勝利的和格氏本人的巨大威勢；它的權力的享用，爲固執不信任任何關係奴隸制和分離的政黨這事所延長；它受它所服侍的實業利益團的歡心擁護而加強。可是這些優勢到時喪失。格氏是位偉大軍人，但是一位可憐的行政首長，除却在外交的領域上，他的治理表現一個非常失敗的紀錄。青年的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觀察從華盛頓到格蘭特的美國歷史過程，說格氏把演化變遷弄得荒誕可笑。但使朋友和贊慕者失望的，不是他的無能，而是他甘心同意於利用他的職位，和他對腐敗目的的友誼。

在他掌握不久之後，居高位者的腐敗故事成爲流行之談；它們不是沒有根據的。太平洋聯合公司（Union Pacific），國之驕子，它的財政受一羣雇用國會議員以遵行他們命令的奸詐發起人所管理；海軍部公開賣業務給承辦者；內政部是個土地賊所喜的逐鹿之場；印第安局賣塞地方貿易權給出價最高者，並且忽略守護者的福利；財政部招收稅者承辦未收到的賦稅，他們從中牟利；紐約和新奧爾良的海關沾染詐取的惡習；一個在聖路易的「威士忌酒黨」騙取政府幾百萬元土貨稅，一個在國都的收賄黨和南方的僥倖分子統治競奢侈和浪費。一位共和黨參議員寫道，「共和黨好像要到一羣狗家去……我深信空前未有的最腐敗最荒唐的政黨今天見到了。」

這種腐敗，滲透整個政府，流下到州和地方政治，屆時喪失北方人民的信心——雖不是感情。格蘭特的上任，比賈克孫以後的任何一位總統聲譽都大；共和黨的上台，具有一七八九年以來任何政黨所無的建設工作的最大機會。四年之內，這黨便分裂了，一個自由共和組織在野，致力於革命與調和。民主黨雖然參與自由共和黨，它們力量還不夠打倒格氏，但兩年以後，民主主義獲得控制衆議院，一八七六年，它的總統候選人得的票比共和黨的多二十五萬。貪婪的政治決定終止了；可是半世紀之久，這國家負着在行政機關和在國會中腐敗的

蓋恥

## 第十三章 大實業的興起

### 工業帝國的基礎

哲斐孫夢想過一個農村的大共和國，充滿獨立的農民；夢想過一個國家，沒有像他在英國所看見的大城市的墮落和工廠煤礦的奴隸情形，也沒有像在法意兩國令他害怕的農奴情形。他寫道，「我們有土地來勞動，讓我們永不希望看見我們的公民坐工作板檯上做事或搖轉紡線桿子。」他已經建立，像他所深信的，一個農民的民主，並且以路易斯安那的購買供給它的擴展。他說這裏土地已夠「爲千代又千代」。他已在選舉上打敗哈密爾敦，並且傾覆，像他所認爲的，哈密爾敦依照當代英國形像造成一個合衆國這計劃。國家該轉向西進，越過山、草原和平原，不該東進越過大洋；它該成爲一個農民的天堂，不是商人的、銀行家的、或工業家的畜養所。當哲斐的繼任者移入白宮，他的信徒掌握國會，他的夢想似乎順利的在成就道上。當國家邊界向西推進到太平洋，向南推進到大河，農業領域遠比工業機器擴展得快。甚至在一八六〇年，美國還是絕大成分農村的；許多觀察家認爲內戰不是一個方興的工業主義與一個擴展中的農業的鬭爭，而是棉花大王與小麥大王間的鬭爭。

可是最後還是哈密爾敦得勝，至少在經濟方面。被接受的是他對銀行的意見，被採取的是他的重商主義牌子，成爲美國福音的是他的「工業報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哈氏死於衛豪世 (Weehawken) 決鬭場百年之後，合衆國是世界上最大工業國。它開發出的煤鐵，鎔冶出的鋼，排流並提煉出的油，鋪設的路軌，建築的工廠，比世界上其它國家更多。蒙蒂苗洛 (Monticello) 哲人(哲斐孫)善終百年之後，製造品的價值五倍於農產物的，金融巨人和工業爵士指揮操縱華府的政治，農民似乎有變成農夫的危險。

這美國經濟的迅速轉變，雖有政府政策的幫助，却是完全自然的。美國工業發展的基礎有六：比天賦與其它民族較廣大且衆多的原料，或者除却俄國人的；變原料爲製造品的發明和技術；充分勝任一個擴展經濟要求的水道和鐵路運輸制度；與人口增加同迅速擴展的國內市場，和外國市場的增長；不斷由移民輸入而更新的勞動系統；各州間各區間擾人的關稅阻礙的不存在，對付外國競爭的保護稅，政府直接間接補助津貼的維持。在這些基本因素上，也許應該加入企業心和自始就爲美國特徵的樂觀空氣。

工業革命基礎於煤、油、鐵，最後於電氣。在彭西凡尼亞和西維基尼亞的山裏，在意大利諾草原的草地下，沿大煙山麓，在干薩斯、科羅拉多（Colorado）、和德克薩斯幾百萬英畝的地下，有無盡藏的無烟煤和烟煤；軍新墨西哥便以足夠美國工廠一百年之用自豪。一九一〇年左右美國每年發掘五萬萬噸，但它的可用的貯藏被吸出去的不到百分之一。第二種基礎的動力大源——油，合衆國是同等的富庶。從一九〇〇年以來，美國的出產沒有一年低於世界其它各國的總出產量；在德克薩斯、俄克拉何馬、干薩斯、意大利諾、和加利福尼亞，油田的開發，解去這必要資源早竭的任何恐懼。鐵礦也豐富於蘇必利湖的四圍，於出產田納西煤鐵南方，於科羅拉多煤鐵稱盛的西部。開發進行半世紀後的詳細估計，指示礦藏至少再能維持二百年。自然又給合衆國比其它任何國家更大有力的水力，充分勝任於一個三萬萬以上人口的工業需要。

合衆國天然資源上一個顯著的事實是：許多資源大規模的得到，只在一八五〇以後。鐵礦從初期殖民時代以來已經開採，但使合衆國在鋼鐵上佔優勢，却是北密西根和蘇必利湖礦場開發以來的事。德瑞克（Drake）上校於一八五九年在西彭西凡尼亞掘得石油。五年之內，每年的出產增加到二百萬桶以上，幾千架鑽空機和幾萬萬美元沉下去，擁到石油地帶的人數與十年前擁到加利福利亞採金去的人數相匹敵。密西根從它的開闢以來就開採銅礦，但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蒙大拿（Montana）和阿利桑那（Arizona）富庶的鐵脈才經開採；一八八二年安那昆達（Anaconda）礦開採不久之後，整個蒙大拿成爲「銅王戰爭」的戰場，不但爲工業專利，並且爲政權而鬭爭。一八五九年科羅拉多富庶銀礦的開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內瓦達和蒙大拿的開發，深切影響

美國的經濟機構和金融政策。塞蘇里和意大利諾卡來納 (Galena) 區域的鉛礦在內戰前便已著名；但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鉛產量的大增加才使管子和印刷的廣大用途成爲可能。波特蘭 (Portland) 水泥在一八七〇的時候上市；電解法製鋁於一八八七年利用於商業的生產，一九〇〇年左右生產量超過七百萬磅。當亨利·亞當斯參觀一八九三年的世界哥倫布博覽會，他看見發電機，認爲它的發現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在這世紀的時機，美國工程師把它裝置到大水閘上去並準備拿電替代蒸汽。

美國人所取得發明品的專利特許大概比任何其它民族較多且較機巧。在一八六〇和一九〇〇年之間，得到合衆國專利特許局准許的不下六十七萬六千件；從那時以來，數目幾乎達到天文數字。重要的發明品原始於十八世紀之末或十九世紀的初年——惠特尼 (El. Whitney) 的軋棉機，福爾敦 (Robert Fulton) 的汽船，何威 (Elias Howe) 的縫紉機，古德立 (Charles Goodrich) 的硬化橡膠，和差不多同時由麥科密克 (Cyrus McCormick) 胡島 (Obad Hussey) 所發明的收穫機。但新器械的大規模生產等待鋼鐵工業的發達和電在工業上的應用。

略舉幾種最奇特的新發明品，令人聯想到它們在造成現代美國中所任的職務。在墨西哥戰爭前，莫爾斯 (Samuel F. B. Morse)，一位由繪畫轉到科學的美國雷奧那多 (Leonardo，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家科學家)，已經研究出電報的原理，並勸說國會補助從華府到巴爾的摩電綫的裝設；一八五六年西部聯合公司組成，利用這發明，不久它和其它公司在大陸上布設它們的桿子和電綫。敷設大西洋海底電綫的努力開始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但到一八六六年大東公司 (Great Eastern) 才展開一段從紐芬蘭到愛爾蘭永久成功的海底綫：聯合通訊社 (Associated Press) 以將近六千萬美元的代價，迅速的傳達普魯士王威廉對他國會的演說全文，這樣使美國人能了解應用科學的利益！一八七六年，一位蘇格蘭移民柏爾 (William Graham Bell)，展覽一架電話器，幾年功夫，每個公事房裏都有一具電話匣子，只見大城市的街頭上被電綫遮暗了。二十五年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結合有二萬五千萬美元的投資。



運輸的進步和國家的擴張並進。自動區對信號、空氣制動機、車輛聯結器、和一九〇〇年以後鋼車的應用，使鐵道旅行減少危險；普爾門 (Pullman) 睡車的開始使旅行更舒適。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初，美國人在試驗電力鐵道，在那十年底之前，也許有二十個城市——巴爾的摩、波士頓、和里士蒙在內——已經有在頭上觸輪操縱的街車。汽車摩托車的發明出現於九十年代。福特 (Henry Ford)，他的工程技巧和專業敏銳很有力於把它做成一個普遍的需要，追述起初：

它被人認為有礙的東西，因為它起了一陣騷鬧，又嚇動馬。它又阻礙交通。因為我假使停我的機器在城裏任何地方，當我能再動身之前，一羣人圍上它。如果我放它獨自立着，甚至離開一分鐘，好奇的人常試試開動它。末了我要帶一根鍊子，無論到那裏，當我離開它時，我把它拴到一根路燈桿子上。

同時十年內，看見郎格利 (S. P. Langley) 的「飛行機」的大膽試驗，這東西在嘲笑它者還生存的時候，便已改變各國的命運。

發明加速實業的速度，引導大羣婦女和「白衣領子工作者」進公事房，並擴大交通的重要。電話很快成爲每個公事房和商家的附屬物。打字機，休爾斯 (Sholes) 和格立登 (Glidden) 兩位密爾華基地方發明家的共同出品，於一八七三年上市。第二年，杜溫 (Mark Twain) 打出一封信：「人可以仰後坐在他的椅子上做事。它堆積非常大一堆字在一頁上。它不塗污東西，也不灑墨水點子在四圍。」當這機器到處都有，每個公事房有它的青年女打字員一部分。計算機和銀錢收支器保證會計上的正確；姓名住址印寫機能使社會大眾受不速而光顧的廣告和宣傳品的攻擊；卡片目錄把美國的圖書館做成世界上最優良最便利的。鑄造排字機，霍氏 (Ho) 迴旋印刷機，和電版印刷術造成新聞紙和圖書印刷的一個革命。

對工業、運輸、和交通都十分重要的電，密切影響美國的社會生活。一八七八年，一位青年工程家布拉希 (Charles Brush)，請得專利一種弧光燈，這燈立即被幾個企業城市採取作街燈。更實用的是愛迪生的白熱電燈，愛氏準備當卡斐爾 (Garfield) 當選總統的時候，屆時用它照明卡氏住宅。電力發光的商業可能性是巨大

的。一八八二年，愛氏建立一所發電配電站於紐約，幾年之內，敏銳的實業界人士獲到裝備城市電力獨占的特權——醞釀動力的爭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愛氏試驗一種活動電影機；十年之後，電影的商業歷史開始，這有力的媒介被送作征服的事業，使它帶美國語言風俗和其它到地球的遙遠角落上。無線電廣播，在它的社會關係上有同等重要，實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終了以後；二十年後，每個家庭有它的收音機。電話、電燈、電影、無綫電無可限量的增加生活樂趣和眼界，無論好壞，它大有刀於打破孤寂且使社會習慣標準化。因為它們的實際利用需用巨大資本投資和大規模組織，它們很加速大實業的成長。

第一條橫越大陸的路綫完成四十年之後，鐵道網大體完成，每年載運十萬萬噸的貨運；商船從長久的蕭條中恢復，足夠使美國旗子再受七個海洋所熟悉；五千萬噸礦沙和穀類經過蘇聖馬利連河 (Sault Sainte Marie Canal)；巴拿馬運河將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聯結起來。歐洲的織機嚙求美國棉花，它們的工人要美國小麥和豬肉；阿坡馬託克斯休戰後半世紀中間，合衆國累積有利的貿易差額總計二十二萬五千萬美元以上，一九一〇年左右的每年出口額超過二十萬萬元。

勞動供給繼續充填要求，大部分勞動是廉價的。從田園和鄉村，從婦女兒童階層，從意大利、奧大利、和波蘭豐滿的城市，幾百萬工人湧進工業中心。一八七〇以後三十年內，靠工資生活者總數從一千二百萬人增加到二千九百萬，但從事製造業的從三百萬以下到七百萬。更明顯的事實是工業中婦女的比例從八分之一增加到五分之一，同時期十至十五歲的童工數目增到一百七十五萬人。一個不斷加大的移民數目，從比較貧乏和技巧較低的南歐東歐人民中聚集前來；二十世紀的頭十年帶來奧匈帝國的苦惱人民二百萬人，從意大利來則又二百萬，從俄國來的一百五十萬。他們大多數願意作他們能得的任何工作；一九〇九年工廠中的平均每年工資只五百美元有零！

在興起的工業主義模範中，還有一個原素需要論到，就是政府的職分。內戰之後一代中，實業利益團不但受國家的委託擔任，並且受州立法議會的。建立於戰時、作爲緊急對策的保護稅制，繼續施行，鐵、鋼、銅、

大理石、羊毛出產、織物、和盜器工業是特別有利的受惠者。國會給予鐵道津貼，為各州和地方社會所做效，直到鐵道在土地、材料、免稅、和其它給與上總共得到大約七萬五千萬美元的收穫。政府當局對霸佔土地、採伐木材、和在公地上畜牧，都採滿足的態度；許多豪富確立基礎於開發國家財產。國會很少表示管制私人企業意向，法院以實質的特許給各州來的限制性的立法。直到世紀轉變後，強烈的個人主義才受到有力的詰難。

### 鋼鐵

我們要在被證明為美國工業發展的最重要一章，鋼鐵故事中，求出這些因素的相互關係。鐵礦在美國，從最初殖民地時代已經開採。一六一九年柏克萊 (John Berkeley) 在維基尼亞的小瀑布 (Falling Creek) 建築一處冶鐵廠，一百年後，白德 (William Byrd) 寫過一篇他的西部「礦場的進步」(Progress to the Mines) 的生動記事。在海灣殖民地 (Bay Colony)，一個冒險進取的公司得到無代價的土地、免稅、和建立一個冶鐵廠的專利。綠山少年領袖阿倫創立一座鼓風爐於康納第格的立取麥爾德山 (Litchfield Hills)，西尖附近的斯特林冶鐵廠 (Sterling Forge) 鑄造橫攔赫德孫河以阻英艦隊的最大鐵練。初期鐵工廠最重要的在北澤西的拉馬波斯 (Ramapos)，後來古伯 (Peter Cooper) 在那州創立一個大工業，休惠特 (Abram Hewitt) 在那裏開始敞爐鍊鋼法。一八〇〇年以後，繁盛的鐵廠興起於阿利根尼山以西，於皮芝堡，這地方有礦沙、煤、石灰石、和燒炭木料的巧合；這裏建立的鐵廠，及時鑄出砲彈為海軍司令培理 (Commodore Perry) 和將軍賈克孫之用。

可是這些初期冶鐵廠是小事。遲至一八五〇年全國生鐵出產每年只五十萬噸，製鋼工業還不足輕重。增產的前途還不佳，因為鐵礦沙的供給不充分，製鋼的成本太高。後來有工業史上最驚人的一個革命。一八四四年，奔走於威斯康辛和上密西根交界上的測量員，注意到他們的指南針兩邊亂擺動。他們報告黑礦而露出很

大。世代以來，印第安人已經傳說一個神怪的鐵山故事；一八四五年一位名叫馬志吉基 (Maclintic) 的吉布華族 (Chippewa) 酋長，引導一位踏勘銅礦者到馬奎特山 (Marquette range)，俯瞰蘇必利湖，不久有幾百熱狂找財的人蜂擁到荒野，用樁子立標識，宣告銅鐵所有權。用鐵道運輸沉重的礦沙，艱難又費錢，水道成爲必要。密西根計畫一道運河圍繞聖馬麗河 (St. Marys River)，聯結胡倫和蘇必利湖，可是，甚至美國制度創立者克萊，嘲笑這觀念。他說，「這是個合衆國最遠居留地以外的工作，如果不是在月球上。」私人企業和青年哈維 (Charles Harvey) 推進的活動開鑿這條運河。它開放航行於一八五五年，長久以前，比世界上任何其它運河載運的貨都多。船塢建築於馬奎特，阿士蘭 (Ashland)，和愛斯干那巴 (Escanaba)；梅諾密尼山 (Menominee range) 開放，密西根湖西岸和跨立密西根威斯康辛交界極富的戈其必克山 (Gogebic range) 擠滿人之後，強大的「紅肚子」船隊載運幾百萬噸礦沙到遙遠的工廠。

長久以前，北半島的礦藏，和蘇必利湖以西的相比較，便小巫見大；實在，那大湖四圍整個是鐵礦。一位測量員於一八七〇幾年中偶然發見銀朱山 (Vernilion range)；一八八四年，東部的資本已築起一條鐵路聯結它和諸大湖，二十五年內銀朱山運出礦沙三千萬噸。這時杜魯斯 (Duluth) 的麥立特氏 (Merritt) 五弟兄，心裏祇有鐵這神祕信仰和他們找鐵的命運所灌注，已經巡遊於湖西的荒野。杜魯斯西北七十五哩，在大陸的分水嶺上——密西西必流向海灣，多雨河 (Rainy) 北流入哈德孫灣，聖路易東流入諸大湖——他們找到麥沙必 (Mesabi)，「一切鐵礦之祖」，世界上最奇富的鐵礦脈。這是一八九〇年的事。兩年之後，一條歪倒的鐵路推進森林、叢林、和沼澤，載出百萬噸礦沙。十年之內，麥沙必已經把四千萬噸吐進皮芝堡和芝加哥的大轉爐裏。

這些北明尼蘇達鐵礦藏有世界上其它礦藏所無的優點，大有力於美國在鋼鐵生產上的優勢。它們實在是無窮竭的。鐵礦沙不生於岩石脈裏，不深嵌在地裏，而正在地面下疏鬆的礦床裏；正像一位麥立特氏少年所說，「假使我們發了瘋，腳踢我們站着的地方，我們能踢出含鐵百分之六十四的礦石，假使我們踢得更使勁，能踢

出松針來。」礦沙成分異常的純，它能用大汽鑪抬出；它密近諸大湖，可以在低價下輸往工業區和煤區。

但如何把紅礦石變成白鋼？在肯特基的愛狄維爾 (Eddyville) 小鎮，內戰年幾前，一位名叫凱萊 (William Kelly) 的製鐵者，偶然幻想到他能以冷空氣吹過鐵使鐵成鋼，並且證實這完全不是幻想。不久之後，英國工程師柏塞麥 (Henry Bessemer) 也用同樣的觀念。他不但證實它，並且成功的應用它，而凱萊卻煩惱他的發明外沒有得到什麼，柏塞麥却結果發了一筆財，得到爵士的封號，和震動世界的聲譽。凱萊柏塞麥鍊鋼法最後完成的，本身是個單純之事。鎔化的鐵礦沙倒入珠狀的容器內，把冷空氣通過這容器。空氣中的氧氣與鐵中的炭和矽起了聲音尖銳和怒吼的大戰，轉爐口上噴火如神話裏的龍，火鍊向空中跳起四五十呎高，顏色從紅變紫，從橙變白。十分鐘內，原素戰爭終了，鐵礦沙裏的雜質被燒化，轉爐傾下，把發熱的鋼灌向模型裏。後來一個新的製鋼法——敞爐法——代替柏塞麥法，但在緊張的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中，柏氏法佔到優勢。

鐵礦、煤、和科學使鋼工業成爲可能；保證它的成功，需要企業心、技術、和資本。引導白人到馬奎特的印第安人馬志吉基，開築蘇運河 (Soo Canal) 的哈維 (Harvey)，發見麥沙必的隆麥立特 (Lon Merritt)，發明轉爐的凱萊和柏塞麥，每個人都有大貢獻；射光燈現在要集中焦點在工業史的最大姓名上。卡匿奇已從蘇格蘭的丹斐謨林 (Dunfermline) 來，這十二歲孩子的父親，一位織布主人，被工廠制度的降生所破產。他們有親戚在皮芝堡，他們搬家到那阿利根尼和摩農卡希拉 (Monongahela) 交界的、興旺的城市裏。卡氏得到捲線生的工作，出師後做到管蒸汽鍋工人，做電報房工作，最後在彭西凡尼亞鐵路上做事。他爲人誠實、聰明、勤勉、且靈敏，他的從不離變的、令人可親的態度，博得老輩人士的信任和友誼。在他三十歲前，他從精明的油鐵投資上和快車睡車公司上，每年有四、五萬美元收入。一八六五年，他決定放棄他的其它利益，集中在鐵業上，這是他眼光的聰明處和勇敢。幾年之內，他已經組織或收買公司從事造鐵橋、鐵道和機關車。當他在三十歲時，他遷居紐約，開始爲他的許多公司做行商，並爲不少鐵道與鐵業做經紀人。他後來確言他已售賣三千萬美國證券與倫敦；他頗有力把它們弄好。這樣，即在他完全着手鋼業以前，他已經和五、六種在美國經濟發展

上注定做重要角色的工業發生關係，這些工業是電報、鐵路、油、普爾門車、快車公司、和鐵。

卡氏採取柏塞麥法雖慢，當他看見它時，他的意見已完全轉變；一八七五年他在摩農卡希拉岸上布拉多克的戰場上建立的工廠是美國最大的。一年之內，這廠造出的柏塞麥鋼，比全美國其它各廠所出的總數還多。注意每種新進步，迅速利用困難時期收買或壓倒他的敵人，密切聯絡彭西凡尼亞和其它鐵路，有敏捷的助手像弗立克（H. C. Frick）和希華布（Charles Schwab）的幫忙，卡氏居於一個戰略地位以確保他在鋼鐵工業界的領袖位勢。他的領域一年大似一年——新廠，焦煤產業，蘇必利的鐵礦，大湖汽船隊，意大利湖上一處碼頭市鎮，和一條聯絡鐵路。實際上它是個信託組合。他的鋼鐵工業和其它十多種工業密切相聯，它能夠得鐵路和輪船的所有條件，它有擴展所需的充足的資本，最優良的工人，最敏銳的經理人。在美國所見的沒有能和它相匹敵，雖然羅克斐勒的「帝國」正在建立正有同樣的勢力。一八七八年投資一百二十五萬美元，它的每年贏利不久便到二百萬，後來達到五百萬。一九〇〇年，這事業增資到三萬二千萬，每年出鋼三百萬噸，獲利四千萬美元。

一個重要因素仍舊存在——勞動。鐵工業的經驗和卡匿奇公司的經驗可為代表。初期的鐵礦礦工多數是從康華爾（Cornwall）和威爾士招雇來的；後來來的有瑞典人、芬蘭人，在他們之後又一大羣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在燒爐和熔鑄鋼鐵的火熱球倒進模子的工人中，可以追溯到同樣的進程。一九〇七年的調查顯示卡匿奇各廠的工人三分之二以上是外國生人，這些中大多數是來自南歐和東歐。他們身體強壯——他們需要一天做十二小時工作，一星期做七天，在一個酷熱和響聲的地獄中。因為無技巧工人的供給很充分，工會在工業中很少進步；當它們有進步，它們便被無情壓倒。卡氏的勞動政策是澈底的壞。

在這工業的興起中，具有一切世界領袖資格的主要因素：原料、運輸、科學和發明，管理的技巧和企業心，低價的勞動，最後，有鐵道的發展和建築構造鋼料的應用，保證市場。另一個暫時需要的因素是對付外國競爭的保護。一個由鋼鐵主人指示條例的關稅關心這層；一噸鋼軌徵收二十八美元是禁止的稅率，甚至卡氏及時認為它最好該降低。

有這些保護為主，美國鋼鐵的冶鍊得以前進。一八九〇左右，出產已超過英國的；一九〇〇左右，合衆國出鋼多於英德兩國之和。一九二〇左右美國鼓風爐冶鍊生鐵二千七百萬噸，鋼四千二百萬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需要顯示生產能力必要時可以提高到八千五百萬噸。

在最後一點上，卡匿奇公司的歷史也表明美國大實業的興起。這有膽識的蘇格蘭人好久便已做工業的盟主，但他要壟斷自然資源、運輸、和有關鍊鋼的工業計劃，却很不可能。羅克斐勒擁有最有價值的麥沙必各礦和一隊大湖汽船；田納西煤鐵管轄南方的巨大產業；新的鋼鐵公司，像聯邦、彭西凡尼亞、美國鋼線，都起來和卡氏的優勢相爭。受競爭的刺戟，卡氏表示意在獲得新礦，修造更大的運貨船隊，着手製造鋼鐵管子、刺鐵絲、洋鐵版、和百種其它貨品。一個有毀滅性的戰爭出現於工業上，鋼鐵界人士感受恐慌，轉到聯合的想頭。卡氏寧願犧牲他自己，變買他的產業，不願競爭；他已是個老年人，久想退休，捨出他的金錢。他同意人向他建議，把他的產業和一個新組織相融化，這新組織要包括美國重要鋼鐵產業的大部分。一九〇一年，合衆國鋼鐵聯合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產生，資本十四萬萬美元——一個比一世紀以前全部國富還大的數目。銀行家摩根 (J. P. Morgan) 氏適合的管理這組合，羅克斐勒 (John D. Rockefeller) 恐怕在這事業上收得最豐厚的贏利。

### 信託組合和專利權

合衆國鋼鐵聯合公司表明一個已經進行三十年、並且繼續到今天還不減弱的過程。這是獨立的工業企業的聯合，成爲聯合或中央化的「帝國」。卡匿奇公司據它的權力的最高頂，不過是六百來鋼鐵公司之一；合衆國鋼鐵聯合公司是設計以吸收或排除這些中的多數，並鍊造美國鋼產的三分之二。在另一世代中，兩百家大聯合公司做美國的組合實業，三十萬家小的做其餘一半。

林肯時代的合衆國是個小企業的國家。專利權實際上還不知道；古老的阿斯脫皮貨公司 (Asdor Fur Co.)

和新組織的西部聯合 (Western Union) 是從殖民時代微弱的王家專利以後最近乎專利權的東西。許多社會集團，尤其在北方，實質上是自足的。家具來自當地木器匠，鞋子自鄰近鞋匠，肉類自小屠戶，車輛自大眾造車者。製造業和礦業散布稀疏；兩千多家廠子製造犁頭、耘器、和刈禾器；彭西凡尼亞一州有二百多家煉油廠，一百家廠家分康斯託克 (Constock) 礦脈的財富。四十年後，這一切都已改變。國際收權機公司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幾乎製造一切農具；美孚 (Standard Oil) 實際已專利煉油；兩三家東部聯合公司擁有並開採康斯託克。

改變開始於內戰時候，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和革命的速度並進。敏捷的實業家看出他們倘能把相競爭的廠家團結成一個單一的組織，他們能減低成本，並且——更重要的——控制價格。達到這些目的的初步工具是聯合公司，再是合資，再是信託組合（托辣斯）。聯合公司是一種手段，用以造成買空賣空的人，他們能享受一切法律的便利，但逃避大部分人類道德的責任。它享受一個永久的生命，流通債券發行的權力，債務的有限責任，和遵從特許狀的約束在全國各地經營業務的權利。信託組合實際是聯合公司的一種合併，各公司的股東把他們的股子放在董事們的手裏，董事們可以管理一切業務。後來「信託」這一名詞的意義成爲任何實業大合併。信託組合的便利也很顯著。它們便大規模的合併、中央化的控制和管理、排除效率較低的單位、謀專賣權的利益、藉它們資金的勢力以擴展、與外國公司競爭、驅除勞動艱境、要求鐵路給以有利條件、和在州與國家政治上發生巨大影響，都成爲可能。

合併是個遍於全世界的現象，但它在美國比在任何處——或許除却德國——更明顯。那是部分因爲廣大的資源等待開發。但還有其它原因。鐵道系統的完成給與製造品一個國家市場的保證。專利法律給真確重要的方法一種獨佔權。寬大的土地租讓和土地法律的自由解釋有益於公司手裏，使它們夠有力量從事大規模開發木材、銅、或煤。聯合制度使一個公司能結合在一個法律自由的州裏，而在其它各州裏進行業務；保證制度阻止外國的競爭。



領導先路的是美孚油公司。西彭西凡尼亞的產油廠家從事兇惡的競爭時，一位沉默嚴肅的、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地方的青年實業家趕緊進行收買當地煉油廠，合併它們為一個單獨的公司。他的兒子後來說，「美國美麗玫瑰花能開得華美芬芳，只是犧牲初時長在它四圍的芽。」一八七二年，羅克斐勒乘短命的南方進步公司 (South Improvement Co.) 的組織、和紐約中央與意大利兩鐵路減價的機會，獲到在克利夫蘭的煉油主權。那事成功後，他繼續進行，控制到在紐約、費城、和皮芝堡各地的煉油權。一個宏大而有效力的市場系統建立成功。接着是油管的控制，十年之內，羅氏擁有運輸和提煉石油的實際專利。一八八二年美孚油公司以第一家大信託組合出現；被俄亥俄法院所解散，它立刻以一個取締公司 (Holding Company) 重新結合於新澤西的較寬的法律下，並且安然進行它的事業。一九〇〇以前，羅氏已從石油工業混亂中整理出秩序，創除他的競爭者的大半，聚有一宗非常的產業，造成美國的最大專利。

其它信託組合和專利事業迅速起而效尤；棉花子油在一八八四，亞麻仁油在一八八五，鉛業信託組合、威士忌酒信託組合、和糖業信託組合在一八八七，火柴信託組合在一八八九，烟草信託組合在一八九〇，橡膠信託組合在一八九二。進取的實業家，隨着羅克斐勒和卡匿奇的地步，開始為他們自己畫出高貴的領域。四位大包裝家，為主的是阿爾摩 (Philip D. Armour) 和斯威夫特 (Gustavus F. Swift)，建立一個「乾牛肉信託組合。」古根漢 (Guggenheim) 的公司控制到阿利桑那、布特 (Butte)、和蒙大拿的銅礦，那裏「世界最富的小山」三十年內出產約值二十萬萬美元的銅。麥科密克氏在割禾機上建立優勢，當他們的地位受威脅，他們成立一個組合國際收穫機公司，壟斷這事業。杜克氏 (Duke) 成立一家烟草大組合。在銀、鏢、鋅、橡皮、皮革、玻璃、糖、鹽、爆竹、雪茄、威士忌酒、糖果、油、煤氣、和電上，有同樣的故事。一九〇四年的一個調查，指出三百十九家信託組合，資本七十萬萬美元以上，合併以前獨立的營業約五千三百家；一百二十七家有專業，包括鐵路在內，資本一百三十萬萬以上，吸收小企業約二千四百家。

一般人的生活，尤其是城市居民的，深被這發展所變化。他所吃的穿的，房子裏的設備，用的器具和運輸

工具，幾乎樣樣都是信託組合製造和管理的。他早餐吃的醃肉是乾肉信託組合所包裝的，調味雞蛋用的鹽是密西根食鹽信託組合所製的，沖咖啡用的糖是美國食糖信託組合提煉的，用一支金剛火柴公司 (Diamond Match Co.) 的火柴燃他的美國烟草公司的雪茄。他騎一部脚踏車信託組合所造的車子，或坐一個專利公司辦理、行駛在美國鋼鐵公司所製鋼軌上的電車去工作。大概他的食物比前一代好，運輸比前一代效率大。一般人所最注意的是信託組合在他的社會中實業生活的效能。地方工業乾涸了，工廠停業或被吸收，抵押權被押於東部銀行或保險公司，不是爲自己而是爲遙遠公司組合工作的隣人，冒險着他們不能管制的政策的興敗。

這種合併和結合的過程的進展，不僅在製造業和礦業上。在運輸和交通的領域裏更是顯著。西部聯合 (Western Union) 是最早的大結合，做它的例子者有倍爾電話組織 (Bell Telephone System)，後來有龐大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年老粗暴的海軍司令官樊德比爾 (Vanderbilt) 早就看出有效率的鐵道事業需要路線的統一，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已經把十三、四個分別的鐵路結合成一條單一的路線，聯絡紐約城和布法羅；當後十年中，他得到至支加哥和狄特羅的路線，紐約中心系統得以實現。其它合併已經在進行，不久國內鐵道的大部分組織成幹線或系統，由樊德比特、谷爾德 (Gould)、哈立曼 (Harriman)、喜爾 (Hill)、和銀行家摩爾根、貝爾蒙所控制。哈立曼 (H. H. Harriman) 把意大利諾中央、聯合太平洋、南太平洋、和六條其它路線連結在一起，打算造成一個全國的合併。最接近到那夢想的實現者是銀行家摩爾根。

摩爾根家的興起，說明合併過程的最後並且也許最重要的發展——所謂「銀錢信託組合」的造成。曾經長期從事售賣美國證券給英國投資家的裴尼斯·摩爾根 (Junius Spencer Morgan)，於一八六四年位置他的兒子皮爾邦·摩爾根 (J. Pierpont Morgan) 負責他的一家美國分行。幾年之後，小摩爾根和一家老銀行業德來克賽爾 (Drexel) 合夥於費城，一八七三年，德摩公司的事業強大得已夠和科克 (Jay Cooke) 分擔整理七萬五千萬美元的國債。同年，科克顯著的失敗使摩爾根家留在堅固的地位；幾年之後，它收拾大量在海外的紐約的中央債權，它的聲譽造成。這種和紐約中央的聯結，指出後二十年這家主要金融活動的道路。

十九世紀整個八十年代中，摩爾根改組並整理鐵道，伸展他的影響進入他的主要活動圈更廣闊。一八九三年的恐慌把國內鐵道長度的一半拋給領受者手裏，鐵道事業者到處向「主神」摩爾根求救他們的困難。一部分因為這事業有利，一部分因為它是維持銷售國外債券健全的要素，他答應了。當恐慌的陰雲吹散，摩氏財產團支配十幾條主要鐵道線——紐約中央、南方、折沙比克與俄亥俄、聖大費、洛克島 (Rock Island)、和其它許多條。

這時摩氏的產業擴展進其它範圍，到二十世紀的開頭十年中，主要的事業很少不受摩氏家大影響的。摩氏管理聯邦鋼公司的財政，做成巨大事業，結果是合衆國鋼公司。他把相爭的農具製造廠聯在一起，實現國際收穫機公司。他在命運不佳的國際商船中組織美國船業，管理總電、美國電話電報、紐約快運公司、和其它十幾家巨大應用事業的財政。一九一二年，一個國會的委員會查明摩根氏和威廉·羅克斐勒 (William Rockefeller) 控制的銀行家擁有三百四十一家鐵道、航業、應用事業、銀行、快車公司、煤、銅、鐵、鋼和保險業的指揮權，有總計資源值二百二十萬萬美元。威爾遜說，「美國的大專利是銀錢專利。」

什麼是合併成長和信託組合興起的意義？它造成一種在外居住者所有權的制度，比歷史上的任何事都更遠大——紐約聯合公司擁有管理的廣大的煤、銅、鐵、木材、鐵道等產業。它把支配萬民福利的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裏，這權比許多君主所支配的還大。它把全國經濟管理集中於東北部一小區域裏，造成新的區域主義，代替舊的。它把所有權從管理上分開，把它寄存在幾萬證券持有人手裏，這些持有人沒有責任觀念，也不知道他們公司的財政或勞動政策。它造成資本的新聚合，力量夠指揮州的政策，甚至指揮國家立法機構，且影響對內對外政策。它無疑的排除去大部分殘忍的競爭，成就較大的效率，貸出款項為改良研究的需用，並且做成大量生產和低廉價格——但全使社會出重大犧牲。

## 政府的干涉

卡匿奇稱這一切爲「勝利的民主」；其他人士誠然要承認這是勝利的，但完全確信這不是民主。實在，他們看看週圍，見到一大部分自然資源、工業、鐵道、和其它應用事業，被控制爲極少數人們的利益，不是爲社會的，他們懷疑民主能否持久。非法的負擔，不平的待遇，鐵道不分皂白的霸佔土地，羅克斐勒和卡匿奇壓倒競爭者的不正當手段，許多巨大聯合公司打倒勞動用的野蠻權力，信託組合私取從科學和發明來的儲蓄，組合公司代理人在州立法機構運動有利的法律、和公司律師在州稅或管制條例中尋找漏洞這現象，都引起普遍的驚駭和嚴酷。

在普通法律上，專利久已是非法的，許多州憲法包括條文禁止它們的存在。但是這些憲法的禁令幾乎完全無效。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許多州寫出更嚴密的法律在它們的法令書上，有些甚至帶着別特惡臭的記錄解散信託組合。但一個在這州被解散的信託組合可以在另一個法律比較寬厚和實行鬆弛的州裏組合，繼續在同樣地位上營業。這明顯是聯邦的，不是州法的事。

早在一八七六年，富翁哲學家古伯，爭綠背票統轄的選舉，勸告人們說，「現在對我們自由制度的危險，只是少於在暴亂的開始。……在這國家裏，堅固的形成一個財富的貴族政體，這政體是能加殃於任何國家的繁盛的最壞形式。」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末，因繁盛的重來，騷擾漸漸衰亡，但八十年代裏，美國又一度趨於信託組合的意識。一八八四年左右，有個反專利黨在野，但在預測民主黨回復到政權的興奮之舉中，它吸引很少的選票。另四年裏，五六家大信託組合的組織使美國注意到危險。克利夫蘭總統告訴國會，說「應該受謹慎約束的法律產物和人民僕役的組合公司，迅速的成爲人民的主人了。」各大黨都繼續記錄，反對任何方式的專利。

這一切騷動的最初的實際結果是在鐵道規程裏。早在一八七〇年左右，受害的農民高呼反對鐵道專利，指摘它以過度的運費欺詐他們，服務不良，並且引避幾百萬英畝離開市場，爲投機之目的。在農田組織像農家秘密協進會 (Grange) 的命令下，西部中央各州在他們的法令書上加上法律，限制鐵路收費的價格，法律上不保

讓折扣、給優惠的運貨者特價、在同一路上短距離收費多於長距離、和免費通過這些行爲。這種立法，立即被鐵道所詬難，因爲它「未經過適當的法律手續」，褫奪它們的財產，又因它侵犯國會管制州間商務之權。

在一串一八七六年有名的判決案中，特別是孟氏 (Munn) 對意大利諾案，法院支持州的立法，因爲任何影響公共利益的或供公用的財產須服從政府規則。但關於州的侵害聯邦規則的領域，法院的地位是不分明的。後來的判決案，弄清楚使各州能管制完全地方性質的商務；假使它有任何一點是州際的，各州不能料理它。那是在國家政府的專有控制之下。多數商務是州際的，這把爭端完全推給國會。

國會以一八八七年的州際商務法案來應付。這法案，設計從價格戰爭和減價的惡果上拯救鐵道、並保護公眾，禁止壟斷的合資、折扣、價格或服務上的不平等，並且規定一切費用應當公平合理。比這些幾分含混的禁令和需要條件更重要的是規定一個州際商務委員會以監督這法案的施行。這是許多行政局的第一個成爲這樣重要的，構成政府的第四部。州際商務法案久已無效，但新法律像一九〇三年的愛爾金斯 (Elkins) 法案和一九〇六年的海普邦 (Hepburn) 法案，有委員會和法院的較強硬的實行，足以屆時除去最壞的鐵路惡習，並在價格和服務上建立有效率的管制。

管理鐵道的工作，比起管理信託組合爲相當簡單。恐怕基本的困難不是源於事業的廣大和複雜，而是在美國人心理的紊亂。美國人畏懼大實業，但他們也讚美它。他們想保護自己，不受專利的危險，但又想享受大量生產和剷除浪費重複的利益。他們信仰政府的管制實業，但同等熱烈信仰私人企業和嚴格的個人主義的美德。他們所實在需要做的是肅清信託組合，不是粉碎它們。如狄奧多·羅斯福總統 (Th. Roosevelt) 在他的一篇後期信託組合咨文中所說：

我們的目的是廢棄組合公司；相反的，這些大聚合是現代工業制度的一個必要部分。……我們不是攻擊組合公司，但努力除去在它們裏面的任何罪惡。

他的兩端論法被美國的談諧者頓氏 (Finley Peter Dunne) 鼓吹爲一段伶俐的遊戲文字：「推力是熱烈的怪

物，由開明的企業所造成，在大有貢獻於我們心愛的國家進步的人們之上。一方面，我要踐踏它們在腳底下；另一方面，不這麼牢緊。」

這實在正代表國家的態度：不是這樣堅強。當然，國會沒有堅強前進。各州顯然不能單獨和信託組合問題相競爭。國會不得不採取處置。一八九〇年的錫爾曼反信託組合法案，使一切契約、合併、或約束貿易的陰謀、和一切專利，都失去法律保護。這被普遍假定，這種立法將給政府一個會，在這些巨大組合公司如美孚油與大合併如威士忌酒和糖信託組合之上。但當政府薄弱的試行解散一些專利事業，法院支持它們，它們愉快的進行自己的路。難壓服的頓氏說，「在常人看來像道石牆的，對律師是凱旋門。」這失敗這樣動人心目，在錫爾曼法案後的十年，有些最大最出名的信託組合的成立出現。只關於勞動組織和罷工，法律顯示無疑的可能性，因為法院堅持勞動協會以罷工或其它行動拘束貿易時，它們是違犯法令。民衆痛切的感覺到一個表面上爲破除工業專利而設計的法案，正被用來撲滅罷工。

有合衆國鋼公司的組織，公共非難的風潮爆發。從報紙和會場上來了批評的激流。書籍像塔伯爾的美孚油公司史 (*The Tarbell's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和羅素的世界的最大信託組合 (*Russell's The Greatest Trust in the World*) (乾肉信託組合) 和勞森的瘋狂金融 (*Lawson's Frenzied Finance*) (銅信託組合) 銷售以數萬部計，而大實業罪惡的暴露充滿於一般新雜誌像麥克魯爾 (*McClure's*)、人人 (*Everybody's*)、和科立爾 (*Collier's*) 並且擠進舊日有地位雜誌的篇幅。這批評是這樣流行且強烈，使二十世紀開始的十年被稱爲「除糞夫的紀元」。

要求更有效的實行反信託組合法律，這事是不可抵抗的。狄奧多·羅斯福具有熱心的答復。他說，「盡着反信託組合法律下去，它們將被實行；當着手訴訟時，它將不和解了事，除非在政府勝利的基礎上。」總統指揮他的檢察長解散摩爾根、哈立曼、和喜爾三位最大鐵道主人所操縱的一個鐵道聯合，使得華爾街的人士失驚。在北方證券公司案上也是成功的。很快接着的是控訴包裝肉類信託組合、烟草信託組合、和美孚油公司，

在各案中，政府都現出勝利。

可是這些勝利，感覺成分過於實質成分。大專利事業的組成分子，被解散後，找到其它方法來維持一個利益團體。除却組合局 (Bureau of Corporations) 的產生，有效的對組合惡行應用「無情的公開」，羅氏並未做出什麼來加強反信託組合的法律。儘管他在法院裏的成功和他公開斥責「大資產的罪人」，信託組合當他任滿時比在他上任時更強有力。羅克斐勒顯然是對的，當他說，「合併現在要繼續下去。孤獨主義去了，永不再回來。」

## 第十四章 勞動與外來移民

### 勞動者與他的雇用

國家富源的開發，工業的機械化，專利的興起，把一般牢固的財富川流注入少數幸運的實業者和較多數機噐的投資者手裏。但它無絲毫利於負完全苦役的工人們。勞動是大實業成長的基本因素之一，但到分攤福利，它却顯而易見的被遺棄。當分配社會的報酬時，它也被遺棄；工人很少生活在合理的軌道上，他們不被請加入鄉村俱樂部，他們的領袖被專門學校和大學所漠視，它們每年只拿名譽學位贈送資本主人。新的財源應當有它的更普遍分配的意義，但那是遙遠將來的事；節省勞力的機噐的應用應該有縮短工作時間的意義，但那也是沒有達到的理想；科學應該保證工人較安全愉快的工作環境，但他們的大多數繼續工作於悶熱、響鬧、空氣不佳的工廠中，或被礦穴石坑的危險所環繞，從工業意外災害和疾病所致的死亡年年可怕的增高。聚集在大城市的貧民窟裏，暴露於衰弱和失業，和從國外或從南方來的未受訓練的工人羣相競爭，工人的命運毫無可羨。他們也找不出容易法子來改良他們的環境。組織和罷工被人帶着猜疑相看待，在立法機構和國會裏，勞動者的代表很少。

實在，有些最有貢獻於工業美國成長的發展是個對勞動的積極不利。這些發展中有兩件事我們可以簡單的加以注意：工業的機械化和組合公司的興起。從全體上看，機械化有助於降低勞動的標準。工人們辛苦獲得的技巧不再有它們舊時的價值，因為機器能做熟練技工所做的大多數事，做得更好、更便宜、並且更快。手工技藝的創造本能被破壞，工人降為機械程序的一單部分，自動機械整天中的每分鐘做着一些單調呆版的動作。像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在「叢林」 (The Jungle) 裏所描寫：



一具割草機的幾百部分，每部分都是分別製成的，有時經幾百個人的手。朱吉（J. G. G.）工作的那裏，有一部機器，切壓一塊兩方呎大小的鋼；鋼塊落在扁盤上，人的手要做的只是把它們堆成排子，時時掉換盤子。做這事的只一個男孩，這孩子立着，眼睛心思都集中這事上，指頭動得這樣快，使鋼片互相敲碰的聲音像晚上在睡車上聽快車的音樂一般。……他每天過手這些鋼片三萬塊，一年九百萬到一千萬塊——一生多少塊，等上帝來說罷。在他旁邊坐着一個人，彎腰向旋轉的磨石，在割機的鋼刃上做完成它們的工作；右手從一個筐子裏揀起它們，先把一面壓在石頭上，再壓另一面，末了左手把它們放入另一個筐子裏。這些人們中的一個，告訴朱吉，他說十三年來，每天磨過三千塊鋼片。

機器又有篡奪工人工業經濟上位置的趨勢。它代表一個巨大的資本投資，它每天能工作二十四小時，每星期能工作七天，它來決定工作環境；五十年來，火爐連續不斷燃燒，這事實任維持每天十二小時工作的鋼鐵工業上是確然的。最後，在一大部分失業中，機器負部分的責任。這大概是真的，機器結果造成的職業比它們削除的更多，但得到新職業的常不是同一的人，而且在舊人找到新工作之前常常有令人煩惱的窮困時期。大規模失業是機器時代的一個產物。

作為雇主的大組合公司的成長，也常不利於勞動。小規模的工業和它的工人並和它的社會有密切關係。工人們和地方雇主，比較他們和一些遙遠並無關係個人的組織能商量得更成功的條件。狄奧多·羅斯福對這說得好：

……舊日雇主雇工間的密切關係是過去了。幾代以前，東家知道他店裏每個人的情形；他叫他們的名字，畢爾、湯姆、狄克、約翰；他問候到他們的女人和孩子；他向他們說說笑話、故事，也許遞點烟給他們吸吸。在小事業裏，雇主和雇工間，有一種友類的關係。

管制無烟煤工業的大鐵道企業家們，和在他們礦裏工作的十五萬工人，或靠這些礦工吃飯的五十萬婦女兒童，中間沒有這種關係。……雇用上萬工人的大煤礦公司和運煤公司，容易辭退任何一個礦工。在另

一面，礦工不能辭退公司。他需要一個職業；他假使得不到一個，他的妻子要搥餓。礦工所要賣的——他的勞動——是個不持久的貨品；今天的勞動——如果不賣——便永遠拋棄了。

一位新英格蘭廠主，在一個參議院委員會前作證，簡明的說：「我從沒有和工人說過話。我的話全是對監工者說的。」

對合衆國是單有的幾個其它因素，限定勞動的福利。這些要素的第一個是內戰一代或這樣久以後，優良廉價土地的過去。說西部已是作爲勞動不平的「安全活門」或是這許多工人的避難所，這也許是個誇大。但兩三代以來，開放的土地已經使鄉間、鄉村、甚至城市和外來移民的過剩人口流出，是明顯的事。假使一八五〇至七〇年間的五百萬外來移民完全留在東部的工業城市裏而不聚集到鄉間的話。勞動地位要比它實際的狀況得多。由於農田漲價和優良廉價土地的絕跡，過剩人口留居於工業區域。農作不再是工廠的一個實際的二者取一之事。勞動不能再逃避於一個工業化社會的問題之外，而不得不立定面對那些問題。

第二個在工業國家中對合衆國特有的因素是連續且無限制的外來移民。從一八七〇到一九一〇，四十年內，有二千萬以上人民流入美國。甚至除去許多勞動的婦女兒童，這是說，每年有幾十萬應募者參加入勞動的行列，渴望得到工廠和礦場的工作，不論工資多少，工作環境怎樣。這也不是對比北方勞動的唯一競爭。在十九世紀時期後，幾萬強壯的黑人來自南方，準備取他們的地位，與波蘭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相比。不是每個國外新來者或從南方來者頂替一個工人；在勃興的時期裏，人人都能有工作，新來者常把本地工人推到頂點而不是擠出他們。可是這種大移動的一般趨勢是逐低工資，壓低標準，並且分裂勞動團體。

對於合衆國又是特有的第三個因素是一個國家經濟和一個聯邦政治制度的同時存在。在煤礦工業、紡織業、和鋼鐵廠裏的勞動問題，同樣的是國家的問題，但處置它們的權力，直到最近幾年止，還只歸宿在各州裏。競爭普遍於全國，但管制工資和工作時間的權利只在州裏。這樣，勞動在新英格蘭紡織業或紐約服裝店所贏得的重要讓步，只要這些工業遷移往法律較不嚴厲的州裏，這些讓步便歸無效。新政來到以後，這一切都改

變。聯邦政府設法在工業關係的整個範圍之上，建立國家的控制。

最後一件考慮的事應受注意：許多美國人對勞動工會所抱的深切猜疑，和他們的不願意以重視工業問題的同樣同情來接近勞動問題。一位著名的紐約居民首腦，瓦爾德 (Lillian Wald)，說過：

在我的早年，東邊 (East Side) 勞動工會被人們所害怕，當作社會主義者，後來，像今天看共產主義者。我記得在一些安適的人物——銀行家、工業家、一兩個律師——的席上，說起一位這些勞動領袖。當我偶爾提及我認識並且敬重一位「步行的代表」，每個人都停着刀叉，注聽我說話。我接着講到一個人，他曾在大衣匠人的先期的一次抗議中，反對勞苦工人的多數，把他們組織起來。我還記得當我說到這領袖和他的奮鬥時，人們的臉上現出沉重。

我們注意到錫爾曼反信託組合法案最初並最有效的應用於勞動：這是整個局面的特徵，直到近年，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實業上的聯合是好意義，但又不贊成的態度看待勞動的聯合；認為實業參與政治是應該的，但以為勞動這樣做便不是美國的；贊成政府扶助工業，但堅持政府扶助勞動是社會主義的或是向壓力團體的一種投降；主張投資者有天賦的權利取得他們投資的公平報酬，但主張一個工人沒有權利要求他勞動的任何報酬，能從他的吝嗇的雇主強要到什麼，並且失業是個上帝的行為。當美國學習到現代工業制度的問題，這些態度改變了，但他們就攔得夠長久，在組織勞動的路上放置嚴重的障礙。

可是我們千萬不要把工業時代的勞動環境畫得太憂鬱。大部分說，想工作的人夠有事做，工資雖很不相當，可是夠維持一家的一種衣食在。在合衆國，沒有像在許多歐洲國家的那種「勞動階級」，而常有機會從這職業轉換到那職業，從一個收入團體轉換到另一個。一位英國人在美國內戰剛過後，訪詢美國，敏銳的評論這情形：

美國一個工人的地位，和他自己階級中人之在英國者不很相同；倘使他有辦法，他可以去他願意去的地方，不必攜帶一紙身份證在衣袋裏。實在；這是公平的，在社會規矩上允許一個找工作的人需要一個

「東家」的身份，他可以要求，因為他需要一個。在這些事上，賈克和他的主人同樣的好。……美國已有成長為偉大的國家的希有優勢，不須經過封建制度的嚴重試驗，在它的進步當中也不會受起於階級自尊心的暴政影響所束縛。

的確，這情形改變了：如果工人沒有攜帶身份證，而黑名單的應用使許多「煽動者」得不到職業。但即使一位二十世紀的訪問者，在合衆國也找不出清楚的階級界線。免費公共教育使勞動者的子女能升上實業界或專門職業界；選舉是個有力的武器，工人如果適當的被喚起，能藉它督促立法者通過有利的法律。和生於外國的美國人談話的旅行家，很少找得着懊悔來到紐約的人，或打算回他們老家的人；不問什麼原因，幾百萬窮人繼續擠入合衆國。

### 在工會中有力量

實業組織的教訓在勞動上並不消失。從共和國的早年以來，便已有一種勞動工會，但這些會大部分是地方的，並且微弱無力。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成立有一些強大的技藝工會——印刷工會是最老最重要的——但這些包含工人階級的一個極小百分數，許多工會在復興時期中和一八七三年恐慌後的大不景氣中消滅了。

在戰後幾年中，有三種形態的勞動組織出現。第一種是工業協會，最好的代表是勞動協會 (Knights of Labor)。第二種是技藝協會和織起的各技藝協會的聯合為美洲勞動同盟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第三種是極端社會主義的或革命的勞動團體，數量上不重要但有持久性。在一九三〇那時以前，任何一個或一切這些組織沒有包含過美國工人的大多數。勞動人口的大部分——農田勞動，轉移的勞動，家庭工作者，白衣領的工作者——仍舊在組織圈外。

早期勞動組織最重要的也許最有趣味的是高級勞動協會 (Noble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r)，成立於一八六九，但它的真正歷史起於一八七九，當純德利 (Terence Powderly) 做大主人 (Grand Master) 時。

這協會最顯著的特徵是它的民主和它的寬大的社會與經濟狀況。它對一切工人——熟練的和未熟練的、農人、工廠工作者、礦工、技工、郡公開；只不收賭徒、酒館主人、銀行家、律師、和股票經紀人。它的目的是「保護給辛苦工作者在他們生產的財富中的正當攤分；應該屬於他們的較多的餘閒；較多的社會利益……一切那些權利和特權，在使他們能享受、欣賞、保衛、和永存上，是必需的……良好的政府。」這些微有光芒的目的不是以罷工或暴力來實現，而是以政治鼓吹、教育、和工人的合作來實現。協會的計畫雖激烈而散漫：八小時工作制，童工的廢除，應用專業的公有，所得稅和遺產稅，和土地改革。燦爛的理想和斯文的勸說，合起來以影響極端的經濟變更，不生效力；但當一八八五年以後，協會憑藉罷工，它們實際上獲到些效果。會員人數飛躍的增加。一年之內，他們自負有七十萬會員，由於成功而氣壯，他們為一個計劃未善的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的總罷工作後盾。在芝加哥，這罷工鼓勵起一個大會，舉行於草市廣場 (Haymarket Square)，有不知姓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投擲一顆炸彈，炸死幾名警察。協會對這暴動雖無責任，可是公共輿論把他們和這事聯在一起。這事，幾次罷工的失敗，和組織的固有弱點，使協會趨於衰敗；一八九二年協會和人民黨 (Populist Party) 發生聯繫，衰敗成爲一個護位。

這時一個新組織正抬頭：美洲勞動同盟。一八六三年，有位荷蘭猶太人賈波斯 (Solomon Gompers)，決定放棄他的倫敦製烟店，在美國一試他的運氣。他帶着一個十三歲的兒子撒穆爾 (Samuel) 隨身，這孩子立刻去做捲烟。第二年，這孩子加入製烟者公會；從那時起，撒穆爾·賈波斯的生活和聯合勞動成爲一體，合衆國的聯合勞動的歷史和賈波斯的成爲一體。他沒有受過正式教育，但製烟店給他一個勞動史和經濟學的澈底訓練。他後來說：

我們工作的性質發展爲一種商店的友誼，像很少工人所享受：這是個在它自身裏的一個世界——一個視同仁的世界。店友來自各地——有些幾乎會走遍各地。……店裏也有書讀。製烟者有種慣例，鑿錢作爲一個購買報紙、雜誌、和書籍的經費。當其餘人們在工作，我們同人之一要向我們讀書報，每次也許

要讀一小時，有時更久。因為讀者在收入上要受損失，店裏其它人們每個人給它幾支捲烟。我有利用任何雜誌和新聞紙文字以讀給我的店友聽的習慣。別人也這樣做。我的聲音洪亮，讀得使人們容易聽清楚，他們常讓我多讀，超過我的時間。事實上，這些在店裏的討論更像公共辯論會或我們那些日子所稱的「勞動會場」。這種作爲大大有助於發展製烟者在重要經濟問題中的利益。

這樣，貢氏熟悉英國改革家和德國俄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也有實際教育：由於痛苦的罷工經驗、困難時期、和存在的團體不充分，貢氏感覺到一個實際且不流於空論的勞動政策的必要。他看出紀律的必要設置，一位大準備金以接濟罷工和氣候不景氣的必要，和避免與政客、激烈分子、幻想家發生任何交易的必要。一八八一年，他把幾個行業公會的代表聯結成一個「美加行業勞動協會組織同盟」(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 and Labor Un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五年之後，這組織成爲美洲勞動同盟。

美洲勞動同盟比較美國勞動協會更近乎同時的英國勞動組織。不像協會，它是個技藝團體，會員限於勞的貴族團體，組成分子是些自治的行業公會，聯合很像美國各州。也不像勞動協會，它是特別實際的並且在政策上是隨機應變的。它的一個代言人說，「我們沒有最終的目的。」「我們一天繼續一天。我們只是爭最近的目標。」這些目標大都是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時間，雖然也不漠視有關於童工、衛生健康法律、禁止包工和罰作苦工、和排斥中國移民這些事。在它的長久且成功的歷史中，美洲勞動同盟是保守的，隨機應變的，並且有些排外的。避免政治，可能時和資本合作，以大費用設置的準備金支持必要的罷工，維持嚴格紀律，以它的持重政策博得公共信仰，美洲勞動同盟克服仇視、艱難時期、和敵人的困難；當貢氏於一九二四年末次接受會長一職時，他對擁有會員將近三百萬人表示滿意。

第三種勞動組織的型態仍舊顯著的薄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美國歷史上有長久的背景，但它們的早期表示大部分是理想式的試驗，像勃魯克農場(Brook Farm)，恐伯美國所知道而最近乎一個社會主義號令的是烏達的默蒙社會，在那社會裏勞動並不居主要地位。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一個幽暗的祕密組織名爲莫利

馬梭爾 (Molly Maguires)，在工作環境殘酷可怕的彭西凡尼亞無烟煤田造成恐怖，直到它被武力壓平。同時，比美國勞動界更熟悉於馬克斯和拉薩米 (Ferdinand Lassalle) 的德國知識分子，企圖建立一個美國社會主義，但沒有成功。一八八二年莫斯特 (Johann Most) 的到美，給勞動的左翼支派一個革命的傾向。被德國英國所驅逐的莫氏，企圖博得美國工人的聽從，採取一個暴動的政策。他主張勞動問題的真正解決是「用有魄力的、殘酷的、革命的、和國際的行動以破壞存在的階級統治；」他創立黑色國際的一個美國支部。除却零碎的暴動行為，黑色國際毫無所成就，只是不信任整個勞動運動。

激烈的勞動團體屆時把它們自己從外國的糾纏中解放出來；世界實業勞動者團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正式組織於一九〇五年，它雖然採取一些福瑞爾 (Froley) 的工團主義學說，却澈底的具本地色彩。儘管在西部的木場和礦場上和在東部紡織業中心上略有成功，世界實業勞動者團從來沒有過任何真正數量上的力量；他在一九一七至一八年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它失勢，除却在西北部的木場上和在西部的農場工人中。

### 勞動的衝突

美國勞動的故事交錯有罷工和暴動。勞動自始就要為它的大部分利益而爭鬪：為組織、罷工、糾察的權利，為較短的工作時間和較高的工資，為安全的工作環境和意外的賠償，為廢除童工、訓戒、黃狗式包工、伸出制度和公司商店的紛擾；為外來移民的限制和歇業商店。爭鬪大部分進行於實業場合，有時在政治領域內。在這種種拖長且辛苦的鬪爭中，勞動大半是孤獨的，而實業則在公共輿論、警察、和法庭上找到有力的盟友。對着這種可驚的反對，勞動所失敗或和解的罷工，多於它所勝利的，但它的勝利，足以證明繼續運用罷工做一種武器是正常的。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在實業關係上憑藉武力，和在國際關係上憑藉武力是一樣的一個理性失敗的紀念。

在共和國的初年，罷工並不完全希見，以後用來戰鬪的武器也非不熟悉。當羅威爾 (Lovell) 織布廠的女工於一八三四年進行罷工時，一家報紙登載說「她們做了些女性不該做的事，如結隊在街道上遊行……揮着她們的手帕和圍巾，並有一兩位向衆人演說。」公共輿論對這些不應當的事正感驚駭，這罷工就被打破。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紡織工人、煤礦工人、冶鐵工人和其它工人中間，也有罷工的風潮，但這些大多數歸於失敗。真正暴動的時期是和一八七七年的大罷工同時開始，也和勞動協會與美洲勞動同盟的興起、信託組合與專利事業的成長同時。從一八八一到一九〇五年，發生的罷工不下三萬七千起，有些時間短促且是地方性的，有些拖得長久且遍及全國。

這時期最顯明的罷工是一八七七年的鐵路罷工，第一次開始給美國人大規模的實業暴動；一八八六年麥科密克收穫機廠的罷工，達至草場暴動的悲劇；一八九二年的宅地罷工，以摩農卡希拉 (Monongahela) 兩岸一場繁營的鬪爭而著名；一八九四年普爾門大罷工，關係及於全國鐵道半數；在科羅拉多煤田上可怕的克利布爾河 (Cripple Creek) 戰爭；一九〇二年無烟煤罷工，威脅得全國工業將陷於麻痺狀態，結果爲羅斯福總統的干涉所解決。詳細描寫它們的歷史既不可能，也沒有益處，但我們可以挑選它們的一件，一八九四年的普爾門罷工，做它們多方面的代表。

它開始於意大利諾州的普爾門「模範」鎮，那裏，工人們居住在舒適的公司住宅裏（房租比別處相等的房子高四分之一），購買公司煤氣和水，向公司商店交易——給喬治·普爾門和他的股東們相當優厚的利益。由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不景氣，工資被削減以維持豐厚的分紅；當工人代表要求普爾門把工資問題交付仲裁，他們全體被解雇。工人立刻放下他們的工具。新組織的美國鐵路總會 (American Railway Union)，在青年的德勃斯 (Eugene V. Debs) 領導之下，把普爾門工人的問題引爲自己的責任，指揮它的會員不要駕駛普爾門車子。由這行動，鐵路和工人間的戰爭開始——它並且佔了全國的半數。幾個星期以內，北部和西部的運輸，大都陷於停頓；一家都會日報，預料用於打破罷工的方法，聲言這是「反對政府和反對社會的一個戰



爭。」驚於罷工的明顯成功，並且決定在正發生的鐵路總工會能造成麻煩之前就撲滅它，一個雇主們的組織，總經理人協會 (General Managers' Association) 要求聯邦政府干涉，以維持鐵道業務不使停頓。

在這請求上協會是成功的。克利夫蘭總統的檢察長是奧爾尼 (Richard Olney)，一位完全同情於操縱者見地的前任鐵道檢察官。他以反對一切罷工活動的一個勢如破竹的教訓來答復他們的請求。亂事立即爆發，但無論由於罷工者、秘密偵探、或由於無賴之徒，從來沒有被斷定。意大利諾州長阿爾特葛爾德 (John Peter Altgeld) 準備以州國民軍維持秩序，但克利夫蘭總統沒有給它機會去做，便命令聯邦部隊開往芝加哥。這教訓打破罷工，軍人幾乎撲滅勞動運動。德勃斯拒絕服從教訓，以蔑視法庭的罪名被監禁。阿爾特葛爾德抗議聯邦軍人這樣開入州裏，是違犯憲法並侵害州的權利；但克利夫蘭所斥責且被法院所批駁。這樣，從頭至尾，鐵路方面顯然是勝利了。

但國會委員會和學者後來的研究幾乎在各方面都支持罷工者——和阿爾特葛爾德。普爾門鎮的工業封建制被責難，罷工者大被中雪亂事的責任，總經理人協會被加上僭越不法的聲名，奧爾尼的政策被認為不適當，教訓的應用為不明白的合法，聯邦部隊的運用為不必要且不適宜。這不歡的意外之事把許多這些年來限定勞動地位的勢力帶入尖銳的集中點：一個大聯合公司的驕橫，同情的罷工角色，反信託組合法案和教訓的應用以抑制勞動，法院的仇視，和政府當局袒護資本方面不讓勞動方面的趨勢。它把勞動問題帶進政治裏，成為臨近的競選的一個大爭點，並且喪失勞方對克利夫蘭總統的信心。它加強社會主義黨並給它一位大領袖，德勃斯；它在阿爾特葛爾德的原來聲譽上加上林德賽 (Vaughn Lindsay) 詩中「被遺忘的腦」的稱讚：

一百隻白鷹飛起來了，你的子孫，它們飛起的熱情是你所夢想的熱情的開始，消磨的勇氣是你為人服務的精神。

一九〇〇年左右，勞動方面已經贏得它的權利的大半——組織、罷工、集體磋商的權利——並在它為較好的工作和居住環境的運動中，做到一些進步。可是這些收穫，顯然是限於工人人口的一小部分，並且他們不易

接觸到爲工人安全的更大問題和整個社會的福利。勞動問題不是孤立於其它社會和經濟的問題之外，社會在它的工人的福利和安全上有一種正當的利害關係，漸漸成爲明白的事情。實業不能付與一個生活必需的工資時，社會不得不補償差額。它不能供給失業時，社會該照料失業者。它傷損或過早用疲工人時，社會該供給他們。婦女兒童的勞動不但是工人和他們的雇主間的爭端，因爲它牽涉到人種的將來。社會能支持工業爭鬪的奢侈多長久，也是個問題，因爲無論誰以勝利出現，社會常是損失者。

這些顯然是須要政治行動的事。雇主們沒有能希望設立這樣遠大且費錢的改革，像失業補償或養老金，除非他的競爭者全願意採取相等的辦法；這種協議的仁慈是不可期待的。這些事也不能用集體磋商來解決，如工人的大多數依舊是無組織的。只有政府才能有效的制止童工，管理婦女勞動環境，要求意外損害的賠償，禁止黃狗式的包工和黑名單，扶助失業者、老年人、和工業的遺棄者，視察工廠，改良住宅，並做許多其它事項以防避無管制的現代工業制度的惡果。英、德、丹麥、奧大利、和澳大利亞諸國早就有見及此並且採取相當辦法。但因在美國，邊地的傳統、充分的機會、和嚴格的個人主義留戀下去，社會立法被耽誤了。當問題成爲十分迫切，合衆國要表現它能迅速的應付它們；在羅新福和威爾遜的時期，有力的開始已經做到，在一九三三至四〇幾年間，合衆國在它的勞動和社會立法上追及較舊的工業國家。

在爲社會改革的奮鬪上，勞動方面在社會工作者、基督新教教師、學者和知識份子中，有有力的盟友。在任何反抗實業弊害和貧民區的戰史中，大大照耀的姓名有：特派新聞記者黎斯 (Jacob Riis)，芝加哥赫爾館舍 (Hull House) 的亞當斯 (Jane Addams)，一神教傳教師格拉登 (Washington Gladden)，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康芒斯 (John R. Commons)。他們不斷的工作，開導大衆使人們知道童工的社會的犧牲或共同住宅的危機，並鼓勵遲鈍的立法機構推進工作。有些州裏，改革家特別成功——馬薩邱塞、紐約、威斯康辛、俄勒岡——但問題却困難。因爲較進步的各州那裏建立高的標準，他們引導工業遷移到沒有這些限制的落後的各州。

可是有真正的進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多數各州已經——至少是理論的——禁止小孩的勞動；許多州建立婦女的八小時工作限制，創意外損害賠償的制度，規定工廠和礦場謹慎的視察，禁止黃狗式包工或在工業爭端上用私人偵探私人警察，並以其它方法表明社會的守護。詳細描寫這種立法是不可能的，但兒童勞動法律的歷史是個好例子。

一九〇〇年前後，童工成爲一件公共誹謗。一百七十五萬名十至十五歲間的兒童那時以前被有利的雇用。許多工作於工廠和礦場，其它在罐頭廠家，甜菜場圃，或蔓越橘園裏。一位調查者看見五百五十六名十二歲以下的兒童工作於八家棉紗廠；另一位看見六、七歲的兒童在早晨兩點鐘時裝製蔬菜罐頭。斯巴各 (John Spargo)，他的「兒童的痛苦呼號」(Bitter Cry of the Children) 震動全國，描寫他於二十世紀初在彭西凡尼亞和西維基尼亞煤礦中所見的如此：

男孩子整天坐着，彎腰向斜槽，當煤塊衝過洗濯器時，他們揀起裏面的石片和其它殘渣。由他們所須做的拘束姿勢，他們大多數多多少少變成畸形，駝背得像老頭兒。……煤塊是硬的，損傷兩手，如割破或軋破指頭，在孩子們當中是常事。有時還有更壞的意外；聽到一聲可怕的尖叫，一個孩子在機器中被切斷撕碎，或在斜槽裏不見了，後來揀出時，已經被磨且死了。軋石機中充滿陣陣泥灰，被孩子吸進，種下喘病和礦工的肺癆症病的病根。我有一次站在軋石機前半小時，試試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子每天做的事。……我做不了那工作並活不下去，但那裏有十歲十二歲的男孩子做着，爲每天五、六角錢的工資。有些孩子從未進過學校；他們很少能唸一本孩子的第一冊讀本。

的確，有反抗這些罪惡的州法，但它們常不夠用並且容易被逃避。因此南卡羅來納最後給工廠勞工製定一個十二歲的限制，但在這限制使家庭負到困難的地方，允許例外。當馬里蘭命令所有十六歲以下要求工作的人須申請許可，申請書比起以前調查所列十六歲以下人的總數字多一倍。除却對工廠勞動，立法很少影響及於其它，聽任幾十萬兒童當信差的、擦皮鞋的、工作於不被認爲工廠的果子園或罐頭公司的，十分未受保護。直到一九

○九年，美國才有一州——德拉瓦——規定「不得雇用或聽任十四歲以下的兒童為任何收益的職業而工作。」州法律的不充分引起要國會行動的要求。一九一六年，國會答復以一種法律，禁止各州間商業運輸童工的產物。問題似乎告了解決——但法院圓滑的宣告這法律在國會權限之外，因此無效。三年後，國會再度嘗試，這次試以徵稅取締童工產品的存在。法院再度插入異議：國會不應直接做的，不能間接來做的。的確，二十年後，最高法院自認這是個全盤大錯，但損害已經做了。整個繁盛的二十世紀頭二十年中，童工繼續存在，一九三〇年的調查顯示十八歲以下的男女受收益的雇用者在二百萬名以上。後來新政取得憲法辯證的捷徑，實際的結束這污辱。

經過集體磋商和立法這兩種方法，勞動已大大改良它的地位。實業方面也開始採取一個較開明的勞動問題見解，並把它自己的房子弄得有秩序。實業家不再和鐵路操縱者谷爾德 (Jay Gould) 說：「勞動是一種商品，長久接連的受供求定律所絕對支配。」供求定律已為製造廠家、銀行家、和農民之故而修正；現在它已為勞動方面而修正。

### 答覆

大多數美國人從來沒有真正體會到外來移民在他們的歷史上所佔的地位。他們想起外來移民，當它是個「問題」，並且常以為只半世紀或半世紀左右以來才成為顯著的問題。在他們想到外來移民時，他們想像出淺褐色的意大利人、或多鬚的猶太人、或走下跳板到葛里斯島 (Ellis Is.) 披着顏色鮮豔的圍巾的波蘭農婦。他們不想起遠遊教徒的祖先、或法國新教徒、或蘇格蘭、愛爾蘭人；他們甚至不想起在非洲和西印度間大西洋上忍受地獄生活的可憐的黑人。

可是一切美國人，除了印第安人，是外來移民或外來移民的後裔：殖民時代的少女和新新那提會社 (Order of the Cincinnati) 社員，與卡利 (Gary) 的波蘭鋼鐵工人或哈爾冷 (Harlem) 的黑人，都是一樣的。的確，外

來移民是在不同的時候、在不同的環境中、從不同的世界各處來的。但他們全得到同樣的經驗，從他們的老家把根株掘出，移植到新的地方上。甚至愚笨無知的和下級的，全帶來他們的力量、文明、和信仰。他們全是美洲大鎔鑪裏的要素。

我們早已看見有關於注到美洲做成殖民地時代美國人口的多次川流。整個共和國初年中，從舊世界到新世界的移民繼續而至，大多數是自動的。從初次有紀錄的一八二〇年到內戰開始時，來自愛爾蘭、英格蘭、和日耳曼的新人大約有五百萬人，來與美國人休戚相共。連戰爭都並未嚴重的阻遏住外來移民的川流，阿坡馬託克斯停戰之後，移民湧成一個大浪潮。結果，一八七〇年的美國人口是個很龐雜的。那年一千名美國人中，出生於本國的白種人而父母是本國人者四三五名，出生於本國的白種人而父母是外國人或雜種者二九二名，出生於外國的白種人一四四名，黑人一二七名；印度人一名和中國人一名湊成這一千之數。一八七〇至一九二〇年間，幾乎有二千萬以上的外來移民來到合衆國。可是出生於外國的和出生於本國的人口比例實質上仍是一樣。最顯著的變更也許是黑人比例數的衰減和墨西哥人數目的增加。

但有關美國人口變動特徵的一個很重要的事實，使每個觀察家都加以注意。那就是老家或父母的老家在歐洲南部和東部各國的人，數目激增。十九世紀第七、八兩個十年中，移民的多數繼續來自過去提供這許多的國家——英國、日耳曼、和斯干的那維亞諸國。就在那些年裏，有「新」外來移民的小川流。有企業心的輪船公司成立和那不勒斯 (Naples)、但澤、麥美爾 (Memel)、阜姆、和雅典的直接航線，並且在意大利、波蘭、和奧匈帝國聘請幾千代理人以招徠下級乘客。有企業心的聯合公司籌備在萬里斯島迎接移民，送他們到礦區或工業城鎮。當英、德、和斯干的那維亞的人口壓迫比較不尖銳時，到新世界去的有組織的遷移弛緩下來。但「新」外來移民却飛躍的增加。例如二十世紀的頭十年，從愛爾蘭帶來的移民只三十四萬人，從德國來的也三十四萬人，但從意大利來的在二百萬以上，從奧匈來的也二百萬。在後來設立阻止以前，意大利送到美國的人民四百五十萬名以上，奧匈四百萬，俄國和波蘭三百二十五萬。

對這些一切新來者——對逃避宗教虐待和追求信仰自由者，對逃避兵役和戰爭者，對切盼一個較為民主的社會者，對希望逃出受磨難的貧苦且希望分享新世界有神話性的財富者——美國是天國了。不論他們採取行動的理由，他們全捲入大冒險事業；他們全夢想一個較好的生活，他們大多數要爲自己和子孫建立這樣一個生活。不裁可兩個企圖限制外來移民的議案的威爾遜總統，說：

每隻船頭向西指的船，不是在這裏懷着它國被壓迫者累世的希望嗎？當人們看見美國海岸現於他們眼前，他們的心常是怎樣跳動！他們常常覺到那裏的居民怎樣免除國王的、特權階級的、和一切使人們抑鬱無告的桎梏的煩惱；怎樣在那裏實現他的誠實人格觀念的完全收穫，那裏他將爲同胞大團體中的一分子，不求互相欺騙，而求達到一個全體的良善！

在現代歷史上平常受到的經驗，確實沒有比初次瞥見自由神像出現於水平線上更動人，更有味的。它的手高舉希望的火炬，基部上有刻銘：

給我以你的疲倦的，窮苦的，擁擠的大衆，他們切望自由呼吸。把這些，你豐滿海岸上的可憐的藥物，暴風雨沖起的，送給我。在金門旁邊，我舉起我的燈。

「舊」外來移民已很平均的散布於北部和西部，進入農業和工業的人數大約相等。但因爲開始從事農田需要錢，因爲最好的土地已成過去，因爲城市裏有職業，有他們自己的人民和天主教會的集團，所以「新」外來移民聚合於東部和中西部的工業中心。一九〇〇年左右，出生於外國的人民三分之二住居市鎮裏，一九二〇左右這比例增到四分之三。紐約有幾十萬意大利人、波蘭人、俄羅斯人、和猶太人；幽靜的波士頓城住有大量的意大利人和法蘭西種加拿大人；教友會的費城有俄羅斯人；克利夫蘭有俄羅斯人和波蘭人；聖保羅和明尼亞波里斯 (Minneapolis) 有斯干的那維亞人；芝加哥和世界上任何城市一樣表現爲一個斑駁的人種模型。在工業的小鎮裏，如瀑河 (Fall River)、斯克蘭頓 (Scranton)、或漢特蘭克 (Hantamank)，出生外國者的百分比例甚至超過在大城市的。這意義就是從歐洲南部和東部來的新人在礦場和工廠裏尋找工作。例如早在一九一〇

年，彭西凡尼亞的煤礦工人四分之三是出生於外國的；這些人中，絕大多數是意大利人、波蘭人、和斯洛伐克人。一九二〇年，出生外國者構成全部人口的八分之一，但那些人中三分之一受工廠的雇用，一半以上工作於礦裏。

外來移民貢獻了什麼？最多的是他們自己——他們的力量，他們的工作，他們的信仰。他們多虧養活他們的國家，那國家也多虧他們。他們做勞苦受責的工作，假使國家的資源要迅速且廉價的發達起來，那工作是須做的。他們開墾草原地皮；他們鋪設橫貫大陸鐵道的路軌；他們開掘鐵礦、煤、銅；他們斫伐西北森林的木材。但是他們的貢獻不只限於無技術的勞動。他們給美國生活以豐富的內容和色彩，在有些方面大大增加它的文化遺產。在音樂和藝術上，他們供給創造推進力的一大部分。一九三〇年美國的大樂隊沒有一個是安格魯撒克遜種人領導的。任何當代名畫家的名單要包括約拿·賴 (Jonas Lie)、邁爾斯 (Jerome Myres)、愛爾希密烏斯 (Louis Filshemius)、康多 (Morris Kantor)、魯西翁尼 (Luigi Lucioni)、科賓諾 (Jon Corbino)、和國吉 (Yasuo Kuniyoshi)。而美國雕刻家的名冊，讀來像個都市大學的足球隊伍：麥克蒙尼斯 (MacMonnies)、聖高登斯 (Saint-Gaudens)、左拉赫 (Zorach)、畢特 (Britor)、愛普斯坦 (Epstein)、拉謝士 (Lachaise)、瓦爾內克 (Warnecke)、賀福曼 (Hoffman)、豐諾赫 (Vonnoch)、波格梭 (Borglum)、和尼豪斯 (Nehaus)。在實業和政治上，在科學和教育上，出生外國者和他們的子孫留下他們的印迹。

可是外來移民也造成它的問題。勞動方面所感覺到的是職業的競爭：像一位勞動領袖所說，「外來移民限制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工資基於外來移民；我們家庭的環境受外來移民所限制。」城市政府所感覺到的是房屋、衛生、和警察的問題。學校制度所感覺到的是不識字和社會調整的問題。可是出生外國者的同化並不困難，雖然許多「土著」的代表懷着「和我們發音不同、威脅的腔調」的恐怖。一般外來移民熱烈切望成爲一個美國人。安丁 (Mary Antin) 在她的「天國」 (Promised Land) 裏描寫的經驗是幾十萬美國人所同具的：

當我在晴明的九月早晨進公立學校時，我的公民的自尊心和個人的滿足達到了。我必須常記住那天，雖

然我已經長得那樣大，我還不能說我的姓名。第一天進學校在許多人看來是個可紀念的良辰。在我的情形，那天的重要更放大百倍，由於我等待了的年數，我來的道路，和我所抱自覺的大志。……父親親自率領我們上學校。他不想委託那使團與合衆國總統。他已經忍耐的等待那一天，和我一樣；當他在陽光閃爍的路上催促我們時，他所見的景象超過我的一切夢想。……最後，我們四個人站在教師桌子的週圍；我的父親，用他不會說的英語，把我們交給她看管，他說出他所希望於我們的幾句零碎話，他的漲溢着的心再也抑制不住。

外來移民的子女，不是外來移民本人，提出同化和調整的問題。許多實在是破根絕敗壞。他們在家裏的生活是一個世界，在家庭以外另是一個世界。他們仍舊和舊世界（歐洲）有聯繫，經由他們的父母——有時經由教會——但這種聯繫是引中的且不實在的。他們自有不同的外貌和語言音調，他們的美國同伴不完全優容他們。在學習承受新的遺產以前，他們常反抗他們的舊遺產。公立學校是大溶劑，但有時並不把異點揩去，反把它們強調了。「第二代」美國人，比第一代提出的社會調整、暴力、和犯罪的問題更多。

一九〇〇年前後，發於有一個普遍的感覺，認為那時該是停止無阻留外來移民的時候了。勞動痛恨競爭；土著美國人恐怕這許多斯拉夫族和地中海國家的新來者把人種血統的素質降低；一般人以為合衆國不再迎接來者，人民和問題已夠多了。早在一八八二年，國會已經停止從中國來的移民，同年它排除那些被指明為不良的人們——有疾病的、精神上有欠缺的、不道德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這也許有些質的、但沒有量的效果；所需要的是一個質量兼有的障壁。計劃出的公式是識字測驗。在英倫三島、德國、和斯干的那維亞，不識字幾乎不存在，而在意大利、波蘭、俄國和其它南歐東歐，不識字的百分數很高，這辦法似乎便於不影響舊外來移民而減少新外來移民。

克利夫蘭、塔夫脫、威爾遜三位總統都不贊成識字為移入合衆國必需條件的法案，理由是這是一個機會的而非能力的測驗。可是國會結果在一九一七年有它的辦法。由於世界大戰的結束和從歐洲被蹂躪諸國大規



模移民的前途，這問題顯然是一個排斥的，不是單單限制的。國會於一九二一、二四、二九各年以一串法律成立一個量的限制，對來自國外的，結果限定十五萬人。這限制並不應用於來自加拿大或墨西哥或南美各國的移民；但條款的一個嚴格解釋，禁止任何將成爲公共負擔者的入境，同樣有效的減少從這些國家來的移民。

一九三〇年左右，美國史的一個紀元這樣的告一終了。合衆國仍然是個鎔鑪，以後幾代也許仍是如此。但它不再爲一切國家的貧民和被壓迫者的天國了。

## 第十五章 西部的成年

### 開發最後的西部

當南方正從戰爭的煩悶和復興的紛亂中恢復、北方正聯合它的經濟於工廠和機器時，密蘇里以外的西部發生甚至更特異的變化。在一八六〇年，這大略包括有合衆國總面積一半的區域，大部份是一片荒野。新的加利福尼亞州，的確以一個將近四十萬的人口自豪；威拉麥特 (Wilmette) 流域約有五萬俄勒岡墾荒者；叢集大鹽湖週圍的默蒙社會另有四萬；而沿大河上游兩岸伴有九萬左右帕布羅 (Pueblo) 族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白種冒險家的散漫一羣。這帝國空闊地面的其它部分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好戰的蘇克斯族、黑脚族、和烏鴉族在北部平原，猶特族 (Ute)、舍延族 (Cheyenne)、和歧奧瓦族 (Kiowa) 在中部，殘忍的科曼奇族 (Comanche) 和阿帕奇族 (Apache) 在不毛的南部——不計其數的部族，它們的名字見於美洲民俗歌曲。騎的是駿馬，依賴以生活的是供給一切，從食品到燃料的大羣野牛，這些部族遨遊於平原、山地、和沙漠間，不受侵擾，除非自相殘殺，或被山上獅子和山犬所侵害。

三十年後，這一切都改變了。印第安人已經失敗，並服從不安的文化過程。咆哮的野牛羣已被掃滅。礦工跋涉整個山地，淘金於名字含有詩意的澄瀾的川流——聖若根 (San Joaquin)、海獺頭 (Beaverhead)、貝爾福希 (Belle Fourche)、苦根 (Bitter Root)、甘泉 (Sweetwater)——變穿地道，建立熱烈的小社會於內瓦達、蒙大拿、科羅拉多、以至於達科大的黑山。鐵道著目的推進過未開闢的草原地，尋找峽口穿過高峻的洛磯山，把大西洋和太平洋連接起來。牧牛人有無代價的草，鐵路，和新的市場的優勢，取得從德克薩斯盤柄 (Panhandle) 伸展到上密蘇里廣大草地領域的所有權；牧羊人在山谷中和山坡上和他們相爭。後來農民聚集於

平原和山谷，關閉東部和西部間的山隘。一八九〇年左右，邊地已經消逝，一個堅固的各州團結伸展過大陸，在羚羊和場撥鼠所遊的地方，有五六百萬男女從事耕作。

這廣大區域的征服何以這樣長久的耽擱着；當開始征服它，何以進行得這般喘不過氣的飛快？二百年來，美國人從大西洋岸不斷向西推進——適入殖民地時代的「舊西部」，越過阿帕拉契山脈，下至俄亥俄，並進入密西西比流域。一八五〇年左右，人口的邊界大約達到九十五度的高點——在我們歷史上的第一度，它在那裏止住它的前進。替代有規律的前進，它跳過平原和洛磯山，建立自身於太平洋沿岸。這說明在於地理和氣候。歐洲民族來自森林和河流地區，他們發見新世界有森林、河流、和豐富的雨量足資他們的農產物。但大平原在兩百年來的經驗中第一次帶些新的事物面對着他們。這是缺水的土地。雨量稀少，又有長期亢旱；水道灘淺且無定，造房子籬牆用的木料缺乏。無怪早期開墾者把這一切付之不問，而向水利木材豐美的太平洋沿岸推進。

農民非到得有適應自身於一個新環境的工具後，他不能希望克復大平原。適應物及時而來。鐵道供給運輸；鐵絲刺網可用於圍籬；深鑿的井和風車供給水；旱地農作和灌溉，部分的解決農民所未嘗習慣在雨量不充分地方耕種的農作問題。有這些新工具，開墾者能夠生活，種植農產物，並在平原上樹立永久的社會。從這經驗，不但產出耕作的新方法，並且產出生活的新方式——新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制度。

巨大的密蘇里以外的西部，雖然大部分未有居民，不是未被人所知。大膽的探險家如魯意斯(Lewis)、克拉克(Clark)、和佛萊蒙(John G. Fremont)曾探查過它，捕獸者和皮貨貿易者，受西北或阿斯脫(Astor)皮貨公司所雇用的或自己經營的，對它極熟悉；沿聖大費大路的巨商和販客已開關到西班牙屬西南的道路；新舊兩派基督教傳教師已和印第安人作傳教事業，沿俄勒岡大路的開墾者，默蒙路上的教士，加利福尼亞路上的求財者，已在上標識出大道；軍隊已建造要塞以保護移民和商人；測量已為鐵道路線測繪地圖；在這新紀元開始時，林肯總統甚至簽准一件法案，規定修築第一條橫貫大陸鐵道。

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來，幻想家已經夢想一條跨過大陸的鐵道；但直至人口向加利福尼亞猛進，問題才成爲急切。那時以後，對它的路綫有過激烈的辯論。南方人士要求一條聯結下加利福尼亞和德克薩斯於新奧爾良或孟買斯 (Memphis) 的路；北方人士選擇一條把西北聯結到聖路易或芝加哥的路。測量已經完竣，但爭論並未解決，直至南方同盟國的退出聯邦，才給北方的主張者一個自由行動。一八六二年的太平洋鐵道議案聯合兩條鐵路——聯合太平洋和中太平洋。聯合太平洋規定從愛奧華的康息爾崖 (Council Bluffs) 向西修築，中太平洋從加利福尼亞向東修築，兩路相接。爲使這樣偉大的一件事業能夠進行起見，聯邦政府給予兩路大約二千四百萬方英尺公地，和結果達到將近六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

受這些補助金和各州立法議會的另外補助，公司管理人猛力推進他們的計劃。一件巨大的工作面對着他們。須要建設過一片只住有敵對的印第安人的草原、山地、和沙漠荒野的路軌，約長一千七百哩。中太平洋的工程問題特別費力。勞工得不到，結果從遙遠的中國運來小工約一萬名。每磅鐵軌，每輛車子，每部車頭，每件機器，要繞過好恩角 (Cape Horn) 或越過巴拿馬山腰船載而來；公司同時有五十隻船獲得特許，專爲這用。塞拉山 (Sierras) 上沒有道路，幾萬噸的配備，包括火車頭在內，都有雪車拖過雪堆。食物、火藥、一切種類的供應品，也走同樣費力的路綫。車道須從巖壁中間炸出，橋梁跨過探峽，在塞拉山的六十哩距離中，穿鑿十五條隧道。當深雪有阻礙一切修築的威脅時，機巧的工程師建造三十七哩的防雪廊，在這些防雪廊下進行工作。

聯合太平洋的工程事業困難較小——也許部分得力於有最偉大的生存工程師之一，道志將軍 (General Grenville Dodge)。他的勞動軍由愛爾蘭人和南北南方的舊軍士組成，他們當印第安人出現時，很快的把尖鋤換來福槍。在他有大促進力的領導下，鐵路以每天二哩、三哩、甚至四哩的速率推進，一羣修築者鋪設枕木，另一羣人照地方擺放路軌並釘住它們。道志本人自豪的描寫這成績：

我們同時用着至少一萬頭牲口，大半的時候八千至一萬工人。橋梁工隊常常在路軌五哩至二十哩前面工

作，路軌很少等候着一座橋梁。供給一哩路軌的材料和供應品，大約需要四十輛車，在平原上，每種物件——鐵軌，枕木，支桿，牢繫的物件，一切全部工作的供應物——要從密蘇里河運來。因此，我們向西移動，每一百哩大大增費我們運輸的事。可是工作計劃並執行得這般有系統，在路線的全部工程上，我記不起一個因材料缺乏而僅僅停頓一星期的例子。印第安人給我們的騷擾開始於一八六四年，終了於兩路在普洛蒙託里 (Pronontory) 相接軌時。當修築岐爾內要塞 (Fort Kearney) 至苦河 (Bitter Creek) 一段時，我們喪失多數人和材料。那時每哩路須在軍隊保護之下測量，鋪平路基，鋪枕木並加支桿。每個測量隊、鋪平路基、加支桿和鋪枕木裝置的命令，當遇到襲擊時，絕不逃避……我不知道有一次不服從命令者，也從未聽見印第安人驅逐過一隊使它永久不能工作。

一八六九年四月十號，兩路接軌於烏達的普洛蒙託里尖 (Pronontory Point)，以金銀的尖鋤開地作為聯結的儀式，全國參加慶祝。這是個偉大的工程事業，一件堅執、機巧、勇氣的史詩故事。斯蒂芬孫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寫道。

當我想起鐵路怎樣穿過缺水的荒野及野蠻部族出沒之地……在每個建設的階段中，噪雜的、臨時的、充滿黃金、慾望、和死亡的城市，興起而又衰落；在這些粗陋的地方，拖有辮子的中國海盜怎樣和邊地的兇漢與來自歐洲的窮人並肩工作，用混雜的語言交談，多半呢督、賭博、喝酒、爭鬪、和暗殺像狼一般……當我繼續記起這一切偉大的混亂是由於穿大禮服的士紳所指揮，這些士紳所懷抱的見解，不過是個財產和藉此到巴黎遊玩，在我看來，這條鐵路是我們所生活着的時代的一件代表成績。……假使它是奇蹟；假使它是顯著的差異，假使它是我們需要的英雄氣概，那末特羅埃 (Troy) 城比這如何？

的確，奇蹟和英雄氣概是有的，但一份財產和到巴黎遊玩也是有的。帶來這種得意的成績實在同時帶來一種恥辱的心緒。聯合太平洋公司的經理人，不滿政府的贈與，組織一個有名無實的建設公司，投票決定捕捉給他們上幾百萬美元的、那公司欺騙來的契約。中太平洋公司的四巨頭——亨丁頓 (Huntington)、斯丹福

(Stanford)、克洛克爾(Grocker)、和霍布金斯(Hobkins)——組織他們自己的建設公司，爲他們自己榨取到六千萬美元以上的數目；他們每人死後都留下遺產四十萬以上。這些管理人團體都從事於大批賄賂；這些團體都負有債務，使政府要呼喚它們，給它們貸款，而它們所服務的社會要爲下一代償付過分的費用。

這時，有其它橫跨大陸的鐵路的設計，完成的有四條。科克(Tay Cooke)受國會的給讓公地四千萬英畝，創辦北太平洋，畢林斯(Frederick Billings)和維拉德(Henry Villard)完成它，一八八三年，連接蘇必利湖和普吉海峽(Puget Sound)。其它兩條橫跨大陸鐵路在土地給讓上所得稍少——沿着舊路從干薩斯進入新墨西哥，再穿過下加利福尼亞沙漠的聖大費，和從新奧爾良到落山磯與舊金山的南太平洋。這幾條路，和向西部推進的其它幾條路一樣，不但受到聯邦政府，並且同樣受各州各郡的補助。只有一條橫貫大陸鐵路——大北——沒有受政府任何幫助而築成。這條路，加拿大生人喜爾(J. J. Hill)的創造品，從聖保羅到西雅圖，和北太平洋相平行。在財務上，它是它們中最健全的；在它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上，它是最有好結果的。

### 礦業界和畜牧界

建立遠西最初的前哨是礦工。加利福尼亞黃金的發現已把那社會從一個畜牧的新西班牙前哨變成一個繁榮的美國州，並開辟新的且多種的經濟活動——農業、航船、鐵道、和工業。那經驗再三重複於礦業界的歷史；一八五九年猛進到牙峯(Pike's Peak)地方。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到蒙大拿的赤楊谷(Aldor Gulch)和後機(Last Chance)和外俄明的甘泉(Sweetwater)兩岸，七十年代到達科大地方的黑山。礦工到處開發地方，建立政治的社會，爲更永久的居留地立下基礎。當金銀告罄或流入東部聯合公司手裏，而礦業的熱度弛減，居民覺得農業和畜業的可能在環繞着他們或在自東向西推進的鐵路上尋找工作。有些社會幾乎完全仍是礦業的，但蒙大拿、科羅拉多、外俄明、愛達和的真正財富，像加利福尼亞的一樣，是在它們的草和土地上。甚至在礦物的財富上，起初引誘冒險家的貴金屬的價值，不久被這樣豐富的銅、煤和油的價值所超過。

礦業界的衰落和它的興起同樣的迅速，但它在美國心理上留下一個深刻印象。礦業的露營風景十分幽美。一個新地質走向，會帶來幾千名找財者，聚集到荒野的前哨上來。幾天之內，幾百個帳篷和傾頹的草房會起於河邊或散處於埋藏財富的山坡。每座其它房子也許是家酒館或一家跳舞廳，那裏化半元錢可以買得劣酒一醉，沿街弄樂器的歌女供滿臉鬍子的礦工娛樂。無法並不像浪漫作家所想像的那樣流行，但那裏却很少文化的舉止禮儀，露營的生活是野蠻化。可是家宅、學校、教會、和法律移進時，礦業社會成爲有秩序了。

礦業所做的，比作西部農業財富的廣告，吸引殖民者，和供給與後來小說作家和電影出品家的要多。它攪促印第安人問題，帶來鐵道，傾注一支財富的川流於東部投資家的庫藏，增加大約二十萬萬美元的貴金屬於國家的財富，這樣使它能用硬貨收回它的綠背票子，並且把「貨幣問題」導入美國政治中。

即在礦工搜索內瓦達和蒙大拿的小山時，在西部的歷史上已經寫下一章新的且更重要的歷史。這是畜牧界的興起。畜牧界的物質基礎是西部的草地，不斷的從大河申展到北方邊地，從干薩斯和內布拉斯卡進入洛磯山山谷。這裏有幾百萬頭野牛任意遨遊，但二十年內，野牛幾乎消滅，它的地位甚至被更多的德克薩斯長角牛和外俄明與蒙大拿閹牛所取而代之。

一百年以來，西班牙紳士和傳教士已在北墨西哥、沿着大河、並在南加利福尼亞的山谷裏從事畜牧，但這些只有價值於本地的消費和它們的脂肪與皮革。有鐵路的來到，在聖路易、干薩斯城、俄馬哈 (Omaha)、與芝加哥的包裝廠家的創立，和冷藏車的降臨，改良種屬與趕牲口向北到市場上成爲有利之事。內戰後立即開始，大隊畜羣成爲每年的制度。幾十萬隻牛——吉斯荷蘭姆種 (Chisholm)、披科斯種 (Pecos)、古德奈埃種 (Goodnight)、波次曼種 (Bozeman)——蹄子踐踏出道路，喧鬧的畜牧城鎮如阿皮蘭 (Abilene)和舍延 (Cheyenne)興起於新鐵路的終點上。這時牧人已發見他們能使畜羣在北方豐美的草地上過冬，畜牧的領域擴展入科羅拉多、外俄明、和蒙大拿。德克薩斯擁有多數牲口，但外俄明是最道地的牧人國。多少年來，沒有利益能與這些的畜牧利益相比，外俄明畜產家協會 (Wyoming Stock Growers' Association) 的勢力無人能與它對敵。

起初幾乎任何人能開始養一羣，揀選幾頭牝牛和小牛，放它們在公地上吃草。但在短時間內，大牧人和畜牧公司——它們許多組織於東部或蘇格蘭——自己隨便佔據草地，或從印第安部族租讓下來，園人永源和河（County）；舍延部族把他們的土地四百萬英畝租讓給一羣畜牧公司；印第安區域的文明諸部族與一家公司六百萬英畝。畜牧「貴族」無情的阻撓小競爭者，並向牧羊人「宣告殘忍的戰爭」——他們的羊羣把草嚙得這樣淺，它們把牧場毀了。

畜牧界和礦業界一樣有它的浪漫方面，這種回憶永存在美國意識中。寂寞的平原生活，呼集牧牛，象形的標記，長大的牧羣，獸羣的奔竄，和偷牛賊的爭鬪，優越的騎馬術，為實用非為效率而設計的美麗的衣服——畜牧市鎮如阿皮蘭和舍延的粗陋生活都尋着它們的路進入美國的民俗和歌曲。兒童們現在模倣牧童的裝束，電影牧童瞄準正確的槍擊偷牛賊，市井頑童嘴哼「德克薩斯催眠歌」的調子：

露營遠遠在外邊，

喊一聲，應一聲，快去，我的小狗兒。

外俄明要成你的新家庭，

喊一聲，應一聲，趕去小狗兒。

農民的出現

高原天然適宜於牧羊，許多牧人確信農民企圖在這地方樹立生活是個錯誤。這世紀之初，派克（Ne-  
bulon Pike）已經報告說：「在干薩斯，普拉特（Plate），阿干薩斯和它們的很多支流上，由我看來，只能容納一個有限的人口……居民會看出對他們最有利的是注重牛、馬、綿羊、和山羊的繁殖；」五十年後，一位合衆國參議員，反對干薩斯加入聯邦，聲稱「我們渡過密蘇里河後，除却在幾條小河上，沒有適於居住的地



方。」這些概括的說法已被證明是錯誤的，可是後來事實明示人們，在乾燥的西部，農業獲利不厚。牧人在任何時候都有把握從大自然本身掌握到西部一切草地的土地所有權證明。他們用公平或不公的方法輕慢土地法律，圍築廣大地區，獨占水道，並圖謀防止農民的前進。

但這是個失敗的鬭爭。牧人能威脅走各別的「尋巢者」，但他們不能永久藐視聯邦政府；當阿塔爾(Arthur)和克利夫蘭兩總統命令除去鐵絲網，把草地公開於取得宅地者，事情就此終了。當十九世紀第七、八十年內，鐵路已開出整個平原地方的入口，從事於大規模的殖民活動。北太平洋，有四千萬英畝要處置，充塞廣告於歐洲，描寫西部土地的幾乎熱帶的富庶（因此科克的「香蕉帶」）；科克的後繼者維拉德(Villard)，某一時有八百名以上代理人在國外鼓吹土地的售賣。聖大費帶進幾千俄國梅農教徒；南太平洋吸收德國人和斯干的那維亞人；喜爾以借款給貧農、津貼科學的農作、建立禮拜堂和學校，來造成他的勢力範圍。印第安人的反抗已被打破，殘剩的失敗部族的土地被掠奪去，或成羣結隊退入隱蔽的居留地。散市在平原地域沿邊的工廠，造出幾百萬哩鐵刺網或幾千具風磨和鑽洞機，使燥地可以農作。八百萬名外來移民湧進這地方，人口增加到二千二百萬人；國內農產物市場擴大，對舊居民區域的壓力增高了。

有這些形勢為主，十九世紀第七、八二十年中遇見一個進入平原地方的真正逃竄。當卡爾蘭 (Hamlin Garland) 去到達科大立樁標識地界時，地回憶：

從世界各國帶着移民聚集來的人羣，且行且停的蠕行於平原地。挪威人、瑞典人、丹麥人、蘇格蘭人、英格蘭人、和俄羅斯人都混在這滾向西部平原尋找土地者的大浪潮中，那裏美國已經預備下一片土地肥美的山谷使人享受富源。……街市上聚滿畫策者。談話都充滿命運和土地。太陽落下時，每點鐘裏，勘踏土地者從他們去無主地區上的旅途中回到旅館來，饑餓、疲倦、但是歡悅的。

沿着平原，都表現有相似的景況。二十年內，明尼蘇達人口增加三倍，干薩斯四倍，內布拉斯卡八倍，達科大從一萬四千一躍而至五十萬，堂堂的德克薩斯有二百二十五萬居民，推倒古舊的馬薩邱塞在人口次序上的第六

位。總之，當這二十年的時期，農業爲主的明尼蘇達、干薩斯、內布拉斯卡、兩達科大、科羅拉多、和蒙大拿各州的人口從一百萬增到大約五百萬——一個增加的速率較整個國家的大八倍。法國旅行家多克維爾（Doqueville）五十年前曾說過：「這歐洲種族的逐漸和繼續向洛磯山脈的進展有個天意之事的莊嚴。它像一個人類的大洪水，不減弱的興起，每天由上帝的手驅使它前進。」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末，進入平原的移民大潮流已耗去它的力量，在有些地方它開始退落。困苦的日子和旱災把許多野心的農民逐出西部干薩斯與內布拉斯卡和兩達科大的乾燥土地，回到東部去。人口增加的速率顯然緩慢下來：例如內布拉斯加，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內只增加四千名居民，干薩斯只四萬名——反之，別處的增加，並大大過於繁盛人口的能自然增加。

可是西部開發史上的最顯著的一章還沒有寫出。五十年來，開墾者垂涎於給與五個開化印第安部族作爲永久居留地的德克薩斯和干薩斯間的富庶土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對阿干薩斯、加拿大、紅河、和瓦西達（Washita）的富庶低地和它們中間大片草地的急切要求很強，使政府不能再加以阻止。印第安人的所有權被收買，一八八九年四月，這區域開放爲居留地。人們狂歡的湧入新地方。一位目覩這事的新聞記者寫道：

當北綫前進的命令下來時，畫策者就用各種速度開始前進。願意居住這區域北端靠近路軌的任何處者，都着了先鞭。有些人因不平而折回，其他更向內地推進。……當列車開始弛緩下來時，發生的事非言語所能形容。兒童，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忽然離開月台，開始一陣亂衝。他們互相攻擊，匍匐而行，並且逃走，有些緊握着他們的東西，有些急着追趕，把所有的東西都丟了。……各條路好像都到土地辦公處，那裏已經劃成一條百碼以上的綫。奔跑者立刻停住。他們落下離開東部的狂淚、當各人看見一塊無主土地，各人進行把它標識出並保有它。……在另一列車到達之前，有相當的空閒時間，但第三列和第四列緊接着而來；各列卸下它所載的旅客，加入可驚的擁擠。三點鐘以前，總共進來了十列車子，酌量給前往俄克拉何馬城的人們；在這區域在法律上開放爲居留地三個鐘頭之後，至少有六千人已經在古斯

里 (Guthrie) 了。

幾年之後，當北俄克拉何馬的浙洛岐地帶 (Cherokee Strip) 開放爲居留地後，也有相似的突進。一九〇〇年左右這新區域已有將近八十萬人的口。

礦業世界畜牧世界消逝了；現在邊地也消逝了。的確，在西部，依然還有礦場，但它們是管理良善的實業，由東部聯合公司所擁有並開採。從德克薩斯和新墨西哥到蒙大拿和兩達科大的草地上，依舊有幾百萬頭牲口分布着，但公開的位置已成過去，畜牧事業只是各種經濟利益之一罷了。西部依舊還有土地，但它大部分是山地或乾燥的地方，只有灌溉才能使農作獲利。在它的經濟機構上，西部更加同化於國家的其它部分中了。

政治上，那同化也疾速的進行。內瓦達早在一八六四年被允加入聯邦——主要的原因是林肯想要它的選票。內布拉斯卡於一八六七年達到州的地位，科羅拉多於一八七六年以百年慶祝紀念的州加入聯邦。接着是個長久的耽擱，直至最後的西部填滿，政黨騙取新區域的控制。結果在一八八九至九〇年，障礙被除去，一件含有數項事情的法案准許西部六州——兩達科大、外俄明、蒙大拿、愛達和、和華盛頓——的加入。烏達，人口早已足夠成爲一州，但因默蒙控制的緣故致被猜疑，幾年後才加入；俄克拉何馬在一九〇七，阿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兩西南州在一九一二。這樣，美國的政治疆界繪成它們的永久狀態，以一七八七年西北條例順利開始的程序終於完成。

在它們的政治組織上，西部各州近似東部。普遍的政府形式——三權分立，兩院制立法機構，地方政治的城鎮與鄉郡制度——到處被採用。在有些方面，新的州憲法和舊的不同。它們遠較詳細，訂立得更週密，大體上更自由。它們多數規定有些婦女參政的方式，禁止信託組合和專利事業，管理鐵道，並建立進步的勞動標準。可是影響它們的哲學和鼓勵它們的動力，基本上都和普遍於整個合衆國的沒有二致。

最後邊地上的生活

邊地常具有困苦和危險的特徵，最後的邊地不是例外。對於離開東部城鎮或森林農田來到高原尋找生活的男女，生活常是艱苦並且常是十分失望。比起俄亥俄和密西西必流域的農田，工作更艱苦，報酬更不足。對有些人，無邊的草原，伸展出最遠的地平線上，大堆雲海，美麗的夕陽，有它們的美，但對大多數人，覺得平原黃灰色並且單調。夏天，火熱的太陽慘酷的曬在耕地者和收穫者身上，乾熱的風從南方吹捲過來，使晚上只有令人難以忍耐。冬季來得極快，而且嚴冷，溫度降到零下二三十度；閃光的暴雪有時連日猖獗，結果留着成千的牲畜屍體散布在草地上，殺害並傷殘不幸遇上它們的男女；有時使人們從他們的房子尋找穀倉的途中失蹤了。

男人有他們的工作和他們的野心；苦工和寂寞，最苦的集中於女人身上。她們中許多生長於舒適的東部後方，初次居住於粗陋的隱蔽所或草泥蓋的小房子裏，光線黑暗，空氣不良，窗門用毛布或獸皮遮擋，每點雨打在露空的地面上，成爲泥水坑子。後來繼起替代原始營造的粗陋的木樞房子，雖是比較舒適，但並不稍稍雅觀。着手在一個沒有樹木的草地上，狹小，建築得匆忙，塗上鉛一般的暗灰色，它們夏熱冬冷，四季沒有溫和之氣。即使東部較窮農田上所有的大小樹木花草也沒有，雖然栽種一些並且在有水的時候照料一些。節省下爲種花木用的方，甚至爲打掃洗刷房子用的水，簡直沒有。遇到旱天，當穀類乾枯，葡萄藤子凋萎，井水涸竭，南風把石質的灰塵刮進每個角落和房子的小縫裏，熱度晝夜停在九十度以上，就是最有勇氣的人，也心驚膽喪。亨利 (Stuart Henry) 回憶一八七四年干薩斯亢旱的影響，說：

人曉得婦女們怎樣每天三次繞着火爐的爐竈旁，爲了定規的假使稀少的三餐，垂頭喪氣。人總得維持點氣力，骨頭上總得維持點肉。即使少有可寬宥的虛榮心的婦女，也免却想法子保住她們的容貌。她們聽着她們的髮髻燥乾，無論支出成什麼樣子。頭髮成爲繃縮的，人們少顧到刷子和梳子。眼睛凹進去，疲倦到極點，女性留意不到她們的外貌，和穿戴得怎樣。……男人們咀咒，也不再玩撲克。父親看見孩子們害怕，他們更加襤褸。說到他們的污穢，你要問，誰敢省點水爲他們洗洗！丈夫討厭回家吃飯，因爲

他們一定碰到他們女人怨訴，叫他們爬上車子，趕車回老家。

寂寞和孤立幾乎比酷熱、污穢、和苦工更壞。絕無社交的樂趣，禮拜堂的安慰，醫生的援救，許多邊地婦女——像羅爾伐格（Ole Rølvaag）的偉大作品「世界巨人」（Giants in the Earth）中的貝瑞得（Beret）一樣——成了反常的。小孩的生產，由仁慈的鄰居幫忙接生，有時或沒有任何幫忙；嬰兒死亡十分的高，有悲慘的小墳地作證。疾病常是可怕，因為醫藥設備不易到手，價錢又貴。由沼澤和停滯水池中孵育出來的蚊子所傳播的瘧疾，只是普遍之事；污水引起傷寒病；霍亂、肺炎、和麻疹極普通，意外之災招致嚴重的死亡數目。疲困的鄉下醫生常常沒有麻醉劑並且用最粗的外科器具施行非常手術。狄克（Elvarest Dick）說到一位青年醫生，在煤油燈光下，沒有麻醉藥，施行他的初次割治盲腸；當燈破火滅，手術在閃爍的吸煙火光中繼續下去。

城鎮的生活呈現得較多變化和親睦，但它也暗淡孤獨。這時期中道地的平原城鎮是件微小且試驗性的事，它的居民夢想着的一個遠大的將來，但等着命下，準備立即收拾，遷移到更有希望的地方去。想像一條窄狹泥濘的街道，它的木質行人道險峭的終止於草原的邊上，兩旁各排着一列傾斜的木框房子，它們的灰顏色被太陽曬得起泡。最傑出的房子是酒館、百貨店、租馬處、旅館、和車站；城鎮上的人每天聚在車站上等候列車帶來報紙雜誌、函售貨品目錄、東部後方親友家屬的信件、常來的旅行兜生意商人、或公債經紀人或收買穀物商人。街道的一頭有一所禮拜堂——常是美以美會或浸禮會或長老會——每月一次，有困苦被催促且報酬低薄的宣教師施送地獄火和硫黃。跨過街道，回到一個方院落中，是文典學校，一個兩間房子的事，有給學生坐的木頭板凳，給教師用的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一些師範學校前一年的年輕孩子，或一些需要一個職業的老女士老孀婦。少數較進步的城鎮居民栽種樹木，各處一排向日葵、蜀葵或牽牛花藤子表示主婦創造美的大膽嘗試。穿印花布或粗斜紋布的兒童在後院裏玩耍或貫注精神凝視鐵匠工作；滿臉鬍子的人們，穿着到處流行的工人褲，在百貨店或租馬處遊散，談論農作物的狀況或穀物價錢，或反覆嚼着政局。

犯罪或罪惡很少，但酗酒的事却很多——星期六夜，當農場少年做完一星期工後來到——有極多的口角。

在七月四號或在一個農場野餐會上，當全體市鎮人民和遠在四圍的農民繫起他們的馬和四輪車，騎坐着到附近河邊參加繼續慶祝時，往往有大聚會。狄克描寫內布拉斯卡青泉 (Blue Springs) 的這樣一個七月四號慶祝：

一個三人的委員會被命來捉鱈魚……四號那時，這些人已經在附近一個小河口中圍圍了千多磅的大鱈魚。……另一個三人委員會造了一座樹枝的筵子，在鋸木廠弄到板子做一張四十呎長的桌子和一座跳舞臺。從燃料木材，集起一大堆木塊。發起人派人到四十哩外的布朗斯維爾 (Brownsville) 買一隻二百五十磅重的豬，供給豐富的豬油來煎魚。臨時用鐵片做成一具壓穀器。那頓飯雖沒有細吃也沒有狼吞虎嚥，可是好穀類麵包很多。有華美的鱈魚和小白麵包的宴席，這穀類食物很少用來做餐品的。三號下午，人們開始前來。第二天，已有一百五十人。他們有的徒步而來，有的坐牛車，有的能得到什麼就用什麼。婦女們戴遮陽光帽子，穿平常衣服。在整個人羣中只有一位穿絲織品的；有些男人赤着腳。旗子升到七十呎高的桿頂；宣讀獨立宣言；豐富的聚餐罷後，從八十多哩外地方帶來的四絃提琴演奏起來，跳舞開始。這一直鬧到五號大天亮，居民才回他們寂寞的家，想着這件熱鬧的事——可怕的邊地生活這沙漠中的一個綠洲。

這些小城鎮有些繁盛起來。街道和行人道鋪設了，磚石代替了木料建築物，一家新旅館，一家戲院，銀行商店，一所高等學校，全證明繁榮和城市的粉飾。其它凋零消逝了；單在干薩斯一州，有二千個地理名字已從地圖上消滅。一個邊鎮的興廢，很被鐵道且被政治所決定；平原地方的郡位置的爭端是出名的。「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 描寫這事：

西干薩斯審判廳的存在，充其量是暫時的且無定的。早晨太陽的金光浸滿它在撲塔瓦託密城 (Pottawatomie City)，但它的長夜的陰影落在小天堂山谷 (Little Paradise Valley) 的街道上。西城 (Occidental City) 迷途的豬某天尋找它可遮蔽的地方，第二天，貪吃的小牛在大生客 (Big Soranger) 那裏抵開後門，當註冊員正玩牌的時候，這牛吃了一張契據和兩件抵押單子。今天我們在換車大站上用一扇

黃色油漆的前門做下標記，一陣旋風吹掉三角頂的那頭；但今晚會有一羣有主意的人們從響尾蛇叉口（Rattle Snake Crossing）前來，用一架牛輓把它扯去，拖着響尾蛇地方的市長和市議會到審判廳那頭。干薩斯審判廳在公共機關上是流浪的猶太人。

最後的邊地，同初期各邊地一樣，是澈底民主的。大多數新社會採取婦女參政的方式——外俄明早在一八六九年作為先導。有些新憲法規定人民直接立法權和公共問題複決權，並且大部分官吏——甚至法官——出於民衆選舉。民主在社會上的，較在政治關係上的為最明顯。任何人，比他的鄰居穿得好些，裝腔作勢，誇耀內部的幫助，便被人懷疑相看。銀行家、大店主、律師、農人、和租馬房的人，只穿襯衫，同坐在市鎮空場上，在禮堂裏同坐一張凳上；所有兒童都上公立學校，更野心的青年男女進附近教會學院或師範學校和州大學，這些州大學西部各州早有設立。許多種族在這些邊地社會中混合了——英國人、德國人、挪威人、波希米亞人、零星少數猶太人、和來自邊州的美國土著；不同種族、語言、和信仰，得普遍的寬容。在許多方面上看來，這最後的邊地是一切邊地中最民主的且最美國式的。

## 第十六章 農民與他的問題

### 農業革命

工業革命久已被視為現代史的基本事實。農業中的革命正是同樣重要。鋼鐵製造家、鐵道修築家、工程師、實業鉅子、和金融主人的勝利激起兩代美國人的想像，但農民和「饑餓奮鬥者」的勝利，如果較不明顯，可並非較不重要。當然，工業和農業兩種革命是互相依賴的。沒有機器和鐵路，農業革命不會發生；沒有穀類的巨流流進大城市的貨棧裏，工業革命不會有可能。幾百年來，人們已努力生產糧食以夠維持他們的生命；人口的增長，本身是受獲得的糧食數量所控制。幾百年來，饑饉這魔鬼是個司空見慣的，饑饉本身勒索過千萬條生命的稅：它是默示錄 (Apocalypse) 的四騎士之一，也許是最可怕的一個。十九世紀把多數人類從常常糧食不夠的恐慌中解救出來，那種解放，大大依賴美國的農場。

從一八六〇至一九〇〇四十年中，合衆國農田畝數增加一倍，實際墾種的土地畝數增加三倍。換句話說，這一世代墾種的土地，比我們歷史的前兩百年增多一倍。生產比較多於與這畝數增加的並進。一八六〇年的二百萬農田出產不到二萬萬布許 (bushels) 小麥，十萬萬布許稍弱的玉蜀黍，和百萬包左右的棉花；一九〇〇年的六百萬農田出產六萬五千五百萬布許以上小麥，二十五萬萬布許大強的玉蜀黍，和將近一千萬包棉花。在同一時期，美國人口增加一倍以上——大多數增加到城市中——但美國農民的穀類與棉花，出產的牛肉豬肉，剪的羊毛，不但足夠供給美國工人，並且輸送不斷增加的剩餘品以供歐洲人吃穿之用。

兩個基本原素大大解釋這非常的成就。第一是農業區域擴展進入西部；第二是機器和科學應用於農作方法。對於第一項我們已經有所熟悉。新的西部平原與山谷是個主要的農田區域，在奇短的時間以內，它在全國



農產中居於領導地位。小麥地帶從沿俄亥俄河各州向西移到密蘇里流域。在一八六〇年，意大利諾、印第安那、威斯康辛、俄亥俄、維基尼亞、和彭西凡尼亞是主要出產小麥的州；一九〇〇年左右六州中只有俄亥俄仍然是領袖，十年後它也從這名單上消逝了。玉蜀黍出產的變遷並不這樣顯著，但它的移動也是從俄亥俄到密西西比流域。棉花的故事十分相同：百年以來，德克薩斯在各州中居領導地位，差不多佔有密西西比以西棉產總數量的一半。當這些相同的年份裏，牛羊羣難以阻止的移進平原和山地的牧場上。

農業向西移動，對東部和南方海岸的農民，當然是象徵艱苦。這些區域的農業，無法和西部富庶的新地相競爭，又有較高賦稅和投資收益的負擔，所以趨於衰落，永不能完全復原。維基尼亞海岸許多地皮長上帶草，變成格拉斯哥（Glenn Cheslow）在她小說中所描寫的荒地；彭西凡尼亞和紐約的大區域亦變成荒野或遊客的遊樂場。新澤西曾有幾十萬畝菜爲大小樹林；內戰後五十年，這區域內在耕作的農田幾乎減少百分之五十。一位旅行家經過新英格蘭，寫道：

在馬薩邱塞的威廉鎮（Williamstown）和佛蒙特的布拉特爾鎮（Brattleboro）間的中途，我向晚上的天空看去，在一座小山頭上，有像一座大教堂的東西。走到那裏，我看見一所極大的兩層樓的舊禮拜堂，一所巨大的學院，一個有寬闊街道的村落，這街道許有一百五十呎寬。我趕馬上前，看見禮拜堂已經廢棄，學院裝具已經沒有，村子已經荒蕪。擁有村北田地的農人住在寬街的一面，擁有村南田地的人住在另一面，他們是唯一的兩家住戶。其他人們都走了——到工業的村中，到大城市，到西部去了。這裏有過實業、教育、宗教、舒適和滿足，但那裏只剩有被棄人家的一種可悲的寂寞。

單獨地域擴展一項，不能說明農產的猛進，這猛進土地耕種的增加或從事農業者的增加，不成比例。說明還是在農事效率的增加中。農業機械化較工業機械化頗爲落後，是件奇怪事實。一八〇〇年工廠工人和礦工用着他們父親祖父所不知道的工具，但一八〇〇年的農人耕種土地却和他的祖先在一千年前所作的十分相似。他的犁耙是件粗笨的木質或鐵質裝置物，用一匹馬或牛拖曳；他用手播種小麥，種植玉蜀黍和馬鈴薯；他用草耙

除草，用大小鐮刀收割穀子，放在穀倉地板上用木棒敲打，用手除去穀類皮殼。雖然婦女兒童都參加幫忙，一家能夠耕種十英畝八英畝，算是很少。

美國第一件重要發明品——惠特尼的軋棉機——深切影響農業並在南方整個經濟中引起革命。可是軋棉機，與其說它有助於棉花的加製，寧可說它有助於它的生產。事實上，除却耕種和噴藥霧這些操作，棉花對機器仍然有相當安全。別的農產物更有利，但對它們大多數，機器的應用長久遲滯着。可是試驗却是不曾間斷。犁耙的故事可作代表。犁耙於一七九七年初次取得專利權，那時以後製造出約有一萬二千具。最切問題是要一柄犁耙能清楚的犁翻泥土，不黏住泥塊或使樹根石頭抵破。哲斐遜試驗過，他的犁頭後面的變形鐵片，為減少阻力最低限度而設計，獲得巴黎王家農學會金質獎章。一八三七年，狄爾(John Deere)把他的木頭犁耙裝鑲鋼皮，堅韌得足以犁開生的草地，用在意大利諾草原上；不久他的出品有廣大的需求。奧利佛(Oliver)式冷鋼鑄造犁耙，開始發售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把光滑的鋼面和堅韌的鐵基連在一起，似乎已供應草地農民所有的需要。此後有無數次改良；一九〇〇年農業部報告說：

我們有輕車犁，兩個至六個犁頭的蒸汽犁，連把土耕耘機與連種子播種機的犁，山側犁，葡萄園犁，甜菜犁，底層土犁，雙地遂犁；最後，關於犁的發明的目標，似乎也是結果，我們有連播種機和連耘土機的多頭蒸汽犁。這種犁減少犁田、播種、耘田人力所用的時間，以生產小麥一布許計，從一八三二年平均三二·八分鐘到現在的二·二分鐘。

割禾機的故事更有趣味。一八〇〇年的農人，用一把手鐮刀，如果他工作夠勤快，一天能望割半英畝麥子；三十年後，他用改良鐮刀，一天能割二英畝。但用這種原始的器具，他不能大規模生產穀類，他也不能侵入西部平原。早在一八三〇年左右，有兩位農人試驗機械割禾器，胡息(Obed Hussey)和麥科密克；一八四〇年左右，兩人都造成用他們奇異的機器每天割五、六英畝麥子的奇跡。胡息搬到巴爾的摩，製造並售賣他的割禾機；麥科密克的眼光更遠大，向西領導芝加哥這青年的草原市鎮。一八四七年，他建立他的割禾機廠。

開始出產機器。內戰前後，麥科密克廠已經發售割禾機二十五萬部；由於供給一種機器，使人們得以出來從軍，這位遷地住居的維基尼亞人對擔保聯邦勝利，功績和任何將軍同樣的大。

割禾機每年都有些改良。一個移動的平頂，穀類在它上面被放到人的手裏，這人站在一個踏腳板上，把穀子捆起來：這法子消除斂集穀類把它捆成把子的退後破碎工作。一八七二年有一種自動鐵絲捆束機，幾年後有愛普爾貝 (Appelby) 式絞絲捆束機。這時打穀機器已經改良很精，在十八世紀第六、七兩個十年中，這些大怪物，每件帶着它的打穀一副機關，在沿着中部邊地的農田中移動。奎克 (Herbert Quick) 描寫愛奧華的一個農場的景象：

打穀時節，一切規矩都暫時停止。麥克康開 (McConkeys) 這一家開始打穀那天早晨，一家都被喚醒，三點鐘就活動起來，機器的來到使他們興奮。那機器頭天晚間就在一位隣居家裏開動了，第二天天未亮就拉進來。……巨大紅色的機器立在高大蜂巢形的乾草堆間。站着十匹馬，繫有五根馬力的長木竿子。駕馬者站在當中平板上，手裏拿長鞭。斂草者帶着他們的大叉子爬上草堆，又柄久經他們的粗手磨光了，叉子的三尖插入草堆頂上的捆子裏。……一陣沉重的咆哮，好像猛犬的發音放大五十倍，充塞了氣；當汽筒聚約速度，那部機器從音量的一種低音起為上低音，再成中音，響得烟霧朦朧的草地周圍四哩內都聽得見。餵草者仰看投草者，看見拿草投給機器的人，手裏拿着第二捆，正要放在平檯上，又見佛蘭克 (Frank) 手裏拿着他的切草刀正要輕輕的切斷草束，他把頭兩捆輕輕的移到兩片張開的口邊間，向上反轉扯草把的粗端，大動作這樣進行着。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出現革新的割禾打穀機，或把割禾、打穀、清穀、和裝袋連在一個單獨相續動作的機器。它用二十四或四十四馬拖拉，後來用一具蒸汽或汽油牽引機，一天能收穫七八十英畝穀類。

在農業的每一部門裏，摘棉花是顯著的例外，機器都大有幫助於農民。機械的玉蜀黍種植機，玉蜀黍收割機，剝皮機，脫殼機，拉伐爾 (de Laval) 式奶油分離機，肥料洒播機，馬鈴薯種植機，草料收乾機，孵卵

機，肥料，和百種其它發明品大大啓迪拿鋤頭的人並且增加他的效率。用複合機器，四個人能做以前三百人的工作——並把它做得更好。玉蜀黍剝皮機用一具代替八個人，玉蜀黍脫殼機代替五十人；收穫一噸草料所需要的時間縮短五分之四。二十世紀蒸汽、汽油、和電力應用於農事，解除以前用爲牧場的幾百萬英畝，進一層減少人類勞力並且增加農業效率。

吸收最大多數新收穫機和打穀機牽引機，像它們能造出這樣快的，是中西部和極西部。東部以投資於高價機器爲正當的農場太小，農業變化太多；南方的棉花煙草並不因機械的耕作而生產較豐，並且人工又低廉。農作機器的價值，從一八六〇的二萬五千萬美元增加到一九二〇的三十五萬萬，但這增加的大多數來自密西西必以久西的地帶。一九二〇年，單獨愛奧華一州農民在機器的投資，比全部新英格蘭和中部大西洋岸各州農民合起來的還大；一個南達科大農場的機器平均價值是一千五百美元；棉花地帶每一農場的才二百十五美元。

農事機械化使農民能養活一個城市居民的增長人口，並且能把剩餘糧食輸送國外，交換有助於供給工業和鐵道的擴展。對於農民本身，它不是個純粹的幸福。它連累他們許多人化錢在貴於他們負擔得起的費用上，強迫他們擴展他們的操作以適合那些投資，並且集中在商品的農產物。它給與大農民一個超出他們弱小競爭者之上的明顯優勢，並且立刻加速「發財」農業的和佃租的發展。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自足小農場，有它的麥田、玉蜀黍田、燕麥田，它的蔬菜園，它的雞窠和豬圈，它的十頭八頭牦牛在草地上放牧；這些讓步與二十世紀的小麥或棉花的大片土地，糧食的取給甚至於依賴雜貨店。

科學並不比機器次要。從初期起，美國農業與其說是加強的，到不如說它是推廣的，因爲開發新土地比保守舊土地似乎比較容易。可是南方沿海地力消耗的快，使種植家吃驚；許多南方人士中單企圖用新植物、輪替農作物、和改良他們的牲畜，來應付這危機，最著名的是華盛頓和哲斐孫。哲氏說，「將任何國家貢獻的最大服務是在它的文化上加上一種有用的植物。」但這些早期改革大部分付諸東流，因爲阿帕拉幾山脈外的廣大地地的開發，和軋棉機的發明，使農民移向肥美土地，比起用仔細耕作來恢復舊地的肥力，要更有利。新地的礦

業，也許是邊地經濟難免的一部分，一再在成功的邊地上發展。

聯邦政府在一八三九年特別爲農業撥出它的初次經費；但政府的興趣從一八六二年莫利爾土地租讓院法令 (Morrill Land-Grant College Act) 的通過才真正開始。這法令規定由公家給與農工學院一種補助金：每州遣派到華府的國會議員有三萬英畝土地的權利。在這法令之下，各州相繼創立獨立的農學院，或和州大學相聯合，這些學院結果推進科學農事的研究。同等重要的是一八八七年哈取法令 (Hatch Act)，撥出大量基金爲創立全國農業試驗站的用途。同時，農業部研究事業的直接經費增高到幾百萬美元。一九三〇年左右，約有七八千名科學家爲這些衆多的政府委託，工作不知其數的研究計劃；最遠大重要的貢獻，來自他們的實驗農場和實驗室。

這些「饑饉抗爭者」的代表是帶偉大的庫班卡 (Kubanka) 和哈科夫 (Kharkov) 小麥到美國西部的卡爾頓 (Mark Alfred Carleton)。卡氏在干薩斯從事農作和教學，年年看見旱天和寄生菌病傷害所有平原農民能種的最堅強的小麥。但他也看見聖大費鐵路帶進住居在聖大費的俄國梅農教徒，他們的麥子運氣較好；他發現他們用遠從他們故鄉帶來的種子所種的。一切麥子究竟是輸入品；卡氏確信堅強耐旱耐菌的穀類的祕密是出產於烏克蘭或歐亞大草原的某處。

一八九八年，他受農業部的加護，趨向這天府之國。最後，在土爾該 (Turkai) 草原，正是烏拉爾河以西那裏氣候和地勢與西干薩斯的十分相似——他發見他所要尋找的東西：庫班卡小麥。在平原地上，它比法府 (Fife) 和青莖 (Blue Stem) 每畝多產幾布許，並且證明對寄生菌病有奇特的免疫性。但庫班卡在明尼蘇達以北到薩斯卡其宛 (Saskatchewan) 的地帶中獲得它最大的成功；很奇怪，它不宜於南方平原。所以卡氏再度着手到俄國；在烏克蘭，於四十年後德俄兩國人成千成萬相殘殺的哈科夫附近，他找到哈科夫小麥。一九一四年左右，美國冬麥的一半是庫班卡或哈科夫各種。

其他饑饉抗爭者作了並不次要的貢獻。多塞特 (Marion Dorset) 克服豬霍亂病，摩勒 (George Mohler) 克

服傷害家畜的蹄嘴怪病。瓦特金斯 (J. H. Watkins) 從北非洲帶回喀非 (Kaffir) 玉蜀黍原種，韓森 (Niels Hanson) 從土耳其斯坦輸入開黃花的苜蓿。布班克 (Luther Burbank) 在他的加利福尼亞實驗室裏出產幾十種新的水果蔬菜，科克爾 (David R. Coker) 在他的南卡羅來納實驗農場上證明長纖維棉花能生長於山麓及高地。巴布科克 (Stephen Babcock) 在威斯康辛大學發明一種試驗牛奶以斷定奶中脂肪含量的方法。工作於塔斯岐基 (Tuskegee) 研究所的黑人科學家喀爾佛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發現普通出產如花生、白薯、和大豆等的幾百種新用途。喀那普 (Seaman Knapp) 從東方輸入新的種類，援救穀米實業的戰後衰落，並且開始實驗農場的冒險制度，指示改良全南部農業方法的道路。

### 農場的艱難時勢

美國農民耕地的功能一年比一年大，收穫農作物一年比一年豐富。勤奮聰明，受富庶土地、靈敏機器、和近便市場的實惠，他當然是順利快樂了。但他的命運是艱苦的，並且不斷的更要艱苦。在全部農民歷史中最偉大的農業擴展世紀之末，替代哲斐孫所稱它為「上帝驕子」的，成爲一個主要的經濟問題。這自相矛盾之論的解釋在什麼？

農場問題是複雜的，它出現於南方種植家，穀類耕種者，種玉蜀黍和畜豬者，牧人，畜養乳牛者，種果樹園者，各種不同的樣式。某一時，它以一個鐵道問題出現，又一時爲一個貨幣問題，更有一時爲一個土地政策問題；它牽涉地域利益，政黨綱領，和國際關係。可是爲農場問題幾乎每個方面基本的却有幾個不變的要素。要素中主要的是地力的消耗，自然的奇想，商品農業物的過度出產，自足的衰落，和充足立法保護與援助的缺乏。

南方地方久已被種烟草種棉花並被無知的農場勞工的應用所耗竭。在那區域的較舊部分中，幾百萬英畝變成叢林，流下無隄閘的溝渠的水，每年沖去幾百萬噸肥美的浮土。在美國售賣的所有肥料，南方用百分之七

十，南卡羅來納農民化在肥料的費用達到他們棉花收穫價值的四分之一，這些事實說明南方地力累積的貧乏的一些現象。在西部，浸蝕作用和大風暴也使土地荒廢。高原的大部分不適宜於耕種，甚至不宜於已在那裏實行的那種畜牧；耕種過度或畜牧過度的土地，塵土凹子擴大了。

時常發作的旱災也降禍於平原農民。一八五九至六〇年，有十六個月以上的一個時期，沒有一滴好雨來救濟干薩斯和內布拉斯卡的農民，抱着這般大希望而來的受難開墾者，需要東部慈善事業的援救。雖然這樣激烈的情形是稀有的，可是那種經驗在平原上倒常見，有時旱災一拖長便是幾年。

蟲害和植物病的危脅並不較小。昆蟲中，灰色甲的棉害蟲 (Boll weevil) 無疑間是最壞的。這災禍在一八九二年從德克薩斯渡過大河，以後每年進展約五十哩，直到它擾害整個棉花地域。阿拉巴馬州恩特普刺斯 (Enterprise) 的農民因為它促成農作物變更，為它建築一座紀念牌；但當它最壞的荒廢幾年，它減少廣大區域的棉產百分之五十以上。比「棉花蟲歌」這詩歌中所說有更真實的。「棉花蟲歌」(Ballad of de Boll Weevil) 說：

棉花蟲向傳教師說：

「最好關上禮拜堂的門，

當我完了農民的事，

他不能再供養傳教師，

我有一個家，我有一個家。」

棉花蟲向農人說：

「他能駕駛那福特機器。

但當我完了你的棉花，

你不能買汽油，

「不要沒有家，不要沒有家。」

一切撲滅棉花害蟲的努力都無效果，種棉農民只有早種和過分的用毒藥，能把它擋住。

平原的蟲害不計其數，但最可怕的是蝗蟲無疑。平原農民的初次蝗災經驗在一八七四年——這經驗一再發。  
亨利 (Stuart Henry) 描寫蝗蟲怎樣

吃去從洛磯山到密蘇里河和河外綠葉植物的每片葉子。我記得當我有一天傍晚回家晚飯，我驚異的退回一看，才知道洛磯山蝗蟲遮了房子的一邊。它們已經在房子裏面啃着幔子。它們大陣立刻落在整個鄉間，到處都是，無可避免。人們動手來除殺它們，救護園子，但不久證明這是件可笑的事。特別設計用馬拉的機器，在穀類田地裏整桶汲起蝗蟲來燒。這也無稽。大羣無數。一星期內，穀類田地、園子、灌木、葡萄藤子、都被吃得精光或連個樹皮都不剩。什麼辦法也沒有。你坐着眼看什麼都完。

麥虱、鑽玉蜀黍的蟲、和苜蓿害蟲幾乎有同等毀壞力。

農民在一個世界市場上售賣——與俄國、阿根廷、加拿大、澳洲的農民相競爭——又在一個保護的市場上購買。他賣麥子、棉花、或牛肉的價格是決定於利物浦，他買收穫機、肥料、鐵絲刺網、鞋子、衣服、木材、木器的價格，由操縱於一個保護關稅之後的信託組合所規定。他的費用——他用於田地上東西的費用，運輸的費用，他借貸款項的費用，政府的費用——堅決的高漲。新土地和機器使他能夠每年生產增加，但他的收入並不增高幾分。在一八七〇至九〇最大農業擴展的二十年中，美國農產物價值只增加五萬萬美元；在同一期間內，製造品的價值增加六十萬萬美元。大多數農產物價格不規則的下跌。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裏，小麥價格每布許一美元，到九十年代中期，跌到五十分錢。棉花從一八七三年的每磅十七分錢跌到二十年後的九分錢，後來跌到六分。實質上，玉蜀黍、燕麥、大麥、煙草和其它農產物有同樣故事：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早期中，十種主要農產物的每英畝平均價值是十四美元，在九十年代中是九美元。

農民在它底下勞動的一切經濟競賽，最嚴重的或許是貨幣漲價。當他到地方銀行或抵押權代理人那裏借



款，他知道他須在他的貨款上付息八釐到二分。這情形以更有損害的跌價方式使他受損。假使我們依美元價值的觀念，不依農產商品價值的觀念去想，我們能容易了解這個。一八七〇年，農民能用一布許小麥、兩布許玉蜀黍、或十磅棉花購買一塊美元。一八九〇年左右，要兩布許小麥、四布許玉蜀黍、或十五磅棉花來購買一美元。在一八七〇年借貸一千美元的農民能用一千布許小麥償還他的債；假使他讓抵押權拖到一八九〇年，這要用兩千布許小麥來清理它。

在這些不幸環境的表面上，美國農民的抵押負債，突飛猛進的增加，並不足怪。一八九〇年左右，意大利諾有九萬以上農場被抵押出去，內布拉斯卡十萬，干薩斯更多。這些抵押單最大多數為東部所握有；單獨新漢布什爾居民就大約有二千五百萬美元的西部抵押單。租佃也在上坡路。全國平均數是百分之二十八，但在南部和西部，比例多少是高的。

這些是農場問題的主要成分。農民未能利用政府做一個工具以保護他的利益，是他的病因，也是結果。農民雖然構成國家人口的一半，他們很少遣派一名代表到國會，甚至於到州立法議會；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農民像參議員裴佛 (Peff) 和議員辛普森 (Simpson) 到華府，他們被人看為奇事。寫國家法律的人對待工業家、銀行家、和鐵道主人的利益，比起注意農民，熱心得多；立法反映出這種熱心。保護關稅或許有助於實業，但它使農民幾乎在他購買每件東西上多出了錢。寫入法令書籍中的銀行與貨幣立法，對銀行家和投資者是個恩惠，但對農民是個可怕的負擔。為管理信託組合和鐵道而設計的法律，寫得或解釋得使它們對那些利益不引起不便利；當農業各州試訂較嚴的法律，法院否決它們。甚至表面上為扶助農民而設計的立法，如宅地法令，也被證明是失望的；直至一八九〇年，直接或經過鐵道和投機商人被售賣的土地，比到宅地主人手中的要多。

阿坡馬託克斯停戰後三十年，那時美國農民已經擴展他的領域於整個大陸，有最新式機器和科學的幫助，增加他的生產到他準備供給西方世界食糧那點上。而他是在到鄉農去的路上。

## 農民組織

實業、銀行、甚至勞工，都已在組織；農民效法他們例子的機會成熟了。可是沒有更艱難的事。農業利益團包括有幾百萬個單位，各自個別運轉，各抱着一個競爭的觀念；農民自然是個人主義者，不願意外界的管制；土地和氣候都不能有效的受控制。結果，農產的管制直到聯邦政府負起責任時才開始。這時，農民假使希望免除鐵路、信託組合、抵押公司、和經手人的剝削，他須要採取辦法。

最初普遍於全國的農民組織是農家協進會 (Grange, or Patrons of Husbandry)。一八六六年，一位政務人員，凱萊 (Oliver Kelly)，在戰爭蹂躪過的南部作長途旅行，他所看見的，使他確信農民的貧窮、落後、和孤立只可以用共同行為來改善。他和幾位朋友組織農家協進會，一個社會的與教育的團體，宗旨是「發展我們本身的男女兩界更高的性格。提高我們家庭的安樂和美感並增強我們對職業的連繫。……使我們的農田能自己保持。」幾個地方的分會建立於紐約和彭西凡尼亞，但這會在東部時，始終沒有多大進步。一八六九年，它的總會遷到中西部，當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的艱苦時期中，這會像野火一般的散播開。一八七三年左右，差不多每州都有分會，會員人數達到七十五萬。它的最大力量在中西部，但它在南部和沿太平洋岸也極繁盛。

凱萊的觀念是：農家協進會主要必須是個社會的組織。婦女與男子同樣可以加入；一個精緻的儀式，部分從互助團的 (Masonic) 抄襲而來，每月有關於教育、愛國慶祝，和節令的集會。大目的是打破農民的孤立，輸入色彩和趣味於他的生活。引起見解的交換，並建立利害的共同責任。在這一切上，農家協進會是成功的。協進會報紙有很廣的流傳，協進會圖書館分配農事出版物，協進會教師演講於鄉村學校，協進會野餐會成為固定制度。卡爾蘭 (Hamlin Garland) 回憶一次野餐會，寫道：

它對我們是壯麗的，動人的，我們看見那些長陣車子慢慢走下街來，一輛一輛相遇在十字路口，直到最

後郡北所有協進會聚成一個大隊，向野蠻地前進。那裏，演說家帶着鎮靜的威嚴和大決斷力等待我們走近。從來沒有更美麗，更愉快，更有益的事，曾出現於美國的農村生活。

但當農民聚在一起，甚至為遊戲，他們須論到事業和政治，這是無可避免的。討論引起行動，不久，許多州協進會成立合作的市場組織，商店，貸款經理處，甚至於工廠。這些常常辦得不好，並且從開始就遭遇已成立實業界的激烈反對。可是這些組織，替它們會員節省不少錢：例如愛奧華農家協進會，運輸穀類五百萬布許到芝加哥，省費百分之十到四十，並且以合作購買的法子替它的會員在他們購買每具割禾機上節省一百美元。應付這種競爭，直接供給協進會會員的需要，蒙哥麥利華德 (Montgomery Ward) 函售公司成立了。

儘管他們的憲法禁止政治討論或行動，農家協進會會員當然也參加政治。在有幾個中西部州裏，他們選舉他們的會員到立法議會，通過所謂「農家協進會會員法」，管理鐵道和貨棧。但沒有一個地方的協進會會員組織成爲一個政黨，他們也沒有在國會中建立像後來「農場集團」的一種組織。

由於他們許多實業經營的失敗，和他們立法的挫折，由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先期的恢復相當繁榮，農家協進會絕亡了。後來它復活，但只是純粹社會的與教育的組織。這時有些失望的農民歸入綠背紙幣黨 (Green-back party，又譯獨立黨)——一個農民、勞工、和空論改革家雜湊的團體——這黨在一八八〇年推舉農家協進會的一位舊領袖，愛奧華的魏佛 (James B. Weaver) 做該黨總統候選人。

農家協進會的真正承繼者是農民同盟 (Farmers' Alliance)，美國歷史上最有趣味的農田組織。農民同盟的淵源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前期的不景氣中。時候比以前都艱難，旱災降在衰老的平原上，年年繼續下去；農產物股分制和農產物留置制把南方陷入悲慘境遇；小麥跌到五十分錢一布許，棉花六分錢一磅；拿棉花當燃料燒，比運它到市場上去要上算些。在華府的半官議員們，只感覺到實業的需要，一八九〇年，給國家贖上麥金萊 (McKinley) 關稅，高得爲空前所未有，維持一個非常頑固的銀行和信用制度，並在養老金與公共建築經費中投票取消了幾萬萬。被政府的不公平所刺激，同盟運動像一個流行病似的展開，一八九

○年左右各同盟的會員人數差不多有二百萬。

西北與南部同盟在許多點上和早期農家協進會相似。它們從事細密的教育計劃，流通書籍像亨利·喬治的「進步與貧窮」(Henry George's Progress and Poverty)和貝拉美的「回顧」(Edward Bellamy's Looking Backward)，出版同盟報紙——單獨干薩斯就有一百種以上——派出演講者向農民報告科學農業的最新發展，並鼓吹救濟的立法，又建立農民研究所和學會。它們也着手遠大的經濟計劃。德克薩斯同盟主持合作的購買、售賣、和貯藏；南達科大州的同盟擔保農作物保險；在意大利，它組織一套農民的交易所。這些事業有些是成功的，並且替農民省却幾百萬元贏利與經手人的費用；其餘對抗銀行鐵路的難解敵意的，是失敗了。

早以前，同盟已產生一個有改革精神的政黨。從開始以來，它們已標榜出一個政治改革的計劃：鐵道國有，低值貨幣，廢除國家銀行，禁止外國人置有地產，減低關稅，創立國庫分支庫計劃以便利的信用貸款供給農民。最後這項特別有趣味。它要聯邦政府在每個農業郡中建設貨倉，使農民可以在那裏貯藏他們的產物，換取等於產物市價百分之八十的證明單。這計劃要給予農民利息很低的信用貸款，使他能避開市場，留住他的農產品，等到價格有利，並且把通貨膨脹——這樣提高農作物的價值。當第一次進行，它被斥為一個輕率並社會主義的手段；在一世代之內，它的要點已被聯邦政府所採取。

在一八九〇和九二年中間，同盟化成人民黨(Populist Party)——美國政黨中最有聲色的一個。這黨的人物是從南方和西部的農民湊集起來的，但它包括有許多其它少數團體——勞動協會、綠背黨、聯合勞工黨、婦女參政主張者、社會主義者、單一稅主張者、銀本位論者、和職業的改革家各團體的殘餘。它的力量集中於中部沿邊，它的領袖也從這區域中產生。這些領袖中主要者是明尼蘇達愛爾蘭人 伊格納利(Ignatius Donnelly)，農民，雄辯家，煽動家，阿特蘭底斯(Atlantis，古代理想地名)已亡大陸的發現者，培根理論的擁護者，通俗小說「恺撒的縱隊」(Caesar's Column)的作者，這人攪動美國政治界二十年之久。從人民主義的暖床干薩斯產生參議員裴佛(William Puffer)，他的飄洒的長鬚令觀察者聯想起一位希伯來先知，而青年的狄奧多。

羅斯福斥責他爲「一位善意的、微細的、無政府主義的幻想家」。從于薩斯，又產生一位最偉大的婦女復興論者——黎斯 (Mary Eillon Lease)，她善辯的懇求平原農民來「少激起玉蜀黍，多激起地獄」。在南部的喬治亞，形容枯槁、頭有紅髮的瓦特生 (Tom Watson)，「希利山」(Hickory Hill)的哲人，自命爲查麥孫的承繼者，號召佃農和磨粉廠工人到人民主義的旗幟下面，並且使所有南方守舊者感覺得震顛不寧。在內布拉斯卡一位青年的民主黨員名布賴安 (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正促着他的政黨和人民主義的新組織相混合。

美國政治上，從來沒有像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早期橫掃草原和棉花區域的人民主義起事這種事。一位目擊者寫道，「它是個宗教復興，一支十字軍，一個政治的神聖降臨節，在這裏人人都有一根三寸不爛之舌，人人說的話好像有妖魔鬼怪似的」；另一位目擊者追述它「好像十字軍的一種熱狂」。一天田野間勞作之後，農民們繫起他們的小馬車，同他們的女人小孩慢慢到協進會或學校，給他們草根領袖們激奮的雄辯捧場。黎斯指斥說，「華爾街擁有國家」。「這已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華爾街有、華爾街治、華爾街享的政府。我們的法律是一種制度的出產力，它使流氓穿着袍子，誠實穿着爛布。」受迫害的農民表決新的獨立宣言。宣言的一段說，「過去二十八年，合衆國的歷史是個層出不窮的傷害、暴政、和篡奪的歷史，世界歷史無與倫比；一切制定的法律有個直接的目的，便是要在一度自由美國的沉淪上建立一個資產的貴族式政治。」

一八九〇年的選舉使新政黨在南方和西部十來個州裏得勢，並且派送二十來名平庸的參議員衆議員來驚動沈靜的國會廳堂。由這成功而氣壯，這政黨甚至計劃更大的勝利。一八九二年的獨立紀念日，一千名熱心勞動的代表聚會於俄馬哈 (Omaha)，推舉一位總統候選人，並贊成當納利的熱烈前提於一個十分進步的黨綱：

我們在一個道德、政治、和物質瀕於毀滅的國家中聚會。腐敗支配了選舉、立法機構、國會，甚至接觸到法官的職位。……報紙大部分受津貼或箝口；輿論緘默；實業疲憊；我們的家抵押了；勞工貧窮；土地集中在資本家手裏。……幾百萬人操勞的收穫被大膽的竊掠，造成少數人的巨大財產……轉過來，這

些財產的主人藐視共和，免害自由。從同一政府罪惡的多產來源，我們養成兩個大階級——流丐和百萬富翁。

人民主義者得到一百萬以上選票。但進入白宮的是克利夫蘭，不是牽引這許多失敗原因的魏佛。變亂的風從南方日灼的棉田和西部炎熱多塵的草原吹來，但兩舊黨走它們的慣路。沒有此地震更小的事能夠搖動它們整齊鎮定的態度。那地震不久便到。

一八九六年

一八九二年的時勢不佳，更不斷的變壞。儀表堂堂的克利夫蘭第二次宣誓就職之後不久，一個大恐慌發生於美國。實業家破產，銀行關閉，鐵道落入債主手裏，工廠歇業，貿易憔悴，放款者取消贖取抵押品的權利。在城市中，長排的失業者等候於湯廚外面；在鄉間，大隊流丐添入成千成萬的新參加者。這甚至比一八七三年的恐慌更糟，更廣，並且在結果上更糜爛。

在這種凶兆的表面上，政府採取不干涉經濟變動的傳統政策。克利夫蘭是一位有能力的領袖，誠實，有魄力，有善意，在反對腐敗和特權上他是曼吉斯德 (Manchester) 自由主義的良好代表。在他的第一次任期中（一八八五——一八九），他留下大可讚美的政績。但他和流行的放任主義哲學結不解緣。他的計劃仍然是一個減低關稅和行政改革，他拒絕救濟性經濟立法的大部分建議。他深信風潮該自己吹出去，不景氣最好用自動的力量救治。兩年功夫，事情不斷的變得更糟。一八九四年眼見普爾門大罷工，科克賽 (Coxey) 的失業者隊伍向華府開進，和農產價格的愈加崩潰。從棉田、玉蜀黍田、和麥田上，起了一陣變動的大暴浪。民主主義的南部和西部一翼威脅着脫離舊黨，當一八九四年克利夫蘭阻塞通貨膨脹政策的路子，密蘇里的老戰馬勃蘭德 (Richard Bland) 宣稱「我們已到分路上」。那年秋天一羣不滿意的民主黨人和人民黨人攔了手，那人民黨已得到將近一百五十萬票數。

許多人預料一八五四至五六年危機的重演，那時老朽的自由黨組織已經分裂，年青有力的共和黨起來替代。但敏銳的西部民主領袖們並沒有準備放棄，而南部民主已和白種優勢完全併合爲一，弄得沒有一個第三黨能得機會。南部和西部民主的激烈領袖們因此運動着奪取黨組織，以代替加入人民主義者。布賴安後來描寫這事：

接着開始鬭爭。具有一個近於鼓舞十字軍人追隨隱士彼得 (Peter the Hermit) 者的熱誠，我們的銀本位主張者民主黨人着着勝利的前進。……在這爭論中，哥哥列陣對抗兄弟，父親對抗兒子。……舊領袖不肯表現他們所要領導者的情緒時，他們被棄在旁邊，新領袖躍起，來指示這真理的主義。

農民的民主黨人選舉在貨幣問題上鬭爭。這常被視爲一個錯誤，可是是否有任何其它意見訴諸這許多選民，或欣然贊許戲劇化的事，倒是個疑問。那時的貨幣問題是複雜的，可是它不太令人誤會，認爲它熬到膨脹對抗收縮的問題。幾年以來，國家的人口實業都有增長，政成已經採取一個收縮通貨的政策。一八七三年，正在西部銀礦生產開始威脅要貶低貨幣價值之前，國會以一個純粹習慣的方法停止白銀的貨幣資格——就是，拒絕收購或再鑄造銀幣。後來在一八七八年，又在一八九〇年，政府被迫大量收購白銀，以致合衆國通貨黃金基礎的維持受到嚴重的危險。接連的幾位總統，由全國所有保守勢力作他們的後盾，決定支持這本位。克利夫蘭特別爲這作一個有力而成功的鬭爭。許多農民確信物價低落的主要負責者是這貨幣政策。恢復白銀，鑄造所有開採出來的，把造幣廠開放給世界上所有貴金屬，貨幣價值會回到常態，物價會提高，繁榮會回來。銀本位論者的主張如此。

保守的硬幣主張者仍舊確信這樣一個政策曾造成財政上的不幸。一經開始的通貨膨脹不能阻止，政府本身將不得不破產。只有金本位有貢獻於安全。比這更進一層，他們說到確信金本位制不但是健全的財政，並且是健全的道德，他們必須斥責銀幣不公平，說它是一種「不誠實」的錢幣。這是個舊爭執——關於低價貨幣的爭論——又是個常常新的爭執。

在戰略的立場上，爭論自由白銀的論點必須多提到。銀礦主人，對着破產，不能期待他們作一個政治運動的經濟後台。白銀利益團在五、六個人口稀少的西部各州裏有無所不在的大權，這些州通常是共和黨的，並且在選舉團裏號召有個不均衡的票數；如果它們能擺到民主黨的隊伍裏，它們會轉移選舉。鬆動的銀根會引動全國廣大的債戶階級和一些工人，同引動農民一樣。結果，白銀有一個情感的性質，容易被利用。黃金是富人的貨幣；白銀是窮人的朋友。黃金是華爾街和龍巴德街 (Lombard St.) 的貨幣，白銀是草原地和小市鎮的。但這還不夠以有一個爭論；銀本位論者須有一位候選人。紐約「世界報」說，「銀本位論者需要的只是一位摩西。他們有原則，他們有膽力，他們有隊伍旗號，他們有呼號擁擠，他們有選票，他們有所謂領袖。但他們在荒野中流浪，像一羣迷途的綿羊，因為他們當中沒有一位現出具有魄力，大膽。和智慧可以做一位真正領袖者。」

他們找到內布拉斯卡的布賴安做他們的摩西。他是一八九六年參加動亂的芝加哥會議的一名代表，被苛評在貨幣問題上發言。當他爬上演講台，六月八號那大熱的夜裏，他走進不朽的聲譽上：

我們不是以侵略者而來。我們的鬭爭不是一個征服的鬭爭；我們是為保護我們的家，我們的家庭，和子孫而鬭爭。我們請過願，我們的請願被侮蔑了；我們懇求過，我們的懇求被漠視了；我們要求過，當我們的災難到時，他們嘲弄了。我們不再要求，不再懇求，不再請願。我們向他們挑戰！……

「普拉特 (Platte) 的少年雄辯家」這樣說，每句話博得一陣陣聲。當他發表他的著名結論，大廳上響動着像尼阿卡拉 (Niagara) 大瀑布的聲音，為任何美國集會空前未有過的：

假使他們敢出來到空場上辯護金本位是件好事，我們決定和他們拚到底。我們有全國和世界的生產大衆做後盾，商業利益團、勞工利益團、和到處勞動者的幫助，我們決定答復他們對金本位的要求，告訴他們：你們不要把荆棘的王冠硬壓在勞工的額上，你們不要把人類釘在黃金的十字架上。

即便沒有這番演說，布賴安也會被提名為候選人，因為他已經作了一個慎重的會議前的競選運動，並且在許多



方面看，他是位合理的候選人。演說之後，他的被提名是個先驅的結果。民主主義白銀一派的勝利是完成了。他們寫定政綱。提出候選人，並力壓民主主義者來加入他們。

有這次競選運動，布氏這引人注意的人物進入國家的活動場，盡人皆知的斷續續到二十年之久。在有些方面上，他是克萊以後的最顯著的政治領袖。相貌莊嚴，頭髮烏黑，眼睛如漆，發言流暢華美，機敏，聰明，有膽魄，他爭取到幾百萬平民的想像和崇拜的熱誠。他們認為他是自己人，給他一個大畢特 (the older Pitt) 的稱號「偉大平民」。布氏生長於農家，進過一所鄉間學院，搬家到平原鄉間，在那裏實用法律與政治；他是個虔誠的長老會信徒，他的政治演說裝飾有適當的聖經語句；他是一位平民的民主黨員，沒有被成功所沾染，誠懇的致力於他所見到的公共利益，並且確信人民的呼聲是上帝的聲音。他的限制雖然很多，因為他讀書不多不深，遠非一位有創作才或深謀遠慮的思想家，他是一位十足的代表美國人。

一八九六年的競選是賈克孫時代以後一次最激烈的爭鬪。布賴安的事業起初似乎是不可克服的。他的政黨分裂很大，黨的名義上的領袖克利夫蘭成爲對立的，它的東部領袖們大多數投入共和黨陣地。民主黨人又被不公平的指摘，負三年不景氣的罪名。所有有體面的勢力，實業界，大學，新聞界，金融界，幾乎都聯起來反對布氏。共和黨魁哈那 (Mark Hanna) 鼓起一宗競選費用，估計有三百萬至七百萬美元；對着這，民主黨人少五十萬能夠對敵。民主黨人只在一點上佔明顯優勢——在布氏本身。交叉着新英格蘭到西部的地方，在炎熱風塵的日子坐着大馬車，一天演說十次八次，向勞工和農民、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申訴，他做了美國歷史中最熱鬧的一次競選。

穿着一件外衣像教會執事，戴着一頂斯德特孫 (Stetson) 帽子，  
他用普拉特來的鐵絲刺鞭撻「象」富豪。……

草原報仇者，山獅子，

布賴安，布賴安，布賴安，布賴安，

偉大的浪漫抒情詩人，說話像一座攻城礮，以他的西部來的圓石粉碎普里曼斯岩 (Plymouth Rock)。它是莊嚴的，但他却不夠。結果麥金萊以五十萬票的多數占勝。使哲斐孫得權，並支持賈克孫和道格拉斯和威斯康辛，又在極西各州，如加利福尼亞和俄勒岡，佔到優勢。但布氏的競選運動是成爲傳奇式的——人民主義者和農民民主黨的觀念最後被寫入立法，沒有單獨的重要例外。他們要改變美國歷史的趨勢。

## 第十七章 改革時代

### 向民主主義的挑戰

當布賴安着手寫一八九六年的競選歷史，他叫它爲「第一次鬪爭」(The First Battle)。這書名是件激奮的事。因爲那次鬪爭，它雖以農民民主勢力的失敗告終，是進步的競選的開始。鬪爭結束之前，農民和工人的大軍橫掃過一州又一州，一次又一次的打勝仗，以大風暴雨奪取到反動的城堡，得意揚揚的樹立他們旗幟於白宮」之上，恢復國家政府到它的傳統的民主軌道。

因爲這是進步的新紀元——布賴安的第一次鬪爭和威爾遜的第二次的中間的二十年。它幾乎在美國生活的每部分上有變亂和改革爲它的特徵。舊政府領袖被逐斥，新的加入；政治機構經過檢查且現代化了；政治運用受批評的考查所指揮，不能與民主理想相一致的人們被排棄。經濟制度和實施——私有財產、聯合公司、信託組合、大資產——受理性的裁判，被命辯解它們自己或改變它們的路徑。社會關係被重新考慮——城市的衝突、外來移民、財富的不平等、各階級的成長，一切要審慎注意。這時期幾乎每位著名人物，無論在政治、哲學、學術、或文學，部分的從他與改革運動的關係上得享盛名：魏佛、布賴安、拉福勒特 (La Follette)、羅斯福、和威爾遜在政治界；詹姆士 (William James)、羅益世 (Josiah Royce)、和杜威在哲學界；韋勃梭 (Thorstein Veblen)、愛理 (Richard Ely)、和特爾訥 (Frederick J. Turner) 在學術界；豪威爾斯 (William Dear Howells)、諾里斯 (Frank Norris)、卡爾蘭 (Hamlin Garland)、和德賴塞 (Theodore Dreiser) 在文學界。這時期的豪傑之士全是改革家。他們大膽的、公然的防守民主城牆，甚至突出來征服新地。非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來，知識界沒有過這樣一個動盪；非從那時以來，改革沒有過這樣穩回在馬鞍上。

這陣改革的好熱狂是關於什麼事？這樣攪亂美國生活世界的是什麼事？我們已經看見農民和工人問題的一些事。但是這些事雖然悲慘，與其說是原因，寧可說它們是先兆。問題不單是經濟的，它也不限於農業和勞工兩大利益團。它影響及美國社會的各方面。

事實是美國生活的希望沒有達到。在這新世界裏，要開創一個保證給大家自由平等的社會，一個到處保護自由的國家。這確實是個夢想，但它不是個憑空的夢想，美利堅共和國的締造者也不是逃避於虛偽希望的雅片中的幻想家。在歷史上，自然從來沒有恩賜過人們這樣豐富的一個機會，從來沒有過更健全的理由以假定人們會爲他們自己創造一個人間樂園。在開始時，美國人民實在是，用杜格 (Hargro) 的話說，「人類的希望」。

這希望沒有達到。美國人比他們國外的同時代人過得好，但他們比他們所應該的過得壞。美國的物質成就動人心目，但社會的和文化的成就令人失望。威爾遜在他的初次就任演說中說：

惡隨着善同來，純金已腐蝕許多。同着財富來了不可寬恕的浪費。我們已經濫用我們要用的一大部分，我們沒有停止來保守自然的格外恩賜……不屑於謹慎，不堪的奢侈與可讚美的有效率同樣。我們已對我們的工業成就自豪，但我們至今沒有停着夠澈底來計算人類代價，喪失生命的代價，被課苛稅和破碎了的活動力的代價，可怕的身體和精神代價，給男人、女人、兒童，在他們身上，代價的死亡率死擔子年年無情的落着。……許多極秘密的事情和大政府過去，我們就攔得太久，沒有去窺看，沒有用公正無畏的眼睛去考查。我們所愛的大政府也常常被用爲私人的和自私的目的，用它的人已經忘記掉人民。

這不是因爲壞人幹了壞事，這不是因爲有權力者排斥民主並着手破壞它，這不是因爲暴政或專制已經佔取自由的位置而自代。不是，原因比那更要微妙。根本的困難是一個普遍於整個西方世界的。科學和機械已經勝過社會科學和政治機構。從一個十八世紀農村共和國遺傳下來的原則和實施已不能再適應於一個二十世紀都市國家的急變。這在政治範圍裏是真實的，在那範圍裏，到機構在社會上已被鬆弛，而只有政府能適當控制勢力

的時期，政府的恐慌還是不改。這在道德範圍裏是真實的。那範圍裏，人的責任的舊觀念，被無人格的組合的興起所表現得不切合。這在社會範圍裏是真實的，那範圍裏，一個單純社會裏的農村生活習慣不能再應用於一個十分繁複社會裏的都市生活的急變。

成長本身已造成一堆問題。農場領域擴大出自然所限定的邊界；外來移民來得比能吸收的更快；城市發展得這樣快。以致它們不能供給它們居民的住宅，不能充分管理它們豐滿的人口；實業變成這樣大，以致沒有人能完全了解它或管理它；少數人成這樣富，以致他們不知道拿錢做什麼好——社會還不知道怎樣免除他們的負擔。

這些是根本的困難，但是能明瞭了解它們的只是少數人。改革家所見到的毋寧是貧窮、不公、和腐敗；他們所見到的是土地問題、勞工問題、婦女問題、貨幣問題。所以他們準備挺身和貧民窟爭鬪；他們清除政治；他們擊開信託組合並向大資產的惡人挑戰；他們向「魔鬼的甜酒」、向童工、向工資薄工作時間長的工場勞動宜戰；他們為印第安人，為黑人，為我們新的島嶼領地上，為棕色小兄弟領導十字軍；他們計畫出新的政治機構——創制權、複決權、婦女參政權、初步選舉、惡習法、和勞績制度；他們保護森林和水源，美化城市。千百個作有益事業的社會產生並繁盛起來。新聞界的書籍汗牛充棟，揭發現制的不平並提出一個新的。雜誌編輯以揭發各處各事的文字來打擊報酬的卑劣行為。小說作家從浪漫故事和本地風光轉向問題小說和道德訓戒；詩人忘却他們的八行絕句、三句二韻體、疊句，發現「荷鋤者」；學者從他們的象牙塔中出來提取社會問題；傳教師重新發現社會的福音並且以直讀新約攪動有體面的教區中人。

這一切是澈底的在美國傳統中。遠遊教徒和清教徒來新英格蘭是爲了抗議並不服舊英倫的環境；殖民地領袖威廉士 (Roger Williams)、培根 (Nathaniel Bacon)、賴斯勒 (Jacob Leisler) 先後反抗這裏建立的暴政和宗教偏執；美國是從一個革命產生的。它的國家英雄——哲斐孫、佛蘭克林、撒穆爾亞當斯、裴因——是叛徒，不但對祖國，並且對本土裏的統治階級；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年代中新英格蘭的大作家、傳教師、和哲學

家，如愛默生、惠特愛 (Whittier)、卡利孫 (Garrison)、帕克 (Parker)，列名在爲平等自由的鬪爭。尋問、挑戰、抗議，證明一切事情，堅持好的，生成是美國的特性。

新的進步的叛亂，它的哲學和方法，對早期改革運動的那些，都無不同之點。哲學主張完全信仰民主：一切使社會煩惱的毛病都能歸咎於缺乏民主，一切能用更多的民主來治療。這樣，信心是在這些政策中，如婦女參政權、創制權與複決權、和人民選舉參議員。方法大多是政治的，並且力求經由已成立的各政黨來行使而不求創立新的；因爲各大政黨的惰性與保守主義，這被證明爲對運動的一種明確的障礙物。

當這些年，有兩股主要的改革潮流混合了。一股是發源於農業的西部，大部分涉及經濟的爭端，時時透露現實極端主義的閃光。這西部主張的哲學家是「進步與貧窮」的著者喬治，和引起一個「理想經濟」想像的「回顧」著者貝拉美；它的政治代言人是阿爾特高爾德 (Alger) 和當納利、布賴安、和拉福勒特。其它一股潮流來源是東部的，甚至是英國的，從事於問題如關稅改革、功績制度和反帝國主義。它的智識代言人是有力的紐約國家報 (Nation) 編輯高德金 (E. L. Godkin)、寇諦斯 (George William Curtis)、和哈佛大學校長愛略特 (Charles W. Eliot)；它的政治代表是休爾茲 (Carl Schurz)、休威特 (Abram S. Hewitt)、克利夫蘭、和威爾遜。

### 爲社會正義的十字軍

一八九〇年。一位丹麥移民黎斯 (Jacob Riis)，擔任紐約太陽報記者，刊行他的書其它一半生活的情況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它是紐約充斥貧民窟之環境的一部質樸報告，它描寫落在民主行伍後面那「一半」的過度擁擠、污穢、疾病、犯罪、罪惡、和悲慘。不久，其它城市的新聞界人士作相似的報告；美國醒悟了，覺察到城市要求的迫切並不亞於農村的要求。

白賈士勳爵 (Lord Bryce) 在他的美國聯邦 (American Commonwealth) 一書中所觀察的是美國民

主的一個顯著失敗。這裏貧富的極端是最昭彰的，貧民窟擠着富人的大理石宮殿，乞丐出沒於華美的飯館門前。這裏腐敗是最無恥的，賭場戲場由公共財產養肥它們，出賣公共的權利，作出罪惡。這裏酒館和不名譽的所在，受政客們和他們培養的利益團保護與鼓勵，而作惡的黨徒如紐約桑子彎 (Mutberry Bend) 和克利夫蘭湖邊窮地 (Lake Shore Push) 的懷俄斯 (Whyos)，做他們掠奪的生計，不受警察干涉的阻擾。這裏工資低時間長的工場證明私佔婦女，賣報孩子和擦靴者證明漠視兒童。這裏公共衛生、住房、教育、和政府種種問題最急切。

首先掌握改革家注意的是住屋問題，因為這問題不但有關於可憐的貧民窟居住者，並且有關於一切城市居民。內戰後的幾十年中，城市人口的增加遠快於供給房屋的便利。結果是共同住宅的發達——東歪西倒的木頭建築，五六層高，黑暗，空氣不良，污穢，並且是疾病的滋生所，罪惡的養育所。一八九〇年，單獨紐約一處，大概有五十萬人居住在這些「貧民窟」裏——那裏，死亡率比城市裏較幸運的部分多四倍。在下東邊的一所地道的房子容納有二千七百八十一人——可是一個洗澡盆都沒有。一千五百八十八間房間中，三分之一沒有光或通風窗洞，另外三分之一通有微光的空氣筒子。讓黎斯描寫下曼哈坦的這些貧民窟之一：

我們試看一處，櫻桃街某號。請稍爲仔細一點！堂屋暗黑，你會跌倒在那裏拋銅元的孩子們身上。那倒不會碰傷他們；腳踏拳打是他們每天的家常便飯。除此以外他們沒有什麼。這裏堂屋轉彎之處，走進漆黑的地方是個台階，又有一個，又有一個。一段梯子。如果你看不見它，你能摸着路。不開的窗？是。你想有什麼？所有會進這些梯子的新鮮空氣，是從那老在開關的堂屋門、並從黑暗的臥室的窗子進來的，那些窗子，回頭過來從梯子那裏受到他們唯一的空氣供給。……那是一位婦人，正在你剛碰撞着的給水嘴上拿桶子盛水。澀水溝在走廊上，所有房客都要出入——他們全一樣被水溝夏天的臭氣所毒薰。聽見唧水筒般輾轉的尖叫沒有？它是大雜住房嬰兒的催眠歌。在夏天，當千來個乾喉嚨渴望着在這房子裏喝口涼水，它一點也擠不出來。……這是一道門。聽！那短促的乾咳，那細小微弱的號泣——那是什

麼事！那意思是，你在樓下門口所看見的污穢的慘白垂頭者將告訴你另一件故事……在今天晚上以前。那小孩子正要死於麻疹。要有半個機會，他就會活，可是他沒有。那間黑暗的臥房傷害他。

一、和貧民窟的鬭爭」實在是個各方面進行的長期戰爭。改革家如吉爾德 (Richard Watson Gilder)，辯論火災和傳染病的危險，勸誘畏事的立法者宣告最壞的共同住屋不受法律保護。並且要其它有適當的通氣和衛生。好勝的社會工作者如亞當斯 (Jane Addams) 和華爾德 (Lillian Wald)，受倫敦湯比堂 (Toynbee Hall) 例子的鼓勵，在大城市貧民窟中心建造住居房子。有些，像芝加哥的赫爾住宅 (Hull House) 和紐約的亨利街住宅 (Henry Street Settlement)，成爲世界馳名；不滿十年。幾乎有一百所房子已建立起來，並已從事一個巨大且多方面的救濟、教育、和公共健康的計畫。使兒童離開街道和流氓。給他們一個較好的機會和禮貌，在城市的最熱鬧區域中建築起遊戲場，新鮮空氣公款供給到鄉間的休息，牛奶站分配免費牛奶給那些賣不起的，白天託兒所解除工作的母親對她們孩子的擔心，巡行護士會給人免費的醫藥和看護的照料，團體組織像基督教育青年會和童子軍，爲青年活動力供給健康的且正常的出路。

牽制改革家注意的最急切的問題之一是犯罪問題，特別是增多的少年犯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監獄囚人人數增加百分之五十，兒童犯罪者佔有他們的五分之一。合衆國在刑法和監獄的改革上有一個長久且光榮的興味紀錄；但儘管開明的評論家如立溫斯敦 (Edward Livingston)、狄克斯 (Dorothea Dix)、和衛恩斯 (Frederick Wins) 等的努力，許多州的刑法仍然野蠻，有些州的監獄情形有力的令訪問者聯想起「加爾加答的黑洞」。與其改革犯人不如懲罰他們這老觀念，至死不悟，警察的殘忍，第三等級、和應用一種法律於有錢有勢者與應用另一種於貧窮無告者，也是如此。赦免草市場 (Haymarket) 「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大利諾的阿爾特葛爾德，主張犯罪行爲與其說是個人的過失，不如說是社會的過失，他勇敢進行改革該州的刑律。他的一位弟子，託利多的「金箴」市長瓊斯 (Mayor "Golden Rule" Jones of Toledo)，取同樣態度——並找機會把它戲劇化。



〔惠特洛克 (Brand Whitlock) 寫〕他常到城市監獄或工場中去，和那裏的可憐鬼們談話，好像他是他們的一個。……他總是想法使他們出獄，後來他和我訂下個小契約，由那契約，他償付附隨他們被審的用費，……假使我肯照顧他們的案件。……例如，假使有個窮苦的女子被捕，需要給她一個有陪審官的審問，而她的案子已經有一切的照料和注意時，她如果是有錢的人，她的案子會被接受；警察，當他們發見他們不能定罪，每易於不甚注意個人的自由；他們開始漠視人類權利和人類生命。

但是這種方法，當然是緩和之事而不是改革。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紀轉變中，未決宣告和試驗制度的採用。由奧斯朋 (Thomas Mott Osborne) 例子的鼓勵，有些最壞的監獄已被清除，並且一個有決心的攻擊被投到普遍流行於南方的帶鎖鏈的囚徒和租借囚徒作工的制度上。爲兒童犯罪者的特別法庭也已成立。擔任科羅拉多州登佛 (Denver) 少年法庭首席二十五年的林德塞 (Ben Lindsey) 法官，以減少少年犯罪的成功引起全國注意。林氏寫他的經驗：

我開始是完全由於一個對兒童的同情心和一個信念——認爲我們反對犯罪的法律不適用於兒童，就像不適用於白癡。不久我覺察到不但我們的法律，並且我們刑事訴訟法的全部系統是錯誤的。它建立於恐嚇之上。恐嚇對兒童是誑言之父。……我知道代替恐嚇，我們必須用同情，但不要假熱心，不要偽善，不要感情用事。我們最先必須使孩子確信我們是他的朋友，可是他的罪行的死對頭；使他確信我們希望幫助他爲善，可是不能幫忙他，如果他堅持要做壞。

一個顯著的犯罪與貧窮的原因——人們這樣想——是酒館；這些年眼見得一致的向「魔鬼的甜酒」攻擊，結果於國家的禁令。禁酒運動的淵源起於共和國初年，內戰以前，幾千人士已簽字擔保禁酒，新英格蘭有幾州已試行法律的禁令。戰後幾年，啤酒和烈酒的消費增加，在城市中是酒館的消費；一九〇〇年左右，紐約、布法羅、和舊金山等處自認每兩百名居民中有酒館一家。有些只是窮人的俱樂部，但許多完全不顧禁酒、甚至不顧喝酒的禮貌而行。星期日休業的法律被漠視，高的許可證費被規避，酒的利益到處和政治的最壞分子結成同

盟。

對着這些情形，一個禁酒黨早在一八六九年就開始活動，但無效果。遠較有效的是這些組織像基督教婦女禁酒協會，反酒館聯盟，和傳教會。這些組織不滿意於政治煽動，但不停的在報紙上，在禮拜堂裏，在演講廳和學校裏，進行宣傳。許多年來，禁酒勢力的善戰領袖是威拉德德 (Frances Willard)。她以領導禁酒的婦女進酒館來把戰爭帶到敵方，那裏她們會唱聖經詩篇，會跪下來祈禱。

十九世紀之末，這些方法已禁絕七州的酒，這七州全是農村的；對其它許多州用「地方選擇權。」當二十世紀初年，禁酒運動大有進展，世界大戰時期先後，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於禁酒法律之下。只有城市是好爲反抗的。主張禁酒者是否能永久在平常時候守住這些壁壘，還不能確定，可是世界大戰有利於他們。大戰開始時，國會爲經濟、效率、和道德的緣故，禁止可醉人的酒類製造或售賣；當這法律滿期以前，禁令被寫入聯邦憲法。它存在十數年，一個失敗的「高尚試驗。」一九三三年，它被廢止，問題回到各州去。

#### 各州指示道路

所有這些改革運動指着一個無錯誤的道德：私家個人和私家組織除非經過立法路徑，不會有什麼成就。紐約慈善組織會創辦人並許多公益工作的活動者羅維爾 (Josephine Shaw Lowell)，由於她的私人慈善事業的經驗而氣餒，決定退出一切工作。她解釋道：

我想要爲工作的人民所作更重要的事還有。這城裏的五十萬依工資度日者，二十萬是婦女，其中七萬五千在可怕的环境下或爲不足餬口的工資而工作。那比二萬五千依賴者更緊要。……假使工作的人民所應該有的他們都有，我們就不會有乞丐窮人和犯人了。在他們沈溺以前，來救他們，比起他們淹得半死時你來費力把他們釣起來、以後再替他們操心，要好一點。

慈善事業分明是個僅僅緩和的事，甚至不信政治行爲的人道主義者也常立在立法的廳裏，脫帽求援。清除貧民

竊、改革監獄、救濟兒童、禁令——一切需要立法行爲。假使要得更基本的事，必須用國家的動作力。

改革運動的頭幾仗決戰於各州，這些州繼續做改革的戰場，甚至在許多爭點已經轉移到國家活動場以後。在美國憲政制度下，它不能太常常被重複，各州在幾乎一切社會性質的事上，被認爲有司法權。勞工的時間和工資、工廠工作的環境、婦女兒童的福利、監獄、改革學校和慈善機關、教育、參政權、市政府——這一切事情是州的、不是聯邦的關係事件。新政確實改變這一切，但它拿一個國家的災難以證明和一個大膽的行政來試作那改變，而它的實行只超過最高法院的堅決反對。

各州是改革的實驗室。後起的國家改革，大多數先在各州試驗；它們在各州證明理論上是對的而實行上不適宜。各州又是後來出演於國家舞台的改革家的訓練學校。狄奧多·羅斯福前進到華府以前是在紐約和阿爾巴尼上學；拉福勒特企圖應用鐵道經濟和信託管理於國家以前是在威斯康辛學習它們；威爾遜在做合衆國大總統、證明爲一位自由主義者之前，以新澤西州長博得自由主義者的聲譽；孔敏斯 (Albert B. Cummins)、諾利斯 (George Norris)、和佛蘭克林·羅斯福——都在他們的州裏當過學徒。

各州所實行改革的性質是什麼？許多是有關於政治機構的民主化：創制權和複決權、祕密投票、直接選舉候選人、直接選舉參議員、腐敗行爲法令、市政自治的規定、和婦女參政權。其它是對着經濟的目標：鐵道和信託組合的管理、公用事業的委託、賦稅改革、勞工時間與環境的規則、工人的賠償、童工的禁止。還有其它有廣泛的社會內涵：教育改革、公共健康計畫、天然資源的保存。

直接的問題是操縱政府。州政府市政府是否更腐敗，是個細密的問題。腐敗的園地到處是廣大且動心的，報酬幾乎沒有限制。州立法議會和城市議會控有公用事業特權的授與，鐵道和公用事業價格的規定，保險事業的管制，稅課的評價，有利的公路修築合同的審查，保護或毀滅酒館的權力。幾萬萬美元是必需的，實業界準備優厚償付徇私、免役、和保護。支付不常用公然賄賂的形式；它可以用政治進行、或捐贈政治競爭、或以有利的法律業務給發見它的辯護士這幾種形式。無論它用那種形式，它通常有效，因爲改革家習見它們的狼狽。

在世紀的轉變時，一班陪審官考究密蘇里的情形，結論是「十二年來……腐敗在州立法裏是平常且公認的事，也沒有人干涉阻止。」這判決有時差不多可以同樣確實應用於聯邦的每一州。從新漢布什爾到加利福尼亞，從新墨西哥至蒙大拿，立法者是站着等拍賣。大聯合公司到處有它們的運動議員者，他們從事於無恥的賄賂，假使那失敗了，便從事訛詐。像邱吉爾在他的「康尼斯頓」(Coniston)和「克魯先生的生涯」(Mr. Crewe's Career)裏所說，鐵道是新英格蘭新漢布什爾州的太上皇；諾利斯(Frank Norris)有力的加州小說中的「八腳章魚」(Octopus)是南太平洋鐵道公司。「銅大王」腐化了蒙大拿；鐵道和保險公司收買了紐約議會；美孚油公司遭人譴責，說它提煉了彭西凡尼亞州的樣樣事，除却立法議會。甚至在邊地小州像新墨西哥，一個不乾淨的同盟，分子有兩三家鐵道、煤礦銅礦公司，木材與土地投機家，和大牧場經營者完全支配該州。煤礦公司佔奪幾百萬英畝最有價值的礦地，木材公司掠取國家森林，牧場經營者在公地上放成千萬頭牛羊，鐵道和礦場破壞勞工法律，它們都逃避納稅。爲達到這些動人的目的，聯合公司利用一羣高價的惡棍，老在政治舞台上搖擺。

試着敘述掃除腐敗或追溯各州政治改革淵源，是件重複混亂的事。有一州的歷史可以示例美國全國普遍發生的事，雖然有點樂觀。威斯康辛在一八八〇左右是繁盛開明的一州，但它的政府却被一個三位黨魁的鼎足三人團所操縱——百萬富翁木材主人凱斯(Keyes)、舍岳(Philetus Sawyer)、和鐵道代理人斯達納(John Spooner)——他們用預選會與議會制度支配州政。據賀威(Frederic C. Howe)說：

整個的州是鐵道、木材、和特權利益團的封土采邑。這些利益團，以聯邦官吏的工具，提名並選舉州長、合衆國參議員、議員；他們回過來利用他們的權力使他們的製造者發財。聯邦和州的獎勵被用於同樣目的。立法議會兩年一屆的會期是爲少數人利益的狂歡節。政治是個特種交易，只有州機器認可時，野心的人才進去。很少人相信能有別的法子，沒有人向那爲維持它的政治和實業權力而分配任用與選舉官職的政權挑戰。有組織的抗議是沒有的。報紙漠不關心或被統制。州裏的大富豪是由取於政府土地の木

材、由於鐵道和特許聯合公司的提倡，由於參與這些利益團的建造契約所造成。

剛出州大學的青年拉福勒特，受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橫掃草原各州的改革潮流所激盪，決定參與在內。沒有工具的憑藉，他打出一條路子進國會，在一連四屆中，證明平氏對着他懷抱的信心是正確的。拉氏失敗於一八九〇年民主黨的得極大多數投票，因為轉向州政治。人民擁護他，工具不要他，後台黨魁駕御的議會接連三次把他打下，擡出較溫和的候補人。從這經驗，拉氏認識廢除預選與議會制度和改用直接選舉候補人的必要。

最後，在一九〇〇年，奮鬥的拉氏把他的提名強參加在不耐煩的議會上，並且大大勝利的得到州長職位。此後二十五年，除却短促的戰時，他和他的黨人支配該州，把它做得聯邦中最民主、最進步、最治理得好的。拉氏在二十世紀前十年或十二年所提出並應用的「威斯康辛理想」，不只是空洞的學說，而是實際且有條理的計畫。它以直接選舉候補人、創制權和複決權、罷免一切只除却司法的官吏、禁止腐敗的選舉行為、競選費用的公開和限制、市政自治、文官改革、和供行政顧問的專家局所的創立這些事擴大民主。為保護州公民免於聯合公司的剝削起見，拉氏建立委員會以管制鐵道及其它公用事業的收費，強制鐵道和大木材公司繳納他們應繳的稅，吐出他們規避過的欠稅，並且規定一種州所得稅和在儲蓄銀行存款上的州保險。為保護勞工起見，有工人的賠償法律，童工的禁止，和婦女勞動的鐘點限制。農業受到鐵道費用的減低、遠大的地方保存和水力計畫、和極力補助與州大學有關係的試驗站與實驗農場這些事業的鼓勵。

拉氏把大學作成州神經中樞的舉動，沒有再比這事更有趣的。范奚斯 (Van Hise) 校長，本人是一個著名科學家，帶到曼多達湖 (Lake Mendota) 畔的學校裏一羣世界上任何高等學術機關所未有的最有名的教授。更重要的，他帶來一個觀念，認為大學的天職是為州的人民服務。它的經濟學家服務於鐵道和賦稅委員會；它的政治科學家起草立法議案；它的歷史家耕作地方史；它的工程師計畫造路計畫；它的農學院進行的研究，節省州和國家的農民幾萬萬美元，在把威斯康辛做成新世界的丹麥這一工作中，它是主要的工具。

這裏是激動起全國趣味的實際進步主義的一個實驗。拉氏證明改革事業不需要空論的，並且證明學者和科學家能有貢獻於實際政治。他指示一個州怎樣管制公用事業，用不着惹起社會主義的斥責，並且這種管制能有利於公衆也有利於事業。他啓示一個州作爲一個政治試驗室的可能性，又不但給別的州、並且給國家指出一條道路。

### 狄奧多·羅斯福與公平政治

像威斯康辛各州的成就的可讚美，改革家所從事的問題，大部分不能在聯邦制度的孤立區分裏求解決。只有在國家規模上設計的改革事業才能生效，只有國家政府的權力才夠保證它們的成功。國會誠然已制定一些溫和的進步性的立法——一八八三年的彭德爾頓 (Pendleton) 文官法令，一八八七年的州際商務法令，一八九〇年的反信託組合法令，一八九八年愛爾德門 (Erdman) 鐵道勞工糾紛仲裁法令。但這些和類似的法律，大都沒有生效，有兩個原因：它們的進度不夠，它們沒有認真被執行。簡單的說，它們是勉強的國會爲平息輿論而拿出來的姿勢和賄賂。

勢邦政府一世代以來大半在共和黨領袖手裏，他們從順那時期的放任哲學，不關心大多數較新的社會和經濟要求。他們毫無例外，都親近大實業，他們以寬厚的養老金立法滿足內戰舊軍人。壓力團體和特別利益團體佔着勢力之地，很少被打破。相繼的幾位共和黨總統——格蘭特、海斯、卡斐德、阿塔爾、哈里孫、麥金萊——都是可敬重的人，但都缺乏想像力和建設能力。民主黨總統克利夫蘭有更具特徵的氣力和更清楚的計畫。他改革聯邦各部，從聯合公司控制裏收回廣大區域的公地，排斥養老金的霸佔和其它特別立法，增強文官，甚至強使國會通過減低關稅附帶一種所得稅法律——這法律立刻被最高法院判決爲無效。但是克氏的任期是間斷的且多事的。在大工業各州裏及在華府的某種限度裏，實際權力是在另一些人手裏，像紐約的普拉特 (Platt)、彭西凡尼亞的奎氏 (Quay)、俄亥俄的哈拿 (Hanna)、這些人不假託政治活動或任何事，除却爲他們的公司主

人服務並酬勞他們的黨走狗。大多數國會議員是政黨所雇的人；他們以他們的演說充滿國會紀錄，穿着寬衣，戴着高帽，排成行列，點綴許多演講台，但一般美國人難想起他們通過的法律，有一單件在國家的歷史過程上有了什麼顯著的異點。

魏佛所領導和後來布賴安所領導的農業勢力真正使兩黨的老衛士感到驚恐。許多州裏變亂的根本漲起表示改革不能再就擱得太久了。接着發生西班牙戰爭，改革一時被遺忘。一九〇〇年戰事在有點不現實的帝國主義的爭點上進行，從事於問題各方面的麥金萊，再度得意的當選，「大平民」再度被排斥。當繁盛的高潮中，美國好像在又一個反對變革的哲學的長期歷程裏。

一九〇一年九月六號，麥金萊被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所刺殺，他死後一星期，美國政治全部改觀。在這樣意外升任總統的青年狄奧多·羅斯福身上，美國發見了一位有顯著刺激性和力量的領袖，而進步運動也有了一個領袖。羅氏生於富有之家，長於有錢的東部人中，讀書於哈佛。可是他是澈底民主的，並對改革事業有熱烈的興趣。他同時是一位政治的現實主義者，熱烈的國家主義者，和忠實的共和黨黨員。他是哲斐孫以後的美國總統中最多才的一位，雖然沒有哲氏智力之高深或微妙，也沒有哲氏的哲學理想力和哲氏的想像力。他曾經營過牧畜，打過大獵，著過多種書，服務過紐約州立法議會，擔任過紐約城警察行政，幫助管理過聯邦文官，指揮過海軍，在古巴作過戰，並做過第一流州長。他有製造名句的妙訣，他的誠懇使他成爲公民道德的一位有力傳教師。像賈克孫一樣，他有一種博得平民信仰並把他的鬭爭做得似乎驚人的天才。又像賈氏一樣，他深信總統比國會更接近人民，行政首領必須把事情做出。但不像賈氏，他在文官中沒有專家的猜疑。一年之內，他已經表示他了解散布於美國的大變動，並有意以政治家風度來應付它們。他不是一位走極端者，而是一位開明的保守派；他不想革命現行經濟制度，而以肅清爬在制度裏面的弊竇來救它。他決定證明政府是在實業界之上，並且要給平民一個更公平的政治。

在這些事業裏，羅氏利用人民主義運動所產生的大衆感情，各州各城輸來的進步刺激力，和一羣勇敢的

「清道夫」——他們以書籍與雜誌文字暴露詐騙與腐敗、實業界的罪行、社會黑幕、小數種族的被壓迫、和一堆煩擾美國生活的罪惡。清道夫本身不但是改革的工具，他們的大得人心並且是個徵兆，表示大眾已經成熟於他們的使命了。

羅氏說，「工業制度的大發展，意義是政府必須加增施行監督實業界事業。」在他們的實行反信託組合法律中，羅氏早就提供這樣「增加監督」的一個例子，但信託組合當然是唯一感覺到他的「大打擊」的利益集團。政府監督的伸展到鐵道上成爲羅氏政權的一件著名成就。羅氏本人稱鐵道管制爲「最高爭點」，他以不斷的壓力，終於強把兩件主要的管理法案通過。一九〇三年的愛爾金斯 (Elkins) 法令把公布的收費率做成正當合法的標準，航業和鐵道同樣負責折扣；在這法令的規定之下，政府得以檢舉芝加哥的大包裝家和美孚油公司。更重要的是一九〇六年的海普朋 (Hepburn) 法令，這法令給州際商務委員會實際權限以管制價格，擴展委員會的管轄權到貯藏和終點的便利、臥車、快車公司、油管線，並迫着各路放棄他們在航線和煤公司的連帶利益。羅氏執政期終了時，折扣實際已消滅，鐵路運費也不再是一件急切的問題了。

「大打擊」的用於勞工事件，與其說是顯著的，寧可說他是驚人的。在總統的刺激之下，國會爲政府雇員通過一件工人賠償法令，爲哥倫比亞區通過重工法律，爲鐵道通過安全應用的立法，而總統本人擔任有點近於笑柄的政府工作八小時制的實行。更可觀的是羅氏干涉一九〇二年無烟煤礦大罷工。長期奮鬥之後，聯合礦工，在青年密其爾 (John Mitchell) 領導之下，得到重要讓步；當礦管理人取消這些，礦工就罷工，領導管理人的是美國實業粗石器時代的一位代表，倍爾 (George Baer)；他聲稱「工人的權利和利益不受勞工煽動家而受基督教人士的保護與關心，這基督教人士是上帝在他的無邊智慧裏給與國家財產利益的管理權。」當他們拒絕仲裁，美國好像要無燃料過多。在這關鍵，羅氏帶着一個威嚇加入了，他表示要接收礦場，用軍隊去辦理，除非管理人答應條件。這威嚇居然生效，礦工得到增加工資與減少工作鐘點。

對一般美國人有更永久興趣的是一九〇六年加入法律書的純潔食品和藥品立法。若干年來，肉類包裝廠和



食品藥品製造廠售賣劣質食物和危險藥品專賣藥品給大衆。農業部主任化驗師威理 (Harvey Wiley) 博士的一串曝露，和幸克萊 (Upton Sinclair) 「叢林」(The Jungle) 書中芝加哥屠場可怕的洩露，喚起民衆普遍的憤慨。國會用一道肉類檢查法令和一道純潔食品藥品法令來回答，這兩法令進行消滅最壞的弊害。

但在內政上，羅氏最重要的成就，是自然資源的保存。美國久被森林地力無窮這概念所哄騙；在十九世紀之末，它醒悟了，感覺到森林的三分之二已經完了，許多礦產已被浪費，水力爲私人利益所佔奪，地力被大水所沖走或被風暴所刮掉。羅氏的喜好自然和熟悉西部，給他一個自身對保存的興趣。在他第一次給國會的咨文中，他聲稱「森林和水的問題恐怕是合衆國最切要的內部問題」，他鼓吹一個保存和收回的遠大計畫。利用一八九一年的森林保存法令，羅氏劃出土地約一萬五千萬英畝做一個森林準備地，並在阿拉斯加和西北部公簿上另外抽回八千五百萬英畝，準備作它們的森林和礦產的研究。同時他把森林保存交給有魄力且開明的賓却特 (Gifford Pinchot) 去管理。一九〇二年的一個收回法令規定大規模灌漑計畫，由聯邦政府擔任費用並加以監督；在這法令的條款下，工作不久便進行於阿里桑那的羅斯福堰，愛達和的箭石堰 (Arrowrock Dam)，和大河上的象岡堰 (Elephant Butte Dam)。這一切確實是個開端，但是先導者已建立，公共興趣已喚起，使得佛蘭克林·羅斯福當政期中更苦心經營的計畫有可能性。

一九〇八年，羅氏已經以麥金萊的繼任者做了一任，自己的也做了一任。他在他深得人心的最高峯，無疑的能再做一任。但他躊躇着向第三任的傳統挑戰，替代這，他選擇另一辦法，拔薦一位繼任者來執行「我的政策」。他的選擇落在有學問有才力的塔夫脫身上，那選擇首先得到共和黨提名會議所批准，後來，經過與布賴安的一次遲鈍的鬭爭，得到民選。

塔氏會做過巡行法庭的法官，菲律賓總督；和陸軍部長。在所有這些行政職位上他善盡自己的本分，但他總沒有顯露出任何政治天才和任何自由主義的痕迹。他真正熱心於繼續羅斯福的計畫，他的成就不可忽視。他進行信託組合的告發，增強州積際商務委員會，設立郵政儲蓄銀行和包裹郵遞制度，擴大文官勞績制度，保證

兩件附加條款的制定加入聯邦憲法——一是規定參議員的直接選舉，一是批准一種所得稅。這些最聲名狼藉的是：接受一種關稅，那稅的保護目錄激怒起自由的意見；退辭賓却特為森林事務的首腦；反對阿里桑那加入聯邦，因為它的自由的憲法，漸漸依賴共和黨極端保守的一派。

一九一〇年左右，塔氏已經把他的政黨弄得裂痕很大，一個一黨得極多數的投票把民主黨勢力帶回國會。羅斯福急於讓他的繼任者放手做去，已經趕赴非洲獵獅子；現在一段流行小曲唱出他的黨人的希望：

狄奧多，回家吹你的號角，

羊在草地上，牛在吃穀子。

你留下看羊的孩子在乾草堆下睡着了。

羅斯福在得意的歐遊之後回來了，自由共和黨人像拉福勒特和賓却特趕緊向他傾聽的耳朵中灌他們的憤慨。羅氏還沒有準備動作，但拉氏在一九一一年開始他的競選運動以贏得共和黨提名。那次競選運動引起這樣普遍的支持，使羅氏決定在它上化錢；在一九一二年，他早就聲言「我的帽子在競賽場中」。接着羅氏塔氏間有一場有精神的競選運動，前者贏得所有民衆的支持，後者贏得大多數代表的。在芝加哥會議上，共和黨的蒸汽輾機壓倒喧讓支持羅氏者，提名塔氏。羅氏斥責那行為是「明顯的竊盜」，發願以一張獨立的票來奮鬥。幾個星期後，他的兩萬名如狂的黨徒集會於芝加哥，口唱：

追隨！追隨！

我們要到處，到處追隨羅斯福，

我們要繼續追隨……

他們組織進步黨，提出他們心愛的領袖做它的候選人。

民主黨人帶着無限制的熱心注視這一切。多年以來，他們和布賴安流浪於政治的荒野；現在他們瞥見樂園了。競賽總統的提名是敏銳的。保守份子聚集在老戰馬、衆議員、密蘇里的克拉克 (Champ Clark) 背後，自

由份子喊出並投票一位新進，新澤西州長威爾遜。最後由布賴安指示取舍，可憐的布賴安，自己從來沒有能做總統，可是現在，在他的生涯中最驚人的時候，提名威爾遜做合衆國的下屆總統。

## 第十八章 興起到世界強國

### 新勢力與眼界

當我們考究內戰後一代的美國政治史，我們遇到一灘驚人的事情：復興，農家協進會運動，分贓制度的被打倒，關稅鬭爭，人民主義的巨潮，進步主義的興起。當我們考究工業史，我們遭遇同樣熱鬧的新紀元：帝國鐵道制度的建立，信託組合的增長，巨大新工業的誕生，首領如羅克萊勒、卡匿奇、摩爾根、和喜爾等的事業。對較起來，對外關係貢獻一段簡單的歷史。從一八六七年法國在美國壓迫下退出墨西哥，到一八九八年「緬因號」在哈瓦那（Havana）港外沉沒，中間這些年內，只有兩三件驚人的插曲作為點綴。傳說這時期一位褊狹的國會議員突然歎氣說，「我們將在國外幹什麼」？心神忙於內部問題，大多數公民對外交只有時斷時續的興趣。

可是外交園地比它看起來更重要，因為某些直接有關每個美國人的事實正在不斷的出現。合衆國正成爲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在愈來愈互相依賴的國家家庭的和平、秩序、和繁榮中有濃厚的興趣。它又注意於對英國的特別關係。因為門羅主義，商業擴張，和一八九九年以後的東方門戶開放需要愛好自由的列強所支配的一個海洋，因為和它的最大主顧自然的實業聯繫，因為促進民主的一個共同利益，合衆國朝着與英帝國更密切連結的路上走。同時，合衆國對拉丁美洲採取一個更嚴正的保護態度。由於製造品和原料同樣尋找出路，它更付注意力於海外市場的發展。部分因為商業的和軍略的原因，部分從理想的動機，部分從權力的自尊心，它搖擺到精力充沛的海外擴張上去。

在西班牙美國戰爭很久以前，合衆國已開始表示自覺它的地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強國。在阿塔爾和克利夫

關兩總統時，它開始建造一個強大的現代海軍。一八九〇年左右，「白鰻隊」是敏銳的國家自尊心的一個對象。一八八〇年左右，合衆國的輸出總額超過八萬三千五百萬美元，二十年後大約是十四萬萬美元。沒有國家在外交中不具活潑的興趣而能輸出這麼多到它的國界之外。內戰之後，有一時期中，舊時擴展熱似乎完全消逝。一八六七年購買阿拉斯加以後，大多數公民認為美國旗子飄到的地域夠了，格蘭特合併聖多明各（Santo Domingo）的努力在參議院中被慘敗了。但擴展派的情緒又漸漸興起來。當德國想染指於薩摩亞（Samoa），合衆國挺身而出和英國一致主張它在那裏的權利。一個三強的保護國建立起來，在十九世紀末的瓜分中，合衆國取得所有各島——除却兩個最大的——得到對之垂涎已久的巴哥巴哥（Pago Pago）港。在美國人已經控制產糖業的夏威夷，合衆國於一八八七年得到獨佔權利，應用無價的珍珠港作爲一個海軍根據地。六年後，一個合併夏威夷的努力在成功的邊際上，而克利夫蘭的再度當權攔阻住它——因爲他正確認為所用的方法不正當。但那時以後，夏威夷羣島被美國居留民所控制，直到一八九八年它們判然歸於美國旗子之下。這時，一八八九年，合衆國召集將近二十個南方共和國的代表到華府的第一次汎美大會。美國的影響從國內愈達愈遠。

內戰後的三十年中，合衆國的國際爭端，大部分是當然對西半球的唯一其它大國，英國。有些是嚴重的。但明顯的事實是它們全以仲裁或審判來解決，並且在改進英美感情的路子上求解決。

友誼解決的全部目錄是動人的。內戰時期中，北方對英國起強大的反感。好些是無根據的；英國承認南方爲交戰團體是十分對的，英國海軍繼續一種政策，大體上有利於北方，英國民衆，甚至在吃虧的蘭開夏紡紗區域的人，都傾向林肯。但保守黨的不友誼，和南方旗幟下的英國建造英國配備的軍艦所做的破壞工作被人們憤怒的記着。有一時，因爲領袖們，像熱狂的薩謨訥（Charles Sumner），堅要過分的損失賠償，衝突似乎可能。合衆國幸虧有一位最聰的國務卿斐許（Hamilton Fish）。在他領導之下，定出一個計畫，把美國所要求賠償「阿拉巴馬號」及其它軍艦造成的損失提交仲裁。第一次巨大的現代國際法庭開庭於日內瓦，它以判給合衆國一千五百五十萬美元結束全部爭論，英國人立刻償付這筆適當的款子。同時，合衆國和加拿大間一件邊界小

糾紛，牽涉到西北海岸上的一些島嶼，也交付仲裁；幾年之後，一件關於北大西洋捕漁權的糾紛由一個聯席委員會予以調解。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一個加拿大人是否有權可以在白令海獵捕阿拉斯加海豹的問題，引起爭論。國務院傲慢的主張這海是完全屬於美國管轄的領海。這爭執又提交到國際仲裁人會議，判決英國人勝訴。最有效的是委內瑞拉邊界糾紛的友誼解決，這事在一八九五年底極驚人且危險的突然發生。這糾紛成熟的急驟，駭人聽聞。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六號那天，美國英國很少人想到兩國間有什麼嚴重磨擦。在十七號，克利夫蘭總統咨請國會的咨文暗示有對英戰爭的威脅這一消息，使兩國國民衆感覺到受雷擊一般。這樣一件咨文是怎樣來的？

英屬圭阿那 (Guiana) 和委內瑞拉間有一段久未解決的邊界。合衆國屢次貢獻它的善意謀一解決。但委內瑞拉的主張過大得可笑；英國拒絕仲裁那要求，除非在五十年以來所勘踏過的所謂維堡克線 (Schomburgk line) 以西。許多美國人揣測英國損一個弱小國家以利己的霸佔土地計畫。結果，一八九五年夏天，國務院遞送倫敦一件克利夫蘭所稱「二十吋口徑砲的公文」，那公文事實上斥責英國侵犯門羅主義，並且要求對仲裁提出一個明白答復。公文斷言，「今天的合衆國實際上是這大陸的主權者。」當久擱的英國答復來到，它否定爭執的邊界與門羅主義有什麼相干，指出美國公文有若干歷史的錯誤，並且再度拒絕仲裁。克利夫蘭大大發怒。他立刻咨請國會，聲言一個調查委員會必須急往委內瑞拉以斷定真實界線，當它完了時，合衆國「必須以它的力量的一切方法來抵抗」任何企圖在陸地上對委內瑞拉的包圍。

一時許多人擔心着最壞的結果；美國的極端愛國主義者舉行一個野外演習日。但那事件的最後結果證明是僥倖的。英國人民和政府表現非常的自制力，而德皇致南非波爾 (Boer) 領袖克魯格 (Krugger) 的電報於一八九六年初開始轉移他們的注意力於別的題目。紐約「世界報」領導美國有力各報，責備克利夫蘭的囂莽舉動。商業和宗教團體紛紛起反對。專門職業界愁歎憤怒。大西洋兩岸的大衆都聲言戰爭不可思議。彼此交換友誼和信任的使命。約有一千三百位英國作家陳訴美國的親睦；三百五十位以上英國國會議員請求一切糾紛的仲

裁。結果，英國和委內瑞拉，由美國的斡旋，同意一個仲裁，除去兩國佔有五十年或五十年以上的那些區域。整個事件把英美兩國間的雲霧撥開，增加他們的互相尊重，並表現動作於政治表面下的附屬者是怎樣有力。這樣是好的。合衆國的外交政策逐漸顯然在有力的新勢力手裏。共和國要在更大的舞台上擔任一個角色，英美的敵對已經拋棄而爲英美的和諧。

### 西班牙美國戰爭

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多數大國中，都高漲着帝國主義的情緒。非洲的分割已告結束；中國似乎要被瓜分爲列強的一櫛。帝國主義的根源有些是經濟的，因爲增長的人口和擴展的工業制度需要新市場。有些是政治的，因爲相競爭的國家在海外屬地尋求力量。有些是海軍的；馬漢（Alfred T. Mahan）各書盡量發揮過海軍根據地連系的價值。有些是宗教的和倫理的，因爲福音教會人士認爲傳播光明於黑暗地方是一種基督教的職責，而改革家主張白種人提高落後民族的使命。更有其它純粹感情的根源；投合人心的報紙策勵起一個在外國範圍內冒險的趣味。在合衆國，一八九三年的不景氣和反帝國主義的克利夫蘭再度當選，稍稍阻止極端愛國主義和擴張主義的銳氣。一八九七年左右，由於不景氣的消退和克氏的喪失信任。這銳氣復活了。當古巴一件流血叛亂贏得動人心目的成功，那銳氣找到一個機會。

在古巴的西班牙政府久已腐敗、且殘忍。它年年把那島的每年收入至少抽乾五分之二，使它的生產能力減少，使它的人民貧窮。西班牙人實際專擅着政府，支給他們本人不法的薪俸，維持一種不斷貪贓的制度。幾乎不堪的賦稅被課在工商業上。浮濫的土產稅使農礦負擔，而關稅給西班牙製造廠家和商人一個壟斷，使他們以收毀滅經濟的物價來掠取。生命財產都無安全。任何古巴人可以被集體逮捕，企圖逃逸時可以集體被槍殺。法庭是西班牙統治者的工具，一件公事常常是切奪的別名。報紙被箝制。在西班牙主教手裏的教會，腐敗，無效率，對平民沒有同情。反動的僧侶團死緊握着教育，使不識字是普遍的事。一個龐大的常備軍要由人

民供給。變亂常常正隱在表面之下，當美國在糖類關稅所強調的一個不景氣降臨島上，受苦的大衆不能再忍耐下去。愛國者馬諦（José Martí）於一八九五年揭旗起事，不久全境烽火蔓延。

克利夫蘭和麥金萊兩人在任時，雖然熱心努力保守中立，可是戰事如果延長，美國將要出面干涉，已是明顯的。對合衆國的經濟影響是嚴重的；美國在古巴的投資約五千萬美元，美國對古巴的貿易在變亂以前，每年總數一萬萬美元。對西班牙的外交糾紛激憤起來。當古巴革命家利用合衆國作陸軍遠征根據地，馬德里怨訴了。但是局面難妥協，西班牙封鎖的無效率是個重要的因素。在古巴的美國公民受到財產、自由、甚至生命的損失，華府對他們的遭遇提出有力的抗議。最重要的，美國情感被雙方作戰的野蠻和西班牙政策的殘忍所深深激動。在有能但兇暴的衛勒（Valeriano Weyler）奉派撲滅變亂之後，鬪爭成爲歷史上最可怕的一役。雙方蹂躪地方，屠殺俘虜。無約束的暴行施於無力的非戰鬥者。一八九六年秋天，衛勒把某幾市鎮劃爲集中區域，驅逐婦女兒童和老人進至柵欄地帶，像撲蒼蠅一般的殺害他們。一八九七年底先後，哈瓦那省的十萬一千人民被關在集中區域者，半數以上死亡；美國總領事報告，在整個島上，有四十萬名不爲妨礙的婦女兒童淪爲乞丐且過野獸狀態的日子——每天有成百因餓死病死而埋掉的。

西班牙政府傾注軍隊進入古巴，到一八九八年初，已經有二十萬人。西國外交部企圖組織一個歐洲列強聯盟以阻止合衆國的干涉；俄國表示冷淡，英國極力反對，它得到德國、奧匈、和法國的一點鼓勵。但在一八九八年時，時候已到盡頭。美國國會正是高呼着果斷的行動。公共的情緒，部分是回答局面的顯明事實，部分是回答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紐約日報（Journal）所領導人聽聞的報界呼聲，準備戰爭。麥金萊總統和他的親信顧問，一羣大實業家的參議員，希望避免衝突。但政治動機和民衆意志治理之權的一種信心，限制麥氏的阻止壓力。愚蠢的駐美西班牙公使羅美（Dupuy de Lome）。無濟於事。在二月裏，他讓赫斯特的報紙遞到一封信，在那信裏，他稱麥金萊爲「一個冒充的政客」，一個「向烏合之衆沽名釣譽者」，一個對西班牙有惡意的罪人。一星期後，軍艦緬因號在哈瓦那港被炸，死人二百六十名。這是否是不負責任的西



西班牙人所做，或是做挑撥家的古巴人所做，都使戰爭成爲幾乎不可避免。西班牙政府趕緊作最後一分鐘的讓步。如果正確的捉住機會，它的結果可以使古巴得到和平的解放。但麥金萊深信再拖延是太遲了，在四月十一號，他送國會一封戰爭咨文。毫無問題，這是個得人心的辦法。

美國的衝突，從來沒有比美西戰爭這樣迅速得到某種光榮結果的。從一八九八年五月一號開始作戰，十個星期一切都已完畢。沒有發生過一件任何重要的失敗。在五一節那天，杜威於清晨駛入未布水雷的馬尼刺灣，駛近他以中彈距離勝過的西班牙艦隊，等到距離最合適時，他說，「格里德來（Gridley），你準備好時，你可以開火，」不折一兵而把敵人打敗。這事有位干薩斯作詩者慶祝得好：

哦，五月一號有露的早晨，

杜威上將下馬尼刺灣。

西班牙人的黑藍眼珠落淚，落淚，

我們覺得氣餒嗎？

我落淚，我們不想落！

相等於只一軍團的部隊登陸於古巴的山地阿各（Santiago）附近，很快打勝幾陣仗，砲火迫近那港埠。塞佛拉（Cervera）海軍上將的四艘裝甲軍艦經隊開出山地阿各灣，幾小時後，沿着海岸成了一排被毀的廢船，美國水兵只死一名。邁爾斯（Miles）將軍的陸軍登陸於波託里各（Puerto Rico），開過那地，好像作假期遊行。杜萊（Dooley）敘述那島的征服爲「邁爾斯將軍的波託里各野餐大會和月夜旅行」。

美國人民帶着快樂的愛國心接受戰爭。每班樂隊演奏蘇沙（Bossa）的新調「星條千古」（The Stars and Stripes Forever），每架鋼琴彈着音調不規則的進行曲「今晚舊城要熱鬧」（There'll Be a Hot Time in the Old Town Tonight）。黨派的畛域被忘却，如布賴安做一個內布拉斯卡團的上校。南北間地域敵對心的最後痕迹在國家情感的火中融化掉，著名南方騎兵領袖惠勒（Joe Wheeler）作戰於山地阿各，聲音爲聯邦旗子的一杖

值得十五年生命。當山地阿各陷落的消息於七月的熱天傳到時，從波士頓到舊金山都鳴笛懸旗。報紙急派它們的訪員到古巴和菲律賓去看趣事，這些記者吹鼓十幾位新國家英雄的聲名。英雄裏有愛奧華號的善戰的伊文斯（“Fighting Bob” Evans），於塞佛拉敗後在船上俘獲塞氏；德克薩斯號艦長斐立普（Philip），當一艘西班牙軍艦沉沒時，說「不要歡呼，弟兄們，可憐的傢伙們正要死。」物魯（Victor Blue）中尉，投身進入古巴叢林去探取西班牙軍隊的情報；何普生（R. P. Hobson）艦長，徒然努力的沉沒運煤船美利麥克號（Merrimac）去擋塞山地的各港口。超過其它一切英雄，出現有喬治·杜威（George Dewey），國家在華府給他一所住宅；和齒莽騎者的領袖狄奧多·羅斯福，他的戰功有助於他得到更著名的華府宅第。這好像是個理想的戰爭。它的死傷名單很短，它沒有費大債款，它提高美國海外威信，並使美國囊中充滿戰利品。

可是細細檢查起來，它有少可稱譽的方面。它的光榮是損害一個無助的敵人而得到的，因為敵人的抵抗小得可憐。西班牙海軍配備這樣壞，軍紀這樣亂，美國的射擊術雖然壞得可笑，而西國海軍還不能使美國船艦輕微致傷。在古巴的二十萬名部隊這樣受指揮不良和運輸拙劣的牽掣，當美軍迫近山地阿各城時，只有一萬二千人可以放到前線上。我們的勝利，部分可以歸因於銳氣和勇氣，但更大部的由於西班牙的衰弱。這些勝利的背景是一篇官僚政治腐敗、無效率、和拙劣的紀錄，這種紀錄，在有反省力的市民看來，十分可恥。陸軍部辦理得這樣乖謬，它的首長最近被迫退出麥金萊政府，讓出位子給整頓陸軍到一個高度效率的一位領袖——羅特（Elihu Root）。軍隊疾病死亡率不但是它醫藥部分的，並且是一般美國衛生和健康事業的一個嚴重反映。海軍設備須要辣手的辦。在華府麻木的政治把持軍政，再度表現。總之，狄奧多·羅斯福稱這戰事為「無準備的美國戰爭」，這話是正確的。陸軍不久提高到十萬名的軍力，成立一個常設的參謀總部，海軍迅速的擴大，海陸兩部分的專門職務加強。把戰爭的教訓放在心上，合衆國設法準備充分，為一九一七至一八年可怕的嚴重試驗。

在巴黎開會的一個委員會已迅速安排對西班牙的媾和。起的爭論，只有兩點。西班牙代表企圖堅持古巴應

承擔債務責任，那些債務是西班牙已在該島稅收的擔保品上訂立的；他們又要求西班牙得保存菲律賓的全部或一部分。但在兩點上，美國代表團堅執不讓。古巴復活為一個無債務的共和國。整個菲律賓羣島和波託里各都割讓與合衆國。因獲得這語言、文化、和政治傳統不同的異族的海外區域，美國似乎進入一個新途徑。布賴安、休爾茲 (Carl Schurz)、高德金 (E. L. Godkin)、杜溫 (Mark Twain)、和參議員賀爾 (George Frisbie Hoar) 所領導的反帝國主義者提起猛烈的異議。但那條約得到一般贊成，表現於一九〇〇年的選舉，使麥金萊以增加的多數再得政權。時間可以證明合衆國所承擔的海外責任一部分只是臨時的，並且證明美國衷心仍舊是非帝國主義的。歲月過去，它想減少它的海外領地，不擴大它們。

可是美西戰爭已在美國歷史中畫出一個重要轉捩點。美國到底承認自己是個世界強國；它漸漸不感覺孤立和自己為中心，它漸漸在寬闊的國際場面上佔二個主要角色。它自覺的成為落後民族的一位導師。在伍德 (Leonard Wood) 將軍這樣總督之下，改組、改革、和發展的大事業着手於菲律賓、古巴、波託里各，不久之後，於巴拿馬。我們開始訓練各種族，如意各羅特 (Igorot) 和摩羅斯 (Moros)，如吉卜令 (Kipling) 所稱的「新提到憂鬱的民族，半鬼半孩子。」黃熱病的克服，瑞德 (Walter Reed) 博士和其他軍醫在古巴實驗的結果，是個勝利，只這件事，值得戰爭全部費用。幾百年來，黃熱病毀滅過熱帶區域各處的生命，它又是我們南部口岸的一個常川威脅。直到美西戰爭時止，合衆國默契的依賴英國海軍以維持門羅主義；那時以後，它主張一個海軍不需外援而能維持主義。美西戰爭，特別和戰艦俄勒岡號從太平洋岸繞好思角到古巴海上的六十八天航程，使國內人人感覺到一條地峽運河的必要。最後，美西戰爭有助於增進英美友誼且沮喪德美關係，因為英國人慶祝美國勝利幾乎像他們自身的，而一支抱有猜忌心注視於馬尼刺的德國艦隊給予杜威不安和憤怒。

### 門戶開放：羅斯福政策

戰後對世界事務新態度的第一個特徵是門戶開放主義宣言。一八九四至九五年被日本戰敗的中國，成為歐

洲列強的犧牲品，那些列強護着它以擴張經濟特權和土地租讓。俄國得到北滿的實際佔有地；德國租借膠州灣，得到山東省的經濟權；法國得到各種優惠。英美兩國驚駭的注視這掠奪。它們重視中國的貿易，恐懼商業高壁壘的建立。正在美西戰爭開始之前，英國建議英美共同行動以保持中國的自由商業機會，但國務院感覺冷淡。後來在一八九九年，華府擺向一個不同的地位。工商業利益團體極力要求一個較堅強的東方政策，並且想到對外商業局會稱中國為美國侵入世界市場的一個最有前途的地點。教會利益團體聲贊助。貝瑞斯福勳爵 (Lord Charles Beresford) 對中國的割裂 (The Breakup of China) 一冊應時書籍喚起很大同情。許多人士在幕後顯出作用；最後，在九月，國務卿海氏 (John Hay) 請求在中國有益範圍的各國應許它們在這些範圍內不課特別關稅、港稅、或鐵道用費。雖然大多數答復包括一些條件，海氏在一九〇〇年年初宣告列強最後決定的批准。

一九〇一年秋奧多·羅斯福繼任總統後，海氏和羅特先後任國務卿，美國對外政策成爲兩主要部分。一部分集中於新的島嶼領地和巴拿馬要道，起初是美西戰爭的結果，和合衆國所得意外變化，使它感覺得在大西洋兩洋中居更可攻擊的地位。另一部分代表羅斯福個人在世界外交上的某種冒險事業，並且表徵合衆國到達一個世界強國的地位。這些冒險事業，主要的是一九〇五年海氏出面斡旋以停止日俄戰爭，和一九〇六年他參與阿爾西拉 (Algiers) 會議，需要稍稍注意。兩件事都是相關的，從羅氏的觀點上看，兩件事都是成功的。沒有一件有真正必要；日俄兩國或許新漢布什爾撲資茅斯 (Peramouth) 以外的地方解決他們的爭端，懷特 (Henry White) 用不着被派去支持法國爲北非港口和特權而與德國作歷史的決鬪。對美國人真正重要的倒是羅氏影響菲律賓、卡利比安海各島、和巴拿馬的對外政策。

我們可以加入他關於英美關係的政策；因爲人們雖然不揣測它，在兩次強有力的戰爭中，民主的、也是文化本身的希望，已寄託在兩大英法國家的合作上。合衆國，一位震顛的進入世界事務那寒冷場合的新人，看得夠清楚英國海軍非常有價值。英國在各方面都受着德國力量的威脅。在國際貿易上，德國的競爭；在非洲，德

國要占一份要求；在亞洲，德國對門戶開放的反對；在歐洲，德國的三國同盟和德國的海軍野心。德國在西印度羣島和拉丁美洲決無領土野心，這是的確——它的領袖們有些想在那裏得到個海軍根據地。因有明顯的原因，英美兩國在遠東、在卡利比安海上、和在他們所維持後來所謂「大西洋系統」的航路上，顯然相一致。

合衆國決定開鑿一條地峽運河這意思公開時，英國政府作寬大的讓步以使它的進行。一八五〇年的克萊頓勃爾威 (Clayton-Bulwer) 舊條約已規定兩國在任何運河上應有同等特權，兩國均不得在運河設防。國務卿海氏與駐美英大使間的商談，結果訂立海氏福斯特 (Hay-Pauncefote) 條約，恰於一九〇一年得到批准。規定合衆國得修築、維持、並管制運河（雖然不准費用上有分別待遇），它表示英國的放棄一切舊條約權利。英國並未要求交換條件，這種姿態，美國人正表示敬佩。不久之後，英國在委內瑞拉的債務問題上聽任自然，又使華府感覺滿意。英意德三國對卡斯特羅 (Castro) 總統聲名狼藉的政府有要索的權利。一九〇二年秋天，三國以其它方法，未能得到償款，它們同意於一個「協同威迫」的陣線。三國封鎖委內瑞拉海岸，佔奪一些砲艦，砲擊兩處要塞。合衆國願意見委內瑞拉被打得好，被打得厲害，但沒有別的。當英國覺得它的方法正激怒美國輿論，它便讓步。下議院中發生一場辯論，痛斥和德國的聯合行動，外部並聲言它願意避免任何武力的應用。美國人民比較英國的態度和德國人的策略，對英國表示嘉許；羅斯福後來說出一件戲劇性的故事（不準確，但或許非全無根據），說他怎樣使杜威和艦隊準備作戰以誘致德皇退讓。

二十世紀之初，英政府又設法以滿足美國人而激怒加拿大的方式，解決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邊界。據一八二五年的英俄條約，阿拉斯加加鍋柄的邊界是隨着位置 and 海岸平行的山峯，這樣一個形式，留給俄國一條三十哩寬的沿海地帶。合衆國承繼這條地帶。問題是這地帶是否圍繞海岸深灣頭上取鋸齒形狀的線，或是否經過灣頭切一直線，加拿大人希望在這些灣頭上得到港口。經過好久討論後，這事被提交到一班代表英、加、美的法學家。羅斯福專心於勝利，揮動大筆。但這實在沒有必要，權利是屬於美國人的；英國法學家阿爾佛斯東勒 (Lord Alverstone) 同樣贊助美國人。最後在一九〇六年，英國海軍重新分配為地中海、海峽、和東大西洋三

支主要艦隊，久以百慕達（Bermuda）為根據地以防禦西印度羣島的艦隊被召撤回。德國的威力迫脅逼這移動，但合衆國現在已有強大的海軍，體會到在卡利比安海能自由行動。

它是這樣情形，部分因為巴拿馬運河那時正在航行。羅斯福於一九一二年向一羣西部聽衆說，「這是運河能修築的惟一方法。」所說的前半差不多可以說是真實的。由一九〇二年制定的一件法律，國會授權總統收買舊法國鑿河公司在巴拿馬的權利，從可倫比亞國（Columbia）取得大西洋至太平洋一條土地的永久管轄權，並開始開鑿那大深溝。和可倫比亞的談判開始。但那共和國知道巴拿馬是它的資產之一，不願意和它分這杯羹。在華府所訂、由美國管轄六哩寬的一條地帶那條約，被波哥達（Bogota）參議院所駁斥。這樣的駁斥，在合衆國是司空見慣，美國參議院把重要契約切為細肉，不止一次。但羅斯福斥責它為侮辱，說可倫比亞政客的特徵是貪得和腐敗。他決計要在十二月國會再度開會之前，得到運河基址，因為他怕他假使不這樣做，他的一些計畫要傾覆。兩個其它有力的要素需要立刻行動。一個是法國公司，它在早期出讓上有四千萬的利害關係。另一個是巴拿馬人民，它們恐怕美國假使不快開始在那裏開河，它將要在尼加拉瓜修築。結果是很多人立刻發生一個在巴拿馬的革命的觀念。一位羅氏密友所編輯的「評論之評論」（Review of Reviews），發表一篇文章，「假使巴拿馬要革命，是什麼？」一個革命爆發的談論充塞華府的空氣，軍艦被調遣到巴拿馬海岸。法國經紀人忙着應付地峽問題。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三號，剛在軍艦那希維爾號（Nashville）到達哥隆（Colon）之後，國務院為這情形致電美領事：

「據報地峽有變事。隨時詳報本院。洛密斯（Loomis）代」。

駐巴拿馬領事，不是呆人，回電：「尙無變事。據報將在夜間。局勢嚴重。」兩小時後，他報告：

「變事發生於今晚六時，未流血。海陸軍官被囚。政府將於今夜組成。」

美國水兵登陸阻止可倫比亞軍隊應付叛變。華府立即接見巴拿馬公使，這新小共和國以非常的速度簽立一個條約，給合衆國這條被切望的地帶，代價一千萬遞減，和一個相當的年租。羅斯福後來說：「假使我用傳統

的保守方法，我們要提交一封或許二百頁莊重的公文到國會，而辯論還要進行。但是我們取得運河地帶，再讓國會辯論，當辯論在進行，運河也修築了。」這話十分確實。十年之內，得力於戈德爾斯（George W. Goethals）上校的工程天才和高格斯（William C. Gorges）的衛生學天才，那運河已準備施用。但羅斯福的蘭丹方法震動並驚駭起全拉丁美洲的公共情緒。

狄奧多·羅斯福被一個真正願望所激動，要和拉丁諸共和國發生較良好的關係，但他的政策和政策的結果都很混雜。當第三屆汎美大會安排在里約熱內羅（Rio Janeiro），他派遣國務卿羅特作南美友誼訪問。他明白表現他要和拉丁美洲修好。他把門羅主義看成美國以南諸共和國一個生命所係的護符。但他在這主義中加入一個系統，深深擾動起許多國。他指出自從合衆國不許歐洲列強暴力干涉延曠它們債務、佔奪外國財產、或虐待外國居民的刁悍小國，聲言這把一個不可避免的責任放在美國肩上。美國自己要看看這些共和國的舉動。他以他對特豐多明各爲這原則作例。一九〇四年該國受到干涉的威脅時，他勸誘它讓他建立一個美洲財政領袖者制度。這做爲建立卡利比安區域幾個事實上保護國的先驅。這政策爲了和平和秩序，但它激起拉丁美洲的恐懼，認爲合衆國正從事一個掠奪的手段。

在太平洋，羅氏所用的方針也有混雜的結果。美日關係開始成爲不安的根據。羅氏干涉一個日本和舊金山城間的爭執，那城對學校裏的日本人施以不平等待遇。用他最好的努力，他緩和日本人的怒氣，取得一個「君子協定」以阻止日本勞工移民，並且勸誘舊金山當局採取一個較爲和藹的方法。但因爲他認定一個警告是合宜的，他派遣艦隊作一次世界訪問，在訪問時停泊於日本港口，那裏接受殷勤歡迎。這是用他一句最常引的話的精神，那句話是：「嘴上和氣，手裏拿根大棍子」。

歲月過去，合衆國不但是個世界強國，並且是世界三、四最大強國之一，漸漸更明白了。它在兩個海牙世界和平事業大會裏有顯著的關係。它以道德的支持給予全世界民主主義和通商自由。儘管羅氏有時不圓滑和塔夫脫的「金元外交」——那就是用外交方法促進美國貿易——它在獲得拉丁美洲的信心上是有進步。儘管有時

的小刺激，它不斷和英國及英國海外領地處得更密切。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它仍然守孤立政策。它並不這  
樣很孤立，而疾速被牽入那可怕的漩渦。



## 第十九章 威爾遜與世界大戰

### 威爾遜

從各方面看，威爾遜是亞瑟孫以後美國政治上最非常的人物。一位學者智者，不愜於公共生活的騷擾，他們仍然是敏捷、有健全判斷力、多機智的人。他是一位想像家理想家，同時是林肯以後最澈底實在且靈敏的政治領袖。他在政治和國際關係上是一位道德主義者，他的盟約者（Covenant）前輩的精神復活在他身上。他調和古道的謙協和急性的奮鬥精神，對主義的熱誠和冷靜的頭腦。他的言論沒有布賴安的樸素性質或羅斯福的挺直氣勢，但有一種高超的辯才和一種詩意的美感，林肯以後無其倫比。他是一位政治學者，曾著幾部關於政府的大書；他對總統職務的性質、政黨制度、和合衆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有他自己很成熟的觀念；他準備實行這些觀念。「明晰、有力、高尚、冷靜，」像內務部長盧氏（Lane）所觀察，但他在心理上又高傲，脆弱，遇到阻礙時易怒。他對人沒有個人關係，吸引人們接近他如同接近一個抽象的主義；他從來不讓個人情感牽動他的政策，或寬恕一位未能配合他的高度標準的朋友。

威氏一生的大半時間消磨在學府裏，故普令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和校長。一九一〇年，新澤西的民主黨魁們推他出來做州政府的店窗裝飾，他承受了整個政治商店。兩年之內，他驅逐黨魁們於政壇之外，把新澤西從美國政治的一個腐敗的市邑變作一個模範州；在這過程中，他改善過許多他後來巧於應用的技術——倘若無人的勇氣，鎮靜的公平，堅持自己為黨領袖的地位，超過政客首領而訴諸人民本身，迅速和無情攻擊的戰術。威氏在新澤西的顯著成就，把他作成一位國家人物，得到布賴安這些人們的支持，給他總統候選提名；他本人坦白的真誠和無敵的競選辯才使他勝過羅斯福。

威氏的就職演說立刻成爲一個挑戰和一個願望。他說：

沒有人會誤解國家現在找着要用民主黨的目的。國家找着用它來解釋在它本身計畫和觀點中的一個變化。有些我們已經熟悉的、已經開始滲入我們思想和生命習慣中的舊東西，當我們新近以新的、醒悟的、批評的眼光考察它們時，它們已改變模樣。……有些新東西，當我們率直的考察它們、想了解它們的實在特徵時，它們來裝出久已被深信且熟悉的東西的模樣，充滿我們自己的確信。我們已在我們的生命中添進一個新識力。

接着來了一個成就新自由的建設改革的計劃，一個即時大膽且廣博的計劃。威氏說，「我們已逐項說明須要改變的事，」他提到一個把政府作爲私人利益圖手裏敏捷工具的關稅，一個完全適合於集中現金和限制信用貸款的銀行與貨幣制度，一個限制自由和限制勞工機會的工業制度，一個無效率和被漠視的農業經濟，和爲私人收益的自然資源的被掠奪。在它的積極方面，政府須爲人道服務而設——保護婦女、兒童、和被壓於特權下者的健康與福利。

這些改革該深思熟慮且有效的去成就。可是改革的程序不是單純科學的冷靜程序。

國家已經深切受到激動，被一個嚴肅的熱情所激動，被發見錯誤、被發見失去的理想、被發見常常壞亂且做罪惡工具的政府所激動。我們所具以面對這權利與機會的新時代的感想掃過我們的心柱，好像上帝親自降臨發出的聲音，那裏正義和慈悲趨於和諧，法官和兄弟是合一的。我們知道我們的事業不單是政治事業，而是一個反覆搜索我們的事業，搜索我們是否能了解我們的時代和我們人民的需要，我們是否他們的代言者傳話者，我們是否有純潔的心來理解和改正的意志來選擇我們行爲的崇高方向。

### 新自由的實行

這些是崇高的理想，流暢的說出，這位這樣奇異升到總統職位的大學教授能夠把它們變成法律嗎？他迅速

表示他的意思是義務。國會召集特別大會，當它集會時，威爾遜復活一個幾乎已被遺忘的習慣，親自向國會致辭。他說，「關稅稅則必須改變。」「我們必須廢除縱使帶有特權形態的一切。」這是個危險的爭點。從內戰以後，保護制度沒有過真正的間斷；克利夫蘭只從保護主義者得到細微的讓步，伶俐的羅斯福完全避免這爭端。阿拉巴馬的恩德伍德 (Underwood) 和田納西的赫爾 (Hull) 已經準備好他們的法案，在行政的刺激下，衆議院夠快的通過它。但當參議院對待它時，運動議員者唐集首都，像鸚鵡一樣，觀察家預料將重演一八九四年的一大失敗。威氏後來在一封公開信中警誡運動者。他說，「一般人民沒有運動……而大羣殿正人士設法造作虛飾的輿論以壓倒公共利益，爲他們的私利，這對國家有嚴重的關係。」這申斥發生效力，在他就職後六個月，威氏圓滿簽定一個關稅法案，以實現五十餘年來第一次真正降低的修正，忠實表現出政綱願望和競選誓約。

國家起來加以注意：這位行政首領說過什麼便打算什麼，計劃什麼便做什麼。威氏沒有給他的黨休息，甚至國會爭執着關稅率時，他向它提醒到他的就職時所希望——改革一個根據政府的需要以出售它五十年前的證券、并且恰巧適應集中現金與限制信用貸款的銀行與貨幣制度。這爭端，像關稅一樣，包裝着政治的炸藥。國家久已遭受一個不變的信用與貨幣制度的損害；每個人差不多同意於診斷，但少數人同意於治療法。當羅斯福執政時期，已經有權宜的立法，允許國家銀行發行應急的貨幣，一個貨幣委員會提出一套細密的各國銀行業務的報告。但一個銀行制度的澈底審查久已過期。銀行家集合來寫一種法律，以便他們繼續能控制；久已主張貨幣問題爲最重要爭端的布賴安，堅持政府應控制信用貸款。威爾遜，不甚明瞭銀行的技術情形，但不自研究第一第二合衆國銀行的歷史和後來獨立財庫制度的試驗，左袒布氏的意見。他說，「管制必須是公共的，不是私人的，權力必須屬於政府本身，因此銀行將是實業、個人企業和開創力的工具，不是它們的主人。」從延長的辯論所生出的聯邦準備法案，滿足這些要求。它分散集中的銀行制度，以較好的銀行便利給與被疏忽的南方和西部，並規定聯邦準備券爲政府管制下的一種有彈性的貨幣。聯邦準備制度來得適當其會，沒有它，政府未必能

渡過世界大戰的危機。

新行政的第三件主要立法成就是信託組合的管制。錫蘭曼法案反對勞工比反對實業的聯合更有效；新近的考查，顯示出工業、運輸、和銀行的管制集中運動急速在進行。布賴安寫入民主黨政綱道，「私人的專利是難辯護的，難容忍的，」正在關稅和銀行立法告一段落，威氏動着來完成這政綱條目。一九一四年的克萊頓（Clayton）反信託組合法令謹慎的給一些不正當手段下了定義，禁止可以傾向造成專利的價格上的不平待遇，禁止以「連環董事部」造成的大聯合公司的結合，並且使聯合公司董事個人負責背「反信託組合法律」的責任。同時成立一個聯邦貿易委員會以研究實業的運用，聽取不公平方法的控訴，阻止用發出停止訂單的損人手段。農民和勞工沒有被忘記。一個聯邦農民貸款法令給予農民低息率的貸款；一個貨倉法令，認可商品農產物安全的貸款，給人民主義者的舊倉庫計劃以實質的效力。克萊頓反信託組合法令的一個條款特別從它的規定免除勞工，並禁止應用訓戒於勞工糾紛——這禁止沒有得到司法的認可。兩個計劃取消工業中童工的法令通過國會，只是被法院所判決無效。一九一五年的拉福勒特海員法令把受苦迫的普通海員從久已忍受的暴政下解放出來，第二年的亞當孫（Adams）法令為鐵路勞工建立八小時工作制。

威氏這樣在三年功夫裏推進愈來愈重要的立法，為林肯以來的任何總統所不及。他已顯出國會行政領袖和政黨總統領袖之才的無疑的可能性。他已證明民主能在一個危機中迅速且有效的發生作用。

### 民主的對外政策

威爾遜的對外政策和前任的有明確差異，好像他的對內政策一樣。羅斯福在外交上喜歡使用「大槌子」，塔夫脫鼓勵所謂「金元外交」。這些政策使合衆國在世界政事上發生更大限度的影響，毫無問題；但是敵對拉丁美洲諸國，以它們為犧牲，並且把美國人牽入沒有真正利益的意外外交與實業冒險，危及美國人自己的福利。威氏的一個首次法令是撤消認可銀行家計劃借款給中國，因為他沒有認可借款的條件或責任的關係。同一

星期內，他宣告他要培養拉丁美洲諸共和國的友誼和取得它們信任；不久之後，在摩比爾（Mobile）演說中，他苦心宣告，特別排斥金元外交，發願合衆國永不再以征服的手段營求土地。把合衆國牽入幾個卡利比安海和中美洲共和國國事的形勢是有的，但在威氏在任時，威氏始終堅決拒絕以干涉爲掠奪的藉口。

威爾遜政策的困難，對墨西哥的關係可以充分說明它。那不幸的地方在狄阿士（Porfirio Diaz）的暴政下呻吟了三十五年，狄氏把他的國家出賣給外國礦業和實業利益團，把本國的人民陷到奴僕的狀態。一九一一年，中等階級和奴僕們發生叛變，驅逐狄阿士，推出自由主義者馬德羅（Francisco Madero）爲總統。這看來好像是墨西哥新時代的曙光；但兩年之內，衛爾塔（Victoriano Huerta）領導的反革命運動推翻馬氏，並把他暗殺。外國油業、鐵道、礦業、和地產各利益團，看見回到狄阿士的肥美時代，高興起來，大多數列強趕忙承認新總統。但威爾遜不然。他覺得承認衛爾塔是寬恕暗殺；他不被只顧自己利益的美國實業家的屢次灌輸所動。他預料他後來在一個更大危機中所要取的地位，說，「我們主張，正當的政府常建在被治者的同意上；假使沒有根據法律、公共正義感、和公共認可的秩序，便不能有自由。」這以道德理由爲承認根據的政策「先後被非議，被認爲背離正確的實行與利害得失的教訓。」像德皇所論，「道德是對的，但紅利怎樣？」但威爾遜，像六世代以後的佛蘭克林·羅斯福一樣，覺察得順從無法或承認暴力收獲，將會發生如何致命的結果。

威氏不但拒絕承認血手的衛爾塔，並且誘致英國支持他的政策——這支持從時常的讓步中獲得巴拿馬運河通行稅問題的利益。對墨關係迅速趨向更壞，當衛爾塔在坦比哥（Tampico）拘捕幾個美國水手，威氏立刻遣派水兵登陸於委拉克路斯（Vera Cruz）。戰爭看來不可避免，但威氏無意讓局面脫手，他把他要親善的墨西哥人民和他要決定消滅的墨西哥政府分開，結果他約束住國內的戰爭情緒，而巧使衛爾塔陷於難守的地位。他再捉住墨西哥危機的機會，以祈求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解決這糾紛，來表現他對拉丁美洲諸共和國爲平等國家的政策。當這幾國援助合衆國，衛爾塔被迫逃亡出國，憲政主義者領袖卡蘭薩（Carranza）出爲當局。甚至那時以後，困難繼續不斷。當墨西哥匪首維拉（Pancho Villa）侵入新墨西哥的哥倫布（Columbus），威氏遣派

潘興 (Perhing) 將軍率領一支遠征軍去討伐他。卡蘭薩怒憤這僥倖，美國極端愛國主義者嚷着要戰爭，但仍保持和平，讓墨西哥解決自己的拯救。被斥為畏意的「注視等待」政策，成就扶助墨西哥且贏得拉丁美洲諸共和國信任的雙重目的。

在兩個其它範圍裏，威氏的當政在和平的維持和條約的神聖上顯示它的興趣。現在主持國務院的布賴安，久已使人確信一切國際糾紛易於仲裁解決；有威氏的加護，他草成並和外國談判緩和的條約。這些條約規定一切爭端的仲裁與和解——那些牽涉國家體面的並不除外——並規定一切戰事準備須停止一年，作為一個緩和時期。這種條約談判過三十件，付諸實行的有二十二件；德國特別的連一件也不接受。一九一五年，早已輕用殘忍政策而最後將不免與合衆國出於一戰的日本，遞送它不名譽的二十一條給中國，國務院提出抗議，認為這些條款明明違背門戶開放和國際法。布賴安說，合衆國將拒絕承認美國權利的或中國領土與政治主權的任何損傷。

### 世界大戰與中立

但給美國和平最嚴重的威脅是歐洲。六月二十八號，一位塞爾維亞愛國者放了一槍，它的回聲響遍全世界；五星期之內，全歐洲銷閉在現代最大的戰爭中。美國的反響是個懷疑的和混亂的。當威爾遜總統正式宣告美國中立，他為一個同心一致的國家說話；甚至當他在思想上同樣在行動上鼓勵中立時，他表明出大多數美國人的態度。

可是美國人不能更不關心一九一四年的鬥爭，比起他們對一九三九年的鬥爭；中立，不論心理的或政府政策的，到最後被證明為不可能。美國的情感自始即強烈擁護從軍。大多數人民希望英、法、比戰勝。文化、傳統、共同制度、共同狀況的百種關係，存在着和英國民族相同；革命時期法國援助的回憶，法國比國人民英勇的抵抗，只是較少有力。比較起來更小的成分，主要者是威應血統呼聲的日耳曼族美國人，和先天嫉恨英國的

愛爾蘭族美國人，同情於中歐列強。德國在太平洋，在中國、在卡利比安海的政策，德國軍人的殘忍行爲，和德國知識界與政治家的傲慢，戰前久已疏遠美國人，比利時的無端被侵襲，堅定美國人對德國最壞的懷疑。德國人在政府和社會上代表專制的思想，假使他們統治歐洲，他們早晚一定會與民主的美國發生衝突，也是明顯的事。

這兩個動機——同情協約國，恐懼德國勝利的結果——最後在控制美國政策上是有決定性的。經濟的動機增加力量於感情的和政治的動機中。美國人民借貸大宗款項給英法兩國。美國工業迅速聯接自己於英法的戰事需要，供給大工廠、彈、猛烈炸藥、和其它材料，收穫重大利益。美國銀行爲協約國做買賣經紀人，流通協約國借款，建立協約國在美的信用借款。從戰前嚴重不景氣中恢復的美國農業，在英法找到棉花、小麥、和肉類的近便且有利的市場。那時，和中歐列強的貿易不足輕重，英國的封鎖同樣有效的控制了中立國貿易。

可是誘導威爾遜和美國人民認爲戰爭有必要的，不是這些經濟的動機，而是德國的「恐怖」政策。潛艇用於擊沉商輪，而它們不能救船員和旅客的生命。當一九一五年英國輪船魯錫坦尼亞號 (Lusitania) 被擊沉沒，死亡者一千一百餘名，其中美國人有一百二十八人，全國興起恐懼和憤怒的大潮。德國答應改正它的素行，威氏使國家保持着和平，但相信美國應當準備戰爭者人數和決斷都有增加。這時，威氏本人漸漸看出把合衆國置身戰爭之外的方法是結束戰爭本身。一九一六全年中，他極力勸誘交戰國聲述他們的戰爭目的並開關戰後世界組織的道路。

在一九一六年的總統選舉中，威氏得勝，大半因爲他保持美國人於戰爭圈外。可是他沒有爲將來給下約定，沒有答應購買任何代價的和平。當然，早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他警告過美國人民，他的話會被德國軍閥好好注意：

我知道你們正依賴我保持這國家於戰爭之外。直到如今我是這樣做了；我向你們保證我的話是，上帝幫助我，我一定——如果可能。但你們在我身上放有另外一個義務。你們已吩咐我擔任，使不要有什麼玷

辱或損傷合衆國的榮譽，那是不在我管下的事；那是依靠在別人所做的事實上，不是依靠在合衆國所做的事實上。因此，任何時候會有一天來到，那時我不能兼顧合衆國的榮譽與和平。不要強我做一件不可能且矛盾的事。

一九一七年初，德國人確認他們能在六個月內使英國挨餓而美國的幫助在那時不能見效，宣告重用無限制潛艇戰。幾個星期內，八艘美國輪船被擊沉沒；一件牽動合衆國與墨西哥和日本戰爭的陰謀的暴露喚起全國。兼顧榮譽與和平已成爲一件不可能且矛盾的事；四月二號，威氏出現於國會之前，請求宣告進入戰爭狀態：

傾導這和平的大民族進入戰爭，進入最恐怖最不幸的戰爭，是件可怕的事；文化本身似乎是在清算中。但權利比和平更可寶貴，我們要爲我們常常最帶近心頭上的東西而戰——爲民主而戰，爲那些服從權勢以得在他們自己政府中發言的人們的正義而戰，爲弱小國家的權利與自由而戰，爲一個正義的公共主權而戰，這主權由自由人民的合所造成，將給一切國家帶來和平與安全，最後並把世界本身做成和平的。對這樣一個事業，我們能奉獻我們的生命和財產，我們所是的，和我們所有的東西；人們知道日子已到，美國有權給它所寶重的生命、快樂、與和平而流血出力，我們真有那些人的自尊心。上帝幫助它，它不能做別的。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號耶穌受苦日，合衆國進入戰爭。

## 大戰

現在戰爭已到，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持政府的決斷以取得完全勝利。威爾遜等待到全國認戰爭爲必需的意見。這道政策被證明確實。不忠的團體比內戰時少並且更薄弱，它們到處無力嚴重的干涉戰爭努力。

「力，極高的力，無限的力，」威爾遜總統發過願，國家趕緊完成這願望。政府從來沒有在戰爭中顯過更



大的智力或效率，美國人民從來沒有更有力量表現過那能力、機智、與著名的發明天才。威氏被證明為最偉大戰爭總統之一，控制着戰爭努力的各方面，維持國內國外的士氣，從不忽略國家正爭鬥着的最後目標。他的有能的助手有陸軍部長培克爾 (Newton D. Baker)，財政部長麥克阿都 (McAdoo)，和戰事工業局主席巴魯赫 (Bernard Baruch)。政府所作處置需要比以前任何一次戰爭中所計劃的更遠具激烈性，它帶着速度和精力這樣做去。它成為工業、勞工、和農業的指揮者。它接辦鐵路和電報線。糧食是需要的，農產增加了四分之一；燃料是需要的，煤產增加了五分之二。政府以借款和稅收提高約三百六十萬萬美元，借出一百萬萬給它的同盟國，把其餘的化在自己的戰事努力上。最重要的是政府集中力量以爭取大西洋戰爭的勝利——在一九一七年的春夏，似乎只是失敗。以略取被拘留的德國船隻，徵發中立的並接收私家的航業，並開始一個巨大的造船計劃——一年內三百萬噸以上——大西洋戰爭是勝利了。

徵兵制早經票決，當戰爭終了以前，約二千五百萬名的註冊，多少說明這西方民主的巨大人力來源。但合衆國能訓練裝備一支陸軍，並載它到法國以及時防止德國前進的大潮嗎？那是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的大問題。

美國首次分遣軍隊於一九一七年六月登陸於法國——與其說它為軍事目的，毋寧說它為士氣上的效果而趕緊進發。七月四號，這小支陸軍遊行過巴黎香澤里 (Champs Elysées)，紅白藍的旗子在微風中飄動。惠特洛克 (Brand Whitlock) 描寫那光景：

我聽見樂隊正奏着「前進經過喬治亞」(Marching Through Georgia)。我忍耐不住。不戴帽子就下樓出門，跑到黎浮立路 (Rue de Rivoli)。沿杜勒里 (Tuileries) 大鐵柵欄下的街上，擠滿了人，從這柵欄到那柵欄，男、女、兒童，沒有秩序，快步走着，熱烈、驚奇，想跟上我們小隊步伐疾速的、穿卡機軍裝的正規軍。法國兵士穿着淺藍色服裝，在他們旁邊疾走，極力靠近他們，帶幾乎幼稚的興趣和驚奇的眼光注視他們，好像孩子趕緊跑上看馬戲班遊行。我們的兵被花朵所蓋，又時常被大眾不斷的歡呼，不

時有「美利堅萬歲」的呼聲。

但這只是一支表徵的隊伍；真正的美國陸軍還在合衆國背後的訓練營裏。

這有無可如何的需要，因爲一九一七年大戰是更壞的一回。十月裏，意大利陸軍敗績於卡波瑞託（Capporetto），協約國須急派援軍以阻住奧國的前進。一個月後，已經被革命所消耗的俄國人崩潰了，並乞求和平。新從俄國和巴爾幹前線撤下的德軍四十師團，急速開上西戰場。一九一八年春天，德軍在西線，數量上顯佔優勢，準備痛擊疲病的英法陸軍。第一次主要進攻於一九一八年三月開始；一星期內，德軍已衝破英國第五軍，虜獲戰俘九萬名和大量用品。四月間又來一次大進攻，海格（Haig）將軍發布他的著名請求書：「我們背靠着牆，深信我們動機的正當，我們每個人必須作戰到底。」第三次進攻開始於六月，德軍據馬恩河（Marne）右岸，協約國推福煦元帥爲統帥，並通知威爾遜總統，「戰事有失敗的大危險，除非協約國人數的劣勢能以美軍的降臨來補救，愈迅速愈好。」

爭取時間早已開始。合衆國政府準備一次巨大努力。航業被認爲優先於一切，大隊受護送的軍隊從美國港口啓航，裝載穿卡機服的步兵。三月中有八萬名被送出國，四月中十一萬八千名，五月中幾乎二十五萬名。十月左右，在法國的美國陸軍數目達到一百七十五萬名以上。

他們來得恰當其會。最初在蒙第地（Mondidier）和坎第尼（Cenigny），後來在柏樂伍德（Bellevue Wood），他們證明他們的勇氣；估低美國援助的德國指揮部，勉強承認「美國兵士顯然勇敢、強壯、且精巧。死傷挫折不了他們。」但是巨大危機還在前面。七月十四號半夜，德軍向馬恩河開始他們期待已久的攻勢，打算擊破協約國最後防線，且開闢到巴黎的路，離巴黎只五十哩。他們轟轟烈烈渡過馬恩河，到處獲勝，除却他們陷入生力的美國師團那裏。德國參謀長雷因哈德（Walther Reinhardt）說，「正在馬恩河，我們幾乎達到爲我們突擊師團規定的目標。……特別是第七軍各師已成功赫顯的初期勝利，除却我們右翼的一師。這帥遭遇美國單位。又有第七軍……面對嚴重的困難。它遇到美國生力軍意外頑強且活動的抵抗。其餘各師……佔得勢力和大量戰

利品，證明我們不能移動我們陣線的右尖端於馬恩河之南，進入有利於繼續戰鬪發展的地位。我們這樣所受的阻遏，是我們第十師與美軍間大戰的一個結果。」他又悔恨的說，「美國人看來是用之不竭的。」十八號左右，德國的攻勢筋疲力盡，福煦要求美軍反攻。他們反攻了，有顯著的成功。潘興將軍記道，「戰爭的潮流明白的轉了頭，對協約國有利。」從德國總理大臣赫特林 (Herting) 來到這形勢的確定。他後來記道，「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初，我確信……九月一號以前我們的敵人將向我們這和平建議書……：那是在十五號。十八號那天，即使我們中最樂觀的人知道一切無望了。世界歷史在三天之內演至終局。」

九月間，向聖密意爾 (Saint-Mihiel) 的進攻突起。潘興將軍記道，「我們師團前進的速度遠超過敵人。」死傷達七千人，但美軍掃去這突出部分，並虜獲俘虜一萬六千名為戰利品。後一個月，一百萬名以上的美軍在繆斯阿爾貢 (Meuse-Argonne) 攻勢中為主要的力量，結果擊破自負的奧登堡防線並毀損德軍的士氣。

這時威爾遜，善辯的解釋民主國家對戰爭的目的，在確定勝利上的貢獻，並不亞於軍隊的力量。他自始就主張我們的作戰不是對德國國民而是對他們的暴虐且專制的政府，他着手以這主張在德國散布分化。他又主張和平條件不應該包括割讓不出本意的人民，或懲罰性質的賠款。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致國會咨文中提出著名的十四原則為一個公平和平的基礎。這些原則是：公開商訂的公開盟約，平時和戰時的航行自由，國家間經濟壟斷的取消，殖民地要求的公平調整，在建設它自身的國策與它自身採取的制度上與俄國合作，以尊重民族自決的原則調整歐洲各國疆界，建立一「國際的大會」以供互相保證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

德軍被擊退却，德國的盟國瀕於崩潰，美國生力軍源源湧到前線，由這種種，德國政府看出，只有立刻媾和能夠避免德國本土的被侵入。它因此轉向威爾遜，請求他根據十四原則的基礎談判。外交折衝還在進行途中。國內兵變和革命進一步使德國的抵抗成為不可能。德皇退位逃亡，戰爭於十一月十一號告終。

### 國際聯盟與孤立主義

威爾遜到此已被證明是一位具有無上手腕的領袖。但戰事結束後，他做了不少次過失。他號召人民選舉一個民主黨的國會，人民怨憤這種存有門戶之見的舉動，在兩院中選出共和黨大多數。他決定親自出席和平會議，這樣一來，遠拂許多美國人的意思，他們覺得總統不應該離開國土；而這樣做去，威氏終於降低他在歐洲的威信。他未能羅致任何傑出的共和黨人——或任何具第一流能力的人物——到他的和平委員會。當他做了這些判斷的錯誤，戰事的疲倦、一個重新起來對歐洲的猜疑、一個消除幻想的感覺、和政黨的怨恨正瀰漫於美國。當他前赴法國，前總統羅斯福，公然嚴厲的警告「我們的盟國和我們的敵人」，說「威爾遜先生這時無論如何都沒有權限替美國人民說話。……他的十四原則和他的補充四原則和一切他所說的話，不再有任何權利的影子，可被認為表示美國人民意志。」

條約製造者——威爾遜、勞易喬治、克萊孟梭、奧蘭多，和一班小政治家——在恨、貪、懼的一個空氣中集會於巴黎——恨着敵人，貪着殖民地 and 賠償，恐懼着共產主義。那訂立的和平是個命令的、不是談判的和平。凡爾賽條約把戰罪定在德國身上，褫奪它所有的殖民地，規定重劃它所有的疆界，責成它負擔沉重的賠款。其它條款依照威氏民族自決的原則造成並承認業已存在的新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蘭、芬蘭、及立陶宛。在這些條件中，威氏不得不稍折衷他的十四原則；他願意這樣做，只因為他堅信一切錯誤可以經由國際聯盟的機構來糾正。

排除最強有力的反對，威氏終能在條約條款中織入國際聯盟。國際集會那觀念不是個新的，許多國的許多人士對那觀念的成爲明瞭已有所貢獻。但最後建立的國際聯盟却是威氏的創作。它的任務是「增進國際合作並促成國際和平與安全」。一切國家皆得加入爲會員，權力歸宿於強國組成的一個行政院 (Council) 和代表全體會員的一個會員大會 (Assembly)。國聯會員保證「尊重並保持全體會員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反對外力的侵略」，依著名的第十條，提交一切爭端於仲裁，使用軍事的和經濟的制裁以對待不願國聯而訴諸戰爭的國家。此外又規定裁減軍備，代管殖民地的政府，並產生一個國際永久法庭和一個國際勞工局。

當威氏帶着凡爾賽條約和國際聯盟回到合衆國，他遇到廣大激烈的反對。許多共和黨領袖——如激昂的且非常存門戶之見的參議員洛治 (Loche)——在爭論中看到一個打倒民主黨人且使威氏屈服的機會。對威氏個人的厭惡支配着一部分人的心理。日耳曼族美國人，意大利族美國人，和愛爾蘭族美國人全找到理由斥責和平的條件。在有些有復仇心的人看來，條約對德國似乎太鬆；在許多自由主義者看來，它似乎太嚴酷。一個巨大數目的美國保守份子恐怕捲入歐洲的紛爭中，並且回憶百餘年來美國大體上已經置身於舊世界的事外。

可是明顯的，多數人民——實在多數受過最好教育的團體——贊成國聯，而條約也時時不缺乏參議院的多數。假定威氏願意在第十條上妥協，即使為批准所必要的三分之二票數也許可以得到。但他不願意這樣做。他向一個參議院委員會說過，「在我看來，第十條似乎構成整個盟約的唯一脊骨。沒有它，國聯再多不過一個有勢力的辯論會。」但共和黨的反對使他不服；威氏把爭端訴諸人民，他們過去常了解過他，並支持過他對政客。當他赴西部號召，他的健康衰落下來；九月二十五號，他得了中風症，永未復元。他所擁護的主義是失敗了。一九二〇年三月，參議院末次投票否決凡爾賽條約和國聯盟約，宣告合衆國此後若干年到一個無生氣無勇氣的孤立主義的地位。

一九二〇年的選舉使共和黨以意外的大多數捲土重來，他們急忙把孤立作為一個政黨的原則。威爾遜，身體衰弱但精神不衰，強烈的消失去幻想，退休下來，看着他所預示的集體安全崩潰。他的生活，像他所讚美的那位彼得魯 (James Petru) 的墓誌銘：

不畏毀譽，不感諂媚，不恐禍難。

像他，

他以古舊的勇氣對生命，

以基督教的希冀對死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甚至比第一次更大，動搖了天空的這基礎，人們才承認威氏這樣英勇奮鬥過的原則的正確。

## 第二十章 從大戰到大戰

### 常態與孤立

威爾遜的失敗，新自由和國際主義的拋棄，安排起孤立和放任實現的局面，孤立和放任這兩個勢力支配此後十年局勢。共和黨對國聯實在沒有清楚的主張，而寧願避難於那爭點的一個巧妙的迷陣中。但該黨在一九二〇年選舉中所領導的絕大多數，使多數領袖——意志薄弱的哈定總統確在其內——深信孤立主義者爲人民說話，並且安置像約翰遜 (Johnson)、波拉 (Borah)、和洛治這些人士於有戰略力量的地位上，而傾向於不信任這班有國際心情的共和黨人，如休士 (Hutches)、羅持、塔夫脫、和蒲特勒 (Putler)。共和黨人一旦當權，急忙把當局地位給與孤立主義。

這在共和黨的和國家的歷史上全是向所未有的。合衆國向來不曾這樣傲然辜負過人類的希望：傳統的美國政策寧可說是履行領導世界的希望。共和黨前此也從沒有委身於孤立。格蘭特和秀華德 (Goward) 督促過進入卡利比安海和太平洋的擴展；布萊恩 (Blaine) 贊助汎義主義；麥金萊爲古巴人而領導國家去戰爭，並得到太平洋上的新殖民地；狄奧多·羅斯福爲國家在世界列強政治上爭得一個支配的地位。共和黨的傳統是個帝國主義的且國際主義的。

但現在，該黨犯了一個狹義國家主義和規避責任，可與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所遭遇的相比。可是真正的孤立是不可能的，合衆國不能仍然超然於世界別部分的事外。實際上，當共和黨當政的年頭，政府活動的參與以解決一些擾亂國際關係的更令人煩惱的問題。哈定總統護持一個減縮海軍的會議——有幾分成功。他的繼承者柯立芝，得到六十二國對巴黎公約 (Paris) 的支持，認定以戰爭爲國際關係的工具爲違法。調停賠償的楊格

(Young)計劃和道斯 (Dawes) 計劃由這起原，胡佛總統領導計劃一個償付戰債的延期令。所有共和黨總統促進美國加入世界法庭——雖然沒有實現——他們對和國際聯盟合作的一些事業，作試驗的姿態。

但這些對裁軍與和平的姿態，被美國超然於國聯的真正工作之外，和經濟國家主義的不斷發展所更均衡。孤立主義在經濟範圍裏實在有最嚴重的結果。恐懼着外國的競爭，渴望着外國的市場，傳染有經濟獨裁的觀念，美國從事一個新重商政策，充滿不但對本身而且對整個世界的危險。

早在一九二〇年，共和黨的國會急急通過一件計劃增高保護壁壘以對待外國貨品的緊急關稅法案。威爾遜總統在他的不裁可咨文中，力陳對這事的常識。他說，「如果美國有所懼於外國競爭時，那個時候已經過去了。如果我們希望歐洲解決它的債務——政府的或商業的——我們必須準備向它購買東西。這明顯的不是建立貿易高壁壘的時候。」但共和黨不顧這智慧的勸告；他們完全控制政府之後，不久就制定福德尼麥康伯 (Fordney-McCumber) 關稅，提高稅率到空前的高度，並有力的阻止歐洲各國售買貨物給美國人。八年之後，更頑固的共和黨多數通過美國歷史上最高的斯莫特豪雷 (Smoot-Hawley) 關稅；越過國內幾乎每個有聲望的經濟學家的反對，胡佛簽定了它。這些關稅不但把歐洲農場和工廠的出產品關閉於美國市場之外，而且引起報復關稅，把美國貨物也關閉於歐洲市場外。

但這只是經濟問題的一面。大戰和戰後幾年，眼見合衆國從一個債務國轉變為一個債權國。當大戰和復興時期，政府借給協約國和各聯合國家約一百萬萬美元；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裏，私人投資家傾注在歐、亞、和拉丁美洲的投資市場中又一百萬萬或一百二十萬萬美元。這些借款怎樣論功，最後，怎樣償還，假使合衆國不讓債戶售貨給美國人？對這切當的問題，共和黨政治家沒有立刻的答復。

整個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中，共和黨政策被這兩個矛盾的緣故所限制。對外國的負債，共和黨政權採取堅如鐵石的態度。在利息上實在有寬大的讓步，但關於償還本金的事政府是堅持的；像柯立芝說過，「他們借了錢，不是嗎？」但美國關稅壁壘一天不破，償還便絕不可能。實在，德國能繼續償還賠款和其它國家購買美國



貨物的唯一的路只有更借款給它們。

在國內的活動場上，哈定政權開始「常態」的時代——哈定的「常態」觀念是回復到哈那 (Mark Hanna) 和麥金萊的好日子。這不是有時所被認為純粹的放任，而是兩個政策的巧妙結合——一是不受政府限制的私人企業自由，另一是給私人企業的寬大補助。政府退出實業，但實業移了進來並接收政府。

在積極方面，這紀錄是動人的。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〇年的關稅構成對抗外國競爭的實際保證。在不知疲勞的胡佛所領導下的商業部，活躍的從事開闢國外新市場，並證實它是「世界上最堅強的爭取對外貿易的機器」這自負的話為正確。在國內活動上，商業部活躍的與大約二百個貿易聯合會和同業公會合作，極像後來組織的那些團體受國家復興署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的領導。胡佛奇警的說，「我們正從極端私人行動時期進入聯合活動時期。」國會決定以寬大的津貼給予運輸合衆國郵件的商船和航空公司。殷富的財政部長美隆 (Andrew Mellon) 所採取的賦稅政策，把賦稅負擔的一實質部分從富人肩上轉移到中產階級和貧民肩上。

同時，傳統的放任主義並不少受人們尊敬。戰爭時政府運用得特別成功的鐵路，在寬大條件下回到私人所有者手裏。大部分戰時建築的商船在可笑的低價下轉讓給私人公司。錫爾曼和克萊頓反信託組合法實際上已停止，行政和司法機構取一個未被要求廢除經濟法律的地位。放任主義最特徵的表現，和計劃政府建設與水電廠運用發生關係。一九一六年，威爾遜總統認可田納西河上筋灘 (Muscle Shoals) 的水閘建設，作為一個戰時處置，供給硝酸廠的動力。戰後，這些工廠水閘的部署成爲一件拖延且嚴重爭論的事。保守份子爭着它們該轉移回私人手裏；在有魄力的內布拉斯卡參議員諾里斯 (Norris) 領導之下，主張它們該繼續由政府所有且運用。一九二八年，一個請求政府運用的法案通過於國會，只是柯立芝總統不認可它。一九三一年，一個類似的法令被通過而被胡佛總統所否認，他的不認可咨文正確的表白他和共和黨所認定的「嚴格個人主義」哲學：

我堅決反對政府參加與人民故意競爭爲主旨的任何實業。……因爲聯邦政府故意出來建立且擴充一個機



明那些要停止理想主義的人士的期望。繼任他的柯立芝是一位澈底平凡的政客，頑固且無想像力，不大說話，不大有思想，着意在維持現狀，並且有病態的猜疑任何方式的自由主義。一九二九年受任總統的胡佛是一位能力遠較巨大的人，具有爲的行政者、有國際心情的政治家、和大人道主義者這種聲譽。四年當中，他讓所有三種聲譽都喪失去，做出格爾特以來任何總統所未有的種種更嚴重的判斷錯誤。

### 戰後幾年的社會

這三位總統，個性和性質各不相同，正好代表戰後幾年美國社會上的支配勢力。威爾遜時期的理想主義已成過去；羅斯福對人道主義的改革的熱誠還在未來。二十年代是昏暗的、庸俗的、無情的。柯立芝總統簡略的說過，「美國的事業是實業」，這種觀察假使不深遠，却是適當。厭倦理想主義，對大戰和它的再萌失去幻想，美國人致力於無恥的弄錢和化錢的熱狂。美國社會，甚至在麥金萊時代，從來不曾這樣唯物主義過，從來不曾這樣完全受市場理想和機器技術支配過。這是個巨大的和效率的時代，一般的稱讚都走到這些事上：工程師、股票經紀人、店員、廣告員、和電影明星是民衆英雄。美國人口增加一千七百萬，財富增加得甚至更可觀；假使財富發狂的被分配開，似乎夠過日子，人們流暢的談着「新時代」，每口鍋裏有隻雞，每間車房裏有兩部汽車。城市更大了，建築更高了，道路更長了，財產更大了，汽車更快了，大學更大了，俱樂部更華美了，犯罪更多了，聯合公司更有勢力了，都是歷史上從來所未有；昇騰的統計給大多數美國人滿意的——假使不是安全的——一個感覺。

這是個順從的和不容忍順從的時代，大多數美國人所認爲最具代表性質的文藝人物是信任一切見聞的白彼得 (George Balaban)。公衆對哈定政權討厭的醜事沒有激烈反響，也沒有處罰負這些醜事責任的政黨，是件明顯的事實；公衆反報答惡感於揭發這些醜事的或批評美國生活方式的人。偏執的種子已在大戰時期種下，戰後它們奇異可怕的生長出來。國家主義是極端愛國主義的；孤立主義負起政治的以至道德的知識的性質。對外

國人和外來思想有普遍的仇視。有激烈思想嫌疑的外來人成千成萬的被包圍驅逐出境；立法機構清除去社會主義者；各州企圖用法律強制人們效忠於政治和經濟制度。以擁有一百萬名黨徒自蒙的三K黨，從事於十年後歐洲獨裁者所採取的阿利安族高於一切那觀念，它的頭上蒙單子的黨徒恫喝天主教徒、黑人、和猶太人。宗教基礎主義形成爲立法的禁止講授進化論；檢查的法律刪削電影、戲劇、和書籍。批評美國實業設施者，不分皂白的包括勞動領袖、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或任何派別的「煽動家」——敢於懷疑實業的倫理或不肯向市場偶像折腰者，都是被仇視的對象。兩件聲名狼藉的案子——加利福尼亞的蒙尼（Mooney）與畢林斯（Billings）案和馬薩邱塞的薩可（Sacco）與樊賽第（Vanzetti）案——是正義的悲慘失敗；在兩件案子裏，被害者所受的懲罰由於他們的激烈主義比較由於他們被告的任何罪名爲多。

可是誇大這種偏見的深廣度，是件易事。最好記住，與其說它是由於仇視民主所鼓勵起來的，不如說是由於誤從民主所鼓勵起來的。整個時期中異議和反對的潮流猛急深沉。偏見沒有不遭嚴斥的；不公平下的犧牲者沒有太謙抑的，他們得到人們救助，擁護他的正義。關於蒙尼畢林斯和薩可樊賽第兩件案子最有趣味的事是兩件案子激起善辯且勇敢的抗議的事實——一件結果良好，一件結果失敗。自由主義的雜誌像「國家」（The Nation）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有巨額的讀者利風大的影響；鼓吹反抗福音的詩人小說家大得人心；學院和大學仍舊是思想與研究自由的中心，學者到處追求探討真理，不受政府限制或民衆仇視所拘束。整個這些年中，法院忠實的採取保護個人自由和擔保權利法案的立場。這不但是哈定、柯立芝、和胡佛的時代，這並且是布蘭代斯（Brandeis）、卡多索（Cardozo）、和胡謨斯（Holmes）的時代。

限制這世代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城市的成長和技術變化的加快。一九三〇年左右，美國人口一半以上住居於城市，它的大部分在大都會區域裏。城市是工商業、政府、娛樂、教育、文學、和藝術的中心。城市的觀念和生活方式傳播到鄉間。在電影、無線電、汽車、企業組合新聞特徵、國家廣告、和一羣其它影響的衝擊力下，省區色彩讓步給標準化。甚至在幽默上，恐怕最能表現國情特徵的形式，邊地的誇大話，讓步給「扭

「約人」(The New Yorker) 所供給的世故趣話或漫畫。

作成標準化的許多力量中，汽車、電影、和無線電容易是最重要的。它們實在是這十年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這三者當中，汽車是最舊的，在有些觀點上，是最顯著的一個。福特(Henry Ford)已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造成「汽油四輪車」，但直到新世紀的二十年代，福特的著名T字型和它低價的車子才成千成萬的開到路上。一九二〇年應用的汽車大約有九百萬輛；十年之後，數目增加到三倍。汽車打破孤立，加快生活，發現新的消磨閒暇方法，給少年一個新自由，造成巨大的新工業，給幾百萬人們工作，鼓勵一個普遍全國的築路計畫，準備對鐵路作劇烈的競爭，並造成每年死傷和內戰死傷同樣高的人數。幾年之內，汽車不再是個奢侈品而成爲一種必需品，恐怕是最必需的。當不景氣來到，汽車常是最後去的東西；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輪胎和汽油的定量分配使一般美國人的印象幾乎比其它的事更深。

電影和無線電，兩件相當新的，重要幾乎不亞於汽車。電影開始於二十世紀初年，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它還沒有成爲大時代的實業，而在一九二七年有聲電影降臨以前，沒有達到它的巨大影響。這十年的後期上，每星期看電影的人數在八千萬到一萬萬之間——極大部分是兒童。從電影中，這未來的一代得到它的生活觀念，時常是浪漫的並且極引人走入歧途的。對許多人，電影呈現離背灰褐色的現實而到烏有子虛的浪漫世界；那裏，罪惡常受懲罰，美德常受善報；那裏，所有女人都美麗，所有男人都漂亮而有武藝；那裏，富足使人快樂，貧窮得到滿意；那裏，所有故事的結局都圓滿。電影直接間接都運行了不可數計的影響。它建立衣飾的家具和室內布置的式樣，它創造通俗的歌曲，它教導禮節，指示風俗，並且造成通俗的男女英雄。它的影響廣被全世界，它也許是美國帝國主義最有力的工具。給英國、俄國、馬來亞、阿根廷各地的看官們，它帶去一幅美國生活的圖畫——常是一幅諷刺畫。

作爲一個娛樂、教育、和標準化的工具，無線電有同等影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無線電發展得很快，第一家商業的廣播電台於一九二〇年開始營業。十年之內，國內每個家庭，幾乎都能收聽阿摩斯安第

(Amos 'n' Andy) 或麥克卡賽 (Charlie McCarthy)，或新聞消息，或音樂。無線電像電影一樣，是個大業；也像電影一樣，它連結大眾的消費，並且要使它的節目迎合通俗趣味：研究無線電節目也許比研究別的更可以透露出通俗心理。在兩個範圍裏，無線電的目的超出通俗娛樂之外。它擔任教育節目——實在較薄弱——並且播送新聞政治演說。值得注意的是無線電仍然是個私人企業——很少例外——不由賦稅而由廣告者維持，那些廣告者爲了他們所賣物品的緣故而購買時間和相連的節目。美國人是否爲政府對無線電的不加管制而出了太高的代價，是一件意見紛歧的事。

### 大不景氣

胡佛就職時的形勢，比塔夫脫以來任何其他總統所遇的更有希望。對各方面，美國從來不曾更興盛，社會不會更健全。證券飛騰到令人頭昏眼花的高度，每個月內，幾萬萬美元的證券被貪得的投機者所插嘴，他們希望在新的賭博中從沒有變成有。工廠出產的汽車、水箱、無線電收音機、真空清潔器、和煤油爐子，趕不上新配件不知足的需求；鐵路歎氣着它們的負擔；成千成萬奇形怪狀的殖民地式、都鐸 (Tudor) 王朝式、中古哥特式 (Gothic)、西班牙式、帕布羅 (Pueblo，美國與墨西哥間印第安族) 式、和現代式的新房屋興起於大城市的近郊或南方和西部的新工業市鎮中。大學和電影院塞滿人；供應男人運動用具和女人化粧品成爲一種大實業；廣告術從一個實業的地位升到一種科學和一種藝術的更高地位。每天有新的希有的技術改良或科學進步擔保前程有更好的時候。這是個新時代，假使農人和非技術的工人沒有分享它的利益，那將待諸後來。一位享有工程師聲譽、證明自己是大人道主義者、且在商業部長的忠實事業上顯露他對實業文化的了解的人，來領導這新時代。這是適當的。胡佛曾自豪的說，「我們在美國，離貧窮的被克服，比以前任何國歷史的都更接近；」幾乎每個人都期待胡佛本人能慶祝那「最後勝利」。

一九二九年十月的破產終於來到，出人意外，令人驚奇。第一個破隙在那月二十一號來到；二十四號那

天，一千二百萬股以上證券在出售的熱狂中換了主；二十九號，殷實的證券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總電公司。總發動機公司的，也遭遇災難，一個星期內就跌了一百至二百點。那月月底，證券執有者所遭的票面損失在一百五十萬萬美元以上；那年年底，各種證券的跌價達到四百萬萬可怪的數字。幾百萬投資者喪失他們一生的積蓄。但不景氣的旋線並未就此中止。公事房關上它們的門，工廠停閉，銀行破產，幾百萬失業者在街頭走來走去，找不着工作。幾萬幾十萬家庭失去它們的家；稅收落到城市鄉郡付不起學校教師的薪水；建設工作只有停頓；已經大受打擊的對外貿易降到意外的低。

這恐慌和接着來的長期不景氣的原因是什麼？雖然政府不着手管餉夠正確的個人企業的過剩量，要說不景氣是實業周期的一個正常部分，却不能很令人滿意，也不很顯明。在一九二九年恐慌的情形中，有某幾種因素，分明是走上崩潰的。第一、美國的生產能力比它的消費能力大。這是大半由於國家收入一個太大的部分歸於人口的小部分，這些人們立刻把收入轉回到儲蓄或投資，而勞工、農人、和小雇員階級，他們的繼續購買力為整個實業制度基本者，收入却不夠。第二、政府的關稅和戰債政策很見效的減削美國貨物的國外銷路，市場同着三十年代初期的全世界不景氣崩潰了。第三、寬大的信用貸款政策造成過濫的信用膨脹、分期付款購買的大推廣、和無限制的投機。政府和私人債務總數達一千萬萬至一千五百萬萬美元，投機事業把證券和財產推到它們真實價值之外。最末，持久的農業不景氣，連續的工業失業，和財富力量集中在少數巨大聯合公司手裏的一種不斷的趨勢，產生一個根本不健全的國家經濟。

不論解釋怎樣，國家已在它歷史上最疲敵的不景氣關頭，是明顯的。一八三七年的恐慌延長到三、四年，一八七三年的拖到五年，一八九三可怕的不景氣到一八九七的春天才完，而一九〇四、一九〇七、一九二一恐慌都是短期的事。但一九二九的大不景氣幾乎拖了整整十年。它的長久與它影響及於社會概括的貧窮和悲劇是意想不到的。在另一觀點上看，它也和前幾次不景氣不同：它分明是豐足的而不是貧乏的產物。它比其它不景氣更能完全顯示財富和貨物分配制度的破產。

由於不景氣不是起於自然的而是起於人爲的原因，所以它顯然需要進取的政府行動。但這還沒有到近。大工程師（指胡佛）沒有解決辦法，他的政府是個繁榮的而不是不景氣的政府。他沒有完全推諉政府行動的責任，但他主張救濟完全是私人慈善事業和地方政府的事。他說，「作爲一個國家，我們必須使我們那些真實困難的人民免於饑寒，」但他頑強排斥每個直接救濟失業者或饑餓者的特殊計劃。他自始採取減少不景氣限度的政策；當那事不再可能，他採擇繁盛「正在轉角處」的政策。當英國和它的領地——許多其它國家也同樣——着實面對類似的問題——正從事於直接救濟、嚴密管制銀行業務、通貨和信用放款、劇烈的所得稅、農業津貼和農產物管制、大規模公共工程和貧民窟清除、遠大的經濟計劃這些細密的計劃時，胡佛政權自滿於設計鬆弛農村信用放款並使款項有利鐵道、銀行、和大聯合公司的政策。

這些政策顯然是不充分的，局面不斷的愈來愈糟。一九三二年左右，失業者人數達到一千二百萬以上，五千餘家銀行關了門，商業失敗數目三萬二千起，農產物價格跌到歷史上最底點，中層階級有被消滅的危險，國家收入從一九二九年的八百萬萬以上下降到四百萬萬。整個國家經濟似乎要崩散，人民陷於一個惡劣的情緒。

美國人是不傾向於暴力或革命的，在這危機中他們懷着希望，轉向另一個領袖人才。諾里斯、拉福勒特、邁斯第根 (Meigs)、和喀丁 (Cutting) 諸參議員所領導的一羣共和黨進步派詰難胡佛的政策，但他們力量不夠從老衛士手裏奪取政黨的權。美國必需向民主黨找解救。一九三〇年，民主黨大勝於國會選舉；一九三二年，他們準備接受總統職位。共和黨老衛士，沒有從不景氣學到什麼，大膽的再提名胡佛總統，胡氏再度號召以「嚴格個人主義」解決國家危機。民主黨擁出赫赫且有吸引力的佛蘭克林·羅斯福。羅氏爲紐約州州長，已顯出他是一位多機智、有膽魄、且通達人情的領袖；他發願給國家一個「新政」。在十一月選舉中，羅氏帶着七百萬票民衆多數的驕傲，得意的進入白宮。

### 佛蘭克林·羅斯福與新政



關於美國民主政治的一件最激勵人的事是：它在危急時常能找到偉大領袖。選擇有時是推究的且深思熟慮的，像華盛頓的情形；有時是大半偶然的。像林肯和狄奧多·羅斯福的情形。當佛蘭克林·羅斯福初次被選爲總統，這不能說是個不明白的數量；我們可以斷言，懷着希望選舉他的人，很少想到在羅氏這人身上，他們有了一位領袖——作爲民主政治和國家思想的代言人，他是林肯的匹敵，作爲改進世界的領袖，他是威爾遜的同情。

羅氏以一位有實效的且有社會心情的紐約州州長而得盛名，但在那以外，還有一個長期的政治上的功夫。出身於富家名門，畢業於格羅頓（Groton）學校和哈佛，羅氏早就決計效法白宮裏他的親戚（指狄奧多·羅斯福）的榜樣，對政治有活潑的興趣。他的早期嘗試有兩個顯著性質，爲他後來事業的特徵：對進步原則的熱誠，和一個從生活的一切部門支配人民信心的天才。他曾服務於紐約州議會，曾任威爾遜時期的海軍助理次長，曾在一九二〇年競選副總統。後來，他正在一個顯赫生涯的開始時，得了急性的麻痺症。他慢慢掙扎，恢復健康；在退出實際政治的幾年中，他研究美國政治史，並從通信和人物的接觸中造成廣大且熱誠的黨徒。一九二八年他以大多數選票獲得紐約州州長之職，兩年後以更大多數再度得意的當選。有這背景和經驗，羅氏或許是一九三二年美國最精明的民主黨領袖了。

但新總統在經驗和學識之外，還有別的特質。他像布賴安，對平民有極天性的信念；像威爾遜，對民主政治有極合理的信仰。他在政治上是敏捷的，了解做領袖的藝術，有用適當詞語的天才，和美國最好的廣播聲調。他在方法上是應變主義的，在目的上是堅實一貫的；他對非必要的事妥協，但對必要的絕少妥協；他知道政治是種科學也是種藝術；他不被社會能用藍印紙來改造、或政略能沖淡爲科學管理或工程計劃這些概念所迷惑。他是一位歷史、行政、和政治理論的學者，知道美國的過去，了解他所生活着的世界，心頭存有未來的世界組織。他信賴政客，但並不信賴專家；他易於感受輿論，但不猶豫於造成它，也不怕向它挑戰。他有廣闊的趣味，不知疲倦的精力，和一個有傳染性的快樂情緒，他把這情緒傳給他的左右，最後，傳給全國人民。態

度謙遜，演說簡單，無疑的他是一位大君子。

羅氏的就職演說是個未來事情的一個發願，像威爾遜首次就職演說同樣明顯，雖然不若威氏那樣善辯。羅氏斷言國家根本是健全的；「富足在我們口階前，但它的大度的用途使富足的外貌憔悴了。」過失在「換錢者」和「自私者」身上；這些人已被逐出殿堂，當前的事業是個復興。總統獻身於那事業：救濟貧乏，恢復農業工業間的平衡，監督銀行業務，重新調整國際經濟關係，開始善鄰政策，擔任適於一個大強國的國際責任。他勇敢的說，「我準備推薦一個受打擊國家在一個受打擊世界當中所需要的政策。這些政策：……我在我的憲法權限內設法儘早採取。」假使國會不能答覆，「我將向國會要求一個剩下的工具以應付危機——廣泛的執行權力以向專權宣戰，如同我們事實上被外國敵人侵犯時給我的權力一般大。」他的結論是：

我們面對刻苦的日子，這些日子橫在我們之前，在舉國一致的熱烈勇氣中，帶着追求舊日和高尚道德價值的明白意識，帶着老幼共同嚴正實行義務所產生清淨的滿意。我們的目標是保證一個圓滿且永久的國家生活。我們並不信任實質民主主義的將來。

這就聯演說送給國家一個正式通知——這將有一個新政。那新政已長久愈期。十餘年來，政客們玩着有記號的紙牌，實業界幾乎飲進一切賭籌。羅氏打算恢復民主遊戲的規矩。在許多同時人士看來，新政似乎像革命。實際上，它是極保守的——其保守意味與哲斐孫的和威爾遜的民主主義的保守相同。它的目標是保護美國民主本質，免得受左端或右端的暴力侵害——各利益團在憲法下的平衡，財產、人身、和自由的安全。

新政在哲學上是民主的，在方法是進化的。因為十五年來，立法改革已被閉塞，現在它們爆發於國家上好像暴力；但當水流平靜，可以明見它們順着熟識的水道流動。狄奧多·羅斯福已經開始新政的保守政策，鐵道和信託組合的管制開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布賴安曾主張而威爾遜已部分的完成銀行和通貨的改革，農田救濟計劃極得力於人民主義者，勞動立法淵源於威斯康辛和俄勒岡諸州的設施。甚至引起這樣大震動的司法改革，已經被林肯和狄奧多·羅斯福所預料到。在國際關係的範圍中，新政的政策顯然是繼續傳統政策：增強國

家安全、維持海上自由、支持法律及和平、與擁護西方世界民主。

### 新政的實行

當佛蘭克林·羅斯福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就職時，不景氣正在退潮，國家經濟制度正在完全崩潰的邊際。羅氏具有勇氣與魄力以應付危機，在他的第一屆任期未終了以前，他已比他的前任幾位建起更多更重要的立法機構。羅斯福政權給美國的新政部分由復元和救濟政策、部分由改革政策所結合成：許多確帶有兩個目的，常常不能斷定復原的出發點和改革的開始點。在救濟的範圍裏，政府以聯邦貸款扶助極受壓迫的實業界，不久即總計幾十萬萬美元。它着手一個廣泛且寬大的計劃，化錢在公共工程與建造住宅、道路、橋梁、和地方改良上，以鼓勵實業並供給失業。它建立起精密的失業救濟制度；一九四〇年左右，已經在直接救濟上用去約一百六十萬萬美元，在各項公共工程上又用去約七十萬萬。它開始遠大的保存自然資源計劃，其中主要工具之一是人民保存團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給三百萬來名青年工作。它應援鐵路、促成利益的統一、為長久過期的改良事業籌給款項。它把煤和油兩工業的混亂情形理出秩序。藉聯邦保護作家的計劃、保護戲院、樂隊、和公共建築物的裝飾，它給困苦的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援助，這樣大大豐富了國家的生活。在農工範圍內，同樣為救濟事業計劃過許多遠大的改革。

向永久改革方面着眼的是大都關於銀行、水力、農田、勞工、社會安全、和政治立法。新政在更嚴格的監督下，並以政府擔保銀行存放款來停閉銀行與重開銀行。它放棄金本位並將美元貶值，以造成一個緩和的管制的通貨膨脹，這樣提高了貨物價格。它建立售賣各種證券的周密管制，打破大取締公司，這些公司，已控制國家電燈供給實業的大部分，並常常巧使少數個中人獲利。它為實業提出公平設施的章則，企圖消滅浪費的競爭。它提高富人和聯合公司收入的稅，杜塞稅法的漏洞，並清除有關州政府和聯邦政府賦稅政策久已有的許多紊亂。它設立田納西流域局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藉政府所有水電閘的應用和一個廣泛的經濟農

業復原計劃，以開發美國內地一個大流域的資源；這極成功的冒險，被類似的、雖然奢望較小的極西部的各事業所做效。

新政改革應受特別注意的有四個大範圍：農業、勞工、社會安全、和行政。在農業上，改革的目的提高貨物價格到世界大戰前的水準，減少農產使它消除毀滅性的過剩，鼓勵地方的保持，使農民易得信用貸款，援助佃農和有限土地的人，為農產物開闢國內外新市場。這全部目的有相當部分的成就。一個仰賴某種商品農產物自動減少生產而以政府津貼償還的農業調整法令，通過於一九三三年。三年之後，最高法院宣告這法令無效，因此國會通過第二件且更好的農田救濟法令。這法令規定政府拿錢給與以部分土地從事「保存地方」農作的農民。一九四〇年前後，差不多有六百萬名農民參加這計劃，並受到每名農民平均一百美元以上的津貼。這新法令同樣規定剩餘農作物品貸款，擔保「常平穀」的便利，和小麥的保險。商品農作物生產因此所致的減少，加上美元的貶值和新市場的開闢，結果提高農產物的價格：一九三九年左右，農場收入超出一九三二年的兩倍。農業信用貸款局 (Farm Credit Administration) 使信用貸款幾乎可在名義的利率上得到；農業安全局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着手以農田所有權供給佃農和無餘力農民的復原。

在勞工範圍裏，新政制定一整套劃時代的法律。一九三三年的國家復元法令企圖展開工作，縮短工作時間，提高工資，消滅童工，保證集體商業權利，並認「黃狗契約」為不合法。這法令於一九三五年被最高法院宣告無效，但它的勞工規定被兩種基本的大法所改良：一九三五年的瓦格納 (Wagner) 法令和一九三八年的公平勞工標準法令。瓦格納法令保證工人有權利藉他們自己所選擇的公會以建立並磋商條件，禁止雇主歧視任何公會會員，並設立一個勞工關係局 (Labor Relations Board) 以判決一切勞工糾紛。這法律引起劇烈的爭論，但給勞工從未享受過的公平辦法。在它庇護之下，舊日的美國勞動聯盟 (A. F. of L.) 復活了，一個新的有魄力的勞工組織誕生——工業組織大會 (Congress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 I. O.)。這工業組織大會復活了舊日勞動協會 (Knights of Labor)，結果組織成前此破壞公會的鋼鐵、紡織、汽車、和其它工業。

公平勞工標準法令企圖「在工作時間頭上安置個天花板，在工資底下鋪設個地板。」它確定正常的工作時間每週四十小時，平常最低工資每小時四十分，它又宣告工業廠家用重工爲非法。」

保護失業、老年、和殘廢的立法也有根本的重要。到這時止，這些事還是委諸各州之手。有些州已制定有效力的失業保險和養老金計劃，但各州顯然不能單獨處理這究竟是國家範圍的問題。由於總統的主張，國會於一九三五年制定一套社會安全法令，規定養老金，失業保險，盲人、不能獨立的母親、和殘廢兒童的津貼，和公共健康工作的經費。這些計劃的費用部分由雇主擔任，部分由工人擔任；由各州經營，聯邦政府監督。儘管起初廣大的反對，社會安全計劃不久得到普遍的支持；接着的幾年，它的規定更加寬大，他的活動範圍也擴大了。

最末，羅斯福政權開始重要且遠大的行政改革。成爲狼狽樣子並且無效率又浪費的政府行政部分，被改組且改革了。哈取(Hatch)法令，也許一八八三年原來法令以後的最重要文官改革法規，禁止政府雇員方面「大有害的政治活動」，打擊政黨的腐敗和奢侈。一九三七年，總統深切掛念最高法院接連廢棄新政法令的意外判決，擬出一個改革最高法院的計劃。方法是促成老年法官的退休，灌注新血液進入法院；勸誘法院回到馬沙爾(Marshall)、斯託里(Story)、和和謨斯(Holmes)的偉大傳統的目的——那傳統是把憲法解釋成政府一個柔韌的工具，而不是政府的一個阻礙物。羅氏的特殊建議失敗了，但他的目的却已達到。最高法院，也許被批評所驚駭，且覺察到它本身的不適當與無力，對政府其它平等獨立部門所制定的立法採取較開明見解，並且翻變大多數它從前麻木的判決。羅氏的成就，這教導國家了解美國憲政制度的真正性質、並勸誘最高法院適應於美國民主政治，並非小可。

### 大戰的陰影

羅斯福的內政計劃被外交的騷擾所暴亂阻礙，像威爾遜的一樣。在他的第二屆任期就緒之前，國際問題顯

然要佔內政之先。威爾遜這樣熱誠計劃的集體安全制度，從二十年代開始，到三十年代，繼續崩解，並不減輕。對這崩壞，合衆國須負相當責任。它所斷然遵奉的孤立政策，褫奪國聯一個最大最獨立的世界強國的道德上和實際上的支持，關稅政策造成世界經濟崩潰，退出遠東顯出誘導日本繼續侵略，激動裁軍沮喪民主國家對海軍準備的現實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本已在二十年代的十年中種下。日本覺得國際聯盟砰然閉門，因此關起門來作進一步的擴張，並且怨憤英美在東方的力量。意大利不滿於它過期參加協約國所得的結果，它的虛誇的領袖墨索里尼渴望着光榮。德國憤慨戰敗，不甘於凡爾賽條約的束縛。經濟不景氣。人口增加的壓迫，社會的紊亂和腐敗，一切爲不能忍耐緩慢的和平調整法的新領袖，與反抗舊日假定和結論的新哲學，開了道路。日本實在不需要一種新哲學，它只需要武器以完成它的舊哲學。意大利轉向法西斯主義。德國經過十年紊亂後，讓一個顛狂的奧國第一次老行伍希特勒組織一個革命的國家社會主義黨並奪取到政權。三十年代初期，這三國都已組織成極權政府，且都已準備不但排斥凡爾賽和後來的諸條約，並且排斥國際法律和秩序的整個機構。

後來大事發展的迅速，沒有片刻休息。每個獨裁國家，先後爭取攻勢。每個建立它的軍事機構，危脅它的弱小隣人，着手帝國主義的冒險。這些冒險事業大多數在巧辯的立場上被解釋爲合理，並且見諸實行，大大提高侵略者的威勢，而沒有太尖銳的挑起民主列強的反對。一九三一年，日本佔中國的東北，建立滿洲傀儡國，從那優越的地點它向北側擊俄國，向南側擊中國。意大利早已鞏固它在多得卡尼斯 (Dodecanese) 的地位，奪取阜姆，擴展它在利比亞 (Libya) 的疆界，開始以侵略阿比西尼亞並在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征服那落後但可貴的國家，來復活羅馬帝國。德國排斥凡爾賽條約，重新佔領萊茵地帶，並大膽的着手大規模重整軍備。國聯提出抗議，外交家慨歎，民主領袖公開指摘，但沒有一個國家或國家團體予獨裁野心一個有力的阻止。

大多數美國人看着這些發展，漠不關心——實在是帶有不贊成的不關心。他們實在覺得這正是對抗的帝國主義的老故事的又一章。他們了解現在世界上被釋放勢力的革命性質，並不比大多數英國人了解得多。他們並

不覺察到他們現在已面對現代史上空前危險且有爆發性的威脅。他們反而自幸他們一切安全，有兩大洋的保護，自足、富庶且有力。

使大多數美國人了解懸在他們頭上和整個世界頭上的威脅的真實性質，確是件難事。那不只是軍事的威脅。合衆國從前遇過軍事威脅，結果是勝利的。這是件新事，新的且難理解的。美國人是懶散的民族，從不知道戰敗和頹廢，如桑達耶那（Santayana）所觀察，邪惡的觀念美國人心目中是沒有的。他們不信有一個排斥且攻擊他們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的新哲學出現了。

美國和英國政治哲學的核心是個人。個人是政治的源泉。他在社會上有權利和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職業自由，結婚和養育家庭的自由，不受國家的干涉。儘管我們的思想怎樣社會化，我們的政治或事業，實在還是成爲這種情形：我們政治和我們經濟的最終目標是造成並保護自由人。

極權主義，像意大利、德國、和日本所實行的，正與這哲學相反。極權主義哲學把個人隸屬於國家或種族之下。在法西斯和納粹制度中，個人比較的不重要，他的自由、權利、財產、志願和希望、社會的和家庭的關係，比較的不顯著。

這奧妙的對個人國家間態度的差異，影響及於民主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提供的整個價值系統。民主主義訴諸理智，法西斯主義訴諸權威；民主主義依賴合作，法西斯主義依賴服從；民主主義信任教育和真理的最後勝利，法西斯主義曲解教育爲宣傳，曲解真理爲國家的或黨的利益；民主主義加強信仰自由，法西斯主義利用偏見；民主主義實行公平的活動，法西斯主義實行背叛和恐怖。民主主義的目的是自由社會的自由人，個人的幸福和快樂。法西斯主義的目的是國家的、黨的、或支配者種族的勢力、財富、和光榮。

當極權主義的真實性質成爲明顯，美國人逐漸恐懼了；當德、意、日反覆它們的侵略，相繼滅亡小國家，恐懼變成憤慨。一九三六至三八年，西班牙遭受苦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軍隊飛機在那裏幫同國民軍推翻共和政體，民主國家袖手旁觀，麻木無斷。甚至當得勝的外國部隊猛擊馬德里的大門時，日本妄動「支那事件」，

拖了不少年，直到它變成一個普遍的世界大戰。一九三八年發生希特勒的暴力合併奧國於德國，大德意志也在準備中。捷克斯洛伐克是其次，在民主國家從奧國被併的震驚中復原以前，希特勒正要求英美幫助締造的小共和國割讓蘇台區。英法領袖驚恐了，向這爭端提訴仲裁。當仲裁被駁斥，張伯倫先生飛到慕尼黑，那裏他把捷克降於德國軍閥。張氏回來時說，「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但邱吉爾說，「英法該在戰爭與恥辱間選擇。它們選了恥辱。它們將有戰爭了。」

美國對這一切的反響不是未來世代帶有自尊心回憶的一個。由於上次大戰的結果而消失去幻想，擔憂捲入一個新戰爭，自信任何決定，如戰爭與和平。完全自他們自己手裏，他們採取一個任何代價的和平政策。他們急忙放棄他們祖先兩次奮鬥保存的許多權利，向世界宣告無論在任何情形下，任何交戰國，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不能期待他們的援助。這一切併合在一九三五至三七年的中立立法裏，那立法禁止和任何交戰國貿易或貸款給它。

羅斯福總統自始就不贊成這種立法，國務卿赫爾也是如此。羅氏現在極力向美國人民灌輸一個實覺，使他們知道國外世界上事情的性質，並極力在道義上和物質上武裝美國，來應付且克服它。一九三七年他在芝加哥演說，要求對侵略國家有一種道德的隔離，只是遇到責備，認為他在玩政治。他斥責日本的侵略中國，建立與拉丁美洲諸國和加拿大的友誼關係，並且力請國會急切需要較大的軍備經費。他警告獨裁者，「恐怖造成的和平比利劍造成的和平沒有更高或更持久的性質」；他不肯向恐怖認罪，也不被武力所威懾。當極權政策更加現出侵略性，美國反對它的氣慨更整。

## 大戰

英國也被慕尼黑所屈辱，被接着而起的捷克的滅亡所迫害，急切重整軍備，因為綏靖政策到底顯然是破產的。但希特勒不願等待到英美完成與德國軍事的平等。一九三九年整春夏兩季，他大聲威嚇波蘭，要求割讓但



澤和波蘭走廊；在仲夏時候，他和最有力的大陸國家俄國成立一個同盟，他的地位增強到不能計量。後來，甚至和波蘭的談判還在進行，希特勒進攻了。九月一號，他的軍隊滾過邊境，他的飛機向波蘭城市落下死亡和毀滅。兩天之後，英法兩國忠實於它們的義務，對德國宣戰。

兩星期內，德國已蹂躪波蘭，俄國從東方進軍，完全征服不幸的國家。接着是長期窮境，許多美國人空幻的名它爲「聲音」戰。春季，希特勒準備第二場。他的軍隊並不通知，開入丹麥，並開向挪威。英國企圖奔救強勁的挪威人，結果失敗，不到一個月內，全斯干的那維亞的資源進入德國掌握。五月十號，德國轉向西方，襲擊中立的荷蘭、比利時和法國。閃擊戰有一個月之久，終了之前，荷蘭已被征服，比利時軍隊已投降，法國本身已顛覆，而一支急忙趕過海峽的英國遠征軍僅被一個勇力和英雄氣概的奇迹所解救。

英國孤立了。但這已不是慕尼黑時的英國，也不是無益的挪威戰役的英國。這是一個記得千年以來沒有侵襲者統治它的國土的英國。沙士比亞自誇過，「世界的三面武力而來，我們要震撼他們。」國家命運和自由主義，被託付在他手裏的偉大領袖邱吉爾，響應沙氏驕傲的豪語：

我們將再證明我們能守我們的島國，渡過戰爭的風浪，生存得久於暴政危脅，必要時有若干年功夫，必要時單獨存在。……甚至歐洲的大部分和許多古舊有名的國家已經顛覆或將陷入秘密警察和一切納粹統治的討厭工具手中，我們將不搖動，不失敗，我們將幹到底，我們將在法國作戰，我們將在海上洋上作戰，我們將具增長的信心和增長的空中力量作戰，我們將保衛我們的島，無論代價怎樣，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着陸的場上作戰，我們將在田裏和街上作戰，我們將在山裏作戰；我們將永不投降，甚至如果這島或它的大部分被壓服並且挨着餓——這事我一時不相信——我們海外帝國，有英國艦隊的武裝和保衛，將繼續戰爭，直到在上帝的好時候，新世界和它一切力量前來拯救並解放舊世界。

「在上帝的好時候」——但這將是什麼時候；波蘭的被襲已經促起奴隸時代以來的最大辯論，不但在國會廳堂裏，並且在每家報紙上，在每所公共會堂中，在全國每家人家裏進行。羅斯福極力申請廢除中立立法；經

過長期討論，他可以從有難色的國會扭奪到「現錢與運煤」立法，這立法至少使在戰爭中的民主國家能得到美國資源。法國的傾覆終於使大多數美國人覺悟到德國軍事機構的力量；那年夏秋英國的被空襲帶給美國人一個實覺，假使英國傾覆，美國將軍獨對着歷史上最堅強的軍事團體。

面對這可能性，國會爲重整軍備通過天文數字的款項，和拉丁美洲諸共和國訂立協定，推展新世界民主國家領地的集體防護，合衆國和加拿大成立一個聯合國防部，並開始約一百萬人的平時徵兵制與軍事訓練。甚至比這些舉動更重要的是因此訂立的羅斯福與邱吉爾的驚人協定，爲報答五十艘驅逐艦起見，英國租借給合衆國一套從紐芬蘭到英屬基阿那的海軍根據地。羅斯福說，「這是路易西安那購置以後我們國防的最重要步驟」；邱吉爾說，「英帝國和合衆國這英語民主的兩大組織，在一些它們相互與一般利害上，似乎要混合起來。」這是個預言的觀察。

羅氏已畫出國家要走的路線：他能使國家走着那路線嗎？一九四〇年夏天，美國人民被要求選一位要指導他們渡過前面危險年頭的總統。民主黨人大膽的放棄反第三任的傳統，再提名羅斯福做他們的候選人。共和黨人一個紊亂空氣中應付這事，選擇一位政治的新進者，印第安那和紐約的威爾基。民主黨和它的領袖直往不變的委身於援助英國的政策——一個勢將引入戰爭的政策。共和黨和那新的無經驗的候選人將擁護相反的政策嗎？威爾基攻擊新政的國內方面，但堅決拒絕向援助英國的政策玩政治。在這嚴重的政策上，他實在和總統站在同一方面，擁護徵兵制，贊助驅逐艦辦法，並且發願，如果他被選，他將不掉轉總統已標出而國會已走着的道路。這是個偉大且有政治家風度的決定，這顯示共和黨終於在威爾基身上找到一位有勇氣、有智慧、有想像的領袖。

在十一月大選中，羅斯福又當選了。現在自信有民衆的擁護，他猛力推他的政策。當國會開會於一月，他咨送一件計劃，租借法案，企圖策略中立立法餘剩的限制。這政策規定合衆國得出借或出租任何國防物品或便利給與任何國家——那國家的國防對合衆國的是有存亡關係的。經過長久辯論，這辦法被通過；在它的深慮的

規定之下，巨流的飛機、坦克、原料、糧食、和其它物資開始渡洋到英國和它的盟邦。這政策顯然是非中立的，但合衆國現在從事於擊敗德國，不停著來吹求國際法了。接着有其它同樣非中立的法令——勒收軸心國航業，凍結軸心國款項，轉讓坦克車與英國，佔據格林蘭，後來佔據冰島，推廣租借法給新盟邦俄國；最後，在一串潛艇襲擊美國航船的事之後，總統命令發見任何敵方潛艇即予射擊。

民主國戰爭目的的表示，其重要並不亞於這些對戰國中民主國需用的物質貢獻。八月十四號，羅斯福、邱吉爾會面於中大西洋，在那裏起草成大西洋憲章，包括若干原則，他們把這些原則作爲「他們希望一個世界較好的將來」的根據。這些原則是：不擴張領土，不變更有關人民所不同意的領土，人民選擇其自己政府方式的權利，一切國家享受貿易與原料的出入口，國家間經濟合作，海上自由，放棄應用武力爲國際關係的一種工具。這是威爾遜的十四原則穿着新的簡單裝束。

合衆國似乎要陷入對德戰爭，但那陷入也似乎要成一個長期的。合衆國已經下它的決心，但它還不敢把決心屈服於戰爭的命運。這時遠東更緊張了。日本早已正式參加軸心國，現在利用英美牽入歐洲戰爭的機會，大膽推進它的「新秩序」——日本人要統治整個東方和太平洋的一個秩序。綏靖政策被證明是徒然的，英美兩國都採取對日一個更有決心的態度。這是同樣徒然的。日本軍閥現在當權了，他們嘗到勝利的滋味，他們自信更大的勝利在前面。在十一月裏，當俄國人正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之前英勇作戰，英國正作戰於大西洋，日本傾注軍隊入進法屬越南，並在泰國沿邊上準備空軍根據地。十二月六號，局勢十分嚴重，羅斯福總統親自寫了一封信給日本天皇，請他參加以求能維持和平的解決。

日皇似乎沒有收到這信。因爲日本現在已經準備作現代史上最拼命的孤注一擲。在十二月七號星期日，它以毀滅性的猛力襲擊美國在夏威夷、關島、中途島、威克島、和非列賓的前哨。大戰來到了。

八十年前，民主詩人惠特曼 (Walt Whitman) 寫過：

美利堅走的是平坦和平的道路，

走久了，太久了，  
你只習見快樂和繁榮。

但現在呵，現在，

在慘痛的危機中學習，

前進，現在和甚可怕的命運與退縮奮鬥，

現在，讓世界想像且看看，

你的子孫的團結真怎樣。

在惠氏所寫的那場偉大內戰中，美國已經讓世界看見它的子孫真實是怎樣的。用林肯的莊嚴句子說，它那時好像「地球上最後最好的希望」。現在它再度被賜與機會，讓世界看它的子孫真實是怎樣的，再度有機會作為「地球上最好的希望」來完成它的命運，來擁護它的稱爲自由人的國家的尊號。